

· 谁也逃不掉的泡沫大破灭 ·

经济如此动荡 你要早作打算

吴学军 罗世滨 · 著

我们是不是该进行股市抄底？
我们是不是该看好升值的人民币？
我们是不是该投资黄金白银？谁是助推房价的帮凶？
谁是操纵经济的幕后黑手？中国经济会崩溃吗？谁能看清泡沫本质？
谁是洗劫财富的杀手？我们应该如何与危机共舞？
我们将走向何方？我们是不是该狠狠心去买房？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兼首席风险官
《财经》杂志原主编，《新世纪》周刊总编辑
香港证监会原主席，中国银监会首席顾问

汪建熙
胡舒立
沈联涛

联袂推荐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经济出版社

经济如此动荡 你要早作打算

吴学军 罗世滨·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东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如此动荡，你要早作打算/吴学军，罗世滨著. —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
2012. 7

ISBN 978-7-5454-1216-1

I. ①经… II. ①吴…②罗… III. ①中国经济—泡沫经济—研究 IV. ①F124. 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 068182 号

出版 发行	广东经济出版社（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11~12楼）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天顺鸿彩印有限公司（北京大兴区西红门镇团河路10号）
开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	18.75
字数	249 000
版次	2012年7月第1版
印次	2012年7月第1次
书号	ISBN 978-7-5454-1216-1
定价	4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广东经济出版社常年法律顾问：何剑桥律师
•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

自序 PREFACE

泡沫的形成与破灭，实际上是财富的快速再分配，是天堂，也是地狱。天堂和地狱之间只隔了薄薄一层纸，天使晚上睡觉说的梦话，地狱中也清晰可闻。我们当然是愿意到天堂里与天使共眠，而不是躲在纸后面听梦话。

但很遗憾，绝大多数投机者都被魔鬼抓到地狱的黑暗深处去做苦力了，有幸聆听天使梦话的只是少部分主流经济学家，因此他们对天使梦话的不同解读也就成为下一轮泡沫中的畅销书。

本书不是解决天堂和地狱问题的，我们也不能聆听天使的梦话，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做苦力，只是做苦力之余，难免会生出一些想法。之所以说是想法而不是思想，是怕上帝他老人家发笑，也怕读者诸君哂然。想法比思想要简单得多，看见美女就想多看看，看见美食就想去尝尝，这些都是想法，而不是思想。

思想是不屑于这些的，因为过于低级。其实，做一个好的思想者很不容易，首先得姿势正确，弯腰屈膝，右手托颌，目光深沉，如罗丹雕像《思想者》一般；其次得恰好站在地狱之门的顶上，可以俯视在不知不觉间走向地狱的众生，并为他们多舛的命运深怀悲悯。

我们有的只是想法，因为自己或许也正在“思想者”的注视之下，那沉重的目光似乎在告诉我们“慢点，再慢点，前面就是地狱！”我们因此觉得心里隐隐作痛，有时候就难免想开溜，或者想在路上多停留一会儿。

经济如此 ，你要早作打算

其实这很难，因为泡沫的盛宴已经开场，已经有很多人在享受饕餮大餐了，还有少部分人正在漏夜赶往盛宴途中，而肥胖溜圆的大厨们则系着围裙忙不迭地在门口拱手招呼。“守夜人”也赶来了，已经喝得酩酊大醉，拉着大厨的胖手一个劲地称赞“您是我们国家的经济英雄”。

在流动性过剩的今天，与泡沫共舞已经成为必然。面对泡沫这个妖媚动人、才艺多方、身着镂空拖曳长裙的美女，你千万不要以为那是琼瑶笔下纯情的美少女，很不幸，她已经是饱经沧桑的少妇了，“她的最大成就，就是当好拉客的妓女”^①。我们需要与泡沫共舞，但千万不要被这个窈窕少妇的外表蒙蔽双眼，我们应该在最后一支安魂舞曲响起之前离开，而不是在舞会结束后留下来收拾。

人类在与泡沫的共舞中，不断被忽悠，这是对人类这种高智商动物的莫大讽刺。因此有一些听到过天使梦呓的学者颇为不服，他们不相信在资产泡沫破灭以前，无法确切预测泡沫是否存在。在他们看来，历史就算不会重复，也会押韵，跑不了调，泡沫的一些先行指标还是可以在破灭之前被识别的。

是的，本书也将这些列举出来了，但麻烦的是先行指标有时行得过于超前了，在市场参与者看来没有多少指导价值，他们需要看见“哧哧”冒烟的导火线。很可惜，有时导火线或者是自行熄灭，或者是威力不够，泡沫小挫以后还可以再创新高。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泡沫只有在破灭之后才能成为真正的泡沫，而泡沫的生成与成熟其实也很不容易，中途难免会被放些气，经历一些挫折。挫折越多，泡沫就越成熟，其中的某些挫折可能就将部分投资者吓出去了，也可能将新的投资者吸引了进来，而当最后一根“哧哧”响着的导火线燃尽时，也许很多人已经不以为意了。

^① [美] 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 1929 年大崩盘 [M]. 沈国华译. 上海: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6.



泡沫经济并不一定只存在于市场经济体制，在我们看来，计划经济体制下也有，但其表现形式却是“短缺”，“短缺”的背后其实是投资饥渴导致的整体“经济增长泡沫”，经济中充斥着虚假、无效，甚至是有毒的增长，并不能带来民众福利的同步提升，很多时候反而会损害大众福利。

市场经济中，资产泡沫的破灭是市场对经济的“强制清算”。计划经济体制下，市场无法发挥作用，经济无法通过市场完成“自我清算”，泡沫经济的破灭通常伴随着剧烈的政治和社会动荡。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资产泡沫破灭过程也远较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痛苦和深刻，并会对政治和经济体制形成强烈的冲击，政府介入经济的程度越深，冲击越大。

不可否认，中国经济在创造增长神话的同时，也形成了巨大的以房地产为代表的泡沫经济。不敢说房地产泡沫是否超过波斯湾“明珠”迪拜一千倍，但也远不是所谓的“结构性泡沫”了，其绚烂程度远非沙漠中的海湾可以相比的，“逗你玩”、“蒜你狠”那都是小菜，仅仅将宛如有中华文明印记的玉石、红木和一切真真假假的古董泡沫，呈献在西亚人面前，就会将他们羡慕。

可惜，古老文明依然绵延的只有中国，日本泡沫时再有钱要装文化也只能天价购买凡·高的《向日葵》^①，轮不到自己的菊与刀，而中国随意炒炒玉石，价格一年涨几十倍是可能的，无他，泡沫印上文明使然。

但很遗憾，再绚烂的烟花也只是过眼云烟，再刚性的泡沫也终将无情破灭。泡沫破灭对于成长中的经济体而言是经济的“成人礼”。面对“成人礼”的到来，有的跳过一次悬崖后，成为“大人”；有的需要实行“割礼”，丢弃一些东西后方可成熟；有的则需要独自跨越冰原，或者背负一块沉重的石头游过海峡……如果以为在“成人礼”上喝点酒闹点事，或者

^① 《向日葵》，布面油画，是凡·高在法国南部画的同一题材的系列作品，创作于1888年。现藏于英国伦敦国家画廊。1987年3月，在伦敦拍卖会上，凡·高的《向日葵》以大约59亿日元的天价被日本人买走，这个消息震惊了全世界。后来，凡·高的作品《鸢尾花》和《迦赛医生像》分别以73亿日元、127亿日元卖出。

经济如此 , 你要早作打算

任性狂欢一阵就可以通过，那只可能迷失。

泡沫破灭是痛苦的，尤其是当泡沫被当作经济体的“成人礼”时。在经济体的“成人礼”面前，各国经济体应对措施的不同使得各国经济状况大相径庭：有的通过彻底的政治和经济秩序再造，顺利走向了成熟；有的则心怀侥幸，希望蒙混过关，因此从“无所不能”跌入“失去的年代”；有的则既不愿彻底割掉“包皮”，也不能独自行走冰原，因此依然在萧条的烂泥塘里打滚。

泡沫破灭是“清算”，也是重建。经济体制的某些缺陷导致的泡沫，唯有通过制度系统性的改革方可跳出泡沫破灭后的泥潭。

我们与泡沫的决战才刚刚开始。如果我们将泡沫的破灭视为新的改革推动力，并以此凝聚人心，形成新的共识，我们完全可以从制度上奠定未来经济发展的良好基础。

资本主义制度是有缺陷的。在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看来，这种制度无法永远存在下去，它会被自己的成功毁灭。被列宁称为“布尔什维克死敌”的凯恩斯也认为不确定性使资本主义经济并不能自动实现均衡，因此需要国家的干预。以凯恩斯正统继承人身份自居的克鲁格曼^①在面对这次世界性金融危机时也承认“最近一连串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出了问题”^②。

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未能发现一个没有不确定性、永远均衡、持续繁荣的经济模式。事实上，由于人性的缺陷，我们也不可能期望建立起没有任何缺陷的经济制度。

美女都已老去，剩下的只是蒙娜丽莎式的微笑和飘荡在大观园上空煎药的余香。如今中国的“美美”们要么姓“郭”，要么姓“卢”，不是“红

^① 保罗·克鲁格曼：保罗·萨缪尔森的得意弟子，2008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1996年曾准确预言亚洲金融危机。

^② 吴易风，王晗霞。克鲁格曼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和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十字商会总经理”，就是“吸血鬼美人鱼”兼“中非希望工程执行主席”，来头都大得吓死人，但其本质却不过是利益的代言人，是泡沫。

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可以期待更好的制度、更人性的发展、更和谐的社会。正如顾准所言：“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所以，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① 经济增长本质上应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反映了社会福利的同步改进，而不是数字和货币的游戏。

本书是泡沫经济的附带产物，也许亦属于泡沫。书中一些东西还是碎片式的，较完善的系统性似乎还是缺失。这是力有不逮的缘故。我们希望这些碎片都在一根隐隐的丝线串联之下，为读者提供更多的启示。

是为序。

吴学军 罗世滨

^① 顾准．顾准文集 [M]．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07.

第一章 逃不掉的泡沫大破灭

回望历史，着眼当下，货币金融投机之下，必然引起资产泡沫的产生，当资产泡沫越来越大时，经济的动荡就在所难免。然而，泡沫终究是泡沫，绚烂过后，终将破灭。世界上很多国家都上演过泡沫的故事，而最终的结局无一例外是悲剧。

第一节 逃不出的金融投机 / 005

金属货币的进化 / 006

金属货币下的投机游戏 / 010

投机的最高境界——货币成为掠夺工具 / 013

第二节 无处不在的泡沫迷幻 / 019

郁金香泡沫 / 020

南海泡沫 / 021

华尔街大崩溃 / 023

硬通货虚化为不靠谱的信用 / 024

现代金融幻术 / 027

经济如此 , 你要早作打算

第三节 疯狂、惊恐与崩溃 / 032

识别投机狂热 / 033

崩溃时刻的到来 / 036

疯狂、惊恐、崩溃 / 038

第四节 泡沫破灭的导火线 / 041

泡沫导火线探秘 / 041

泡沫可以杜绝吗 / 047

第二章 流动性泛滥与中国泡沫

货币的发行似乎永无止境，我们的工资似乎越来越高，但能买到的东西却越来越少；我们不断被变成“百万富翁”，但同时也正在被变成“房奴”、“车奴”；身边的千万富翁似乎越来越多，但我们又感觉日子越来越难。

当下，各个领域的泡沫都在膨胀，我们要小心，小心，再小心……

第一节 泛滥的流动性 / 056

超发的货币 / 057

繁荣与泡沫共生 / 063

与泡沫共舞 / 066

隐蔽的滞胀 / 072

财富的“乾坤大挪移” / 076

第二节 隐蔽的吸金黑洞 / 079

“看空”中雄起 / 081

泡沫黑洞 / 085

国企黑洞 / 088

炫富的时代 / 091



第三节 泡沫的制度基础 / 094

日本泡沫的制度基础 / 094

东亚泡沫的制度缺陷 / 097

金融自由化与泡沫 / 098

计划体制下的“短缺”与“泡沫” / 101

中国泡沫的制度基础 / 103

再读明斯基 / 108

第四节 中国房地产泡沫 / 110

房地产发展历程 / 111

调控声成为涨价的协奏曲 / 113

房地产泡沫的国际比较 / 116

房地产泡沫刚性的制度成因 / 123

第三章 激荡 30 年的喜与忧

30 年的发展，我们消灭了绝对贫困，消灭了文盲，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并跻身于世界经济强国之列，我们取得的成绩是辉煌而又令人瞩目的。但回过头来看，我们过去更多关注发展，而忽略了社会的公平与公正，我们依然不够“富裕”和“强大”，我们要追求的是“民富国强”。幸运的是，我们现在正在向这个目标迈进。

第一节 高歌猛进的 30 年 / 130

30 年发展神话 / 130

令人称赞的五大成就 / 132

第二节 30 年神话的背后 / 137

寻找坐标 / 137

经济如此 , 你要早作打算

历史的选择 / 139

异化的 GDP / 141

倾斜的天平 / 144

第三节 “国富民强”的玄机 / 148

国富与民强 / 149

分配功能的异化 / 151

隐性收入与灰色收入 / 156

高发的腐败 / 158

贫富悬殊如云泥 / 160

夹板中的中产阶级 / 161

走向民富国强 / 163

第四节 脆弱而孤独的大国 / 165

踌躇于身份的认同 / 165

脆弱的社会结构 / 168

曾经的主流日益边缘 / 170

受制于人的外向型经济 / 173

孤独的行者 / 176

第四章 繁荣背后的动荡隐忧

经济繁荣的背后,我们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不断强化着尴尬的城乡二元结构。严重的环境破坏、凋敝的乡村、日益悬殊的贫富差距,使我们不得不回过头来审视自身的经济发展模式。

未来的路,我们怎么走?

第一节 增长与破坏共生 / 185

环境污染 / 186

资源消耗 / 190

沉重的“地耗” / 193

第二节 断裂的城乡关系 / 195

扭曲的城市化 / 197

房地产绑架城市化 / 202

凋敝的乡村 / 206

第三节 经济发展模式背后的隐忧 / 210

效法“东亚模式” / 211

“东亚模式”拐了一个弯 / 215

被误读的“中国模式” / 221

“中国模式”背后的陷阱 / 224

“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 / 227

第五章 动荡中的生存之道——我们将走向何方

泡沫破灭，我们无可奈何；经济动荡，我们无法躲避。我们唯有擦亮双眼，做好准备，让自己不要陷入泡沫的迷幻之中。

不要以为有什么低谷，高手一般是死在抄底里；金银早已不是货币，不要盲目迷信它们；股市是靠不住的，尤其是所谓的科技股；回归实业是王道，运用科技是正途。

第一节 房地产泡沫破灭的路径猜想 / 234

警讯与预期的变化 / 235

慢撒气还是“砰”的一声 / 238

日本步入“失去年代”的启示 / 240

经济如此 , 你要早作打算

中国会崩溃于房地产泡沫破灭吗 / 246

第二节 未来经济的路径选择 / 249

危机是转型经济的成人礼 / 249

误入渐进式改革陷阱 / 253

“软着陆”是大势所趋 / 258

制度创新奠定未来 / 265

第三节 自求多福——危机中如何生存 / 268

泡沫破灭终将到来 / 269

高手死在抄底里 / 271

金银靠谱吗 / 272

外币与本币的纠结选择 / 276

大宗商品还会持续看涨吗 / 279

紧抓住农产品与土地 / 282

警惕中国股市 / 284

回归实业和高科技 / 284

第一章

逃不掉的泡沫大破灭

回望历史，着眼当下，货币金融投机之下，必然引起资产泡沫的产生，当资产泡沫越来越大时，经济的动荡就在所难免。然而，泡沫终究是泡沫，绚烂过后，终将破灭。世界上很多国家都上演过泡沫的故事，而最终的结局无一例外是悲剧。



一只小老鼠见到大象，情不自禁赞叹道：“好大的泡沫！”

大象一听，扑哧笑了，“我是厄里芬特^①，不是泡沫，但如果你变成我这样，那你就是泡沫。”

狼在一旁听了，说：“小老鼠，厄里芬特就是泡沫，你想不想变成泡沫呀？”

看见大象庄重威严的模样，小老鼠早就羡慕得不行：“当然想，但怎么变呢？”

大象缓缓转过头来：“小老鼠，别投机。”

小老鼠哪里听得进去，盯着狼问：“怎么变呢？”

“这简单。”狼说着，抓起小老鼠，将它的嘴掰开，使劲往里吹气。不一会儿，小老鼠变得跟兔子一般大。

“怎么样，小老鼠？”狼有些累，将小老鼠放下，问。

小老鼠看见水中的倒影，不禁飘飘然：“哈，这下可以去吓唬猫了！”但看见大象的泡沫模样，它意犹未尽。

狼看出了小老鼠的心思，自己往小老鼠嘴里猛吹了一阵气，也有些饿，心想，将小老鼠变成猪的模样，至少可以多吃几口肉，于是又抓住小老鼠，往它嘴里“呼哧呼哧”吹气。

① 大象英语 elephant 的谐音。

经济如此 , 你要早作打算

不一会儿，小老鼠变得跟小猪一样大。

狼看见自己的杰作，心里很满意，盘算着这次可以吃个饱了。而小老鼠感觉自己都快上天堂了，对狼充满了无限热爱，正要开口说“您是我们鼠界的大恩人”时，狼猛地又吹了一口气，只听见“砰”的一声脆响……

自从有了货币，人类疯狂与贪婪的“动物精神”注定了投机随之出现，货币与投机因此成为连体兄弟。而投机的过度导致了泡沫的产生。

早期的货币投机发生在政府与民间，这时候的政府刚从“丛林”中走出不久，崇尚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游戏就不免带有掠夺的成分。集权政府毫无顾忌，因此也就自然将货币投机游戏演变成赤裸裸的财富抢劫。与此同时，民间也开始了互玩，民间的智慧丝毫不逊色于官方，所以民间的投机游戏玩得更是有声有色，不断出现五彩的泡沫迷幻。

最早有记载的经济泡沫是1636年荷兰出现的郁金香泡沫，大约因为玩郁金香确实有些过分、有些傻气，经济学上于是有了所谓的“博傻”理论。说是博傻，其实参与的都是聪明人，但比的却是谁更傻。真正的傻子和真正的聪明人是不投机的。

什么是泡沫？西方经济学界很早就有了明确的定义，泡沫就是任何高度投机的不良商业行为。而高度投机的原因是投资者相信明天他们能够以更高的价格卖出自己所购买的商品。至于资产是什么，在泡沫中根本就无关紧要，可以是金属货币本身、花草、农作物、矿山、金属、铁路、运河、债券、新的公司形态、新的技术运用、土地、房屋，以及衍生的金融工具等，也可以是“确保女人贞洁”、“经营和承揽巨大好处，但没人知道它是什么”的公司。

历史上所有泡沫经济的兴起，无一例外都是货币太多、流动性泛滥的结果。郁金香泡沫背后是私人信贷的扩张，南海事件背后是索沃德银行，密西西比泡沫背后是皇家银行。现代金融制度下的信贷扩张、金融创新工



具等更是催生泡沫的利器。

现代金融几乎已经渗透到公众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泡沫已成为经济生活的一部分，我们绝大多数人，被动也好，主动也好，都是泡沫的共舞者。

很多时候，泡沫会发生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转型及出现重大技术创新时，“咆哮的 20 年代”^①是如此，日本泡沫、东南亚泡沫，19 世纪英美的铁路泡沫、20 世纪末的互联网泡沫依然如此，包括中国现在的泡沫也是如此。在经济转型和重大技术创新推动下的泡沫，很可能被当成新时代的开始。因为自以为是新时代，老的规则就不再有用，人们也不屑于用现有的经验和数据推测未来，人们需要偏执，相信“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

很可惜，只要是泡沫，最终都会一一破灭在人们面前。如果是曾经以为的泡沫但最终却并未破灭，那泡沫其实是经济结构性转变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快速而激烈的自然反应。奇怪的是，即使是在重大技术革命出现后的所谓新时代里，泡沫最终也不得不归于寂灭，铁路投机狂热如是，“.COM”公司狂热依然如是。对于泡沫而言，似乎从来就没有什么新时代。

很多研究者认为，适度的投机与泡沫是经济增长的润滑剂。少数学者更是认为超大型泡沫甚至可以改变一个民族的特性，法国在 18 世纪不到一百年的工夫，政府和民间互动玩出了超豪华的密西西比和“指券”两个泡沫，搞得法国人从此都有些神经质了，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更为浪漫；而日本泡沫过后，日本民族似乎也更加含蓄和热爱储蓄了。

第一节 逃不出的金融投机

货币是我们每天都会接触到，也是绝大多数人向往的好东西。上至总统，下至平民百姓，无不趋之若鹜，唯恐其少。对于什么是货币，我们

^① 指北美地区 20 世纪 20 年代。

经济如此 , 你要早作打算

一般人倒是搞懂了，那就是钱嘛，但经济学家似乎还没搞懂，因此，经济学上的货币概念五花八门，有说货币是金属的，有说货币是特殊商品的，有说货币只是一个名目的，还有浪漫主义者认为货币是一层美妙的面纱，遮掩在商品之上，后来又形成了作为一种经济变量或政策变量的货币定义。

这就玩得有些深沉了，搞得我们连货币还是不是钱都有些怀疑了，而这正是经济学家的高深之处，说的都是你搞不懂的。那正是我要说的，我说的如果你都懂，我就不如不说。

我们一般人也不要因为搞不懂货币究竟还是不是钱，就自认智商低下，以为自己真是没学问，其实“在研究货币本质中受到欺骗的人，比谈恋爱受欺骗的人还要多”，看来经济学家们也没怎么搞懂。如果真是搞懂了，这个世界也就变成他们家的了，国王都只好做他们的仆役。他们绝大部分和你我一样，都在为饭钱发愁，只不过咱操心的是面包钱，他们操心的是血燕之类。好点的、搞过一些大萧条研究的都已经出任中央银行行长或者美联储主席了，其实也是天天为钱犯愁。

● 金属货币的进化

货币的进化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到最后谁也搞不清楚为什么会这么复杂的一个过程。

原始社会，人们采用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这种方式受限太多，需得是双方正好需要彼此的东西方可达成，且一般无法找零，吃亏或者上当大约是免不了的。好在原始人质朴，也就不太往心里去，但终归是感觉不顺，回去可能还得受到族人或者不定是哪个老婆的唠叨。于是聪明人开始寻找一种能被交换双方接受的中介物，这种中介物就是最原始的货币。牲畜、盐、稀有的贝壳、珍稀鸟类羽毛、宝石、沙金、石头等不容易大量获取的物品都曾经作为货币被使用过。



作为交易中介物的货币，首先得稀缺，如果是用空气做中介，说，这一堆空气是你的了，你把那群羊给我，这个买卖肯定就黄了；其次是易于保管，时间久了也不会腐烂；最重要的是得有一群人认同。因为金银铜等贵金属稀少，看起来还闪闪发亮，大家就很稀罕，因此它们在很多国家和地区相继成为货币。马克思说“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金银”。这话听起来有点费解，但在他那个时代是真理。因为是真理，所以就没必要俯身以就，高高在上就足矣，不需要一定让你搞明白，你搞不明白它也是真理。这就是货币本质的金属论，货币也就等于金属，货币的价值取决于贵金属的价值。

早期的金属货币是块状的，使用时需要先测其成色、称重量，很麻烦，后来就有权威机构站出来铸造成色、重量统一的硬币，这样在使用的时候，既不需要测试成色，也不需要称重量，无疑方便得多。货币的统一推动了交易的发展，但同时也为投机和泡沫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中国最早的金属货币是商朝的青铜币。青铜那时属于高档奢侈品，非一般人家可以使用，主要功能就在于盛“三牲鱼腊”、“四时之和气”以供祖先晚上享用。当时最主要的货币还是天然海贝。

到春秋中期，出现了包金铜贝，也就是在普通铜币的外表包一层薄金，彰显其华贵，但流通并不多，更大的作用是养眼。战国时期黄金与铜铸币并行，但黄金似乎更多地用于离间和行贿。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规定黄金为上币，一般用途是赏赐；铜币为下币，以秦国的铜钱为标准，外圆内方，这就是后来我们尊称为“孔方兄”的那个“兄长”。自此之后，铜钱的式样基本定型，历代相沿。铜钱作为我国历史上最重要的货币一直流通到清朝末年。外圆内方这种形状其实是为了浇铸方便，后来被我们赋予了很多象征性的神秘主义色彩，比如，圆形代表天，方孔代表地，追求天地之间的和谐，等等。也难怪，钱这个东西就是神秘。

经济如此 ，你要早作打算

西汉承袭秦制，黄金仍为法定货币，但主要集中于皇家手中，用途依然是赏赐和馈赠。东汉至隋朝，黄金愈加贵重，主要用途已经不是货币，和平期间则用来炫耀和礼佛，战乱时则被窖藏。这样，黄金就逐渐退出了市场流通。

唐朝以后，白银货币逐渐得到广泛流通，但很多金银进了国库就不再出来，民间的富户也将白银窖藏起来，市面上流通的货币主要还是铜钱和丝织物，所谓“钱帛兼行”。由于铜钱供应严重短缺，币值不断上升，出现了钱荒，没办法，唐武宗年间甚至出现“会昌灭佛”，利用毁佛所得铜材铸币。

两宋时期，白银的货币性质进一步增强，政府正式规定白银为租税和官俸的法定货币。虽然元、明两朝都曾明令民间交易禁止使用白银，推行纸币，但这种禁令收效甚微，未能阻止白银的流通。明朝中后期，白银已成为和铜钱一样普遍的金属货币。清朝时期，白银已经成为国家的主要货币，清末光绪帝在位期间，中国开始将元宝铸造成银币，并设立了户部银行。宣统二年（1910年），颁行《币制条例》，正式采用银本位制，但银本位制只执行了25年，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1935年宣布废止，改发行法定纸币。

其实，纸币在中国出现得很早。北宋初年四川就有了“交子”，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之一，其后金、南宋、元、明、清均有纸币发行，但这时的纸币基本上都是乱搞，所以理论界一直不认为这是现代意义上的纸币。中国古代纸币的鼎盛时期在元朝，当时政府下令纸币通行全国。

在欧洲，货币作为交换媒介始于何时，也是稀里糊涂，但一般以为黄金作为交换媒介最早可能出现在今伊拉克的两河流域一带。当货币逐渐流行时，统治者认识到了货币的公共商品这一特性，于是开始为辖区内的铸币厂定下标准，并督促他们遵守。在这点上，中外皆通，中国统一铸币始于秦朝，西汉武帝时期，铸币成为皇家专营。



在以后的大部分时间里，欧洲的通用货币是银子，但其他金属也用作货币，比如金和铜，有的也用铁。统治者向被统治者征收到金银后，一般就存在国库里，当时没有经济学这门“显学”，大家都不知道再投资的重要性，因此市场上贵金属越来越少，出现了钱荒和通货紧缩。聪明的斯巴达人就开始实施世界上最早的“外汇管理”，严格控制货币流出。

早期的欧洲，地中海沿岸，尤其是古希腊贸易发达，有的城邦甚至出现了债券，因为古希腊人长于哲学思考，所以债券管理还跟得上，发行债券须得经过城邦议会的批准。此时的雅典号称西方首富，它的城堡里堆积了大量的金银，发行的“德拉赫马”^① 银币据说可以媲美今天的美元。亚历山大大帝时期，希腊疆域广阔，一度南达今天的苏丹北部，北至今天的俄罗斯境内。

古罗马时期，人们对货币的追求经常演变为战争。那时发动战争并不需要购置昂贵的飞机大炮，只要有人有勇力就可以。通过战争，罗马经常可以获得不菲的收益，日渐壮大起来。此时商业贸易更加发达，并出现了银行业的雏形。古罗马早在公元前 200 年左右，就开始铸造自己的金币，但流通中的主要还是银币，因为金子很稀少。

中世纪时期，由于贸易日益扩展，商品交易量逐渐增大，许多银子南流到威尼斯，然后被运往地中海东部换取香料、丝绸以及其他奢侈品。银子出现了净流出，加上每年流通过程中的损失以及有意的窖藏，到 15 世纪时，欧洲出现了大规模的钱荒，有时甚至用胡椒替代货币，以至于德国各诸侯称他们的银行家为“胡椒人”。钱荒的出现推动了欧洲海洋国家的远洋冒险，哥伦布 1492 年发现了新大陆，使大量来自美洲的黄金和白银从 16 世纪开始源源不断地流入欧洲，从而挽救了欧洲的货币制度。

远洋贸易的巨大经济利益促使欧洲沿海国家全力抢占海外殖民地，英

① 德拉赫马是古希腊货币，1 德拉赫马相当于 4.36 克白银。

经济如此 , 你要早作打算

国在与欧洲其他国家争夺海外殖民地的过程中，先后打败荷兰、西班牙，成为头号海洋强国，资产阶级的力量空前壮大，金银开始大规模涌入英伦三岛。1717 年，英国将英镑与黄金挂钩，规定每盎司黄金（纯度 0.9）等于 3 英镑 17 先令 10.5 便士。1774 年，英国停止使用白银作为通货。

● 金属货币下的投机游戏

从物物交换过渡到使用金属货币，虽然本质上还是以物易物，但由于货币的实际价值与名义价值相对分离，投机也就随之开始了。先是控制货币发行的政府用货币游戏民间，以此敛集财富，其后民间开始互玩。在官方与民间的游戏中，因政府可以随时变更游戏规则，民间自是弱势，但如果官方玩得太过火，民间只好悲催地离开游戏场，不和政府玩了，甚至于起来推翻政府。

例如汉初的半两钱，原重 12 铢，后减为 3 铢，但名义仍是半两，等于膨胀了 4 倍。东汉末年王莽货币改制，“大泉”铜币币材比五铢钱加重 2.4 倍，面额作价等于五铢钱的 50 倍，实际相当于贬值到 $1/20$ ；“契刀”铜币，1 枚当五铢钱 500 枚使用，按其重量则相当于贬值成 $1/120$ 以下；“错刀”币，1 枚当五铢钱 5000 枚使用，相当于贬值成 $1/720$ 。如此贬值，物价当然狂涨不已，史称“米石万钱，人相食”。

后世的政府读史知鉴，不想再重复这样的错误，就通过改变币材的金属成分，降低贵金属铜的比重来掠取民间。如宋徽宗时太师蔡京推行夹锡钱，即在铜钱合金配方中减少铜的比重，增加铅锡的比重，含铜量只有 57% 左右，而标准的铜钱含铜量一般均在 83% 以上。

在这点上，中外统治者都是无师自通的高手。早在公元元年前后，古罗马统治者就知道通过将硬币中黄金和白银的含量降低，可以使同样的金银变出更多的钱。这样一来，民间钱没少一个，统治者则白捞不少，何乐而不为？古罗马当时 1 磅的黄金铸造 42 个叫“aures”的硬币，到尼禄时

期，变成了45个，又过了一百多年变成50个^①。西方统治者这样的“仁慈”，要弄点钱还如此笨拙，周期漫长，真是让当时东方的皇帝笑掉大牙。

罗马时期货币的缓慢劣质化趋向，引起了物价缓慢而持续地上扬，国家也就开始混乱。这样说，似乎将国家混乱的责任全部推到货币身上，那货币是不答应的，应该是国家已经在变坏了，才出现货币劣质化。劣质货币的出现只是使国家变得更坏而已。当然，通货膨胀的起因从来都是那些罪恶的、利欲熏心的投机者。我们现在是这样的看法，古罗马的统治者当时也是这样看的，于是决定用专制手段结束物价飞涨，如颁布限价令，实行国家定价，但很遗憾，史上最早的“社会主义实验”失败得很惨，最终使整个罗马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

降低货币成色这种事，后来在欧洲继续上演。1536—1546年，英格兰亨利八世分若干次将金价从每金衡制磅24英镑升至30英镑，银价从2英镑升至2英镑8先令^②。此后的神圣罗马帝国为筹集军资，在辅币中大量采取削边和掺假方式以支付雇佣军工资或兑换邻国货币，从而引起了严重的通胀；西班牙也出现过往银币里加铜，使它们成为不同比例的合金的现象，这个过程叫使钱“变黑”^③。但是，当小老百姓认识到新货币贬值了的时候，就没人愿意再接受成色不足的货币了，新货币的流通也就出现问题。

官方可以掺假，民间也有高招，那就是削边。为此官方不得不在硬币上扎上花边，这样的话，一有人削边，官方马上就可以发现。

这样的技巧，我们的东邻日本也玩过，似乎玩得还不错，因此还出现过所谓的“元禄繁荣”。日本17世纪元禄年间，财政不堪重负，加上海外

① [德] 彼得·马丁，布鲁诺·霍尔纳格，资本战争[M]，王音浩译，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8：14。

② [美] 金德尔伯格，西欧金融史[M]，徐子建，何建雄，朱忠译，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7：32。

③ [美] 金德尔伯格，西欧金融史[M]，徐子建，何建雄，朱忠译，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7：26。

经济如此 , 你要早作打算

贸易导致金银外流，幕府缺钱得很。为改善窘况，政府决定将市场上一切货币回收改铸，为的是降低货币中贵金属的含量。通过改铸，幕府增加的收入达到557万两以上，而幕府在货币改铸前，年财政收入才110万两左右，真是功在当代。货币改铸后，市场上的货币量大幅度增加，但自然也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持续发行劣币终于使幕府声誉扫地。

随着贸易的发展，携带硬通货毕竟很不方便，于是出现了汇票等货币替代物，有了银行家，产生了交易所，甚至是股份公司这种高级的集资方式。有了这些条件，民间就开始自己玩自己的了，开始是商人之间、银行家之间互玩，后来大众经不住诱惑，也参与进来，于是形成投资狂潮和泡沫。

古罗马人早就已经知道股份制运作了，在进行具有风险的海运贸易时常常成立一个将几十份资产组合在一起类似公司的组织。海运一结束，组织就解散，投资者会得到相应的报酬或承担相应的损失。随着欧洲海外贸易的发展，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以股份制形式成立，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因为公司不再像古罗马时期只着眼于单生意，而是放眼长远。

东印度公司一上市即获得巨大成功，遥远国度的魅力以及诱人的赢利前景给了投机者无限的遐想。当公司第一批船队出发时，股价已高出面值30%~40%。前景如此诱人，效仿者出现了，西印度公司宣告成立，并对外宣称垄断了与美国人的贸易，但可惜其主要业务却是做海盗，专门劫掠装载丰富货物的西班牙船队。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东印度公司经营得不错，但也充满了投机与泡沫。1688年，从好望角总督那里传来好消息，东印度公司船队正满载货物赶回荷兰，于是行情开始上涨；没过多久，有消息说船队搁浅，货物丢失，行情当然下跌；正在这时又有消息说，船队已脱离危险，货物非但没减少，似乎还有增加，于是行情暴涨。

当船队最终抵达荷兰时，人们欢欣鼓舞，但马上又失望了，因为没有



人们预计的多。做空的人以为机会到了，他们需要股价大跌，开始不遗余力地散布消息说与法国的战争很快要开打了，并描绘出凄惨的局面和严重的后果，股东开始出现惊慌，东印度公司的股票持续下跌，几乎无法卖出，交易所里也一片恐慌。由于这次下跌，荷兰证券市场很长时间才从这场崩溃中走出来。

● 投机的最高境界——货币成为掠夺工具

一般以为信用本位是金本位破灭以后才开始建立的，但如果追根溯源，信用本位最早应该出现在中国的元朝，只是当时政府无信用可言，信用很快就演变成了无信用。货币成为掠夺工具的典型事件有以下几个。

第一，中国古代纸币案。

北宋时期出现在四川的“交子”，虽然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之一，但严格地说，它更像一种汇票，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货币。

在四川成都，商业贸易一直比较发达，为方便交易的执行，成都地区出现了专业的经营货币保管业务的商户，存款人把货币交付给商户，商户把存款数额填写在一张专用的纸卷上，再交还存款人，并收取3%的保管费。这种临时填写存款金额的纸券便谓之“交子”。

后来“交子”商户在经营中发现，只动用部分存款，并不会危及“交子”的信誉，于是他们便开始印刷有统一面额和格式的“交子”，作为一种新的流通工具向市场发行。这样的好事难免被利用过头了，有时就不能兑现，从而引起很多纠纷，市场迫切需要制度来规范。益州知州开始规定专由16户富商来经营“交子”，但赚大钱的买卖政府还是希望自己做，于是政府设立“益州交子务”，并“置抄纸院，以革伪造之弊”。

说是“革伪造之弊”，其实政府参与进来看中的就是“伪造”之利，政府首届发行“官交子”126万贯就只准备了本钱36万贯，准备金率为28%。后来政府发现其中好处越来越多，干脆就不要准备金，大肆发行，

经济如此 ，你要早作打算

于是“官交子”只好变成废纸。政府当然聪明，又改“交子”为“钱引”，从这个名字就知道政府希望靠这个玩意“引”钱出来，“钱引”自是弄得一文不值，虽然纸张、印刷、图画和印鉴都很精良，但也只好供“糊墙专用”，这大约也是世界上最早最精美的墙纸了。

与北宋同时期的金朝，初期发了战争财，后来军费开支太大，就跟着宋朝学发行纸币。不限数量，不管兑现，不备钞本，新钞不断，面额随意扩大，结果币值跌成千分之一，一贯钞币实际只值一文钱，百姓的资财受通货膨胀的影响瞬间化为乌有，俗称“坐化”。当时“万贯唯易一饼”，民间只好拒绝用钞，许多商人罢市，远逃他乡。

到了元代，官府干脆禁止民间买卖金银，拘收全国铜钱，强制推行“中统元宝交钞”，以白银为本位，面额仍沿用铜钱单位，从10文到2贯分为10等，每2贯同白银1两，不限地区，不限年月行使，开创了纸币新时代。马可·波罗来到中国，见小小一张纸片竟可以买到各种各样的商品，惊叹不已，“大汗国中，商人所至之处，用此纸币以给赏用、以购物、以取其货物之售价，竟与纯金无别”。但这种状况未能维持多久，政府很快就开始大发钞币，并宣布不再兑现，永久通行，物价随之大涨，甚至于贿赂一下小官吏，所需钞币都要用车拉。

明代也发行了“大明通行宝钞”，沿用元制，不限地区和流通时间，不定发行限额，没有发行准备金。政府规定支付俸给、军饷都用宝钞发出，而租税却不收宝钞，光投放不回笼，或多投放少回笼，一开始就处于通货膨胀的阴影之下。于是币值不断下跌，到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大明宝钞1贯实际只值160文钱；正统九年（1444年）宝钞1贯只值10文钱；弘治元年（1488年），宝钞1贯值钱1文（实际上这时民间已不用钞了）；嘉靖元年（1522年），政府规定入库只用银不用宝钞，宝钞作废。

清朝政府也发行过两种钞币。顺治八年到十八年（1651—1661年），因军费支出浩大，发行“钞贯”，后战事减少，经济好转，即停止发行。咸

丰三年（1853 年）因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发行“户部官票”和“大清宝钞”，但人们拿到钱票却换不回现钱，因此钞价大跌：第二年宝钞价格下跌 50%，第三年就只有面值的 10% 左右，许多省份因此拒不使用。而外国商人却从中发现了商机，乘机压价收购钞币后，按规定的五成用钞币去缴关税，逃避税费，钞币转成政府之累。同治元年（1862 年）宝钞停止流通使用。

第二，密西西比纸币案。

通过纸币掠夺财富，其实不是中国古代政府的专利，在享有高雅和文明气息的法国也大肆出现过，就连素以严谨著称的德国也没能逃脱得了。

“太阳王”路易十四后期，法国因连年作战，导致国库空虚，债台高筑。这时享有骗子“盛誉”的约翰·劳出现了，他主张不受金银储量限制发行货币，这和我国宋元政府真是心有灵犀，但还是落后了几百年。他认为发行货币的银行应有权管理国家的税收，并以税收和不动产为基础发行纸币，以保证提供足够的通货来支持经济繁荣以及进行宏观调控，正是因为这点，约翰·劳被誉为现代货币之父。只可惜他那时还不知道中国的教训，一个集权的中央政府怎么会因为税收和不动产而自缚手脚呢？

银行纸币发行正好迎合了路易十四死后摄政王的需要，因此约翰·劳备受重用。1716 年，法国政府特许约翰·劳在巴黎建立了一家资本约 600 万利弗尔的“通用银行”，获得了发行纸币的权力。最初银行发行的纸币可以随意兑换成硬通货，因此很受欢迎。不久后，银行就发行了 6000 万利弗尔的新纸币。

当然，仅仅靠银行发这点货币肯定是不行的，于是约翰·劳开始包装一家刚成立的公司。该公司拥有法国与密西西比河广阔流域和河西岸路易斯安那州贸易的独一无二的权力（因为当时传说这两个地方遍地可见金银），然而要购买这家公司的股票需要先行购买政府公债，而政府公债此时信誉低落，二级市场常常是大比例折价销售，因此公司股票最初销售很是

经济如此动荡，你要早作打算

缓慢，但好歹都卖出去了。

1718 年 12 月，路易十五批准“通用银行”改名为“皇家银行”。皇家银行被授予以法国王朝的信誉做保证发行纸币，拥有了事实上的印钞权。有了皇家的保证，玩一把大的那是理所当然的了。

此后密西西比公司相继拥有了在法国、东印度、中国、南太平洋诸岛以及塞内加尔进行垄断贸易的权力，因此该公司又称为印度公司。1719 年 7 月，约翰·劳向法国政府支付了 5000 万利弗尔，取得了皇家造币厂的承包权。在利好的刺激下，密西西比公司的股价终于从一股 500 利弗尔涨到 750 利弗尔。当然，股价仅涨到这点远远不够。

1719 年 8 月，密西西比公司开始试探性发行 5 万股新股，每股 1000 利弗尔，此时公司资助的宣传品已在巴黎满天飞：据说有确切证据证明殖民地存在一个巨大的宝藏，有人甚至已经为发现这处宝藏悬赏了一笔重金；还有人说路易斯安那是真正的黄金国……有了这么大的利好，公司就宣布新股不对外发行，要奖励那些忠实的老股民，只有在出示 4 股老股的前提下才能购买新股。约翰·劳的这套把戏很快将股票价格推升到了每股 1800 利弗尔。

约翰·劳发财了，不仅是因为内幕消息，也因为绝顶聪明，但他是个有理想的人，他向摄政王许诺同时解决所有令法国政府棘手的财政问题，并接管国家 15 亿利弗尔的国家债务，法国政府则为公司提供的贷款每年支付 3% 的利息。此外，约翰·劳还于 1719 年 8 月取得了农田间接税的征收权，同年 10 月接管了法国的直接税征收事务。

为刺激股价，约翰·劳开始慷慨给投资者融资，股价在短短 5 个月时间里（1719 年 8 月—1719 年 12 月）涨幅接近 500%，达到 12500 利弗尔。此时，约翰·劳为向政府支付 15 亿利弗尔，开始了新一轮融资。印度公司连续三次共发行 30 万股新股，每股 5000 利弗尔，上市即被抢购一空。为了在高位继续吸引投资者购买，约翰·劳甚至宣布公司将维持最低股价



9000 利弗尔，低于此价则无限量回购，整个市场为之疯狂，股价最高达至 20000 利弗尔，是两年前的 40 倍。

印度公司的股票猛涨不落，不仅吸引了大量的本国资金，也吸引了欧洲各国的大量资金流入。投机活动刺激了对货币的需求，于是每当印度公司发行股票时，皇家银行就跟着发行货币，因为约翰·劳始终坚信增发银行纸币，然后换成股票，最终可以抵消国债。1719 年 7 月—1719 年 12 月，皇家银行发行了 8.9 亿利弗尔纸币，纸币与股价之间互相追赶，股价自是迭创新高。

此时的约翰·劳已是法国科学院名誉院士、新任财政部部长，但公司股价和他的人生一样也已到了峰顶。大量纸币的滥发，不仅仅影响了股票，物价也因此大涨，位于股票交易所附近的房租甚至上涨了一百多倍。通货膨胀率的上升直接动摇了民众的信心，人们纷纷涌向银行，想方设法把自己的纸币兑换成黄金。随之而来的是国内的流通硬币极度匮乏，于是政府颁令禁止任何人拥有超过 500 利弗尔的硬币，严禁收购金银首饰、器皿和珍贵的宝石。

如此一来，狠狠打击了股民的信心，密西西比股价开始出现下跌。为了维持住公司 9000 利弗尔的股价，政府使尽浑身解数，约翰·劳也于 1720 年 3—5 月发行了共计 11 亿多利弗尔纸币，使得一个多月内货币流通量增加了一倍多，但股价还是在 9 月出现暴跌，11 月跌到 2000 利弗尔，12 月跌到 1000 利弗尔，到 1721 年 9 月就跌回到了 1719 年 5 月 500 利弗尔的水平。至此，昔日的繁荣泡沫彻底破灭，代之以经济衰退、民生重创。

短短几年时间，约翰·劳为摄政王减少了高达 25 亿利弗尔的债务，还帮摄政王的私人钱柜聚敛了巨额投机收益。最终他也是在摄政王的帮助下逃离法国，1729 年在威尼斯于贫病交加中死去。

第三，其他纸币案。

经历这次投机事件之后，法国经济每况愈下，1789 年终于爆发了法国

经济如此 , 你要早作打算

资产阶级革命。为解决财政危机，革命政府发行了“指券”纸币，甚至规定谁不按全价接受“指券”，就要被送上断头台，但“指券”这种革命性产物却很不革命，到1795年贬值了90%，到1796年年初价值仅剩1%。

其后的德国更是经历了一场天价通货膨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参战国财政空前恶化，战后，胜利的协约国希望由战败国来赔偿损失。1921年，特别赔偿委员会宣布德国应赔偿1320亿金马克，此外还得上交所有1600吨以上的船只、所有殖民地，承担占领军的费用，甚至包括军中妓院的费用。

战败后的德国只好充分开动印钞机，流通中的货币大量增加，物价飞涨，马克迅速贬值。1923年年初，2.1万马克兑换1美元，6月就变成10万马克兑换1美元，8月变成500万马克兑换1美元，9月28日，交易所的收盘价是1马克兑换0.00000068美元。在人们还没习惯10亿马克时，德国人就不得不适应万亿马克。

当时每份售价300万马克的《柏林股票交易报》上写道：“请在所有价格后面都加上9个0！”一则刊登在报上的提示是：“面包的最新售价是1200亿马克。”为了买到一磅黄油，工人不得不在车床边工作9个小时。1923年年底，工人的实际平均工资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低了77.5%。这大约也是一种剥夺，只是变成了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剥夺。在通货膨胀中，倒霉的永远是老百姓。

与此同时，世界另一边的俄国政府宣布股票、债券和其他有价证券毫无价值，加以没收，而印纸币也成为政府自救的妙法。1919年，俄国政府就印出1630亿卢布，1920年为8550亿卢布，1921年人们就已经快绝望了，因为4个人4个月时间里只能依靠1英镑生活，而同期的英国，1英镑也足够1个人生活一周。^①

^① [德] 彼得·马丁，布鲁诺·霍尔纳格：《资本战争》[M]，王音浩译，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8：173。

在我国，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也出现了恶性通胀。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结束了银本位制，发行国家信用法定货币，规定1法币兑1银元。法币初期与英镑挂钩，可在指定银行无限兑换，1936年，改为与英镑及美元挂钩。抗日战争爆发前，法币发行量为14.8亿元。

抗战期间，日本为破坏中国后方经济，在日占区强行以日本发行之货币收兑法币，再加上以走私物资套得法币，兑取国民政府的外汇。国民政府虽分别从英国和美国那里得到1000万英镑及5000万美元贷款，但根本不足以支撑法币汇价，1940年不得不取消外汇兑换。为应付巨大的抗战支出，南京国民政府不得不加大法币的投放，到抗战胜利前夕，法币发行量达到了5569亿元，8年时间增加了376倍。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爆发后，法币发行更是失控，到1948年8月达到了604兆元，3年间增加超过1000倍，造成了恶性通货膨胀。

第二节 无所不在的泡沫迷幻

投机过度，自然就走向泡沫，金属货币下如此，信用货币体系下更是如此。在一个不断“金融创新”的时代，金融其实已经变成了一种无孔不入的幻术，货币的再创造、杠杆信贷、风险对冲、资产债券化等已经落后，衍生金融产品这种高杠杆信贷，使经济体更容易出现泡沫，并急速放大泡沫破裂的后果。本来，金融衍生品最大的作用在于价格发现，对冲风险，但理论上的好处在现实中却变成泡沫助涨与助跌的动力。

因为有了现代金融，泡沫被华尔街的投行精英从投机玩成魔术，并进而上升为了艺术。精英们身穿阿玛尼燕尾服，在聚光灯下用数学公式不断将现实变成浪漫，将资产诉诸情感和想象，并以此吸引观众。此时媚惑观众的托儿已经不是电视台的美女主持人，而是大腹便便的银行家们了，他们其实都受过专业的演艺培训，努力瞪大的小眼睛中流露出的惊讶与欢喜

经济如此 , 你要早作打算

丝毫不比美女少，而其假嗔做痴的神态更是让人忍俊不禁。

现在我们所知的泡沫，最早出现于 17 世纪的西欧。当时，欧洲正处在封建社会解体和资本主义兴起的阶段，西欧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确立为商品经济的空前繁荣大开方便之门，对新时代的向往使人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欧洲由此进入了一个充满炫耀、猎奇和好大喜功的时代。新的时代、美好的未来、充足的货币、信用的创造，泡沫产生的条件基本具备，于是人类开始了不断的泡沫游戏。

郁金香泡沫

17 世纪，荷兰经过尼德兰革命洗礼后，堪称当时最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掌握着世界海上霸权，有“海上马车夫”之称。荷兰人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船队，首都阿姆斯特丹成为世界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1608 年，世界上第一家具有现代意义的证券交易所即诞生于此。

由于郁金香被引种到欧洲的时间很短，数量非常有限，价格极其昂贵，所以一块豪华的郁金香贴片、一次用郁金香加以装点的聚会，甚至用郁金香装饰的窗框，都成为人们昭示社会地位的手段。

1634 年以前，郁金香和其他花卉一样是由花农种植并直接经销，价格波动幅度并不大。1634 年年底，荷兰的郁金香商人组成了产业协会，基本控制了郁金香的交易市场，强行规定任何郁金香买卖都必须向产业协会缴纳费用。由于产业协会通常是在小酒馆里进行交易，他们收取的费用也就被称为“酒钱”。

控制了交易，价格上涨自是情理之中，于是人们开始普遍看好郁金香的前景，纷纷签订郁金香的买卖合同。到 1636 年年底，荷兰郁金香市场上不仅买卖已经收获的郁金香球茎，而且还提前买卖在 1637 年收获的郁金香球茎，价格更是离奇上涨，不到两年时间，郁金香普通品种的价格被抬高了 25 倍。几乎每一个投机者都沉浸在突然大发横财的美梦之中。



1637 年 2 月，倒买倒卖的人逐渐意识到郁金香交货的时间就快要到了，一旦把郁金香的球茎种到地里，就很难再转手买卖，于是郁金香价格开始直线下降，短时期内平均下跌 90%，那些普通的品种更是一文不值，郁金香市场全线崩溃。

在这个打击下，荷兰的郁金香投机市场一蹶不振，再也没有恢复过来。但这并不妨碍郁金香成为荷兰的国花，也不妨碍后世因此发明经济学上的“博傻”理论。

● 南海泡沫

荷兰人玩郁金香之后 90 年，英国人开始大玩股票。与荷兰纯粹的民间玩不同的是，英国政府参与了玩股票的游戏。当时，政府与私人企业互为对方提供逐利的机会和便利，这种在后世被任何市场经济国家禁止的行为，现在在我国依然流行。

1711 年南海公司成立之初，认购了总价值近 1000 万英镑的政府债券。作为回报，英国政府对该公司经营的商品实行了永久性退税政策，并授予其对南海（即拉丁美洲）的贸易垄断权。这种垄断权当时似乎意义不大，因为英国对南海的贸易最早只能在 1717 年开展，且由于西班牙捣乱，南海公司一年最多只可派三只船前往拉美，到 1718 年，因英国和西班牙交恶，贸易不得不中断，但南海公司并不在乎，因为它意本不在此。

1720 年 1 月，南海公司向政府表示愿意支付 750 万英镑，以换取国债管理特权，同时，承诺向国会的主要议员和皇室提供一笔巨额贿款。有了这个“利益均沾”的承诺，南海公司的要求自然完全得到满足。

南海公司于是开始发行新股集资，就像现在中国证券市场一样，招股说明书是可以“乱”说的，南海公司不断散布“在墨西哥、秘鲁一带发现巨大金银矿藏”、“金银财宝就要源源不断运回英国”之类虚假而美妙的消息。民众是不经骗的，对于有政府背景的公司尤其缺乏免疫力。

经济如此 , 你要早作打算

南海公司股票刚发行即遭疯抢，票面价值 100 英镑的股票，3 月初达到 200 英镑，3 月末超过 400 英镑，4 月初飙升到 900 英镑，进而又疯涨到 1050 英镑。

南海公司轻而易举地筹集到了一大笔资金，而这笔资金的第一个用途就是兑现自己的诺言，向与此事有关的贵族、议员和官员们提供了大约 200 万英镑的贿赂。

看看南海公司 IPO（首次公开募股）之后的盛况，我国证券市场的 IPO 制度真得跟南海公司好生学一下，不要首发时一下子就几倍地溢价，得慢慢来，老鼠偷鸡蛋——大头在后面。

在南海公司飙升的股价面前，连国王也不再淡定，认购了价值 10 万英镑的股票。议员们不消说，大多数都是南海公司的董事或股东。股票如此好卖，英国于是一下子冒出来二百多家“股份公司”，有正研发“可以永久转动的车轮”的高科技企业，有“确保女人贞洁”的公司，有“在适当的时候才公布营业性质”的公司。这类骗子公司为了销售新股，甚至在交易所附近租赁一天的摊位，24 小时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而那些可怜的股东则必须去寻找更愚蠢的下家。

市面上如此混乱，政府觉得该出面了。因此英国议会快速在当年 6 月通过了被民间称为“泡沫法”的《反金融诈骗和投机法》，规定如果没有议会法案或国王特许状给予的法律权利，禁止以公司名义发行可转让股票，或转让任何种类的股份。本来此举是南海公司派驻议会的有关企业代表（名义上是国会议员）为保护南海公司的垄断利益而作出的决定，但时机选择得不对，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投资者对一些公司的怀疑逐渐扩展到南海公司身上。从 1720 年 7 月开始，首先是外国投资者抛售南海股票，国内投资者纷纷跟进，南海股价很快一落千丈，9 月份直跌至每股 175 英镑，12 月份跌到 124 英镑。“南海泡沫”由此破灭。

在这场泡沫中，仅仅通过一个苹果掉下来就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的牛顿，



也以亏损 2 万英镑离场，不得不感叹“我能算准天体的运行，却无法预测人类的疯狂”。因为这句话，很多成功预测出了过去 3 次经济衰退中的 1 次的经济学家，心里会好受一些。看来，再厉害的科学家也搞不过商人，更别说只有“一只无形的手”的经济学家们了。

● 华尔街大崩溃

进入 20 世纪不久，新兴帝国美国就出现了一次泡沫自爆，并引发了全球经济萧条，以此“证明”自己不愧为全球老大。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曾经统治世界的欧洲成为一片废墟，而美国却毫发无损，且发了不少战争横财，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纽约也取代伦敦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美国人信心满满地以为这个世纪是他们的了，于是在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不断“咆哮”，以为依靠爵士乐和现代科学可以化一切不可能为可能。

新兴科学技术、科学管理方法在美国企业生产中的大量运用，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促进了整个 20 年代的经济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工人的工资水平也有了大幅度提升，消费能力增强，反过来又刺激了生产。“炫耀性消费”成为时代潮流。

经济的快速发展，刺激了股票市场持续上涨，财富和机会似乎向每一个美国人敞开了大门。曾有人这样描述华尔街的投机气氛：“从来没有像 20 世纪 20 年代那样有如此多的人参与投机，但是只有少数人明白他们是在投机。”投机活动、内幕交易的盛行，使股市逐渐脱离基本面的支持，形成了股市泡沫。道琼斯指数从 1921 年的 75 点升到 1929 年顶峰时的 386 点，平均年增长率高达 34%，而据美国商务部后来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1921—1929 年美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增长了 25%。

只可惜，乐观情绪完全冲昏了人们的头脑。“人人都应该富裕”，通用汽车公司总裁如是说。刚当选的胡佛总统也认为，“我们正在取得对贫困战

经济如此 , 你要早作打算

争决定性胜利的前夜，贫民窟即将从美国消失”。当时美国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欧文·费雪在1929年10月22日的《纽约时报》头条表示，“我认为股票价格还很低”。此时，没有谁会想到在这个“黄金年代”的美国还有300多万的失业人口。

就在费雪认为股价还很低的几天后，10月29日华尔街就出现了“黑色星期二”，道琼斯指数继周一下跌13%后，再次大跌22%，整个交易所淹没在抛售股票的旋涡之中，由此结束了美国股市长达10年的上涨。到1932年11月，道琼斯指数跌至41点，与1929年最高点相比，惨跌90%。

在这次股市泡沫中，美国同时也经历了一次佛罗里达州房地产泡沫的洗礼。佛罗里达位于美国东南端，地理位置优越，冬季气候温暖而湿润，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迅速成为冬日度假胜地。许多美国人来到这里，迫不及待地购买房产，随着需求的增加，佛罗里达的土地价格开始逐渐升值，尤其在1923—1926年，地价出现了惊人的涨幅。

例如棕榈海滩上的一块土地，1923年价值80万美元，1924年涨到150万美元，1925年则高达400万美元。一股炒卖房地产的狂潮开始，据统计，到1925年，迈阿密市居然出现了2000多家房地产公司，当时该市仅有7.5万人，其中竟有2.5万名房地产经纪人。可惜好景不长，到1926年，佛罗里达房地产泡沫迅速破灭。

硬通货虚化为不靠谱的信用

我们现在说的“硬通货”指的是信誉良好、币值稳定、汇价挺而坚的国际货币，与此对应的是“软通货”。其实，不管硬也好，软也好，都是一张纸片，和金属货币这种坚硬的实物货币相比，都是不靠谱的信用支撑下的软货币。

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因为金属货币使用上的不便，于是作为金属货币的代理人——纸币出现了。



在欧洲，现代意义上的纸币最早出现在法国，法国的这场实验最终以大泡沫告终。早在 13 世纪，意大利的银行就开始发行汇票，其后又出现了融通汇票、本票，这就是所谓的“私人货币”。私人货币的出现和存在完全依赖于私人信誉和汇兑网络。

亚当·斯密曾指出，“一个像法国、英格兰这样的大国的货币，一般几乎完全是由自己的硬币组成的。因此，如果这种货币在任何时候遭到磨损、削边或其他原因达不到标准价标，国家可以通过重铸货币有效地重建自己的货币”。亚当·斯密引用了阿姆斯特丹存款银行的有关资料，强调了发行一种可用于支付汇票的银行票据的必要性。

这时的银行和我们现在理解的银行完全不一样，它不能贷款和贴现，也不能透支，当然也就不能创造货币，只能百分之百地进行储蓄。亚当·斯密之所以提到银行，是因为他发现了伦敦和阿姆斯特丹之间存在汇率差异，这种差异就是银行货币的溢价。

由于有利可图，欧洲各地相继成立不少官办银行。1656 年成立的瑞典银行在欧洲近代银行业中具有巨大的意义。它一开始就分为汇兑银行和贷款银行两个部分，并于 1661 年发行了欧洲的首张银行券。作为货币的替代物，银行券排行老三，在汇票和存款之后。

1668 年，瑞典银行被收归国有，从而成为世界上最早的中央银行。其后，英格兰银行也于 1694 年成立。银行券流通渐兴，并逐渐演变成现代的纸币，流通中的贵金属铸币则日益减少。到 19 世纪，工业化国家纸币的发行权逐渐集中于中央银行。

纸币的发行最初是以白银为基础的，纸币与白银可以自由兑换，可同时流通，这就是银本位制。同时一些国家也采取金银复合本位、银铜复合本位、金本位等。英格兰于 1717 年决定将英镑按黄金价值固定，此后金本位制逐渐普及，到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实行了金本位制。

经济如此动荡，你要早作打算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各国为了筹集军费，纷纷发行不兑现的纸币，禁止黄金自由输出，金本位制随之告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国企图恢复金本位制，但由于金铸币流通的基础已经遭到破坏，不可能恢复典型的金本位制。当时除美国以外，其他大多数国家只能实行没有金币流通的金本位制，称为不完全或残缺不全的金本位制，该制度在 1929—1933 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下，逐渐被各国放弃，代之以不兑现信用货币制度。

自此之后，各国货币动荡不定，国际贸易呈现出无政府状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坐上了西方盟主的宝座，美元也因其国际黄金储备的巨大实力而空前稳固。于是在 1944 年 7 月，44 个国家及政府的经济特使聚集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商讨战后的世界贸易格局，并于 1945 年 12 月 27 日订立《布雷顿森林协定》，规定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则与美元挂钩，并可按 35 美元一盎司的官价向美国兑换黄金，世界货币形成了布雷顿森林体系。

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因为其只有依靠美国的长期贸易逆差，才能使美元流散到世界各地，使其他国家获得美元供应。但这样一来，必然影响人们对美元的信心，从而导致美元危机。而美国如果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就会断绝国际储备的供应，引起国际清偿能力的不足。这个问题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Robert Triffin）1960 年在其《黄金与美元危机——自由兑换的未来》一书中提出，这就是著名的特里芬难题，或叫特里芬悖论。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美国国际收支开始趋向恶化，出现了全球性的“美元过剩”，各国纷纷抛出美元兑换黄金。到了 1971 年，美国的黄金储备再也支撑不住了，尼克松政府于该年 8 月宣布放弃按 35 美元一盎司的官价兑换黄金的美元“金本位制”，实行黄金与美元比价的自由浮动。1973 年 2 月，美元进一步贬值，世界各主要货币被迫实行浮动汇率制。



金本位制崩溃后，世界各国转向信用本位制或称管理纸币本位制。在这种制度下，货币发行流通完全依赖于发行机构的信用，货币创造过程轻而易举，成本费用微不足道。于是货币的本质变成了一个纯粹意义上的符号，但也正是这个名分，货币依然无所不能，能通胀，也能通缩；能投机，也能泡沫；能使人癫狂，也能使人幸福。

❁ 现代金融幻术

信用本位制后，一国的货币供应量不取决于该国的金属储存量，而取决于一国政府对经济发展或其他因素的判断而制定的货币政策，这就是经济变量或政策变量的货币定义。如此一来，货币就与泡沫结下不解之缘，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全球发生了多次资产泡沫，泡沫的破灭常常带来经济的衰退。当然，泡沫的产生也常常伴随着经济的“繁荣”。

第一，道琼斯指数创纪录大跌。

从1982年开始，美国出现了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和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为股票市场的繁荣创造了条件，因此道琼斯指数当年创出新高并一举突破2000点。从此之后，股市开始缓慢而坚决地持续上涨，大大超过上市公司的实际增长，平均股息从1982年的6.2%下降到1987年的不到2.4%，股票的市价与账面价值的比值从1上涨到2.7，而股票价格收益比率则从7.5攀升至22.5。

虽然有分析家不断指出股票估价过高，但持续上涨的股价却在证明这些警告都是危言耸听，持怀疑论的人要么闭嘴，要么就是继续大丢其脸。投机越来越成为一种时髦，到1987年，美国股市连续上涨5年，涨幅超过200%。正在人们以为股市将持续上涨的时候，10月19日美国股市发生了大崩盘，道琼斯指数当天下跌508点，跌幅达到22.6%，创下新的日跌幅纪录。仅仅几个小时，纽约股市上市公司的市值就损失掉1/4，不少人倾家荡产、负债累累。

经济如此 , 你要早作打算

美国股票市场的崩盘导致了全球股市的传染性暴跌, 东京下跌 15.6%, 伦敦下跌 10.8%, 巴黎下跌 9.7%, 悉尼下跌 25%。仅一天时间, 全世界就损失了约 14000 多亿美元。

第二, 日本的“广场协议”。

日本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对美贸易连年巨额顺差, 1985 年 9 月, 日本签订允许日元升值的“广场协议”。为缓解日元升值压力, 扩大内需, 日本政府从 1986 年开始连续 5 次下调利率, 从原来的 5.0% 降至 2.5%; 同时大力推行金融自由化政策, 使得日本企业越来越重视资本运营, 迷上了“金融炼金术”, 把大量的资金投入股票、房地产, 推动了金融资产和房地产价格上升, 而股票、房地产价格的持续攀升又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资产价格的乐观预期, “泡沫”越吹越大。

1985 年年末, 日经指数为 13083 点, 到了 1989 年年末就达到 38916 点, 4 年间累计上涨近 200%, 而同期日本实际 GDP 增长率年均只有 4%^①。当日本股市凯歌高奏时, 房地产价格也正在疯狂上涨。1990 年高峰期时, 东京、大阪等六大城市市区土地价格上涨近三倍。在不断升值的财富面前, 日本人民充满了信心, 全世界都在预测什么时候日本会超过美国。索尼创始人盛田昭夫说, 日本必须学会在他的批评者面前说“不”, 如果日本成为超级大国, 那对世界是一件好事。

但泡沫吹得再大, 也只是泡沫。日本泡沫在 1990 年开始破灭, 当 4 月日本股市大幅下跌时, 日本的自信随之大幅减弱, 日本《远东经济评论》写道, “太阳变得昏暗起来”。从此, 日本经济走上了“失去的十年”。

第三, 东南亚泡沫。

1980 年以来, 东南亚各国经济出现高速增长, 加上国外大量资本的输入和风险溢价的降低, 使得投资和信用规模急剧膨胀。以泰国为例, 1990

^① [德] 彼得·马丁, 布鲁诺·霍尔纳格. 资本战争 [M]. 王音浩译. 天津: 天津教育出版社, 2008: 266.



年泰国资本净流入是 97 亿美元，1995 年资本净流入增长了 126%，达到 219 亿美元。在大量外国资本涌入之后，泰国的银行系统放松了贷款条件，信贷迅速扩张。

信贷扩张的结果是股市和房市交易火热，资产价格迅速攀升，泡沫现象越来越严重，在金融危机爆发以前的 1996 年，泰国的房屋空置率持续升高，其中办公楼空置率竟达 50%。在中国香港，房地产更是一路高歌，1984—1997 年，香港房价年平均增长率超过 20%，中环、尖沙咀等中心区域每平方米房价高达十几万港元，一些黄金地段的写字楼甚至到了每平方米近 20 万港元的天价。受房价飞涨的刺激，香港的房地产投机迅速盛行起来，出现了一大批近乎疯狂的“炒楼族”。

1996 年泡沫由泰国开始破灭，山火一样飞速蔓延，到 1997 年 10 月，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中国香港相继陷入危机，房地产资产价格急剧下跌，一年时间内平均跌了 40%。股市跌幅更惨，据估计，1997—2002 年的 5 年时间里，香港房地产和股市总市值共损失约 8 万亿港元，比同期香港的生产总值还多。

第四，台指坐火箭掉海里。

20 世纪 80 年代，台湾地区经济已经连续 30 年实现平均 9% 的高增长，赚取了大量外汇，贸易顺差从 1981 年的 14 亿美元增长到 1986 年的 157 亿美元。经济的持续景气刺激了股市和楼市，两者开始飙涨。1985 年台指仅 746 点，到 1986 年该指数越过 1000 点，此后台指坐上火箭，不到 9 个月时间里跃上 2000 点，随后 2 个月内，指数接连突破 3000 点和 4000 点。没有暂停，没有中场休息，真是奇迹。

可是不巧，遇上了 1987 年 10 月华尔街的股市狂跌，台指重挫 51%，低现 2298 点。不过台指上升远没有结束，只是被美国打扰了一下，到 1988 年 6 月，台指就反弹突破 5000 点大关，接着连续突破 6000、7000、8000 点关口。看来台湾地区火箭的二级推进技术真是不错。但台湾当局感觉如此

经济如此 , 你要早作打算

疯狂上涨有些不妥，开始打压，市场出现了下跌，台指至年底累计下跌43%，跌回5000点以下。

但这次下跌后市场更是普遍看好上10000点。果然，1989年台指创出9000点新高，并顺利站稳10000点。人们此时考虑的是如何突破15000点大关，但很可惜，火箭上升动力不行了，有关部门还要拉后腿，股指在1990年2月跑到12682点后开始狂泄，到10月份，降到2485点，跌去一万多点，几乎掉到海里去。

第五，科网泡沫破灭。

1994年，互联网出现，并很快引起公众注意，到1996年，对大部分美国的上市公司而言，一个公开的网站已成为必需品。人们认为这种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商业模式将很快代替传统的商业模式，并会开创很多不可能的商业新模式，于是大量资金涌入互联网，一时间，互联网公司遍地开花。

这些公司大部分缺乏切实可行的商业计划和管理能力，但因为是新颖“.COM”概念，投资者依然蜂拥而至。在“.COM”公司看来，赢利是次要的，关键在于如何尽可能多地“烧钱”，以长期净亏损来获得更多的眼球和市场份额，建立足够的品牌意识，以便以后可以赢利。“快速变大”一时成为几乎所有“.COM”公司的口号。

由于公司是新型的“.COM”，估值就不能再按照传统的市盈率来考虑，那样是落伍的，与科技很不协调，虽然没有赢利，又需要不断烧钱，但架不住钱多，许多“.COM”公司募集资金时，价格高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在2000年3月，以科技股为主的美国纳斯达克指数攀升到5048点，比一年前翻了一番还多，网络经济泡沫达到最高点。

可惜，就算是披上高科技的外衣，网络经济依然于2000年3月10日开始破裂，到2001年，泡沫全速消退，大多数“.COM”公司在把资金烧光后停止了交易，许多公司至死也没有看见过赢利的前景。据估计，这次泡沫的崩溃在2000年3月到2002年10月间抹去了IT界约5万亿美



元的市值。

第六，次贷泡沫。

网络泡沫破裂和“9·11”恐怖袭击发生后，美国经济面临衰退的危险，为了刺激经济增长，美联储实施低利率政策，这一政策极大地刺激了美国房地产业的发展，使之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拉动力量。

在美国，90%以上的人在购买住房时都使用房屋抵押贷款。房地产按揭在美国银行信贷中所占比例为61%。随着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信贷市场也日渐火爆，为鼓励更多的人买房，银行推出了次级抵押贷款。所谓次级抵押贷款就是针对大量信用程度较差的贷款者发放的房屋抵押贷款，这类贷款信用要求不高，但贷款利率通常要高出普通贷款2到3个百分点。

2001—2004年，次级抵押贷款成了大量信用等级不高的购房者的选择。为了吸引客户，一些贷款公司推出了“零首付”的贷款方式。宽松的贷款政策活跃了房地产市场，美国人买房热情不断高涨，不断刺激着房价的上扬，2001—2005年，美国全国平均房价翻了一番。而在1975—1995年的20年时间里，美国房价基本保持平稳，平均每年上涨0.5%。^①

为抑制房地产过热，2005—2006年，美联储17次加息，在节节攀升的利率面前，美国房地产终于开始逐步降温。但在次级抵押贷款市场上，购房者的热情远未冷却。统计显示，次级贷款占美国全部房贷的比例从2001年的不足5%涨到2006年的20%。

在房产价格不断攀升时，贷款者可以通过卖房偿还贷款，但是当房价开始下跌、利率不断提高时，越来越多的贷款者不堪重负，次级贷款市场危机由此产生。在2006年房价泡沫破灭时，次贷泡沫随即破裂，并很快波及证券市场和海外市场，导致了世界性的金融危机。

在美国房地产泡沫和次贷泡沫产生的同时，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都

^① 徐滇庆：《房价与泡沫经济》[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271。

经济如此 , 你要早作打算

经历了房地产泡沫，有的已经破了，有的似乎还在长大。爱尔兰 1996—2006 年，房价平均上涨了 3 到 4 倍，房价之高创下经合组织成员之最，在本轮金融危机中，房价已跌回十年前水平^①。中东奇迹的迪拜曾号称新兴经济体又一成功的范例，依靠房地产泡沫快速在沙漠中崛起，但也已经轰然倒塌，房地产价格从 2007 年的最高值在不到两年时间内下跌一半。^②

第三节 疯狂、惊恐与崩溃

泡沫与我们已经如影随形，在流动性过剩的今天，泡沫以及与泡沫经济相关的问题已经成为政策制定者、市场研究者和广大投资者共同关注的话题。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他们当然不希望泡沫的出现，或者出现后可以借“有形之手”予以控制，不要对社会造成大的破坏；市场研究者自是希望可以成为前者和后者的指路明灯，但很遗憾，这盏灯常常是隧道尽头最后的亮光；而投资者感兴趣的则是希望既可以与泡沫共舞，又能够在最后一支安魂舞曲响起之前带着财富快速离开。

泡沫周期一般要经历以下过程：投资、转位、繁荣、亢奋、获利、恐慌、破灭。转位在这一过程中至关重要，转位没有完成，投资就无法过渡到投机。转位完成后，新的投资机会出现了，信用开始扩张，经济走向繁荣，更多的投资者开始进入，从而产生了正向的连锁反应，市场开始亢奋起来，出现了亚当·斯密所称的“过度贸易”，即针对未来过高收益的纯粹投机。在繁荣时期，投机者往往过高估计未来收益，而这将影响到其他市场参与者。当市场对利润的追逐偏离了正常的商业理性时，投机狂热便出现了。

① 丁志杰：房地产泡沫是爱尔兰债务危机的推手 [J]。中国金融，2011 年第 5 期。

② 吴智钢：成也地产败也地产 中国从迪拜危机吸取何教训 [N]。国际金融报，2009 年 11 月 30 日。



❁ 识别投机狂热

每一次泡沫破灭之前，总伴随着投机狂热，“博傻”也好，击鼓传花也好，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人们交易的目的是为了完成下一次交易，而不是为了买入并持有，更不是为了资产本身的红利。

如果这样的交易能永远持续下去，那参与其中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会是一种享受，通过不断的交易，赢利也就不断出现，财富不断积累。这其实也正是大众不顾危险参与到投机中来的根本目的，对财富的过度追逐导致了泡沫累积到非常危险的程度。

在泡沫未破灭之前，游戏非常具有诱惑力，就像吸毒一样，明知道警察就在外面，但总以为警察要抓的不是自己。

当泡沫发展到顶峰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投机者都被施了魔咒，他们相信这样的赢利游戏可以无休止地进行下去，直到自己也倒下。著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在他的《1929 年大崩盘》一书中将这种心态描述为“公众的大规模发昏”。

投机狂热一般伴随着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持续增长的故事。

纯粹的泡沫，如郁金香事件、南海事件和法国的密西西比事件，那是故事演绎的结果，纯属欺诈，由于现代监管技术的进步，大规模的欺诈已经很难再发生了。

现代的泡沫多伴生在国家或地区经济高速发展时，如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日本和八九十年代的东南亚，其经济成功的模式也一度被认为是独特的、可持续的；或者是出现了革命性的新技术，如 19 世纪的铁路，20 世纪 20 年代的收音机，最近的互联网等。

这些革命性技术的出现，带来了重大的产业结构调整，早期的快速增长，使人们以此推测遥远的未来，人们对未来的预期脱离了实际，导致投

经济如此 , 你要早作打算

资过度，从而引发资产泡沫。

第二，较长时间宽松的货币政策。

货币供应的强劲增长刺激泡沫的产生，同时也埋下了金融脆弱的隐患。自 17 世纪 30 年代郁金香狂热事件以来，支撑所有重大投机活动的都是过量的货币和较低的利率。宽松的货币政策让企业更容易得到贷款，从而引发信贷疯狂增长，企业负债率普遍提高，金融市场流动泛滥。

金融部门通过大肆放贷编织起经济繁荣的景象，而企业为寻求更高的回报，倾向于进入更有风险的投资领域，赌场式思维渐渐取代了正常经济环境下的理性。国际清算银行经济学家研究表明，贷款严重偏离过去的轨道，呈现超乎寻常的增长，有 80% 的概率导致金融危机。长时期的货币宽松政策极易造成金融系统的不稳定性。

第三，投资过度。

在盲目的乐观中，资源错配、浪费现象非常严重，过量资金被用于支撑不断高涨的资产价格而不是改善企业本身的财务状况。19 世纪英美等国的铁路投机热潮中，毫无赢利希望的盲目投资比比皆是，在伦敦和彼得伯勒（Peterborough）之间其实一条铁路就已足够，但实际上建了三条。

美国铁路投机热潮退去时，25% 的铁路线宣告破产。在互联网泡沫中，企业投入了 300 亿美元的资金，建造了 9000 万英里的光缆。据估计，在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前，只有 5% 的光缆处于工作状态；更多的公司在烧光了现金后不得不宣告破产。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发布的一份世界经济展望中指出，GDP 中投资占比过高，往往会导致国家陷入长期的严重经济低迷。

第四，对当局能力的盲目信任。

20 世纪 20 年代，由于美联储的成立，人们相信经济的繁荣与衰退交替的周期已经终结，一个“新时代”已经开始。20 世纪 80 年代，日本人更是摩拳擦掌地准备着很快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日本不仅开



始面对批评意见说“不”，更以为自己如果习惯说“不”的话，那对世界是一件好事。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的“如果你以为听懂了我的话，那你一定是理解错了”的言论，对于市场来说就是“神谕”，人们相信格老这个经济学家中的“巫师”、“华尔街上的神”经常在和上帝对话，已经驯服了经济周期，“新范式”将永久垂范。美国的一家媒体甚至在 1996 年美国总统选举时说道：“谁当总统都无所谓，只要让格林斯潘当联储会主席就行。”2005 年 11 月，一位众议员公开表达对格林斯潘的崇拜：“您引领着美国货币政策走过了股灾、战争、恐怖袭击和自然灾害。您为美国的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整个国家都感谢您。”

第五，道德风险与腐败激增。

道德风险是引起巨大投机狂热的共同特征。由于人们普遍相信当局不会让金融系统出现重大问题，因此不负责任的行为得到了纵容。格林斯潘在美联储任期内，市场普遍相信，只要你足够大，不论你是投机者也好，投资者也好，一旦遇到麻烦，格老会市场注入流动性，你因此可以“大而不死”。

道德风险因此不断放大，腐败激增。繁荣时期，人们心情总是愉快的，钱总是很多，愿意轻信他人，被骗的概率因此增多，贪污贿赂也大幅增长。狂热投机的最后阶段，人们的欲望恶性膨胀，而真实经济世界里的收益远远赶不上心理预期，一些人不可避免地走向“庞氏骗局”^①，肆无忌惮地撒谎、疯狂地造假，直至骗局破裂。

第六，投机成为常态。

泡沫上升的开始阶段，市场总是小心翼翼的，伴随着巨大的分歧和争

^① “庞氏骗局”也称庞氏投资，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老鼠会”。一个名叫查尔斯·庞齐 (Charles Ponzi) 的意大利裔投机商 1919 年开始策划一个阴谋，骗别人向一个子虚乌有的企业投资，许诺投资者将在三个月内得到 40% 的利润回报，然后，庞齐把新投资者的钱付给最初投资的人，以诱使更多的人上当。

经济如此 , 你要早作打算

吵。但市场的上涨无情地将看空者消灭了，对高风险冷漠的人群也被市场卷入时，市场已经将投机视为一种常态了，人们总是相信自己是在投资而不是投机，都陶醉在快速致富的美梦里，却忽略了市场中存在的风险。

此外，有的人还列出了什么固定汇率、快速上升的房地产价格等，作为投机狂热的先兆，因为固定汇率造成了亚洲金融危机，而多数时候的资产泡沫都伴随着房地产价格的大幅上升。

❶ 崩溃时刻的到来

投机狂热的出现和持续的经济“繁荣”，将使泡沫不可避免地走向“明斯基时刻”。

所谓“明斯基时刻”（Minsky Moment）是指美国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所描述的繁荣与衰退转折点的资产价格崩溃时刻。在明斯基看来，繁荣时期，投资者敢于冒险；繁荣时间越长，投资者冒险也就越多，并出现过度冒险，直到资产所产生的现金不足以偿付他们用来获得资产所举债务的临界点，从而导致资产价格的崩溃。

明斯基反对金融自由化，认为金融天生具有不稳定性，并看重政府的作用，尤其是中央银行作为最终贷款人的作用。但有意思的是，他的理论长期以来却很少受到政府和中央银行的重视，因此他在有生之年都只是“非主流经济学家”。

明斯基在经济学上的主要贡献是将金融与经济周期联系起来，强调信贷的顺周期特性对金融体系的冲击。在他看来，尽管历次危机各有各的起因，但又遵循着共同的规律。在一个不受到政策干预的自由资本主义金融体系内，信贷是顺周期的——当经济处于上升阶段时，信贷会扩张；而当经济下行时，信贷便会紧缩。这种顺周期的信贷行为形成了金融体系内生的不稳定性，并最终造成危机的爆发。

在市场上，存在着三种投资者：避险、投机、庞氏。避险投资者资产



方的收益现金流既能满足负债方的利息支出，又能满足本金的支付；投机型投资者的资产方收益现金流只能满足利息支出；庞氏投资者的资产方收益，则连支付利息都不够，而是寄希望于资产升值来偿付利息及本金。

随着经济周期的发展，投资者的角色会在三者之间转换。投资者在购买资产时，无法直接观察到各类资产的未来收益率，往往是基于目前已知的信息对资产未来动态收益率作出理性预期。由于信息不完全对称和市场情绪的影响，投资者对未来资产动态收益率的预期有可能偏离其真实价值。一旦市场对未来经济前景持乐观的态度，投资者将通过举债加大投资，资金的不断流入推高了资产价格，最终推动经济的繁荣，形成一个正的反馈循环系统。

随着经济越来越繁荣，投资者变得越来越兴奋，赢利预期开始日益建立在资产价格上升的基础上，投资变成了投机，资产泡沫开始出现。当最初的投机者收获超额收益时，更多的人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理性的、基于基本面的经济发展过渡到了非理性的“亢奋”阶段，庞氏投资者增多，泡沫于是形成。

在整个过程中，信贷，尤其是高杠杆信贷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泡沫累积到一定程度，信贷收紧就成为理性的做法，去杠杆化的结果常常导致庞氏投资者被迫抛售资产，泡沫随之破裂。

这里的关键是投资角色的转换，转换的发生往往是由于一些来自于经济体外部的强大冲击。外部冲击可能是战争的爆发或结束；也可能是某项技术的发明，如铁路、无线电、互联网等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或者是货币政策发生了出人意料的改变；也或者是所谓新经济模式的诞生等。这些外部冲击规模足够大，影响足够广泛，能够给经济中一个或多个部门带来超额利润，从而改变了经济的整体预期。

在整体预期的转变面前，政府和中央银行常常成为泡沫的推手，通过税收减免、直接或间接补助、专利政策以及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信用的

经济如此 , 你要早作打算

不断扩张，信用扩张和经济繁荣于是相互推动，直到形成泡沫。

在一个经济体中，如果避险融资占主导地位，则表明金融体系是健康和稳健的；相反，如果投机融资和庞齐融资占据的比重过大，则说明金融体系非常脆弱，随时有可能发生大的波动。而泡沫的破裂总是发生在不稳定的金融体系中。

明斯基反对那些所谓的反周期、熨平周期的政策应对，在他看来，这些措施即使能够取得暂时的稳定，也只是为此后产生更频繁和更剧烈的不稳定埋下伏笔，无异于为自己的灭亡埋下种子，因为总会有“算总账”的一天。

明斯基生前是“小众”经济学家，逝世十多年后由于200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他才又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人们恍然发现明斯基的分析不但对他那个时代的金融危机是中肯的，对互联网泡沫的破裂，以及我们正在经历的危机也是适当的。或者，明斯基的理论在当时已经超越了时代，是否真的如此，历史自会给出证明。

也许，这对于明斯基来说可能是好事，因为可以免掉生前的很多骚扰。加尔布雷思1954年写了一本《1929年大崩盘》，人们因此以为他要对1929年大崩溃负责，很多“虔诚的公民”经常为他“生病或早日死亡而祷告”。当他滑雪摔断腿时，一些人以为这是“虔诚的祷告得到了回应”，美国一位州参议员甚至欢呼说：“这是一名共产党地下党员所做的事。”^①

❶ 疯狂、惊恐、崩溃

经济学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理性预期假定，说的是市场的参与者针对某个经济现象进行预期的时候，这个人如果不疯不傻，他应该会充分利用所得到的信息，以使自己作出符合逻辑的判断，并采取相应的正确行动。当

① [美] 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 1929年大崩盘 [M]. 沈国华译.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然，这个人不是共产主义者，他总是倾向于从自身利益出发。这是我们要理解的，因为首先提出这个假定的人是美国经济学家约翰·穆思，在他提出这个假设之前，他几乎没接触过高尚的共产主义者。

理性预期后来成为一个学派，声势不小，但本质上他们是货币主义学派，属于“新古典”风格。遗憾的是，“新古典”低估了人性追求财富的冒险欲望。在这点上，马克思是对的，在马克思看来，如果有 50% 的利润，资本家就会冒大风险；如果有 100% 的利润，资本家就会不顾法纪地胡乱折腾；如果有 300% 的利润，就是砍掉资本家的头颅，他们摸黑也要去试试。

马克思都反对了，但理性预期学派不听，依然坚持认为市场参与者是一贯的和成功的，能有效调节个体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不会犯错误，市场始终处于连续均衡状态中。事实证明，反马克思是不对的，市场中的个体根本不可能掌握完全的、充分的信息，而每个人对信息的理解和处理方式也完全不同，市场因此经常处于失衡状态，而非均衡。

普林斯顿大学的布林德教授因此嘲讽说：“当卢卡斯教授（理性预期学派的代表性人物）改变凯恩斯先生提出的答案时，他通常会把较好答案变为更坏答案。”

但理性预期学派还是有进步的、值得肯定的地方，在他们看来，人们的经济行为是随时根据信息进行调整的，也就是动态的理性，这一点因此成为后来经济学假定的一个基础：市场参与者的行为准则就是追求利润或效用的最大化。

因此，当明斯基所说的“外部冲击”强大到带来一个或几个行业的繁荣时，人们包括政府的预期也就随之改变，在彼此的合力推动下，市场开始出现泡沫，变得疯狂起来，而此时对市场中的个体而言，合理的预期就是自己也要疯狂起来才行，不然就会在这场已经上演的泡沫追逐游戏中被淘汰。这时候的人，在美国国际货币问题专家金德尔伯格看来已经退化成

经济如此 , 你要早作打算

猴子，对投机的追逐也变成了“猴子看，猴子学”。^①

随着投机狂热的出现和“繁荣”的持续，利率、货币流通速度和资产价格都将继续上升。在一定阶段，某些内部人开始出清投机“落袋为安”，如果此时有更多的新投机者进入，资产泡沫将依然保持升势，价格攀升带来的财富效应将吸引更多的新投机者进入，同时也将使出清投机的人开始高位回补。

在市场达到高峰时，更多的投机者开始卖出，而新的投机者总有资本耗竭的时候，于是价格出现下滑。价格的下滑势必给所谓的“庞氏融资”带来很大压力，出清投机偿还借入资金就成为一种不得不进行的选择。当很多投机者开始进行相同的选择时，流动性争夺开始了，资产价格开始崩溃，市场很快演变成一场恐慌的“没有原因的突然逃亡”。

市场恐慌导致资产价格下跌过快过深，以至于人们试图再次购买，或者是政府当局对下跌资产加以管制，为市场提供足够的流动性时，市场信心方可以重建。否则，恐慌的蔓延将导致危机的扩散。

亚洲金融危机扩散到俄罗斯和巴西就被认为主要是恐慌心理导致的结果，因为人们意识到这两个国家和已经崩溃的东亚经济体很相似，都有通货膨胀，外债负担沉重，币值高估，且俄罗斯还有严重的腐败问题。疑神疑鬼，加上经济在亚洲危机中也受到一些损失，金融市场很快就发生了自动崩溃^②。

俄中央银行 1998 年 8 月 17 日宣布年内将卢布兑换美元汇率的浮动幅度扩大到 6.0:1 ~ 9.5:1，并推迟偿还外债及暂停国债交易；9 月 2 日，卢布贬值 70%，使俄罗斯股市、汇市急剧下跌。有若干诺贝尔经济学家参与的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本来豪赌俄罗斯债券利差会缩小的，不料俄市场

① [美] 金德尔伯格：《疯狂、惊恐和崩溃》[M]。朱隽，叶翔译。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7：16。

② [美] 金德尔伯格：《疯狂、惊恐和崩溃》[M]。朱隽，叶翔译。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7：第七章。



如此不堪一击，崩溃使得债券风险溢价大幅提升，该公司方向赌反了，只好破产。好在美联储出手援救，才阻止了恐慌与危机的继续扩散。

因为个体的合理预期，全体就变成了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①所说的“合成谬误”，大家因此相继走向了泡沫，并在泡沫中毁灭。

第四节 泡沫破灭的导火线

泡沫破裂总是有原因的，但事实上，每一次泡沫破灭之前，都很难找到投资者心理预期突然发生绝大转变的踪迹。绝大多数时候，人们还沉浸在美梦中，泡沫就破灭了。

引起投机者心理预期发生巨大转变的常常不是经济上的原因，而是偶然的因素，包括：银行或大企业因投机失败的突然倒闭、庞氏融资的曝光、流动性的大幅收紧、信用骤停、批量投机者的自杀等。

历史上所有的泡沫，不论兴起也好，破灭也好，本质上都是一种金融现象，破灭的根本原因也很雷同：资产价格已经被推到一个荒谬的不可持续的高度，红利本身完全无法达到人们的预期，资产市场演变成纯粹的“博傻”，过度交易的目的根本不是为了资产本身的红利，而是为完成交易而交易。但其破灭的导火索却又大不一样。

● 泡沫导火线探秘

荷兰的郁金香泡沫仅仅持续了一个冬天，其兴也勃，其灭也速。开春了，郁金香新的种植季节到了，投机者不是守财奴，自然不愿意将昂贵的财富埋到土里，于是泡沫快速破裂。

法国的密西西比泡沫破灭的导火线则更简单。有一位叫孔蒂的亲王要

^① 保罗·萨缪尔森：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人，当代凯恩斯主义的集大成者，被誉为“经济学的最后一位通才”，2009年12月13日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家中逝世，享年94岁。

经济如此 , 你要早作打算

求以他自己的定价购买新上市的密西西比股票，好大发一笔横财，却被约翰·劳拒绝，亲王恼羞成怒，就用三辆马车公然拉着纸币到劳氏的皇家银行要求兑换硬币，并沿途散布小道消息。权威的示范作用是巨大的，先例一开，人们对纸币的信任瞬间崩溃。

英国南海公司事件，则是因为市面上畸形繁荣，骗子公司太多，英国国会于是颁布旨在保护南海公司免受“泡沫公司”打扰的《1719 年皇家交易所及伦敦保险公司法案》，这就是后世所称的“泡沫法案”，规定股份制公司必须取得皇家特许状才能继续经营。当大批“泡沫公司”被宣布为非法，并予以取缔后，人们如梦初醒，南海泡沫也因此破灭。

1926 年的美国佛罗里达房地产泡沫因为一场热带风暴而破灭。这场热带风暴导致四百多人死亡，卷走成千上万座房屋。刚开始被视为“具有镇静作用”，是地价暴涨健康的喘息机会，佛罗里达除遭到风暴之外，什么都没有改变。可惜，风暴改变了泡沫走向，这场泡沫破灭多年之后甚至被视为华尔街大崩溃的前兆。

20 世纪 20 年代末发生在华尔街的资产价格泡沫破灭，导致了世界性的大萧条。对于华尔街崩溃的原因，货币主义认为“货币流动性是导致 20 世纪 20 年代繁荣的主要原因，因为它是 1929 年后破产的主要原因”。^① 还有人认为是一系列事件叠加的累积效应，如在此之前美国的佛罗里达房地产泡沫的破灭、美联储缓慢而坚决地将利率水平从 1928 年的 5.5% 左右提高到 9.5%^②，早期的伦敦股市下降以及更严格的借款条件等。

从 1928 年开始，华尔街明显出现了过度交易，当年的成交量是 1927 年的 1.6 倍，同时保证金交易显著增长。根据当时的做法，投资者买股票可以由经纪人提供短期贷款，自己只需交纳 10% 的保证金。1926 年年初经

① [澳] David L. Western. 泡沫·膨胀·破裂：美国股票市场 [M]. 张德远译.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9：176.

② [澳] David L. Western. 泡沫·膨胀·破裂：美国股票市场 [M]. 张德远译.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9：180.



纪人贷款规模在 20 亿~25 亿美元，到了 1928 年年底达到 60 亿美元^①。贷款利率也从 5% 左右持续上涨到 12%，1929 年股市暴涨时期，贷款利率更高达 20%。保证金交易明显加大了股市的投机性和波动幅度。

1929 年 9 月 3 日，道琼斯指数达到历史高位的 386 点后，开始出现高位大幅震荡，欲涨乏力。10 月 24 日，市场开始恐慌，谣言不断，道琼斯指数大跌 20%，11 个知名的投机商自杀身亡。当时伦敦的一些报刊这样描述纽约城里的情景：投机者从高楼窗口往下跳，行人灵巧地在坠楼身亡的金融尸体间穿行。其后，虽有银行家出来护盘，当时的美国总统胡佛也发表谈话：“国家的经济基本面，即商品的生产和销售，是建立在踏实和繁荣的基础上的。”但 5 天后，也就是 10 月 29 日，华尔街崩溃了。

在这次崩溃中，投机商的鲜血应该是泡沫破灭的导火索。任何大规模的投机，最后支撑市场的只剩下普遍的信任感和极度的乐观情绪，而这种盲目的情绪在面对投机商鲜血时将极快地发生巨大逆转。其实，在此之前，已经有信号表明投机泡沫的严重性了，1929 年 8 月 9 日，美邦储备银行将贴现率调高至 6%，利率的提高成倍放大了用保证金交易的风险，一些高投机性的投资信托公司因无法再筹集到资金而宣告破产。

至于后来有人说“先知”成功预言了这次崩溃，那其实只是所谓“楼梯上的智慧”，事后明白罢了。纽约的一家报纸早在 1928 年 3 月 28 日就曾庄严宣告“华尔街的牛市昨日崩溃，爆炸声响彻世界各国”。1929 年 9 月 5 日，有一个叫罗杰·沃德·巴布森的美国金融统计学家说股市要跌 10%，于是市场很快就有了“巴布森突变”的说法，可惜周末股市又涨了。

巴布森是矛盾的，1928 年年初彻底看空市场，但在 9 月转而宣称，如果胡佛当选总统，1929 年将持续繁荣。与此同时，市场上更多的则是看多的声音，当时美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欧文·费雪在 1928 年 10 月甚至还说

^① [美] 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 1929 年大崩盘 [M]. 沈国华译.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14.

经济如此 ，你要早作打算

市场“达到了一个具有永久高位特征的股价”，许多著名的专家教授对市场都怀着“有科学根据的信心”。

在看多的气氛中，被淹没的理性的看空的呼声其实非常之高，而在大崩溃之前，每次的下跌其实都证明是进入的良机，看空的言论更多的只是被别人取笑。著名的哈佛经济学会在 1929 年年初一直坚持市场已经被高估，并一个星期接着一个星期地预测经济将发生轻微衰退，可市场却总是拂了哈佛经济学会的好意。到夏天，该学会实在顶不住压力，终于放弃自己一贯坚持的观点，承认预测失败，并转而认为经济将持续走好。我们不能因为某人的看跌恰好发生在下跌之前，就认为他是一个神明。

在经济泡沫的长河中，看跌其实一直伴随着泡沫的成长，泡沫的高度事实上就是建立在被消灭的看空者基础之上的，泡沫有多高，被消灭的看空者就有多少。

20 世纪 80 年代，日本经历资产泡沫，我国站在自己的立场进行了很多的研究，很多人相信这是一场日美之间的金融对决，日本战败的结果，其根源在于美国强迫日元升值。但在这一点上，西方研究者颇为不认同，在他们看来，日元升值是一种必然，1985 年 9 月的“广场协议”最多也就是加快了这一步伐，所谓的“日元升值萧条”的时间也很短，1986 年年底日本经济便恢复了增长。

但是，出于对日元升值的恐惧，日本政府在“日元升值萧条”中做了重大误判，采取了错误的长时间的货币扩张政策，从 1986 年 1 月到 1987 年 2 月，日本中央银行连续 5 次降息，贴现率从 5% 降低到 2.5%，不仅为日本历史之最低，也为当时世界主要国家之最低，并一直维持到 1989 年 5 月。极度扩张的货币政策造成日本经济体系内到处充斥着廉价的资金，这些资金迅速进入了股票和房地产市场。

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日本泡沫破灭的根源也在于流动性的突然收紧。1989 年年底，主张不惜一切代价抑制泡沫的强硬派代表三重野康出

任日本中央银行行长，上任伊始就将中央银行的贴现率由 3.25% 提高到 4.25%，结束了日本的超低利率时代，其后又于 1990 年 3 月 20 日将贴现率提高到 5.25%，1990 年 8 月 30 日提高到 6% 的历史高位。极速的货币收紧导致了 1990 年年初股市泡沫、1991 年房地产泡沫的相继破灭。

与日本泡沫相似的是，东亚，包括韩国、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以及中国的台湾地区、香港地区等在内的经济体，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也因流动性过剩出现了房地产泡沫和股市泡沫。在一些西方人眼里，“东亚可能已经成为了自我成功的受害者，它们通过大量的出口积累的财富和很高的储蓄率，产生了巨大的资产价格泡沫，并导致经济过热”^①。这种解释在我们看来很诡异，似乎是说亚洲人都在自掘坟墓。

在我们一般人眼里，亚洲金融危机是金融市场开放后国际热钱扰动的结果，是另一场货币战争，不幸的是，美国支持的索罗斯胜利了。其实，如果我们不用意识形态来说事的话，我们本可以更加客观地认识东亚危机。

长期以来，东亚各经济体的汇率政策紧盯美元，实行固定汇率，财经政策因此丧失了独立性，中央银行对汇率失去了实质性影响力。在东亚经济一片向好之时，国际资金大量涌入，大大提高了流动性，并进一步加大了资产价格泡沫。

1994 年年初，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贬值超过 50%，外资开始从东亚转入中国；1994 年美国为抑制通胀，快速加息，亚洲出口出现疲软，泰国、马来西亚和韩国等不得不依赖中短期外资贷款维持国际收支平衡。

相对美元的走强，东亚货币出现了整体的高估，由索罗斯主导的量子基金乘势大量卖空泰铢，迫使泰国不得不于 1997 年 7 月 2 日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当天，泰铢兑美元汇率下降了 17%，从而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菲律宾比索、印度尼西亚盾、马来西亚林吉特、新加坡币、韩元以及中国

^① [澳] David L. Western. 泡沫、膨胀、破裂：美国股票市场 [M]. 张德远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9：202.

经济如此 ，你要早作打算

香港港元等相继受到冲击。

日本泡沫破裂是日本政府主动收缩流动性的结果，而东亚泡沫的破灭则是因投机者发动突然袭击，东亚很多国家宝贵的外汇储备在保卫本国货币过程中被投机者洗劫一空，流动性也因外资快速撤离被动地大幅收缩，所以显得更加无奈与凄苦。索罗斯对泰铢的攻击是泡沫破灭的导火线，这是已经公认的。但他之所以对泰铢发起攻击，正是看到了泡沫已经不可持续，东亚货币相对于美元已经出现明显高估的趋势。

2007 年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最初也起源于美国房地产泡沫的破灭，本质上也是流动性问题。2001 年之后，为促进经济增长和刺激就业，美联储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连续下调利率，将联邦基金利率降至 1% 的历史最低水平，并在 1% 的水平上停留了一年之久。

过低的利率和美国政府一再鼓励民众拥有自己住房的政策直接刺激了民众的贷款投资热潮，越来越多的生活状况不稳定的民众通过银行贷款加入到购房者的行列中，金融机构也针对信用等级不高的购房者推出了相应的信贷政策，一些金融机构甚至为购房者提供 100% 的贷款。美国房市的持续上涨，使投资者预期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人和机构卷入了房屋信贷的游戏之中，而越来越多参与者的进入又加速了房价的上涨。

美国房价在 1996—2006 年平均上涨了约 85%。为抑制过高的房价，美联储自 2004 年起连续 17 次加息，到 2006 年 6 月，联邦基金利率已从 1% 上升至 5.25%，从而推动了房屋借贷成本的上升，促使美国房市在 2006 年由升转降，房地产泡沫破灭，于是爆发了次贷危机。

次贷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自然是信贷持续收紧，爆发的导火索则是 2007 年 4 月美国第二大次级贷款抵押机构——新世纪金融公司向法院申请破产保护，尽管这次破产清算并未引起市场恐慌。

但其后金融机构相继卷入次贷危机，导致整个金融市场流动性的急剧收缩，各国中央银行不得不向市场紧急注资，而美国政府拯救房地美和房



利美的行动却在国内引起了大讨论，大多数认为这样的行为违背了美国一直奉行的自由市场法则。当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因次贷危机损失惨重，寻求政府支持不果，不得不申请破产保护时，全球金融市场产生集体恐慌，次贷危机升级为全球金融危机。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导火线自然应该是雷曼兄弟公司的倒闭，但其背后深层次的制度性原因，目前则分歧多多。当然，这次并不是美国和别国进行金融战失败了，在我们看来，这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必然结果，是资本主义自己把自己玩残的。这样的看法非常正确，因为一些西方人也是这么看的，克鲁格曼就曾说“最近一连串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出了问题”，还有一些人甚至说美国救市，向金融机构注资推行的是国有化策略，学的就是社会主义，看来，社会主义将最终挽救资本主义。

然而，事情似乎没有这么简单。一些西方学者曾把这场危机看做信贷危机，危机起于信贷，也将终于信贷。一些学者则认为是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失败，是新自由主义思潮和美国政府对金融业解除监管的政策直接导致了金融系统的危机。相反，坚定的自由市场信仰者则认为这场危机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胜利，在他们看来，利率调节等考虑欠周的政府举措才是危机的根源，是政府干预导致金融机构制造出更多的有毒资产和更疯狂的投机行为。还有一些人则认为这场危机是最近30年来拉美金融危机与亚洲金融危机的继续和发展，也是美国国内几次危机的继续和发展^①，是金融体系内在不稳定性导致的结果。

● 泡沫可以杜绝吗

从久负盛名的郁金香泡沫之后，三百多年的时间里，世界各国发生了多次泡沫危机，虽然每次泡沫后人们都不断忘我地反思，并痛恨别人的贪

^① 吴易风，王睦霞。克鲁格曼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和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经济如此 ，你要早作打算

婪，监管也在不断进步，但结果却是发生泡沫的频率越来越高，泡沫越吹越大，超越了地区、国家的界线。这其实是人类天性的使然，也是金融发展的必然结果。

人类本性是贪婪的，追逐财富成为绝大多数人的梦想。人们明知投机风险巨大但仍义无反顾投身其中，争先恐后加入狂热的财富追逐盛宴，害怕自己进场晚了可能连汤都喝不上。正是这种非理性、疯狂和贪婪，导致人们踏着历史的足迹，不断重复过去的悲剧。

人们相信“魔鬼抓住的是最后一个人”，而自己永远不会是最后的那个人。每次泡沫后，人们也在反思，但反思的却是自己“怎么就被魔鬼抓住了呢”，结论是下次自己一定不会是“魔鬼抓住的最后一个人”。凯恩斯认为，市场这个魔鬼要抓的是“最后一个傻瓜”，而在一个疯狂上涨的市场里，每个人都是傻瓜，理性的分析完全没用，不论股价多高，买与不买只决定于能否找到下一个出价更高的傻瓜，只要不做最后一个傻瓜，那就是成功的高尚人士。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里写道：“繁荣期之特征，乃一般人对资本之未来收益作乐观预期，故即使资本品逐渐增多，其生产成本逐渐增大，或利率上涨，俱不足阻碍投资增加。但在有组织的投资市场上，大部分购买者都茫然不知所购为何物，投机者所注意的，亦不在对资本资产之未来收益作合理的估计，而在推测市场情绪在最近未来有什么变动，故在乐观过度，购买过多之市场，当失望来临时，来势骤而奇烈。”

欧文·费雪也认为在经济繁荣阶段，整个社会会处在一种过度乐观的心理状态之中，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依赖于银行的宽松信贷条件，过度投资、过度投机的行为将会大量出现，资产泡沫由此泛起。

人类的“金融记忆”是短暂的，索罗斯曾说：“世界经济史是一部基于假象和谎言的连续剧。要获得财富，做法就是认清其假象，投入其中，然后在假象被公众认识之前退出游戏！”很多人也正是这样做的，但可惜的



是绝大多数人没有索罗斯这样的运气。

货币制度从金属货币演变为信用货币，货币的替代物、衍生产品不断出现，货币的信贷膨胀、超发、流动性都在不断增强，这都为投机和资产泡沫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因此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出现货币与资产相互追逐的游戏。

行为金融学的研究表明，人类存在各种认知偏差，投资决策时，一般会通过观察他人的信息或者说公共信息，有意无意间忽略自己的私人信息，在一个乐观情绪弥漫的市场里，常常表现出从众心理和“羊群效应”，从而导致资产泡沫的出现。凯恩斯曾说“股票市场是一场选美比赛，在那里，人们根据其他人的评判来评判参赛的姑娘”，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第二章

流动性泛滥与中国泡沫

货币的发行似乎永无止境，我们的工资似乎越来越高，但能买到的东西却越来越少；我们不断被变成“百万富翁”，但同时也正在被变成“房奴”、“车奴”；身边的千万富翁似乎越来越多，但我们又感觉日子越来越难。

当下，各个领域的泡沫都在膨胀，我们要小心，小心，再小心……



2009年，民间有人要清查房地产暴利，鼓噪要求开发商公开成本，开发商生气了，抬出“大炮”一阵乱轰，说“公布成本无异于公布老婆的三围，她又不参加选秀比赛，这是不可能的”。有关部委一想，强制别人公布成本确实有些不地道，于是乎只好作罢。

其实，就算是参加选秀，说说三围，穿件“三点”，走走猫步，外行大约也看不出什么名堂。露在外面的固然重要，但紧要的却是藏起来的部分。

对于房地产泡沫的认识，中国一些人的认识是走在世界前列的，有人提出了“结构性泡沫”一词。

据说2009年年底，“经济学的最后一个通才”萨缪尔森，在天堂里遇见“而我甚至也不再去歌唱”^①的凯恩斯后，说：“老师，经过我们的努力，已经将您以前给政府准备的干预经济的工具箱变成了超大型集成装备，您的理论几乎已经成为所有政府干预经济的准则了。”

“我知道，这都是你的成绩，是你改变了你接触到的一切。”^②凯恩斯回答道，“听说你建议中国走适度中间路线，中国的反应如何呀？”

“您知道，我努力信奉现实主义，而不是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适度的

① 凯恩斯基志铭上的最后一句话。

② 麻省理工学院校长苏珊·霍克菲尔德在萨缪尔森逝世后说，萨缪尔森“改变了他接触的一切”。

经济如此 ，你要早作打算

中间道路其实也就是您的理论的另一种说法。”

“这倒新鲜，”勋爵冷笑了，“那中国的结构性泡沫又是怎么回事？”

“这，这个概念我不清楚，”竟有通才不知道的事情，萨缪尔森不免惶恐起来，“我马上打电话给克鲁格曼，他是这方面的专家。”

不一会儿，克鲁格曼电话打回来了：“师爷，老师，天堂里好！”依然是大大咧咧的声音，“老师以前跟弗里德曼^①打赌，准备拿一个绝妙的理论换他的灵魂，但弗里德曼说自他以后绝妙的理论都在东方了。我看，这个结构性泡沫可能正合适。”

勋爵一听“弗里德曼”几个字，脸色就有些不好看：“这么好的理论拿去换什么灵魂？”转头看看萨缪尔森，说，“你有时间转告克鲁格曼，让他今后说话过过脑子，不要张嘴就乱说，他在亚洲就不如你受欢迎，被称为什么‘乌鸦嘴’，好像是他的嘴让亚洲遭遇金融危机似的。”

“嗯，嗯，好的，”萨氏忙不迭回答，“但结构性泡沫这个理论真这么好吗，老师？”

“那倒不是，”勋爵脸色平和了一些，“你有所不知，结构性泡沫其实就是从魔鬼那里用灵魂换来的，现在地球上只有泡沫，没有灵魂。”

自从凯恩斯 1936 年发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之后，货币在经济中的重大地位就此奠定。

在此之前的古典经济学看来，货币的出现对于物物交换虽有必要，但对于经济究竟有多大意义尚说不清楚，需要货币自己给出证明，但货币自己给出的证明似乎并不好，很多时候对于是否能节约交易费用都不敢肯定。^② 19 世纪 70 年代兴起的新古典理论则认为货币对经济发展基本无用，

^① 米尔顿·弗里德曼：1976 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货币主义学派”创始人，2006 年 11 月在旧金山逝世。

^② [美] 劳伦斯·哈里斯：货币理论 [M]. 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89.



货币是货币，实物是实物，两者河水井水不相犯，货币的增加只影响物价水平，不影响经济的运行，也就是货币理论与价值理论是“两张皮”，不能融合。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则革命性地将价值、分配理论与货币理论联系在一起，认为货币与实物不可截然“两分”，“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在最后比开始赚取更多的货币，企业没有别的目标，这是企业（货币）经济的本质特征”^①。

通过这种创新的货币经济观，凯恩斯把货币以一种实质性的方式融入真实经济过程。凯恩斯及其后来者均认为货币不再是中性的，对经济发展起着重大作用，好的货币政策要实施通货膨胀定标，因为通货膨胀是经济的润滑剂，轻微的物价上涨，能维持经济的长期稳定与发展。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反凯恩斯面目出现的“货币主义”代表性人物弗里德曼也认为，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是引起经济活动和物价水平发生变动的根本的和起支配作用的原因，并很好地解释了 20 世纪 70 年代在西方出现的剧烈物价上涨与经济增长停滞同时并存的“滞胀”现象。于是“货币主义”开始流行起来，并对美英等国的经济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

但遗憾的是，凯恩斯及弗里德曼等认为货币当局能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来调节整个经济的观点却被一些国家误用，变成了货币的滥发，以为这样子可以增加产量，增加国民收入。岂不知他们真实的意思是货币供应增加短期会使产出增加，促进经济发展，但从长期看，货币供应只决定物价水平。

这一点，我想可能大家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因为自从货币从金属过渡到信用后，发行货币几乎没有任何本钱，政府情不自禁地都会想多发点，现在既然前有凯恩斯，后有弗里德曼，都说货币多一点对经济有用，那货

① Keynes, T. M. . *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Maynard Keynes*. London: Macmillan, 1973.

经济如此 ，你要早作打算

币多发就更有了借口，至于以后物价如何，会不会有资产泡沫，似乎暂时可以不管。更何况，货币本有“面纱”一说，有些朦胧，有些美，也算是一种经济魔术的道具，大家不妨用货币的增发玩一套经济增长的魔术娱乐娱乐。

第一节 泛滥的流动性

2010年，某银行前副行长在上海接受某家杂志采访时说：“过去30年，我们是以超量的货币供给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①这番言论一时引起了从黄浦江到珠江、从南海到渤海、从平原到高山轩然大波。

这话不能说没有道理，“超量货币”推动“快速发展”，本来没那么高，加个增高垫，看起来就靓一些，走路也可以摇摆生风。但这个表述因此也被误解为仅仅是超量货币推动了经济发展。还有的媒体一算，中国货币超发已达到43万亿人民币，真是不得了，于是网络为之疯狂。

但很快，银行前任行长和现任副行长站出来高调回应说“这一提法不科学”^②。

不科学在哪里呢？没有明说。麻烦的是这个社会本来就浮躁，可不管什么科学不科学，并将很多矛盾都归咎于超发的货币。

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函数只是对美国过去经验数据的一个估计，根本不可能适应转型中的中国经济，虽然这个函数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但中国一时半会就是找不到，更何况我们害怕通缩甚于通胀，货币的超发因此就难免。但我们不得不说，中央银行调控经济的水平在不断进步。

在亚洲各经济体中，中国虽然属于宏观经济波动幅度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但由于调控艺术的进步，中国经济波动的幅度近几年在明显减少。

① 谈佳隆。升值与通胀 人民币超发43万亿之后 [J]. 中国经济周刊, 2010年第42期。

② 王松奇。中央银行货币超发之谜 [J]. 银行家, 2010年第12期。



❁ 超发的货币

要谈货币的超发，首先得理清几个概念。

反映货币供应量的重要指标有 M0、M1、M2，各个国家和地区在这些概念上有些许区别，现在说说我国的定义。

M0 是指流通中的现金。

M1 是指狭义货币，反映经济中的现实购买力， $M1 = M0 + \text{活期存款}$ 。

M2 是指广义货币，不仅反映现实的购买力，还反映潜在的购买力， $M2 = M1 + \text{定期存款} + \text{储蓄存款} + \text{其他存款}$ 。

此外，还有 M3，只是这个概念我们一般不大用， $M3 = M2 + \text{金融债券} + \text{商业票据} + \text{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等}$ 。

中央银行印出来的钱首先向商业银行投放，这时还是 M1，这部分 M1 被称为“高能货币”，能量很大，商业银行拿到这笔钱肯定要找出路，于是不断循环着往外发放贷款，这就产生乘数效应，派生出几倍多的 M2 货币。改革开放后，我国货币乘数持续上升，在 2005 年年末就已达 4.64^①。如果中央银行觉得外面钱多了，就通过提高准备金率、发行国债什么的往回收，收到自己的库里暂时不放出来。

在我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主要盯住的是广义货币 M2。所谓“货币超发”，是指 M2 发行增长速度超过维持经济正常运行所需要的货币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每增长 1 元价值，作为货币发行机构的中央银行也应该供给货币 1 元，超出 1 元的货币供应则视为货币超发。

改革开放以来，“代表主流经济学观点的通货膨胀有益论曾占有优势地位”^②，货币的不断超发也就顺理成章，与此相应的是 GDP 不断增长和物价的持续上扬。正如现代货币数量论和许多实证所验证的那样，我国的货币

① 对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张健华的专访 [N]. 金融时报, 2010 年 10 月 15 日.

② 吴敬琏. 经济学与中国经济的崛起 [J]. 求是, 2011 年 8 月 17 日.

经济如此 , 你要早作打算

供应量与 GDP 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具有较强的相关性。货币的长期周期性变动与相应的货币收入和价格水平变动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

我国货币超发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979—1994 年为第一阶段。这个阶段人民银行还只是财政的出纳，财政有了赤字，银行开动印钞机给予弥补；银行系统缺钱了、国有企业转不动了，也开动印钞机解决。那时的国有企业和政府的预算约束都很软，它们和中央银行也好，和印钞厂也好，都是一家子，都是所谓“国家”的，互相帮衬那是正常的，因此就形成了对中央银行货币投放的“倒逼机制”，也就是中央银行被动地进行基础货币投放。

“文化大革命”刚结束时，冤假错案要平反，平反后须得补发工资、抚恤金，发还抄没的财产，这都需要钱，而财政部当时拿不出这么多的钱，只好靠发票子。这是没有真实经济背景的货币乱发，但这时由于中国经济改革从农村起步，未涉及大范围的物价调整，仅以提高农产品价格为重点，旧的价格机制仍在发挥作用，以往积累的一些矛盾尚未暴露出来，物价上涨表现不太明显，通货膨胀比较轻微。

其后为了价格闯关，从 1984 年开始，钞票供应速度明显加快，M1 和 M2 增速绝大多数年份都在 20% 以上，引发了改革以来的首次恶性通胀。1985—1987 年，CPI 分别达到 8.8%、6.0% 和 7.3%^①，进入 1988 年物价更是汹涌，7 月份 CPI 已达到 19.3%，全国几乎都陷入了抢购风潮，中央用行政调控好不容易才使官方公布的 1998 年 CPI 指数维持在 18.5%^②。但值得庆幸的是，经此一役，我国终于闯过价格“双轨制”的大关。1979—1994 年 GDP 与 M1、M2 增速情况，如图 2-1 所示。

1995—2007 年为第二阶段。1995 年开始执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财政赤字不得通过向人民银行透支解决，制度上杜绝

① 中国统计年鉴 1998。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8：777。

② 中国统计年鉴 199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6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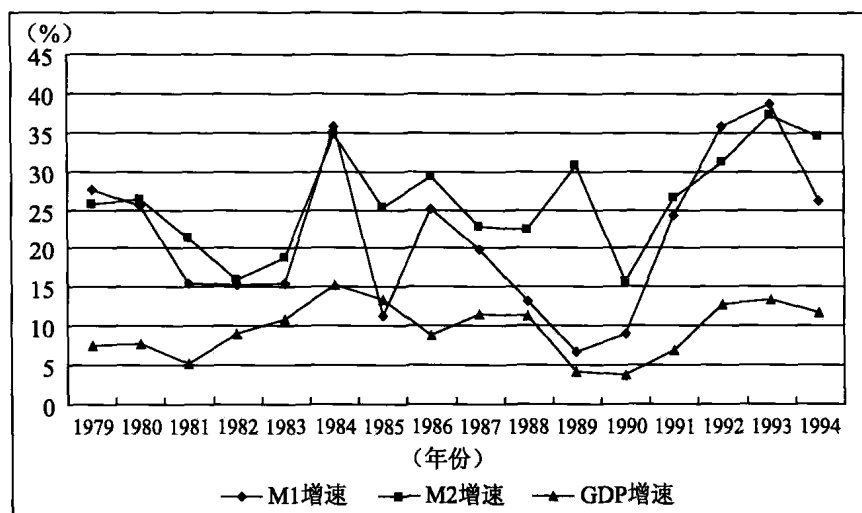


图 2-1 1979—1994 年我国 GDP 与 M1、M2 增速比较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统计局网站上的相关资料整理而得。

了政府把中央银行当做财政之外又一个钱柜子的做法。以后解决政府财政赤字，只能靠税收、靠发国债、靠国有资源的收益上缴，不能靠银行超发票子。

我们不得不说，这是个制度性进步，但在纯粹信用的货币体系下，这个制度有时也只是一个障眼法，原来是通过中央银行印钞票直接解决财政赤字，然后引起通货膨胀，做法有些露骨，懂一点事的就直接怨政府抢钱。现在变成了中央银行印钞票先到社会上转一圈引起通货膨胀，回头来再间接解决财政赤字的温柔方式，搞得中央银行成为人们注目的一个焦点。但不得不说，这种玩法还是高明些。

现在好了，责任都在中央银行了。对财政的被动发钞时代结束，却又冒出一个 1994 年人民币汇率大幅贬值时就已经注定的新的发钞口子，每年新增的国家外汇储备，全部是中央银行用基础货币买进来的。

怎么买？中央银行想按什么价买就按什么价，可惜那时我们实行的是盯住美元的汇率，不浮动，也就只好按照人民币兑换美元的官方汇率

经济如此 , 你要早作打算

购买。1997—2005 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为 8.26 元,这意味着每增加 1 美元国家外汇储备,中央银行就要增加 8.26 元人民币的基础货币向商业银行购汇。

这 8.26 元的基础货币属于“高能货币”,乘上 4~5 倍的平均货币周转速度,市场增加的货币就不再是 8.26 元,而变成了 40 元左右。从 2002 年年末到 2010 年 9 月末,外汇占款 2.21 万亿元增加到 19.5 万亿元,增长了 7.8 倍;外汇占款占基础货币的比例由 49% 增长到 121%。受此影响,基础货币也扩大了 2.6 倍。^①

由于外汇占款导致基础货币增发,这不是中国的特例,东亚经济体的日本和中国的台湾地区、香港地区都曾发生过。不同的是,我们在此之外,依然在大印钞票以“润滑”经济。

为何继续大印钞票?有的学者认为中国计划经济时代很多产品没有货币化,中国经济货币化和金融化就需要印钞。“房改”后住房商品化需要大量货币,“医改”后医疗产业化需要大量货币,“教改”后教育产业化同样需要大量货币,还有政府要发行债券,国有企业要股改,资源要市场化,这些都需要大量资金,不开动印钞机行吗?自然不行的。否则会出现通货紧缩,而通缩比通胀麻烦得多,你本来有钱都会显得越来越没钱,而通胀却能使你从没钱逐渐走向有钱,感觉大不一样。

1995—2010 年我国 GDP 与 M1、M2 增速情况,如图 2-2 所示。

第三阶段是从 2008 年开始的。为应付 2007 年的金融危机,中央银行 2008 年开始更是大肆货币超发,货币供给增幅持续涨幅高于 GDP 增幅。

2009 年我国政府公布新增贷款目标是 5 万亿元,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增长目标是 17%,实际执行结果很不理想。当年实际新增贷款达到 9.7 万亿元,比计划多增 4.7 万亿元,多增了 94%;M2 的余额达到 61

^① 对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张健华的专访 [N]. 金融时报, 2010 年 10 月 15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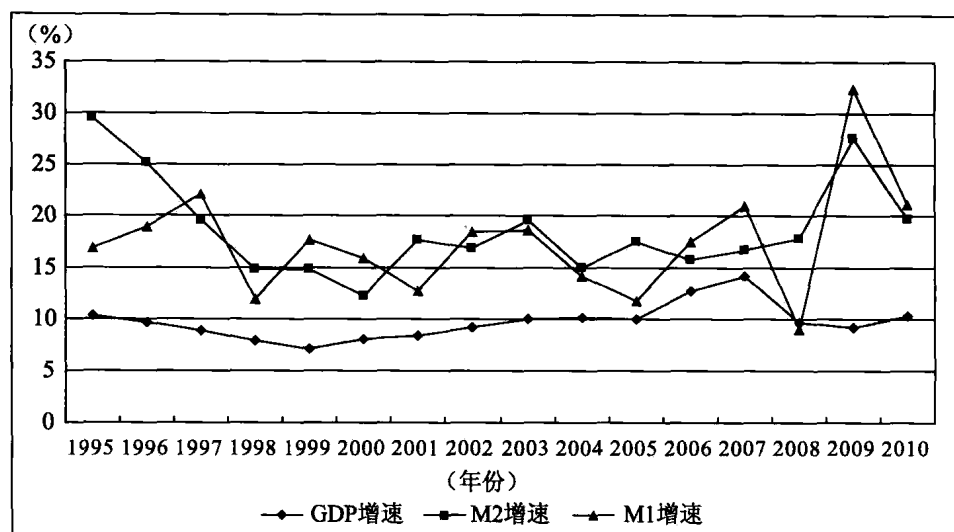


图 2-2 1995—2010 年我国 GDP 与 M1、M2 增速比较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统计局网站上的相关资料整理而得。

万亿元，比上年末增长 28.4%，比经济增长率高 19.4%。2010 年，我国货币广义货币供给增长目标是 17%，实际增长为 18.9%，再一次突破年初的预定目标。

至此，过去 30 年我国广义货币的年均增长率为 17.5%，远远超过经济增长率。2010 年年底，我国 GDP 为 397983 亿元，是 1978 年 3645.2 亿元的 109 倍。但同期，广义货币供应量却从 1978 年的 859.45 亿元增长到 2010 年年底的 725851 亿元，为 844 倍。M2/GDP 比值从 0.23 上升到 1.82，已经处于世界一流的水平了。

1978—2010 年我国 M1、M2 增长情况，如图 2-3 所示。

货币的超发，其实我们都已经感觉到，钱是越来越多，物价是越来越高，房子是越来越贵，虽然我们的钱比之前多了很多，感觉却是越来越没钱。但一些经济学家的感觉就和我们不一样，在他们看来，中央银行根本就没有超发货币，我们投放的货币都是有真实经济背景的，就算是因外汇占用被动增发，也已通过央票不断回笼，并认为不会对经济造成不利影响。

经济如此动荡，你要早作打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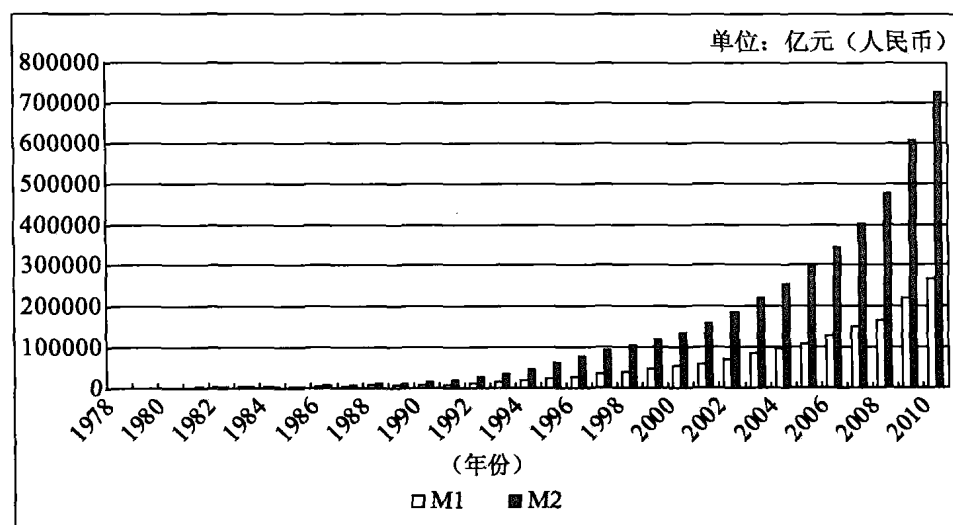


图 2-3 1978—2010 年我国 M1、M2 增长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统计局网站上的相关资料整理而得。

至于其他的，试图通过货币超发引起通货膨胀、刺激投资和消费似乎在中国根本就不存在。而为挽救国有企业的拨改贷、为挽救国有银行的几万亿不良资产剥离和外汇注资等，都是因应改革需要而合理增发的货币。就算是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主动超发货币，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情，那只是世界性货币超发的一个环节，因为如果不那样做，我们就会吃大亏，会在国际市场上买到低价的铁矿石、有色金属和石油，那样通货会紧缩，经济增长会下降。

M2/GDP 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金融深化的初级指标，通常来说，该比值越大，说明经济货币化的程度越高。我国的 M2/GDP 数字 2009 年达到 1.79（2010 年为 1.82），而同期的美国因为要救市，货币裤腰带很宽松的时候，也仅为 0.88，巴西为 0.84，俄罗斯为 0.50。我们既远高于欧美等西方发达地区，也高过印度、巴西等同是“金砖”的新兴市场，也高于同样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同样有高储蓄倾向的日韩等国。

我国 M2/GDP 比值之所以如此之高，自然是有特殊性的。特殊性在哪



里呢？大致可以说的理由如下：一是货币化过程的影响，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这个过程，必然伴随经济的货币化程度升高；二是有较高的储蓄率；三是银行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结构；四是金融创新不足。这些因素其实只是我国货币超发的部分理由，完全不足以解释我国的 $M2/GDP$ 比值为何会位列全球前茅。

我们不能因为世界上并不存在一个固定的 $M2/GDP$ 最优比值，就以为我国目前超高的 $M2/GDP$ 比值是合理的。如果以为这个比值合理，那么 CPI 增幅在 6% 以上也是合理的，房地产价格两三年翻一番也属于正常的，调控房价、通胀控制等都是庸人自扰，完全没必要。其实，中国的特殊性都不特殊，根本的特殊性隐藏在政府的“有形之手”里，隐藏在国有银行的坏账里。

● 繁荣与泡沫共生

货币从金属变成信用后，基本上就成为光棍了。这样的货币虽是光棍，但也算有了对象，轻易不会乱来，这个社会也就不会形成通货膨胀，资产也就不会有明显的泡沫。但如果是超发的货币，那它们就是完全的光棍，背后什么都没有，只有所谓的“信用”，而这种信用基本不靠谱，因为货币发行机构不顾“信用”，它们才得以诞生。

既然是“哧溜溜”的光棍，看见了资产这些打扮得光鲜靓丽的美女，自然会撒开腿就追。如果很多光棍都相中了一个美女，大家争先恐后地追，追上了就死死抱住，这个美女难免就变成泡沫。如果新的光棍多数愿意打酱油，不惹事，今天追这个，明天追那个，追上了看一眼，最多也就亲一个，闹着玩，那这个社会就会显得很“繁荣”，只是物价可能会慢慢地涨起来，但不怕，因为有了暂时的繁荣景象，物价高点似乎也还可以忍受。于是“繁荣”与“泡沫”共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持续的令人炫目的高增长，创造了继

经济如此 ，你要早作打算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之后新的“增长奇迹”，目前 GDP 已稳坐全球老二的位置，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如果将之视为货币超发的功能，那是偏激的，我国 GDP 快速增长主要还得益于改革开放，得益于主动参与到全球经济一体化，得益于我们廉价卖出我们可以出卖的东西，包括地下资源、劳动力和曾经美丽的环境。

但，我们不能否认货币的超发确实也刺激了经济的增长。只是从长期看，超发的货币制造的不过是所谓的“繁荣”，“繁荣”的具体表现就是泡沫的不断兴起，以及在泡沫中狂欢的人们，豪车、豪宅，灯红酒绿，夜不归宿，LV 横行，GUCCI 满街，“二奶”兴起，“牛郎”盛行，夫妻之间离婚又闪婚，等等，不一而足。当然，物价也会上涨，但只要物价的上涨追不上大多数人“泡沫”财富的增长，只要“泡沫”不破，这个世界就可以持续“繁荣”下去。

2003 年，我们的中央银行应该就已经感受到货币超发的严重后果了，因为房地产泡沫正在慢慢冒起。因此中央银行希望有所抑制，并率先在当年的 4 月份公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明确要求提高购房首付比例，不再执行利率优惠等政策，但国务院当年 8 月份宣布房地产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政策给中央银行绊了一脚。其后，正常的结果自然是房地产泡沫越吹越大，从中国特色的“结构性泡沫”变成了全局性泡沫，从房地产泡沫，延伸到古玩、字画、大蒜、玉石等，就差水和空气没炒了。

好在房地产成为了支柱产业，因此可以大量吸纳超发的货币，可见中国还是有英明而睿智的人。中央银行有时也真是糊涂得可爱，那么多钞票总得有地方吸纳才行，如果大家真在 2003 年就开始打压房地产，多发的钞票怎么办？不仅房价可能打压不下去，有损中央政府的威信，物价也早涨得不成样子了。

进入 2007 年，当大家都意识到钞票确实发得有些多，“结构性泡沫”



不正视不行，中央也准备要“软着陆”时，美国却发生了金融危机。全球老大病得不轻，大家自然都有些恐慌，各自忙着“救市”。这下倒好，中国经济就只好暂时不着陆了，依然维持高速飞行。

在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纷纷陷入经济衰退，哀鸿一片之时，中国经济则独秀于林，不仅昔日风采依然，2009年顺利实现“保八”的增长目标，而且显得更加靓丽。各地的投资计划都大得惊人，政府控制的平台公司蜂拥而出，中央企业景气程度大幅提升，国有经济似乎已成为了对抗经济衰退的绝对法宝，大有扬眉吐气之势。

房地产自是尤为火暴，各大城市房产价格几乎都在2009年一年的时间里顺利实现翻番，并正向中小城市蔓延。玉石也疯狂，几年的时间价格就几十倍、上百倍地跳涨，弄得炒玉的人心里都有些发毛。这在外界看来，已经不单是奇迹，而是戏法了。2008年，克鲁格曼就表示：“看中国的经济增长数据，就像是看一部科幻小说。”

在这一轮全球性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中，中国不着陆，只空中加了点油就继续高飞。我们不禁要问，加的是什么神油？加的是货币的神油。我们用不断超发的货币继续着华丽的飞行。2009年4万亿元的投资及新增10万亿元的信贷，还有不断涌现的地方平台公司和不断壮大的央企，生成了新的“繁荣”与更大的“泡沫”，并以此对抗全球其他经济体的“去泡沫化”。在这点上，中医是有传统的，讲究“以毒攻毒”，看谁更毒，西医则是要动手术，将腐烂的肉割掉。目前看来，中医暂时胜出。

供给货币制造经济繁荣，其实早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日本元禄年间就曾搞过，也因此形成了长达十多年的“元禄繁荣”。当时的主财政者荻原重秀因为经济的繁荣，总结出“通货此物，赖（政府）信用而畅行矣。苟信用立，则何必铸金，虽瓦土可为钱币也”的名言，可惜不久后日本就物价飞涨，其本人亦被“罢黜其去职回乡，未几即予暗害”。

三百年前的法国也曾试验了一把，那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密西西比

经济如此 , 你要早作打算

纸币案”，一般称之为“密西西比泡沫”。约翰·劳利用滥发纸币在短短几年内给法国制造了经济“繁荣”，自己也从一个苏格兰的骗子变成法国财政部部长、法国科学院荣誉院士。很遗憾，劳院士结果依然不善。

我们的繁荣和泡沫与法国还是有较大不同的，二者的根本差异在于我们可以通过从农村向城市的价值转移使城市在一定时期内形成畸形的繁荣，“其中的最亮点就是条条块块政府连同掌控的公司，都可以动用征地权把原本属于农民的集体土地直接变成国有资产，并以此满足增加向银行贷款的抵押条件。”^①而2007—2010年，政府卖地收入累计达到7.25亿元也直接印证了这一点。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的繁荣与泡沫才可以较长时间地耀眼而不破灭。但在这背后却是城乡差距的日益扩大。

我们的繁荣之所以说是畸形的，不单是因为城乡差距的扩大，也因为城市日益繁荣的同时，伴生着高昂的环境污染和劣质的廉价商品，通过不断劣化的商品，我们掩饰了商品的短缺，表面上依然显得繁荣与富足。

我们也许拥有价格不菲的房屋，但我们却不得不精打细算，为的是可以按时缴纳分期付款；我们也许拥有不错的小轿车，但汽油的每一次涨价都会使我们心痛，而每一次快涨价前我们都要去排长队将油箱灌满；也许我们拥有不错的家庭，但每次生病我们都会担心家庭财产是不是会因此一分不剩；我们也许拥有大学文凭，对未来也充满憧憬，但我们毕业即失业，成为社会的“零余者”。

这是畸形的，因此我们越来越不快乐，而调查显示的幸福指数却在不断增长。

● 与泡沫共舞

对于什么是泡沫经济，一些教科书用什么虚拟资本过度增长与相关交

^① 周其仁。货币调控的中国特色。周其仁个人网站，2011年3月29日。



易持续膨胀等天书般的说法来解释，看着头都大，那是神仙们的对话，咱们凡人不懂。在咱们看来，泡沫经济就是对房地产、股票等狂热投机所引起的虚假经济繁荣，大致表现为：市场投机行为普遍，交易持续活跃，价格迅速上涨，最重要的是泡沫要归于破灭，并进而引发社会的动荡和经济的衰退。

如此看来，泡沫在未破灭之前似乎不称其为泡沫，当它成为真正的泡沫时，对我们多数人来说，黄花菜都凉了，已经失去了探讨的意义。如果一件事只有怀念和追思，不能指向未来，那就失去了绝大部分的价值。这也是在泡沫破灭之前很多人很长时间否认泡沫的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出现了几次泡沫事件。

先是 20 世纪 80 年代初出现在长春的君子兰泡沫。1981 年，长春市面上出现很多有关君子兰的传闻，致使原来几块钱一盆的花不断地涨价，涨到几百、几千甚至上万元。当时一般工人月工资才三四十块钱，如此快速的致富路径，使得长春人都为君子兰而疯狂，经过两年多的疯狂投机，一盆君子兰，售价可高达几十万元。1985 年，长春市市政府明文规定，不得用公款购买君子兰，在职职工和共产党员，不得从事君子兰的倒买倒卖活动，规定一出，君子兰泡沫戛然而止，花价一落千丈。

在此之后，海南岛建省的消息，爆炒了一顿房地产，同时也培养出了中国第一批房地产富人。1988 年，海南脱离广东独立建省，引得一大批人来淘金，但那时海南既没产业，也没资源，好在有土地，又是一个新的省份，想象的空间很大，大家于是开始炒地产。

从 1991 年开始，整个海南省基本上都被卷入疯狂的地产泡沫，1991 年海南省平均房地产价格为 1400 元/平方米，到 1992 年就猛增到 5000 元/平方米，一年上涨 257%，真是旷世奇迹！海口市地价 1991 年最高为 98 万元/亩，到 1993 年涨至 680 万元/亩。当时海南城市人口才 100 多万，但房地产公司就有 1.3 万家，平均每 80 人就拥有一家房地产公司。这个泡沫吹起来

经济如此 ，你要早作打算

快，破灭得也快，1993年下半年房价开始回落，到1994年就完全不行了。

进入21世纪，我们也进入全新的泡沫时代。首先令我们感受颇深的是新一轮的房地产泡沫。1998年开始进行“房改”，推行住房商品化，到2003年，由于持续的货币超发，不仅全国出现经济过热，房地产价格也开始脱离居民收入增长水平快速上涨，有些要成为泡沫的苗头，中央银行首先站出来准备轻轻敲打一下，不料房地产业摇身变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有了大的政策支持，于是房价开始三步并作两步往上蹿，一直到2007年年底因为美国金融危机才暂时停下来喘了口气。

而此时，房价已经高高在上了，炒房团也已经到处流动，很多买了房子的人心里虽有些满足，但依然恨自己当初胆子太小，为什么不借钱多买几套，没买房的人那就更是恨不能重生一回。

因为房价已高，交易也持续活跃，房地产的泡沫化似乎不可避免了，但很奇怪，一些经济学家的意见只是说“结构性泡沫”，也就是说确实有点泡沫了，但不关全局，没什么大不了的。

“金融危机对中国真是妙不可言”，有位经济学家这样说。是呀，确实是妙。因为2007年美国的金融危机，很多大城市的房价在2009年一年时间里就翻了一番。房屋销售价格与居民家庭年可支配收入比普遍达到15~20倍，也就是说一家人不吃不喝20年可以买一套房子。而次贷危机爆发前，美国房地产泡沫严重的几个城市房价收入比也就在5倍左右。

在房价高涨的同时，只要是大宗商品，只要有稀缺性，都被炒了一把，比如茶叶、邮票、钱币、钻石、翡翠、红木家具、进口洋酒，甚至是大蒜、生姜等小宗农产品的价格也一度上天。

有了泡沫怎么办？别国都是非疯即亡，“不在泡沫中疯狂，就在泡沫中死亡”；我们则是要“在泡沫中崛起，在泡沫中疯狂，与资产泡沫共成长”^①，

① 金岩石：在泡沫中崛起与疯狂 与资产泡沫共成长。和讯网，2009年11月18日。



伟哉斯人！可惜，斯人风采不再，被迫债人从美国追到中国，现在似乎追到南极去了。斯人已远，但音容宛然。炒房、炒地、炒矿、炒股、炒艺术品催生出了职业炒家群落，并将很多实业家转变为投机商，整个社会心态已经严重投机化。

资产泡沫使许多领先一步的人成功跻身富人行列，昔日邻家坐上宝马扬尘而去，激起了大众的紧迫感，再不投机炒炒资产，自己就很可能沦为中国最后一个穷人了。穷得只剩大把钞票，那样的滋味对富人来说是一种至高的境界。但如果一个人变成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真穷人，人们无论如何也是不愿意的。虽然明知道是投机，但总是盲目地相信自己不会是被魔鬼抓住的最后一个傻瓜。

在泡沫中与泡沫共舞，这其实是人类贪婪的天性使然。在一个泡沫成为常态的经济体里，我们都是主动或被动的参与者。在这个泡沫泛滥的时代，不与泡沫共舞似乎已经不可能，不管在泡沫中崛起也好，疯狂也好，只是不要与泡沫共舞久了，自身也变成泡沫的一部分就好。

中国经济不断在创造奇迹，中国的一些“主流经济学家”也在不断地“泡沫化”，不断地依靠非学术创造“神话”。比如什么“现在买房就是最大的爱国”，“大学学费上调可以使教育更加公平”，“房地产没有泡沫，因为离婚、包二奶都需要房，未婚同居刺激了购房需求”等。不知道的人以为某些“主流”浅薄，加以调戏，知道的人则“知主流心忧”，也就是心乱，所以才会说些愚弄大众智商的浑话。其实他们自己知道那正是他们“有所求”罢了，他们得自觉站到房地产开发商和权贵们的队伍里，不然就没人出钱请他们演讲了，你注意看他们的额头，就可以看出浅浅的极细小的两个字“要钱”。估计某些“主流”已经不满足于混经济圈了，准备去娱乐圈打酱油，因此以雷人的语言，不断冲击着媒体。

泡沫延续时间既长，烈度也高，其破裂后造成的损坏也就越大。我们已经失去将泡沫压制在萌芽和初期形成阶段的机会，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

经济如此 , 你要早作打算

机使我们的政策一误再误，导致了更大的泡沫。泡沫已经成熟并正四处泛滥着，中国的金融和经济已经很大程度上被泡沫绑架，这使得我们在抑制泡沫方面不得不更加投鼠忌器。而货币政策的博弈也已经将地方各级政府从后台推向了前台，这使我们的货币政策受到了更大的牵制。

我们不敢大规模加息，表面上说是怕国外的热钱进来，加大人民币升值预期，其实背后真实的原因是怕很快刺破泡沫，导致经济“硬着陆”。进入2011年以来，物价指数迭创新高，官方公布的7月份数据是6.50%，而民间感觉则至少在10%以上。我们的基准利率（以一年定存为例）仅为3.25%，负利率趋势越发明显，中央银行却只是可劲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加息却如天上的月亮，可望而不可即。

为此，一大帮经济学家不惜赌上名誉，一会儿说上半年物价肯定见顶，一会说都是翘尾因素影响，下个月应该见顶。可物价就是不听，总是屡创新高。如果说这就是“管理通胀预期”，那还不如干脆闭着眼睛说：“昨夜观天象，有紫气东来，明日定是良辰。”

什么是管理通胀预期，说白了就是控制想法，通过管理控制住如我们这等小民对通胀的判断，比如抢购东西、哄抬物价什么的。睁眼看看我们周边国家的CPI就会明白，越南、印度、俄罗斯，甚至遥远的巴西，物价都比我们高几个档次，只有我们中国的通胀依然可控。

我们的统计数字真是听话，我们收入“被增长”，房价“被下降”，物价“被压低”，目的无外乎一个，那就是“管理通胀预期”。早在2011年3月，发改委就发布公告称，因联合利华有关人员多次接受采访并发表日化产品涨价言论，增强了消费者的涨价预期，决定对其作出200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老外真是有些不懂事，贼还没来就开喊，成何体统，这不是让警察难堪吗？罚你的款，那是看得起你，谁让你可是知名企业，能“增强消费者涨价预期”呢！



只是，不论统计局、中央银行、发改委怎么努力，“预期”管理起来似乎还是有些不妙，毕竟年代不一样了，噪音多了起来，大家都得讨口饭吃，做事说话得靠点谱。2011 年年初，政府表示有决心将 CPI 控制在 3%，现在似乎不得不调高了，变成了 4%，今后还会不会调高呢？难说。但即使调高，那也没关系，吹鼓手们会跳出来说，“不用担心，那是结构性通胀，可控”。

预期管理下的小老百姓，好不容易挣点养家糊口的钱放到银行，虽眼看着一天天缩水，但补贴了那些有钱的贷款大户。这些大户可是很能干的，多数是炒家子，拿到钱后不干别的，买土地垒房子、做光彩工程、炒矿石倒煤炭，剩下的就放高利贷或到中国澳门或新加坡赌一把，将一切稍值点钱的都炒一遍，增加 GDP，为国家发展作贡献，力争在 2030 年之前超过美国，坐稳全球 GDP 第一的交椅，顺便也将我国的基尼系数再提高一些，让帝国主义者汗颜去。我们高兴！

中央银行不加息，那是心存慈善，务求高远，我们应该理解。你想想，真的加息了，热钱汹涌而至怎么办？那是外国的洪水猛兽，去时会将你席卷一空。还有，炒家子们贷款多了，银行坏账会增加，你住的房子价格会跌，你会损失多少财产啊，不得了的。再说，地方政府的债务也会增加，政府债务是谁的，还不是你的，你得去填亏空。你看看，你什么都不做，一旦加息，你会损失多少，你就是坐在家，债务也得从天上掉下来砸着你，可怕吧？还是不加息的好。

因为不敢加息，物价疯涨又控制不住，存款利率低得很厉害，理性的资金大约在银行里是待不住的，怎么办呢？可能还是只好往资产泡沫里钻，实在无地可钻的话，那就变成民间高利贷，而高利贷要么是“庞氏骗局”，要么就是真有大赚头。大的赚头何来？唯有投机一条道。如此看来，未来资产价格不会轻易就破，而通胀也将更加恶化。只是现在与资产泡沫的共舞更是刀尖上的舞蹈了。

经济如此 , 你要早作打算

国门之外，是一片此起彼伏的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和针对中国出口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国门之内是中小企业生存环境不断恶化，资产泡沫此起彼伏，物价指数屡创新高，地方政府债务逐渐暴露于风险之下，而我们的经济结构转型空喊了若干年却迟迟未能见到成效。

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好生为难，老路似已难以为继，后来者又当如何？汇率不敢动，怕影响出口增长，怕所谓的国外套利资金进来；利率不敢动，怕增加升值压力，更怕将地方政府无用、低效，甚至是价值毁灭的投资项目暴露于风险之下；超发货币的加快回收也已不现实，因为政府投资如猛虎，出笼了轻易就回不去，只好任由流动性泛滥。

● 隐蔽的滞胀

在一个泡沫持续泛滥的时代，很多资源不可避免地被用于制造更多更大的泡沫，从而形成经济的畸形繁荣，繁荣的背后其实是实体经济的停滞不前和超高的失业率。持续的资产泡沫，又将通过财富效应，推动生产成本上升，并导致 CPI 恶性上涨。

对于经济的滞胀，我们是畏之如虎的，甚至于提到“滞胀”两个字，一些人就难免脸上染色，做出不好看的样子。我国目前究竟有没有滞胀，大家看法完全不同，是可以理解的，但存不存在滞胀的风险呢？

有的说风险就在家门口了，稍不注意就可能要溜进门^①；有的说根本不存在这个风险，因为我们完全不具备“滞胀的条件”^②；有人因此站出来图文并茂地说，“中国经济已处于滞胀状态解读不符实际”^③。后面这句话真是点在了腰眼上，让你酥软得不服不行。之所以争论，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彼此对经济数据的解读不一样。

① 贺铿，当前我国经济出现应对“滞胀”风险，人民网，2011年1月15日。

② 李稻葵，“滞胀”不适用于中国经济 [N]，新京报，2011年7月8日。

③ “中国经济已处于滞胀状态”解读不符实际 [N]，人民日报，2011年8月9日。



滞胀，全名是停滞性通货膨胀，又称为膨胀衰退，指的是经济停滞与高通货膨胀、高失业同时存在的经济现象。这里麻烦的是，对于什么是经济停滞没有一个量化的指标，高通货膨胀倒是有个大致的标准，那就是年CPI增幅超过5%就算是恶性膨胀了。

为此，也有人尝试着给中国的滞胀予以量化，“当中国经济增长率下降到6%，通货膨胀率超过4%，就会出现滞胀”^①。但就是这个指标，似乎也没得到认同，因为有些人觉得宽松，如果按此标准，中国差不多已经一脚踏入了“滞胀的河流”。但我想，对于中国这个高速发展中的国家来说，当CPI增长速度超过5%，而GDP增速低于5%时，无论如何我们也该算是在过着“滞胀”的日子了。

西方发达国家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滞胀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政府希望借有形之手通过“反周期”的经济政策来平滑波动，减少经济萧条的痛苦。其中主要的政策就是扩大财政支出，加大货币投放，最终导致货币供应量过快增长，引起通货膨胀。与此同时，经济发展却没有出现重大的技术创新、缺乏经济内生增长机制，导致增长乏力。我国之所以出现滞胀，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根本原因是一致的。

对于目前出现的通胀，我们是不好否认的。从2009年年底开始，我国CPI开始出现快速攀升，进入2010年，CPI指数屡创新高，2011年先后突破5%、6%的关口，7月CPI同比上涨6.5%，创下近3年来的新高。

冰冷数字的背后，是大众真实的抓狂。在民众的感受中，这个数字远远代表不了通胀的严重性，这种差异可能是由于衡量通胀率的方法不同造成的，但也是我们管理通胀预期的结果。

“通胀无论何时何地皆为货币现象”，货币学派创始人弗里德曼如是说，后来很多人也跟着如是说，于是就成了经典名言。成为名言也就成为标靶，

① 厉以宁。警惕中国经济出现滞胀。搜狐财经，2010年1月19日。

经济如此  你要早作打算

变成了很多人要射击的目标。

因为名气太过强大，敢于正面直射的，那一般也就是像我们这样的无名小辈，好不容易发现别人的一点瑕疵，就按照自己的混乱逻辑推理开去，以此证明名人远不如自己。大凡名人都很有风度，看到这些乱箭也就只是笑笑。有点水平的“射击运动员”一般也就躲在暗处偶尔偷射一箭，不会明目张胆地出来单挑，因为他们也知道，货币超发肯定会引起物价上涨。

前一阵，谣传我国准备建立资金“蓄水池”，将多余的资金往“池子”里赶，别流出来祸害物价，这是高明的做法。很多人听到消息后都准备要往“池子”里跳。如果说“池子”建在股市里，好，那得多多炒股发财；如果说“池子”建在楼市里，那得借款去买房炒楼。但“池子”的事说过也就没有了下文，看来建“蓄水池”也不容易，建起来后要把资金往“池子”里赶而不流出来也不太现实。

资产的泡沫该泛起的地方也已经泛起，泡沫差不多也快到头了，剩下的大约也就只好追逐物价，物价的上涨似乎才刚开始。低廉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终结，“刘易斯”这个“拐点”^①也已经到来，用工成本不可避免地要大幅上升。全球性的粮食价格上扬，以原油、铁矿石和铜等为代表的原材料与大宗商品价格的持续攀升，节能减排压力的不断增大，必然在短期内带来企业运营成本的上升，并形成通胀的不断自我强化。

而现在，通胀传导的路径已经发生了改变，“从需求端开始的通胀已经很难发生，变而从资产和起源类商品价格开始，沿着产业链向下传导”^②。这就注定了，在全球流动性泛滥的时代里，中国已经不可能独善其身。中国的通胀已经不再是“猪周期”的问题，而是全球性的结构现象。

我们持续了几十年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走

① 刘易斯拐点：意指劳动力由过剩转为短缺的转折点。

② 吴庆，滞胀离我们越来越近，搜狐财经，2010年5月12日。



到尽头，长期积累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愈加突出，在一些经济领域，原先积极推进的市场化进程已被资源垄断和权力配置机制取代，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大量的“寻租”和资源的错配，国有企业、房地产占据了大量的稀缺资源，而效率较高的民营企业或者受到挤压和蚕食，或者干脆放弃实业转入投机领域，未来中国经济的活力正在失去。

“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在未来的几年间，将仅为2%。”^①因为外界的不景气持续时间可能大大超过我们的预料，出口增长也不太可能再现过去的辉煌。2003—2008年，出口增速平均在25%以上，未来几年，出口很可能下降到10%左右。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估计，中国2008年之前GDP增长率中有1/3要归功于出口贸易的拉动，如果将出口对国内消费的影响算进去，这个比例将达到40%。中国出口年增长率如果下降10%，将使GDP增幅降低2%~2.5%。^②

“高增长、低通胀”的时代或许已经过去，而“低增长、高通胀”则正在变为现实。

当年美国破解滞胀的难题，里根政府用的是“三板斧”：紧缩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及放松经济管制。“三板斧”让美国经济较快地走出了滞胀的困境。现在我们要像当年的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那样快速抽紧银根“打断通胀脊梁”是不可能的。

从1979年开始，短短两年时间里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从11.2%提升至20%，贷款利率提升至21.5%，为此《专业建筑商》杂志向沃尔克及他的美联储同事发出“通缉令”，控诉他们“预谋并冷血残杀数百万小企业”、“劫持房产主的美国梦”。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绝对的正确路径，美国的通胀率很快由1981年的13.5%下降到1983年的3.2%，沃尔克也成为美国的经济英雄，并被誉为“过去20年里美国经济活力之父”。

① 谢国忠。中国实行过剩货币政策 未来经济前景更加黯淡。凤凰网，2010年1月26日。

② 丁学良。辩论“中国模式”[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144—145。

经济如此 , 你要早作打算

现在中国的货币政策其实已经被资产泡沫、被我们的投资政策、被我们的地方政府债务、被所谓的人民币升值预期所“绑架”，快速大幅加息的后果是任何决策者都不敢想象的，而提高准备金率等数量型货币政策最先损害的无疑将是最具活力的中小企业。

企业近几年的实际税负还不断攀升，结构性减税变成了总量的不断加税。在失业问题上，官方公布的数字是2008年、2009年、2010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依次为4.2%、4.3%、4.1%，而实际的失业率则高得多，甚至官方也承认，我国的真实失业率已经超过9%^①，远远超过了7%的国际警戒线。

我们正在一步步滑向滞胀。

❶ 财富的“乾坤大挪移”

“从长期来看，货币数量的变化对实际国民收入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对于过去几十年中实际国民收入的变化来说，非货币因素的作用是唯一重要的，而货币却无关紧要。”^② 看来，超发的货币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什么真实的财富，那为什么要超发货币呢？多发点货币润滑经济是可以的，但在一个充盈机会主义的扭曲世界里，货币的超发也许并不都是这么冠冕堂皇，其背后其实还有一条隐秘的通道可以通向我们大部分人不知道的远方。

政府因财政压力而主动超发货币被看做政府在抽取隐蔽的“通货膨胀税”，我国在1995年以后已经不允许这样做了，因为这样做很不符合一个现代政府的素质，并且太过直接，不可取。

被动超发货币，其实也存在受益的冷热不均和变相的财富转移。由于

① 2010年3月22日，温家宝总理在会见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外方主要代表时的讲话。

② [美] 弗里德曼、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结构——与批评者商榷 [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13.



货币的超发与物价上涨之间通常存在较长的时滞，最先得到超发货币的自然最先受益，等到大众已经感受到货币增多时，物价其实已经悄然上涨了，等到工薪阶层因为物价上涨要求上调工资时，已经赶不上趟了。

当你发现自己的存款已是负利率，不得不把存款从银行里提出来转战股市、房市，甚至是去“赌石”时，你发现那里的泡沫已经不小，价格已经使你心惊胆战了，如果你还敢斗胆进入，那就得做好兜底的准备，一旦泡沫破裂，你将不得不面临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破裂的双重打击。在中国，这个收益的顺序大致如下：国有企业、与国企紧密联系的权贵型企业、民营企业，最后才是普通老百姓。

经过三十多年急速的货币化过程，我们的财富分布不知不觉间发生了巨大变化。改革开放的很长时间里，银行都是改革成本的最后买单者，往往会积累大量的坏账，21 世纪初期，很多西方观察者估计中国银行业的坏账率已经达到 40% 以上。通过货币的不断超发和储蓄的负利率，银行体系的总资产不断膨胀，稀释甚至掩盖了银行体系的不良资产。短短几年，中国金融业变戏法般地从技术性破产变成了全球资本追捧的对象，秘诀就是将坏账的损失通过隐秘途径转移给了社会大众。

转移的途径大致有两条：超发货币稀释存量财富，低利率或负利率转移财富。假定你现在有 100 元，且全部是存款，货币超发了 10%，那很不幸，你的财富被稀释掉了接近 10%。同样的，银行坏账事实上也少了近 10%。但其实你比坏账会好些，因为你还有存款利息可以弥补。

严格地说，货币超发不是形成物价上涨就是形成资产泡沫，但这两样并不一定会同时出现。好，假定全部形成物价上涨，也就是说在你看来物价上涨了大概 10%，但农贸市场公告牌却说白菜价格综合指数上涨不到 5%，而钱庄老板给的存款利息只有 3%，事实上你已经有 -2 个利率了，按说你该有至少 1 的利率，这样一来，你虽然有了 3% 的利息收入，但事实上却有 8% 的财富通过稀释和压低的利率被转移走了。也不多，一年也就只

经济如此 ，你要早作打算

损失 8 元钱。

当你要求老板涨点工资时，老板正好从银行低息弄到一笔款子，为人又心善，还真的给你涨了，那你也别高兴，你以前的损失其实已经形成了。

当然，现实的情况会复杂得多，弄得你我都搞不清楚我们的财富究竟跑到哪里去了，但不管怎么弄，其实我们都知道，自己的真实财富少了。

总体来看，我们从 2004 年就基本进入负利率时代了，一直未得到扭转，2010 年后负利率的程度更深了。

20 世纪 80 年代初真正的富人是“万元户”，但如果“万元户”就此满足，当寓公，提鸟笼吃利息，那到现在肯定是一文不值。按照北京师范大学钟伟教授的估计，80 年代的“万元户”就算是不吃不喝，全部存银行利滚利，到今天大约也就只有 10 万元；如果按照居民家庭收入增长幅度计算，“万元户”到今天也就只有不到 30 万元；但如果按照居民储蓄增长情况，到今天应该是 255 万元。^①

在快速货币化的进程中，持有现金或者低风险低收益的储蓄、国债等金融资产，差不多等同于将大半财富拱手让人。而我们引以为傲的恰恰是我国是一个有高储蓄倾向的国家。我们民间的高储蓄不仅支撑了大规模的投资，也在储蓄过程中被无形地转移走了。

因为这种“乾坤大挪移”，财富也就自然而然地集中于少数人手里，我国的贫富悬殊也才会超过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

美国的亚瑟·马文·奥肯于 1970 年创造了“痛苦指数”，以此衡量令人不快的经济状况，痛苦指数等于通货膨胀与失业率之和。现在，我们已经步入事实上的高通胀、高失业时代，但为避免我们过于痛苦，有关部门需要通过压低 CPI 指数和失业率来减轻我们的苦痛。真是感谢那些压低的数据，他们想得真“周到”。

^① 钟伟，极速货币化：中国金融的幸运和不幸，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网站。



国家统计局数字显示 1978—2009 年，我国物价累计仅上涨了 4.19 倍，事实上，我们一般人的感受是 30 年来，物价整体涨幅至少在 30 倍左右。^①真是感谢了，仅仅是统计数字就为我们减轻了几十倍的痛苦。

第二节 隐蔽的吸金黑洞

自从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以来，每逢金融市场出现动荡，他必出手干预。从 1987 年的“黑色星期一”，到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乃至 1998 年大型对冲基金长期资本公司破产，以及 2001 年“9·11”事件导致的金融系统混乱，美联储均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贴现率的调整或者减息，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市场因此形成“格林斯潘卖出期权”，意思是碰上价格下跌不必惊慌，等格林斯潘放水，市场反弹后再卖不迟。2007 年美国次贷危机之前，格氏期权一直看涨。

因为次贷危机，格氏饱受非议，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面对永远正确的议员们，格氏不得不承认自己部分错了，一些人因此嚷嚷要“清算格林斯潘”。清算什么？清算他造成的流动性过剩。但老爷子却认为，向市场注入流动性是正确的，之所以网络股泡沫破灭后美联储长期维持低利率，根本原因是全球储蓄资金太充裕且都很留恋美国。

将流动性过剩的责任推到老爷子头上的企图遇到了顽强抵抗，以致老爷子在听证会上都改变了一贯说话模棱两可的风格。但不管格氏怎么否认，近十几年来全世界依然充满了泛滥的流动性，导致全球性的房地产、股票、有色金属、石油等资产价格的节节攀升。

事实上，要清算格林斯潘，目前看起来不现实，因为继任者是宣称为了挽救经济可以直接从直升机上撒钱的“直升机”本·伯南克。从 2009 年

^① 文晔，为什么我们越来越“穷”[M]. 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1：171.

经济如此 , 你要早作打算

开始，美联储先后实施了两轮总规模超过2万亿美元的量化宽松政策。

在伯南克看来，中国得为全世界流动性过剩负责，他认为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通过人为压低本币汇率，使世界性贸易失衡得不到调整，这对自身和整个世界经济来说都构成了“重大不利”，因此美国需要推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伯氏的话被我们解读为“印钞不是我的错，都是中国惹的祸”^①。之所以会如此解读，不是我们敏感，而是伯南克意在所指。

大经济体的货币一般实行的都是浮动汇率，汇率高低由市场决定，很少有紧盯住美元不放的，实行盯住汇率的一般也就是中国香港地区这样的小经济体，或者是欠发达国家。2005年7月之前，人民币实行的是单一盯住美元汇率制度，之后参考了“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但美元在我们的“菜篮子”里就是猪肉，占据主导地位，也就是说人民币汇率很大程度上依然盯住的是美元。

这就弄得美元有些不舒服，中国已经是全球排名前三的经济体了，人民币还不自由浮动，成天抓贼似的盯住美国，而美国在次贷危机中，迫切需要通过美元贬值来提高出口降低进口，尽快走出经济衰退的困境。此时，在我们看来，如果像中国这样严重依赖国际进出口的国家主动提高汇率，无异于主动承担经济衰退的后果，如果盯住美元，那就可能搭上美国货币贬值的“便车”。

美国不断敦促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言下之意就是要中国尽快上调人民币汇率，分担点美国金融危机的损失，这样的“好事”，中国自然是不好满口答应的，但中美之间又不能翻脸，不然“恐怖的平衡”失衡后就真恐怖了。中国被逼急了，只好对美国说，先别嚷嚷，也别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家”，人民币升值得讲究技巧，中国名义上对美元依然保持缓慢升值，但暗地里在国内多弄点通胀出来隐蔽性地搞搞，双管齐下加快人

① 伯南克：印钞不是我的错 都是中国惹的祸，凤凰财经，2010年11月19日。



民币升值步伐。东方的智慧，西方自然是信服的。只是如此一来，中国国内流动性更是泛滥成灾。

中国有理由觉得冤枉，美元又不是中国发行的，人民币还不是国际流通货币，世界性流动泛滥当然不应该是中国的责任。美国人强词夺理了。美国人曾对亚洲说“美元是我们的，但问题是你们的”，现在搞得连责任也是我们的了。

中国作为全球近几十年来最成功的转型经济体，在世界泡沫潮流中虽“起了个大晚，却赶了个早集”，在别国去泡沫化的过程中，依然不断地吹大着泡沫。在这场因为理性而合成为“非理性繁荣”谬误的泡沫盛宴中，我们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或正在享受饕餮大餐了，还有少部分正在星夜赶往盛宴途中，而肥胖溜圆的大厨们则系着围裙忙不迭地在门口拱手招呼。

❁ “看空”中雄起

由于意识形态、经济体制、文化上的差异，中国经济几乎是在外界的质疑声中雄起的。在我们看来，老外的心中有“无形的辫子”，他们总以为自己掌握了人类经济发展的唯一正确途径，中国 GDP 的持续快速增长充满了悖论。

早在“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就有很多善良的西方学者以为中国经济行将崩溃。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走上了高速发展的道路，但政治体制却没有什麼大的变化，经济发展与政治体制出现了脱节，西方人开始看不懂了，不断发出鼓噪。

亚洲金融危机前后，西方一些主流媒体和学者对中国 GDP 数字不断提出质疑，认为中国高投入、低产出为特征的经济增长模式和建立在廉价劳动力及巨大的能源消耗基础上的发展模式正在逐渐步入死胡同，中国终将成为亚洲金融危机中的“最后一张多米诺骨牌”。

曾经大胆预言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克鲁格曼公开宣称，看中国的经济增

经济如此 , 你要早作打算

长数据就像看一部科幻小说,中国经济数据是一堆不可置信的符号体系。

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罗斯基(Thomas G. Rawski)先后发表了两篇文章——《中国的GDP统计出了什么问题?》以及《中国的GDP统计:该被警告?》——对中国经济增长表示高度质疑。在他看来,中国1997—1998年GDP增长2.2%是一个远比7.8%的官方数字更为合理的推算。而且,2.2%是一个上限。实际的数字可能更低,甚至有可能为负数。

2002年3月,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中国问题专家瑟罗(Lester Thurow)通过统计数据的比较分析,认为中国官方的增长数据与事实明显不符,中国GDP数字出现了严重误差,过去5年中国经济实际上陷于呆滞状态。美国《时代周刊》因此刊登了《中国为什么造假账?》的文章,称中国“已被虚浮的数字淹没”,“中国作为经济大国的名声是建立在纯属虚假的基础上的”。

西方一些主流媒体,如美国《新闻周刊》《商业周刊》,英国《金融时报》《经济学家》,法国《费加罗报》,新加坡《海峡时报》等也不断刊载关于中国经济的负面报道,有的甚至将中国经济比作“一座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一些政治人物也伺机加入了这个合唱,2002年1月,印度外交部长辛格对《今日印度》杂志说,中国“捏造”经济增长数字,并一丝不苟地指出,中国2001年的国民经济增长率“多捏造了两个百分点”。

然而,质疑的结果却是中国经济总量从2001年开始进入了高增长、低通胀的黄金时代。2002—2008年,我国年均GDP增长幅度达到10.44%^①,而同期CPI基本都保持在4%以下,有的年份甚至还是负数。

2002—2008年我国GDP与CPI走势,如图2-4所示。

从2001年开始,中国经济先后超越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和日本,成为全球老二。我国的严肃研究者一般以为,加入WTO是中国改革的

^① 邹东涛主编. 新中国经济发展60年[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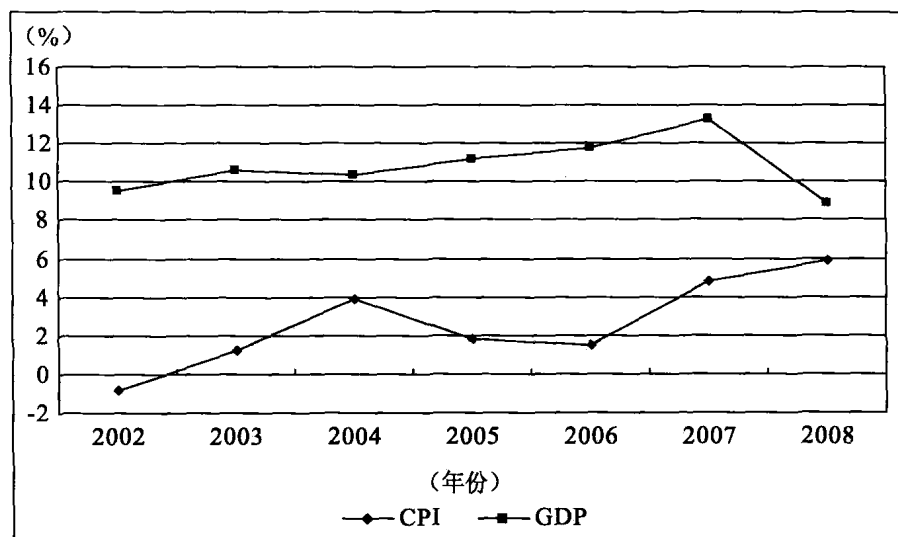


图 2-4 2002—2008 年我国 GDP 与 CPI 走势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统计局网站上的相关资料整理而得。

转折点，激发了中国不断的制度改进和创新，好的制度推动了中国经济持续的发展。但中国加入 WTO 在西方也曾被当做崩溃的开始，2001 年 7 月，美国华裔律师章家敦在美国出版《中国即将崩溃》一书，章律师预言，中国加入 WTO 后不出 5 年，强制性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改变将使中国在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前后雪崩。看来，章律师失算了。

美国次贷危机之后，老外们又开始了新一轮对中国经济的质疑。只是这次中国因为金融危机爆发后快速推出了庞大的救市计划，4 万亿元投资、10 万亿元新增信贷，成为全球经济为数不多的亮点，2009 年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超过 50%。老外们在苦海中尝到不少甜头，因此更盼望中国这次可以挽救资本主义，说话自然也就客气了一些，至少在表面上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奇迹的信仰者。

而中国自认为已不再是吴下阿蒙，对于外界的质疑“打法硬朗起来”，也打消了很多潜在的哗众取宠的想法。2009 年 5 月，国际能源署（IEA）认为中国官方公布的一季度 GDP 增长数据过于乐观，对中国经济数据的可

经济如此动荡，你要早作打算

信度提出了质疑，这下，国家统计局说“不”了，认为国际能源署“原文观点缺乏论据”，并客气地指出这样的做法不合乎一个国际组织的身份，“是缺乏严肃性的”。^①

官方的顽强回应，其实并未打消一些人的质疑，只是大家变得谨慎而虚伪起来，对于不同意的事情，开始“打哈哈”了。

但很遗憾，中国的一些统计数据似乎从来都没得到真正的信任。老外怀疑，国人怀疑。而在统计局看来，老外和国人都懂统计局的专门科学。与质疑中国同时存在的是“中国威胁论”，自1992年起，关于成长中的中国有可能对亚洲乃至整个世界构成威胁的“中国威胁论”，在国际上迅速蔓延开来，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西方国家以及部分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态度。

其实，我们不应该在乎别人怎样说，而应该观察别人怎么做。有的人当着你的面毫不留情地指出你的缺点，其实是希望你好起来；有的人在你面前好话说尽，而眼睛却瞄着你的口袋，无外乎哄你高兴时可以顺点东西走，或者搂一下你的小蛮腰，揩点油。

看空中国并不可怕。“主流”经济学家有时也很不靠谱，经常是“三个人有四种不同意见”；两次经济衰退预测出了八次，其中一次还变成了繁荣。美国前总统里根就曾公开说他的经济顾问是“专门讲反面话的人”。看来，我们也得习惯听反话。

在我们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看来，中国不仅顺利摆脱了金融危机，也在这次危机中充分展示了“中国模式”的优势，中国很快将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中国社科院预计的准确时间是2020年。这就对了，因为很多外国权威组织也是这么看的，并且将时间都可以精确到年，真不简单！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中国将在2016年超越美国；普华永道说中国将在2018年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认为2030

① 姚伟．国家统计局与国际质疑再过招 [N]．东方早报，2009年5月26日．



年中国经济规模可能是美国的两倍；摩根大通、高盛等也相继确认中国将很快超越美国。

一些学者唯恐预测落后会被中国冷遇，只得将时间提前，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学家罗伯特·C. 芬斯特拉（Robert C. Feenstra）预计中国将在 2014 年就接过全球经济领导者的大旗；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萨布拉曼尼安（Arvind Subramanian）认为中国在 2010 年实际上已经超过了美国。^①

快哉！不亦快哉！

这种预测活动热门到博彩公司也加入了。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英国博弈公司立博（Ladbrokes）2011 年 2 月已经推出中国坐上全球经济一哥宝座的赌盘，立博以 6:4 赔率，押注中国将于 2020 年后取代美国。在该公司看来，中国胜面似乎稍小。也不知看好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去下注没有，但我想，如果理性的话，他们是会去的。

西方学者和主流媒体开始盛赞中国了，但投机商却开始做空中国。

● 泡沫黑洞

黑洞是一种引力极强的天体，任何物质和辐射一旦掉进去，就再不能逃出，甚至连光也一样。因为光也被吸走，无法逃逸，所以我们无法直接观测到黑洞，只能推测其存在。这可真是够“黑”了，因此黑洞也被引申为无法摆脱的境遇。

我国三十多年经济的高速发展，成绩是巨大的，但在这个过程中，也生成了两个黑洞：泡沫黑洞和国企黑洞。

在全球流动性过剩的背景下，2003 年，中国经济其实已经明显过热，房价的泡沫正在生成，一些部门开始有意地压制。而股市几乎从诞生开始

① 姚洋．中国经济何时超越美国？．财经网，2011 年 6 月 3 日．

经济如此 , 你要早作打算

就是泡沫，市盈率、市净率明显超高，投资者进入市场的根本目的也不是为了那点微薄的红利，而是寻求下一位高位的接手者，这个市场一度被认为“连赌场都不如”。

很可惜，我们的政策不统一、不连贯，没有形成合力，资产泡沫在我国顽强地生成了。全民也开始了对楼市、房市的炒作。因为是炒作，欺骗自然是少不了的，鼓动与宣传更是得跟上，于是中国遍地流动的不仅有江浙游资，也有山西“黑”金，还有东北的“银”子，港台地区也来凑热闹，韩国也携巨资杀过来了，西方的资金都堆在香港正准备潜渡。

一时间，中国炒风炽热，老百姓开始通宵排队买房，房产商开始三天两头涨价，地方政府开始不断推出“地王”。不过，“炒股炒成股东，炒房炒成房东”，那样的人生是失败的。

自2004年开始，中国各大城市的房价开始不断上扬，到2007年，基本上都完成了翻一番的目标。股市在2006年年初从1200点起步，到2007年10月达到创纪录的6100点之上，不到两年时间上涨了5倍多。

在泡沫中，我们崛起了，2007年，我国GDP总量以微弱优势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

美国的金融危机使西方不断沦陷，与此同时，中国则依靠2009年的天量信贷开始了逆风飞扬，当年GDP增长达到9%。2010年更是达到10.3%，顺利超越日本成为全球老二。

流动性的快速释放，不仅支撑了GDP的增长，也吹大了本已不小的资产泡沫。很多城市的房价在2009年一年时间里又翻了一番，这个速度比我们GDP翻番速度可是快多了。2009年10月，深圳创业板开市首日，28家上市公司市盈率平均达150倍，真是旷世奇迹！

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也搬进了炒家的厨房，轮番炒了一遍，呈献在大众面前，大蒜、生姜、进口红酒、中国白酒、石头、纸币、家具、墓地等。当然，还有很多瓷器、字画、玉石什么的，那都是无价之宝，上面有深刻



的文化印记，沉淀了文明，几年涨个几十倍上百倍，似乎很是正常。

泡沫不断吸纳着社会资源的投入，更多资源的进入形成了更大的泡沫。泡沫黑洞正在吞噬我们有限的资源和财富。

自 2004 年开始，房地产企业投资完成额年增长幅度都在 20% 以上，有的年份甚至高达 30%，占全社会完成投资的比例也都在 20% 左右，占全国 GDP 的比例也在稳步提高。

2007 年年底，全国金融机构商业性房地产贷款余额为 5 万亿元左右，其中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余额不到 3 万亿元。到了 2011 年 6 月，房地产贷款余额就变为 10.26 万亿元，其中个人住房贷款余额达到 6.26 万亿元。据估算，现在的 55 万亿元左右的银行信贷中，有 60% 的贷款都与房地产有关。^①

2009 年，国内证券市场筹资达到 5711 亿元，2010 年达到 10275 亿元^②。我们不可否认有些优质上市公司确实需要资金，但事实却是很多不需要资金的企业完成了集资，甚至是欺诈上市，上市以后即变脸。

泡沫黑洞也将人类的理智变成了疯狂。企业家开始放下实业转而从事投机，并发现其中趣味无穷，不仅利大，来得也快，还很刺激。低级点的开始借高利贷，图的就是痛快；高级点的直接玩资本市场，今天重组这个 ST 公司，明天用资产置换另一家亏损企业，后天说不定就炒到美国的股票市场上去了。

只是美国市场似乎不及中国好玩，专有一些“猎狗”等着中国上市公司露出破绽，逼迫中国的一些企业家不断变着花样造假，很是伤脑筋，不然就只好退市。2011 年上半年，中国在美上市公司就有 19 家成为猎物遭遇停牌，5 家企业退市。还是中国本土市场好，一招鲜，吃遍天，做点假不过就是被谴责，外加罚点款，都是毛毛雨。

① 易宪容：国内房地产信贷风险不可低估 [N]. 中国经济时报，2011 年 10 月 14 日。

②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统计数据。

经济如此 , 你要早作打算

● 国企黑洞

国有企业是“共和国的长子”，为这个家族的繁荣做了不少事，吃了不少苦。在我国重要的行业里，国有企业均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有的甚至是寡头垄断。

表面上看，我们的国企风光无限，2011年，美国《财富》杂志排出的世界500强中，中国企业有61家，民营企业只有深圳华为和江苏沙钢两家，其余均是国企，中石化、中石油和国家电网甚至已进入世界前10强。托美国金融危机的福，我们的银行早几年就已经是全球市值第一、赢利能力第一了。2010年英国《银行家》杂志排出了世界1000强银行，中国有84家银行入选，这84家银行总资本虽然只占到全球千家银行的9%，但赢利却高达25%。

这是奇迹，更是异数。要知道，我们的这些企业绝大多数都还没有真正地国际化，国内业务一般都在90%以上，有的甚至是100%，有朝一日，一旦它们像华为一样真正完成国际化，那世界上其他企业还会有汤喝吗？我想，美国人是有些怕了，不然怎么会三番五次阻止我们的国企收购美国企业呢；日本人嘴上说不怕，但心里也是害怕的。

作为“共和国的长子”，国家为扶持国企真是不惜血本。钱不够，银行凑；亏损了，就补贴；补贴不够，就涨价；坏账实在多得不行了，就剥离；剥离后也无法生存，那就给个稀缺指标，或者再重组一把，到资本市场上弄弄钱。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的专题研究表明，国有企业在规模发展壮大的同时，隐蔽地吸走了无数社会财富，它们都有着超强的资源吸收能力，但价值创造却不敢恭维。

2001—2009年，国家变相补贴给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地租25787亿元，如果考虑商业服务用地，仅2008年一年，就有12065亿元；全民在超低的利率环境下补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利息约27539亿元；通过



石油、煤炭、天然气资源税金变相补贴约 4977 亿元。至于财政列支的亏损补贴不多，1994—2006 年，只有 3653 亿元；2007—2009 年，据不完全统计，也只有 1943 亿元。

当然，财政名义的补贴多了，很不好，长子们都大了，还一天到晚嗷嗷待哺，说出去让人笑话。家里的其他孩子，婚生的也好，非婚生的也好，都会有意见，不好平衡，还是巧妙一点的好。如果扣除这些补贴和变相的补贴，2001—2009 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平均真实净资产收益率仅为 -1.47%，而同期非国有工业企业平均的净资产收益率为 12.9%。^①

国有金融机构的发展与壮大，这些年好似一个戏法。21 世纪初，西方观察者均认为中国国有银行坏账率超过 40%，有的甚至估计超过 50%，技术上已经破产，短短几年时间，这些银行就变成全球最赢利的银行。

2009 年，央企实现的名义利润中，金融、石油、电信等垄断行业占据了绝大多数，单是中石油和中移动两家就分别实现 1285.6 亿元和 1484.7 亿元，超过全部央企（工业）利润的 1/3^②；同年中国工商银行赢利 1294 亿元，中国建设银行赢利 1068 亿元，都创纪录了。

2010 年，中国利润最高的企业也全部来自金融、石油、电信这三个垄断行业，合计达到了 8668 亿元人民币，占中国企业 500 强总利润的 40%^③。利润来源于垄断的背后是国有企业平均资产收益率的低下和公众为此支付的高昂成本，我们的通讯费和上网费是别国的几倍、几十倍，我们的油价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我们的高速公路收费里程占全世界的 70%，我们的汽车比国外的贵至少 50%，我们的存贷差全世界最高。

社会财富是有限的，稀缺资源的分配常常决定一个经济体发展的好坏。

① 以上数据均摘编自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与改革》的报告。

② 数据摘自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与改革》的报告。

③ 国企 10 巨头占 500 强利润 4 成 制造业现空心化隐忧 [N]．第一财经日报，2011 年 9 月 5 日．

经济如此 , 你要早作打算

在利率管制严格、信贷配给严格、持续负利率的大背景下,资源占有多、游说能力强的国有经济自然能够抢占过多的金融资源,利益也通过正规金融系统输送给国有企业。

在美国,最优惠利率平均比过去 40 年的名义 GDP 增长高出 1 个百分点,而中国自 1990 年以来,最优惠利率平均比 GDP 增速低约 9 个百分点。^① 这种补贴是巨大的,地方政府的平台公司自然也是廉价资金的最大获益者之一。国家审计署资料显示,截至 2010 年年底,全国省、市、县三级政府共设立融资平台公司 6576 家,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为 10.7 万亿元,其中银行贷款为 8.47 万亿元。

但这些低成本资金却并未进入实体经济,绝大多数进入了泡沫资产领域,2009 年央企就不断成为新的“地王”拥有者,而平台公司的根本目的就是“投资投资再投资”,通过不断的投资确保地方 GDP 的增长。而效率较高的中小企业则存在严重的资金短缺。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指出:“目前小企业从银行能够贷到的款不足其需求量的 10%,而大银行给小微企业贷款,在我国经济体制下,很长一段时间来看都是一种幻想。”^②

泡沫使中国经济越来越具有了投机狂潮和金融脆弱的典型症状。有人说,世界上既然有“黑洞”,那也就应该存在“白洞”,“黑洞”将所有物质都吸进去,而“白洞”则将所有物质都吐出来,只是这个“白洞”到目前为止,尚没有被发现。但我们想,“白洞”在经济学上至少应该存在。

不管泡沫也好,国企也好,吞进去那么多东西,总得要吐些出来。天文学家将连接“黑洞”和“白洞”之间的通道称为“虫洞”,看来,自从牛顿跨入经济界后,天文学家们很多也都已完成跨界了。

事实上,我们的黑洞也一直是在边吞边吐:翻几番的房价;因持续繁

① 中国的红色警报. 财新网, 2010 年 3 月 31 日.

② 大企业成吸金黑洞 [N]. 经济参考报, 2011 年 7 月 26 日.



荣而不断下滑的国际清廉指数，中国在 2009 年的排名已下滑至第 79 名，略低于布基纳法索；增长速度最快的奢侈品市场，据《纽约时报》估计，多达一半的销售与贿赂有关，上千万元的一个吊灯，天价茅台、五粮液，一口酒几头牛，一顿饭一座楼；当然，我们还有使用率不到亚太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 20% 的高速公路网，以及越来越豪华、越来越多的城市公共建筑。

很多时候，我都流连于我们城市里宏伟、富丽堂皇的公共建筑。它们都太豪华了，清一色的大理石地面，充满艺术气息的墙壁，炫人眼目的灯光，超高的空间里可以看见地球在转动，充分向世界展示出穷人乍富挺胸凸肚的模样，真是令人感动，以致自己有时不禁茫然，深恨自己工作不努力没赶上国家经济的平均发展水平。

● 炫富的时代

一个繁荣的时代，常常也是充满炫耀和好大喜功的时代，17 世纪末 18 世纪初的法国路易十四时代如此，20 世纪 20 年代的美国如此，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日本如此，21 世纪初的中国也是如此。

美国历史学家斯蒂夫·弗瑞瑟面对次贷引起的经济衰退不禁感叹道：“一个炫耀财富的时代已经结束。”看来，历史学家的眼光还是不够长远，未能延伸到太平洋彼岸的中国。其实，在中国，财富的炫耀才刚开始。美国人消费着几乎所有的奢侈品，却从不储蓄；中国人则是被储蓄和几乎所有的奢侈品消费着，为的就是那点炫耀。

炫富，已经成为中国的新时尚。网络上不断出现 ×× 少爷、×× 女、×× 公子展示自己奢侈的私生活，名牌、豪车、大把钞票点烟、一天花掉几十万元等。炫耀，在生物学者看来，是动物本能的展示，其核心是性吸引，正如孔雀开屏，雄孔雀要展示的只是自己长期进化的雄性特征，目的无外乎求偶。

经济如此 , 你要早作打算

人类因为进化，除有暴露癖的之外，当不会学雄孔雀一般炫耀，他们要展示的是自己的富有与别出心裁，目的除性之外，应还有马斯洛所谓的满足和尊重的需要。但如此炫富，在真正的富人眼里，根本就不是主流，最多算是对财富主流的一个挑战，或者是别有用心，因为他们煽动的是对富人的仇视。真正的富有是低调的。

中国富人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完成了从自行车到宾利车的跨越。近年来，中国富人不仅变得更富，而且是以更快的速度变得更富，这点从福布斯富豪排名就可以看出来。据说，中国已经有 96 万个千万富翁，他们每人平均拥有三辆汽车^①。很多人都在发愁，今天买了宾利，明天不知道是买宝马还是法拉利，抑或是买一部游艇玩玩。

2010 年兰博基尼在中国的销量增长了两倍，劳斯莱斯增长了 146%，宾利增长近一倍。尽管中国城市交通堵塞严重，但中国的新贵们越来越喜欢在道路上炫耀他们的财富。一位山西煤老板嫁女，4 辆劳斯莱斯、6 辆奔驰、6 辆宾利、20 辆奥迪、6 辆吉普、1 辆悍马以及若干辆宝马、保时捷、路虎等组成了炫耀性的豪华婚车大巡游。同样是山西的煤老板，可以一下子买上几十辆彪悍的悍马。

在城市里，各种豪宅、美酒、高尔夫俱乐部的精美广告已经占领街头。房子都是国外顶尖设计大师倾力打造的，名字也是全世界征集而来，不是“维也纳的公馆”，就是什么欧洲著名的小镇，要么就干脆叫“凡尔赛世家”，至于“白宫”，因为文化品位不够，已经沦为中国若干乡政府的办公室了。

好的住宅，不是别墅，也是叠拼，花园洋房都不好意思让你住，而高层公寓都是墅景，和别墅也差不多。至于精装修房，那自然是万国建材博览会：窗户玻璃来自德国，灯具来自浪漫的法兰西，家具是自意大利漂洋

^① 中国千万富翁数量达 96 万。财新网，2011 年 8 月 25 日。



而来，而英国人大约只配给你做管家。

对世界顶级洋酒的追逐，我们已经超越美国了。2010 年中国一跃成为法国葡萄酒出口额最高的市场，价格越贵似乎销路也就越好。老外都知道中国新富阶层的潮流，送礼只选拉菲，否则就不够气派，没有面子，因为中国人都知道拉菲昂贵。一些买家已经不满足于一瓶一瓶地购买昂贵的波尔多葡萄酒，开始到法国各个葡萄酒产区去收购酒庄了。

中国香港、巴黎、伦敦等地已经为中国富人开辟了奢侈品专场，中国本土也在不断上演什么“世界奢侈品嘉年华”巡回展，据说展示的销售效果很不错，大大超过组织方的预期。

难能可贵的是，高校也开始了对财富的崇拜和炫耀。2011 年，以“五四精神”自居的某大学校长高调宣布校友中诞生了 79 位亿万富豪，连续三年居内地高校第一。某大学教授甚至公然对学生“励志”：“当你 40 岁时，没有 4000 万身价不要来见我，也别说是我学生。”这是精神的堕落吗？不是，这是对财富的激励和炫示。呜呼，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

很多东西，我们已经买了，还有的正在买，几亿元人民币的青花瓷，几千万元的青铜兽头，我们都自豪地拍了回来，为的是让世界见证中国的富裕。只是有些国家有些东西不让我们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小小的遗憾。

我们已经有人去国外买机场了，据说花了 10 亿元，击败了十多家全球参与竞标公司；我们已经一下子买了冰岛 300 平方公里的土地，准备建成度假酒店和高尔夫球场；我们有人花 4.8 亿美元在美国“如狼似虎”地买了约 8000 套公寓，成为美国租住公寓楼的最大买家之一^①；我们还在成群结队地要去买巴西的农场、非洲的矿山、伦敦的豪宅，凡是可以花钱的我们可能都要买。

“中国正在购买全世界”，国外有人惊呼。

^① 根据《东方早报》2010 年 10 月 14 日的报道。

经济如此 ，你要早作打算

对于这样的大惊小怪，我们其实不必太在意。日本当年挥舞着支票，以 2200 亿日元的天价买下了作为“美利坚标志”的洛克菲勒中心，34 亿美元购买了“美国灵魂”的哥伦比亚影片公司，这些标志性的东西落入日本人的手中，弄得美国人惊呼“这是新的珍珠港战争”，“美国正在变成日本的第 41 个县”，甚至有人怀疑日本人要购买“自由女神像”搬回日本。

我们到目前尚未购买到什么标志性的建筑或者是别人的灵魂，美国也不用担心成为中国的一个省份。我们似乎还缺些日本当年的气概。据说当年美国人打算将一栋大楼卖给日本人，双方谈妥成交价格是 4 亿美元，但日本人付钱时却反悔了，拿来了新的合同书，上面写的价格是 6.1 亿美元。日方解释说，他们的老板头一天在吉尼斯世界纪录里看到历史上单个大楼出售的最高价是 6 亿美元，他们想要打破这个纪录。这是何等的气魄！呜呼，中国顶级富人能不汗颜乎？也许，纪录正等待我们的富人去打破，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而是超越与自尊的问题。

第三节 泡沫的制度基础

现代金融制度下，泡沫的出现与破灭虽然本质上都是流动性现象，但事实上泡沫也存在国别差异。在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发展阶段下，泡沫的路径、表现形式会有很大的区别。

日本泡沫的制度基础

日本模式曾经被认为是日本经济成功的秘密，但后来也被认为是造成“失去的十年”的根本原因。作为我们的近邻之一，日本的泡沫常常成为我们的镜鉴。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日本，其实出现了两次泡沫，只是第一次泡沫较小且很快破灭，因此没有受到重视。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由于布雷顿森



林体系的瓦解，“尼克松冲击”^①到了日本，维持多年的日元与美元 360:1 的外汇兑换率出现浮动，为避免日元升值，大藏省和日本中央银行联手干预外汇市场，抛售日元收购美元，造成巨额货币被投放到市场。

同时，日本政府在 1972 年 8 月宣布进行列岛改造计划，实行财政扩张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引发了日本第一次泡沫经济，但是由于 1973 年年底发生的石油危机严重打击了对原油涨价毫无准备的日本，第一次泡沫很快破灭。

日本第二次泡沫缘起于 1985 年 9 月 22 日在美国纽约广场饭店订立的“广场协议”。有专家认为，日本经济泡沫以及泡沫破灭后日本进入十多年低迷期的罪魁祸首就是“广场协议”。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广场协议”就是美国为整垮日本而布下的一个惊天大骗局。

这种看法其实是很情绪化的，“广场协议”之后，美元对日元和马克贬值均达 40% 以上，但日德之间结果迥异。很显然，日本泡沫以及随后的经济停滞显然不是“广场协议”的错，而是内生于其政治经济制度结构之中。

有论者认为，第一次泡沫后日本为应对石油危机进行的改革，在日本经济鼎盛时期被认为是日本模式的优势，但同时也被认为是泡沫破灭后日本经济进入“失去的年代”的主要原因。^②

石油危机之下，日本经济一度出现高通胀下的负增长，大批企业破产倒闭。为了维护经济基础和社会安定，企业、工会以及政府在 1975 年达成妥协性解决方案：企业保障工人的就业权，工会降低加薪要求甚至同意减少劳动报酬，政府则通过大量发行赤字国债、建立就业资助制度、投入政府资金等方式来提供雇佣后援。

其后日本政府通过《特定萧条产业安定临时措施法》（1978 年生效）、

^① 1971 年 8 月，尼克松政府宣布放弃按 35 美元一盎司的官价兑换黄金的美元“金本位制”，实行黄金与美元比价的自由浮动，史称“尼克松冲击”。

^② 季卫东，日本经济受挫的教训是什么。中国经济网，2004 年 7 月 12 日。

经济如此 ，你要早作打算

《特定产业结构改造临时措施法》（1983 年）等法律将之制度化，企业里出现了“终身雇佣制”、“年功薪金制”以及“企业内部工会”等三种有特色的制度安排，政治和社会系统也因此演变成基于“维稳”的所谓“准社会主义”结构。这种“准社会主义”被“末日博士”努里埃尔·鲁比尼（Nouriel Roubini）——他曾准确预测了次贷危机——归纳为如下特征：

个人对福利的追求超越了对社会凝聚和集体目标的追求；

建立在受限的市场竞争和寡头垄断市场的框架之上，而不是自由市场竞争上的经济体系；

贸易保护的整体，相对于进口更优待出口和限制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

终身职业安全体系；

使家庭和公司偏向风险厌恶行为的隐性/外在的社会保险体系；

株式会社的公司组织结构。

正是这种模式下的一系列制度安排，“过高的资产负债率、公司间金融和实体资产的交叉持有、累积的贸易盈余、日本中央银行制定的货币供给、股票和房地产商的投机行为，以及过度借贷用于私营部门投机的财政系统”^①，导致了 20 世纪 80 年代资产价格的大幅上升。泡沫破灭之后，为避免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大量破产对社会产生巨大冲击，日本大藏省提出要“软着陆”，在维持原有机制的前提下等待经济回升逐步消化银行的不良资产。

但日本人过高地估计了自身的能力，繁荣时期无所不能的日本消失了，长达十余年的缓慢却是大幅度的泡沫消退过程使日本金融公司的不良贷款日渐累积，投资者资产不断缩水，通货紧缩长时间笼罩在列岛上空，投资

^① [澳] David L. Western. 泡沫·膨胀·破裂：美国股票市场 [M]. 张德远译.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9：187.



者和消费者信心缺失。日经指数从1988年39000点的高峰一直掉到2003年的7780点，跌幅达到惊人的80%；房地产价格下跌也历经十余年，平均跌幅高达50%以上。

到2002年，日本全国各银行的不良资产达到近2兆美元，而日本最大的15家银行每年正在继续产生300亿美元的损失，不良资产占日本GDP总量的10%~20%。^①

❁ 东亚泡沫的制度缺陷

东亚模式本质上是日本模式的一个变种，具有“银行—产业”一体化的出口导向、集权的精英政府对市场经济的主导、固定汇率、高投入高产出的特征。东亚模式也曾与日本模式一样，一度被认为是东亚经济起飞的关键，但也被认为是造成东亚经济危机的根源。

落后国家在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中，需要通过政府对经济的适度干预来弥补市场发育的不足，东亚国家的“强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创造出了一个经济迅速增长的制度安排的同时，也形成了对经济的过度干预。

精英政府的理性长期来看是脆弱的、不可持续的，与市场理性也并不总是一致，而一个缺乏有效外在约束机制的政府必然会走向腐败。东亚很多国家在金融危机之前都走向了亲密的“裙带资本主义”，政商之间通过大型经济发展项目“亲密”了，政府和金融机构之间通过股权水乳交融起来。

“裙带”关系的建立，不可避免地导致大量经济资源的耗费，使国家金融稳定性遭到严重破坏。当一个社会或国家的腐败被普遍接纳为一种行为方式时，政府的管理能力和效率就会遭到毁灭性破坏，甚至完全失去自律性。亚洲金融危机之前的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韩国都是例证。

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几乎都难免陷入高投入、高产出的窠臼，而中央

^① 季卫东，日本经济受挫的教训是什么，中国经济网，2004年7月12日。

经济如此 , 你要早作打算

银行不得不屈服于通过增发货币保持经济高增长的压力,很多东亚国家甚至为了维持经济高增长,不惜大借外债。1996年,泰国的外债急剧上升至1128亿美元,占GDP的62%,其中大约960亿美元是由私有部门举借,并且大多数是短期资金,远远超过当时国家38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①

而“裙带资本主义”下的金融机构又通过大肆放贷编织出了一番繁荣的经济景象,1997年年底,韩国最大的30个产业集群平均债务/净股本比率高达519%,而美国这一比率约为154%,日本为193%,中国台湾为86%。^②

和日本泡沫一样,东亚危机之前的资产泡沫也是过度的流动性和信用导致的结果。但亚洲金融危机一定程度上却是外因推动的,索罗斯对泰铢的攻击被看做危机的开始。尽管如此,大多数学者认为,东亚国家自身经济政治结构的失衡和汇率的高估则是危机快速传染到东南亚、韩国,造成亚洲全面的金融危机的根源。

● 金融自由化与泡沫

索罗斯在攻击泰铢一击得手后,也曾反思为什么成功来得如此之快,“如此成功的一个经济发展模式为何会在顷刻间就变得一无是处了呢?我们如果不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缺陷入手,就很难找到这一问题的答案。事实是,亚洲金融危机并不仅限于亚洲,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波及了所有新兴市场国家,这更强有力地说明不稳定的主要根源存在于国际金融体系自身之中。”^③

这个结论无疑会受马哈蒂尔^④的欢迎,但马哈蒂尔却依然愤怒地将索罗斯视为低能的“亚洲金融危机纵火犯”。索罗斯费力不讨好,羞怒之下暗指

① 沈联涛. 亚洲金融危机十年祭 [J]. 财经杂志, 2007.

② 同上。

③ 五年一觉——亚洲金融危机 [J]. 三联生活周刊, 2002年第7期。

④ 马哈蒂尔·穆罕默德 (Datuk Seri Mahathir Bin Mohamad), 1981年起任马来西亚总理 (首相) 长达22年, 成为马来西亚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政府首脑。



马哈蒂尔是独裁者，“对他自己的国家是个威胁”。但据说后来两人还是找到了共同语言，2006年两人在马来西亚首次碰面，一起把小布什总统痛骂一番后，前嫌尽释。索罗斯事后说“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其实非常相似”，马哈蒂尔则表示“我对他的看法已经改变”。

是的，作为金融大鳄的索罗斯对金融世界的看法应该是有道理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使工业国家既能保持汇率的稳定，又能追求国内经济增长和充分的就业，促进了发达国家经济繁荣。但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自身存在不可解决的悖论，注定了其必然走向解体。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无疑深刻改变了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

当尼克松总统1971年8月16日宣布冻结美元与外国货币的兑换时，不仅冲击到了日本，对资本主义世界每个国家而言都是一场考验，发达国家不得不放弃与美元之间的固定汇率。由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产生的最深刻的变化是金融自由化。

“金融自由化标志着资本主义经济长程运动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折。经过20年的贸易与生产扩张之后，全球资本主义开始了一个财政与金融扩张的时代，国际竞争的游戏规则发生了急剧的变化。”^①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发达工业国家相继完成了金融自由化的进程。

金融自由化是全球经济一体化下的必然结果。金融自由化的目的是通过金融制度改革，减少金融抑制，使利率和汇率逐渐市场化。金融自由化将促进金融发展，带动经济增长，但金融自由化的过程其实也是将金融抑制下隐藏的风险外露的过程。在全球金融一体化的背景下，外露的风险如果不能及时修复，很容易遭到国际资本的侵扰，一旦处理不当，将导致本国金融的不稳定，从而引发金融危机。

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本质上是不稳定的。“蒙代尔三元悖论”（见图

① [美] 高柏：《日本经济的悖论》[M]，刘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204。

经济如此 ，你要早作打算

2-5) 告诉我们，在一国的经济目标中，独立货币政策、固定汇率、资本自由流动三者之间，只能三选二，而不可能三者兼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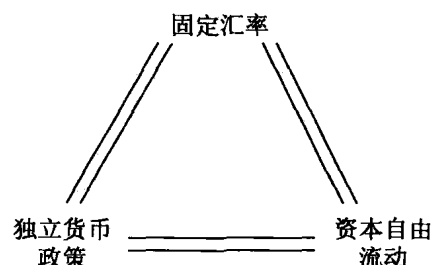


图 2-5 蒙代尔三元悖论

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各国“独立货币政策”和“固定汇率”得以实现，但“资本自由流动”受到严格限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垮台后，“独立货币政策”和“资本自由流动”得以实现，但“固定汇率”将不复存在。

一个国家或地区保持汇率稳定的目标与国内政策的目标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冲突。日本为避免日元过快升值，不得不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从而导致日元供应过剩。与此同时，金融自由化下的日本企业疏于监管，积极玩起了“炼金术”，大规模参与金融投机，从而引发泡沫经济并直至走向泡沫破灭。

在东亚危机中，固定汇率是这些国家外向型经济成功的基础，但同时也导致了危机的发生。为维持固定汇率，东亚国家失去了对利率和货币供给的控制。根据“蒙代尔三元悖论”原则，资本自由流动、固定汇率制和货币政策非独立性三者的组合是一个可行的选择，但是这一组合在现实中有效的前提是假设一国外汇储备无上限。

实际上，现实中一国的外汇储备不可能无上限，一国的外汇储备总量再巨大，与规模庞大的国际游资相比，其力量也是薄弱的，一旦中央银行耗尽外汇储备仍无力扭转国际投资者的贬值预期，则其在外汇市场上将无法继续托市，固定汇率制也将彻底崩溃。



因此，一国即使放弃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巨大的国际游资压力下，往往也很难保证固定汇率制度能够得以继续。亚洲金融危机深刻地体现了这一点。国际游资不仅卷走了这些国家宝贵的外汇储备，也使得这些国家的固定汇率制归于失败。

危机是一个事件，而改革与重组则是一个流程，制度变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么主动改变制度以顺应历史大趋势，要么通过危机强制性地改变整个局面。我们不能改变历史，但今天我们在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全球市场环境中作出的决定，可以改变世界并同时改变我们自身。

所有的社会变革都有着路径依赖的特征，我们现在作出的决定可能是未来成功的基础，但也可能为未来埋下祸根，是福是祸皆取决于我们自己的选择。如果我们总是将成功归因于自己，而将失败归咎于别人罪恶的阴谋，那么我们将永远在失败的烂泥塘里打滚。

❁ 计划体制下的“短缺”与“泡沫”

在很多研究者看来，泡沫只是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下的专利，与计划经济没有联系，事实不是这样的。有研究者曾提出“结构性泡沫”一说，“在一个经济体中存在着一些不好的、虚假的甚至‘带毒的’东西，而且是不可持续的。并且，这种泡沫状的东西是由特定结构在经济体内部所造就的，是不可避免的”^①。

所谓的“结构性泡沫”广泛存在于经济实体之中，从有形到无形，从食品、药品等一般消费品到公共领域，乃至精神世界，无所不在。对于结构性的定义我们不敢苟同，我们更倾向于用“经济增长泡沫”来定义，意指增长的无效性，或者是我们常说的为 GDP 而 GDP 的产物，明知道是无效、浪费的事情，也得去做。这种事情，百害有一利，那就是可以增加

① 王键：结构性通胀与中国的结构性泡沫。中国改革论坛网，2011年8月30日。

经济如此 , 你要早作打算

GDP, 满足某些特定的需要。在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下, 其实充斥着很多这样的经济增长泡沫。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苏联曾经有过“经济奇迹”, 以至于赫鲁晓夫可以在联合国脱下皮鞋敲桌子, 并威胁西方说“我们终将埋葬你们”。许多西方学者都大感震惊, 有些人甚至预测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 苏联的经济就会超过美国。

事实上, 按照苏联官方的数据, 1950 年苏联就已经是世界第二工业大国。1950—1980 年, 苏联工业增长速度远远高于所有西方发达国家, 农业生产增长速度也比几个西方大国快。1980 年, 苏联计算, 国民收入和工业生产分别为美国的 67% 和 80%。^① 尽管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后, 苏联经济发展速度慢了下来, 但依然在 3% 左右。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很厉害, 1938—1980 年, 工业生产增长最少 9 倍, 快的达到 60 多倍, 而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中增长最快的意大利也仅有 7 倍多。^② 但就是这样辉煌的经济成就, 因为制度的转变一夜之间崩溃了, 几十年创造的价值毁于无形。是财富太玄妙, 还是制度太玄妙, 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 这是经济增长泡沫的崩溃。

市场经济制度下的泡沫是投机过度导致的资产泡沫。人性中对财富的追逐欲望导致人类不断地冒险, 创新、投机与泡沫也就随之出现。在熊彼特看来, 企业家天生冒险的精神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创造性毁灭”, 市场经济在创造巨大价值的同时也毁灭着价值, 但因为创造得多, 毁灭得相对少一些, 因此不停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创造性与毁灭性同源。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没有企业家, 也没有企业家精神, 加上长期的金融压抑, 货币不允许追逐商品和资产, 计划经济体制下资产泡沫表面上就不存在, 而是表现为“短缺”。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认为, “短缺”源自

① 三联书店编. 世界经济统计简编 1978 [M]. 上海: 三联书店, 1979.

② 三联书店编. 世界经济统计简编 1982 [M]. 上海: 三联书店, 1983.



国家与企业间的“父子”关系，预算软约束使政府和国有企业存在着极强的“投资饥渴症”，各级政府都力图为本部门争取尽可能多的投资份额。

事实上，“投资饥渴症”也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即使是在市场经济制度下，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也都倾向于不断加大投资的原因。这种内生于计划体制的再生能力缺少导致的“短缺”其实是“泡沫”的另一种表现形式，短缺与经济增长泡沫相生相伴。

资本主义在“创造性毁灭”中不断通过泡沫的破灭完成市场的自我纠偏，计划经济则由于制度刚性使经济缺失自我纠错能力，导致经济长期失衡。

❁ 中国泡沫的制度基础

毋庸置疑，中国已经存在严重的资产泡沫，产生泡沫的原因自然是流动性过剩。但中国的泡沫又与日本及东亚的泡沫有着极大的制度性差异。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执行的是“经济增长优先”政策，为了发展经济，公平、公正都可以让路，在追求 GDP 增长的道路上，各级政府的运作基本上都“公司化”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过多。

政府干预经济始于罗斯福新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及东亚国家经济的成功一度引起了对于政府干预经济的热议讨论，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崛起以及苏联、东欧的崩溃，政府干预经济也就成为非常之时的非常之举了，不再是市场经济中的常态。

在中国渐进式改革中，总体趋势是经济逐渐走向自由化，但由于计划体制的桎梏，我们现在正走在“半计划半市场”的轨道上，政府对经济的介入不仅是宏观调控的问题，而是直接插手经济。各级政府拥有分配包括土地和资本在内的重要经济资源的巨大权力，可以通过直接审批投资、市场准入许可以及价格管制，直接干预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

政府行为不仅作用于宏观管理层面，而且直接作用于企业层面。在国

经济如此 , 你要早作打算

民经济运行中,政府既制定交通规则,又充当警察,还可以决定“车辆和行人的方向”;既是足球比赛上的裁判员,又是教练员,还是运动员。身份错乱,行为必然乖张,越位、失位现象同时存在。

对经济的过度干预不仅造成了寻租和腐败现象,也大大降低了经济发展效率。政府官员是人,是亚当·斯密所说的“经济人”,远没高尚到不食人间烟火的程度。不仅政府机构需要谋求内部私利而非公共利益,作为政府官员的个人也不可避免地利用权力寻租,当政府本身掌握着强大的稀缺资源的分配权力,且监督机制远没完善时,寻租和严重的腐败就将尤甚。

除此之外,政府官员还是“政治人”,当其政治利益目标与公共管理目标发生冲突时,后者将被取代或忽视。寻租和腐败,政治目标替代公共利益,这些都将造成资源的错误配置,从而降低经济发展效率。

政府对经济的过多干预必然造成政府规模的膨胀。柏林大学的阿道夫·瓦格纳教授早在19世纪就提出,政府就其本性而言,有一种天然的扩张倾向。我们在21世纪初朝着“小政府大市场”方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机构改革,但短短几年时间里,改革成果已化为乌有。公务员这个职业已成为千百万人追捧的目标。

政府规模和权力的膨胀,进一步刺激了政府对经济的介入,在我国的很多地方,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已经演变成政府主导型经济,有的甚至变成典型的掠夺型经济: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对普通百姓的掠夺。^①至于为GDP而GDP、无效的经济增长、投资浪费、数字虚增,在我国也比较多见。

第二,占据主导地位的国有企业。

纵观中国洋务运动以来的企业形态,占统治地位的无非有三种:官商合办、官督商办、官办。无论哪种形式,权力始终居于核心位置,既制定游戏规则,又直接配置资源。这种官商结合的模式,并没有因为中国在经

^① 投资决策失误率30%左右,政府主导型经济亟待改变[N].每日经济新闻,2005年9月15日.



济领域的市场化改革而有实质性的、彻底的变化，“国退民进”的步伐从2002年开始出现停滞，并有了“国进民退”的说法。

在国企改革中，我们远未能建立起良好的运行和监管机制，国企本质上还是政府职能的延伸，其运行效率必然受到损害，而国有资产的流失以及腐败的高发也属必然。

第三，金融抑制。

过去的十多年里，中国金融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实现了转型。一些大的金融机构实现了资产重组、资本充实和上市，公司治理得到了改善。但中国的金融抑制也是显而易见的：行业进入的严格审批，利率和汇率的严格管制，创新能力的不足，货币不可自由兑换和流动，等等，都构成了巨大的金融抑制。

近年来，中央银行通过人为压低存款利率对储蓄进行隐蔽性征税，并将之补贴给了银行、贷款企业。据估计，在2008年第一季度，对这些储蓄的隐性征税额为255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4.1%。居民储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尽管一直在提高，但居民利息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却在大幅缩减。隐性的利息税，不仅压抑了国内的消费需求，也将储蓄更多地推向了资产市场。

金融抑制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国内金融业，减少了中国政府干预人民币升值的成本，但事实上却未能减少金融的脆弱性。通过金融抑制，中央银行将成本和风险层层传导到别无选择的储户身上，一定程度上反而是放大了系统性风险。

缺少竞争的金融机构，虽然近几年账面利润不断创出新高，但背后的根本原因却是我国有着全世界最大的存贷差，其风险控制机制、定价与创新能力依然羸弱。过低的贷款利率，不仅导致银行贷款需求过度，官商合营的企业得到了绝大部分的金融资源，而效率较高、创新能力较强的中小型企业却生存维艰，整个社会的资本利用效率不可避免地大幅降低。

经济如此 ，你要早作打算

与此同时，巨大的地下金融市场的出现将不可避免。地下金融本质上是高利贷，遵从的是“丛林法则”，失于监管的地下金融将会给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增添巨大的风险。民间高利贷动辄几亿几十亿元，牵涉大量的人，一旦资金链断裂，极可能造成社会的大范围动荡。

第四，创新能力不足。

如果说中国企业没有创新能力，那是肯定不对的。比如，食品里加苏丹红、牛奶里加三聚氰胺、通过瘦肉精改良猪种，这些都是中国企业的“创新”，只是这些“创新”不太受欢迎。很长时间以来，中国企业的竞争能力都体现在价格战、成本战、模仿战上，作为发展中国家，这是不可避免的一个阶段，但问题是，当我们的成本优势用尽之后，我们还有什么竞争能力呢？

国企不用说了，是有竞争能力的，因为垄断可以提价，可以有效转移成本，还可以设计出若干让你看不懂的消费套餐，把“3G”变成“G3”，弄得你不稀里糊涂地花点钱仿佛就对不住自己似的。这也是创新，只是这种创新看起来和往牛奶里加三聚氰胺一样可疑。

在科技创新上，我国是不错的，航空航天和军事工业等方面，中国的技术实力在世界上都还位居前列。然而，在民用技术领域，中国却达不到世界中等水平。国家的很多重大科研同一般民用领域基本上脱节，制度性缺陷使中国缺乏把技术开发同民用领域相结合的动力。

企业的自主创新更多地停留在口号和简单模仿上，企业在技术引进上敢于花钱，因为它的效益立竿见影，而对消化、吸收却吝于投入，从而导致无法完成技术的升级，也培育不出强大的技术创新团队。中国已是世界贸易第二大国，但出口产品中拥有自主品牌和知识产权的只有10%；中国是制造大国，但重要技术装备却主要靠进口；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不断增加，但是不仅关键零部件依赖进口，而且每年要为软件技术标准向外企支付高额的费用。



克鲁格曼曾指出，过去 150 年间，先进国家的国民平均所得之所以能够持续成长，主要原因在于科技进步。据麻省理工学院的罗伯特·索罗教授估计，美国国民平均所得长期提升，80% 是由科技进步促成的，资本投入的增加只能解释其余的 20%。

而中国经济过去 30 多年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高投入、高储蓄，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教授看来，这与其他东亚国家、地区差不多，除了规模超大和环境资源更加恶劣之外，没有什么特别的。^① 清华大学的黄亚生教授更是认为中国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GDP 增长主要得益于由政府组织的基础设施、城市建设以及城市化方面的大规模投资。^②

第五，稳定的政治架构。

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结束了长达百年的分割局面，得到了全民的支持，建立了新中国。虽然经历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灾害，也经历了长达十年的严重动荡，但这并未从根本上破坏共产党的执政基础。改革开放的成功，更是加强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此外，中国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控制系统”^③，包括五大部分：正规的国家及其系统，专业的控制体系，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以工作单位和城镇居民居住点为单位的社会控制网络，新兴的高科技。这五大部分有效地保证了中国政治和社会的相对稳定，但我们因此也付出了很高的“维稳”代价。

中国社会结构的超稳定性也让老外刮目相看，因为他们无数次预言中国将很快崩溃，但中国却总是没有，这在他们看来不可思议。其实，长期的封建制度使绝大多数中国人只知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在读书人看来，乱世如果能做上忠臣，那是无上的光

① 钱颖一专栏。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中国经济。爱思想网。

② 黄亚生专栏。中国经济增长的南柯一梦。爱思想网。

③ 丁学良。辩论“中国模式”[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经济如此 ，你要早作打算

荣，甚至于有些人刻意追求的就是在故宫午门前被掀开裤子打破屁股，以求博得一个忠臣的名分。

所谓的天赋人权、生而平等的观念，那只是五四运动以后的舶来品，远没有深入到中国的文化中去。后来，有些老外明白了：我们不了解中国，不知道中国人在干什么，他们根本就不讲什么天赋人权，在老百姓心目中，是规则意识大于权利意识，这是中国社会保持稳定的主要原因。^①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利益。中国绝大多数人所争的，是利益，而不是权力。这也是我们得以“维稳”的基础。因为不是要争夺执政权，所以利益之争通常被视为人民内部矛盾。什么是人民内部矛盾呢？就是用人民币可以解决的矛盾。解决好这些矛盾，我们才得以“维稳”，但我们为此付出的开销实在不低。

中国的这种以政治权力的排他性和封闭性为基础的刚性稳定缺乏弹性，在有些学者看来存在系统性的风险。

● 再读明斯基

明斯基的研究表明，现代金融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不稳定的，不稳定的根源在于追逐利润的投资、融资等市场行为的不稳定。投资决策是基于现在对未来的预期，本身具有内在不稳定性，投资者的情绪在乐观与悲观之间的忙乱冲动会影响投资总量，进而通过支出乘数影响总产出和就业。

而投资者的情绪很不靠谱，很容易发生变化，在不稳定的经济中投机会压倒投资。如果投机的泡沫在爆发之前被成功抑制，那么在投机者看来，之前的冒险行为被证明是正确的，这就为以后可能发生更频繁、更剧烈的泡沫创造了条件。金融机构正常的逐利行为总是会持续不断地扩张流动性，

^① 于建嵘专栏，当前的社会冲突与制度变革，爱思想网。



推动投机狂热。

明斯基认为“大萧条”是资本主义的失败，至于何时会再次发生，明斯基的答案是“暂时不会”。因为“大政府”和“大银行”在起作用。

所谓的大政府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府作为“反经济周期者”的斗士角色，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政府规模不断扩大，干预经济的力度不断增强，政府财政开支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也不断增大，在发生经济衰退的时候，政府可以通过刺激消费需求和增加投资支出的政策来增加总需求，以维持经济的稳定运行，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私人投资周期性波动的影响。

所谓的大银行是指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在战后也得到了强化，中央银行在发生金融危机的时候，能够更加积极地加以干预，使得金融波动的程度大大减轻，从而维持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行。

不稳定是现代金融的正常产物，持久的稳定是不可能达到的，即使采取了适当的政策也不可能，因为这会改变人们的预期和行为，而新的行为很可能形成新的不稳定。正是基于这一原因，明斯基明确反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行为，认为即使政策确实实现了暂时的稳定，那也只是开启了新的失衡的大门，实际上是为更大的危机创造了条件。

其实，泡沫也好，危机也好，本质上都是经济体的一个自我修复过程，是经济重新增长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熊彼特认为，“创造性破坏”是资本主义最本质的属性，企业家的创造性冒险活动不仅给企业家，也给全球经济的每一个成员带来了不确定性，动态失衡是经济中的常态。

在熊彼特看来，每一次的经济萧条都有可能孕育一次技术革新，而技术革新又将会带来下一次的萧条。因此，创造与毁灭同属于市场经济的本质，政府在这其中能做的，最多也就是在毁灭带来痛苦时给人们提供一点镇痛剂，或者是延缓毁灭爆发的时间，却不能从根本上避免毁灭的发生，因为毁灭与创造同源，没有旧的毁灭也就没有新的创造。

经济如此 , 你要早作打算

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在古典经济学家眼里，政府只是“看门人”，地位不高，管事不多，最好少插手经济的事情；后来凯恩斯出来说，市场有缺陷，政府得管一管。政府地位因此有所提高，可以与市场相提并论，但因为政府被市场压抑太久，很多经济学家也总在一旁暗示政府有缺陷，很多时候会失灵，政府因此还很不自信，在市场面前少不得谦虚一下，说经济主要还是归市场“无形之手”管理，政府的“有形之手”主要在于弥补市场的缺陷，而不是替代市场。

再后来，一些政府变得强势起来，因为手里有国家机器，有法律武器，另外还有自己的国有企业，因此走向了对市场强制干预的道路，比如日本、东亚、拉美地区等国家。但很遗憾的是，“有形之手”过度介入经济遭到了“无形之手”的强力反击，最终强制干预均以失败告终。而以政府完全替代市场的世界性实验，在 20 世纪末就已经结束。

明斯基的理论里，暗含了一个根本的命题，在一个政府作用越大的市场里，由于政府的干预，泡沫危机爆发的频率可能较低，但危机的破坏性可能也就越大。这一点，日本泡沫、东亚泡沫、苏联与东欧的经济增长泡沫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供证明。明斯基是悲观的，他认为根本不存在一个无缺陷的市场经济制度，更反对建立福利制度和政府为刺激经济而进行的投资。

在他看来，对总需求进行微调是不可能的，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会产生有害的不稳定性和通货膨胀，福利事业也不好，易产生通胀，而且会形成制度化的失业。他对经济展开出的“药方”是更低投资、更高消费、提升就业以及运用制度和监管来减少不稳定性，但很遗憾，“明斯基医生的药方”一直不太受政府和中央银行的待见。

第四节 中国房地产泡沫

房地产泡沫是中国最典型也是最大的泡沫，房地产泡沫化已是不争的



事实。国家统计局数字表明，2010 年中国房价收入比为 7.76，京沪深分别为 17、15 和 16。但某些所谓的专家学者却说这不算高，因为中国国情决定了大家都喜欢房子，都要买房子，所以多高也都不算高了。

还有的专家说确实有点泡沫，但是是“结构性”、“局部”的，局部地区有雨，并不意味着全国就发水灾。他们忘记了一个事实，中国是一个二元结构的社会，广大农村和中小城镇事实上是被排斥在现代化进程之外的；他们也忘记了房价高不高本质上不是他们说了算，也不是统计局说了算，而是由潜在的购房者收入水平决定的。

自然，房地产商以为房价永远都是低的，至少还会有十多年的涨势，他们的看法另当别论。你能让王婆说她卖的瓜价格高吗？当然不能，房地产商不比王婆傻，他们都是“精华素”。

但凡能睁开眼睛，且眼睛没有太大问题的，都认为中国房地产市场存在大量泡沫。2011 年第一季度，中央银行针对全国 50 个城市的 2 万户城镇储户的问卷调查显示，认为房价“过高，难以承受”的居民比重高达 75%^①。当然，也不排除中央银行调查的多数都是穷人，如果取样都是房地产商的话，90% 以上大约都会认为房价还很低。

日本泡沫时期流行“炼金术”，这是中国道家的玩意，看来秦始皇“遣徐福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最终他们真还是辗转到了东洋列岛。只是日本人不知后来中国“炼金术”在人世间变成了“炼房术”。现在，我们来慢慢梳理一下现代的“炼房术”怎么就炼成了泡沫。

●● 房地产发展历程

我国房地产市场主要得益于两大制度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和土地使用制度改革。1978 年之前，我国实行的是国家统包住房投资建设，以实物形

^① 2011 年第一季度储户问卷调查报告。中国人民银行网站，2011 年 3 月 16 日。

经济如此 , 你要早作打算

式向职工分配近乎无偿使用的福利性住房制度，没有房地产业，只有建筑业。

1979 年，我国开始进行住房制度改革，先后经历公房出售试点、提租补贴试点。1990 年 5 月，国务院发布了《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对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出租、抵押、终止以及划拨土地使用权等问题作了明确规定。1991 年 10 月，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了住房制度改革的指导思想和根本目的。至此，我国房地产市场初步形成。

1992 年春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推动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11 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发展房地产业若干问题的通知》，首次勾画出了房地产市场体系框架。全国很多地区骤然掀起了房地产热潮，海南、广西北海还出现了严重的泡沫。1993 年下半年以后，随着宏观调控各项措施的落实，全国房地产开发的增长速度明显放缓，海南、广西北海的房地产泡沫开始破裂。此后的海南省用了 8 年时间才基本消除泡沫时期留下的隐患。

过度扩张后的紧缩带来了经济的不景气，加上 1997 年亚洲爆发了金融危机，“中国崩溃论”一度在西方甚嚣尘上。为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1998 年 7 月，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明确提出“促使住宅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宣布从 1998 年下半年开始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

一系列配套的支持措施先后推出，有关部委先后发布了《关于加大住房信贷投入，支持住房建设与消费的通知》《关于调整房地产市场若干税收政策的通知》《关于个人出售住房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2002 年，全国商品住宅销售面积达到 23702 万平方米，较 1997 年增长超过 2 倍，销售金额高达 4958 亿元。不过这时候的房价很平稳，涨幅不大。如图 2-6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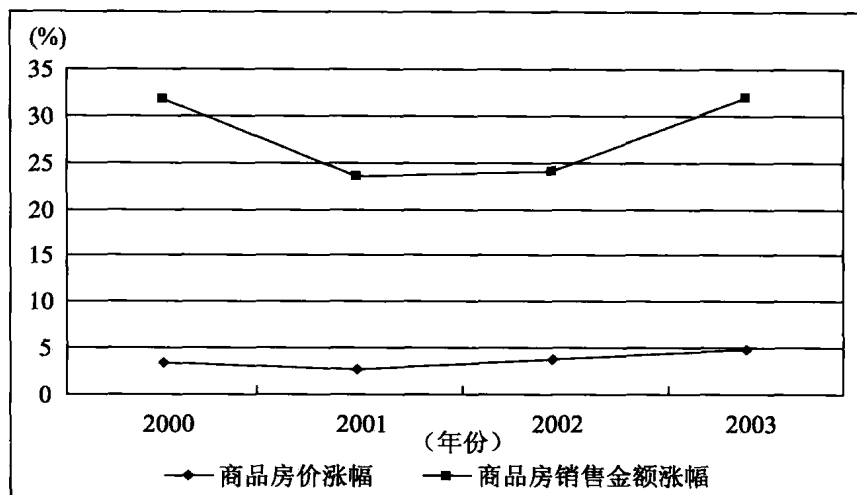


图 2-6 2000—2003 年商品房房价走势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调控声成为涨价的协奏曲

2003 年年初，我国出现了经济过热的迹象，为抑制投资过快增长，中央开始了对房地产业的调控。6 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要求加强房地产开发贷款管理，严控土地储备贷款发放，加强个人住房贷款管理等，部分房地产企业资金链出现问题。

中央银行的措施在社会上一度饱受非议。8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事实上否定了中央银行的调控政策，明确指出房地产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要加大信贷支持力度。

2003 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较上年增加 30%，房价也出现大幅度上扬。房地产投资持续过热，政府开始收紧土地供应，2004 年 3 月，国土资源部、监察部发出《关于继续开展经营性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情况执法监察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在 2004 年 8 月 31 日前将历史遗留问题界定并处理完毕。8 月 31 日后，不得再以历史遗留问题为由采用协议方式出让经营性土地使用权”。

经济如此 , 你要早作打算

相关部门同时实施了加强信贷管理, 提高投资门槛, 严格项目审批, 控制拆迁规模等一系列政策措施。这些措施旨在控制房地产投资过快增长, 结果不但未能稳定住房价, 反而助推了房价的持续上涨。2004 年全国平均房价上涨 19% 以上^①, 远超过前几年 3% 左右的涨幅, 北京、上海、杭州等大城市涨幅更大, 上海平均上涨 24%, 个别地段甚至超过 50%^②。

从 2005 年开始, 一些地区的住房价格又快速攀升。3 月, 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切实稳定住房价格的通知》, 提出了抑制住房价格过快上涨的八项措施, 简称“国八条”, 将稳定住房价格提到政治高度。但“国八条”的根本目的只是为抑制房价过快上涨, 不是打压房价, 住房价格上涨反而因此出现新的动力。5 月, 国务院又颁布“新国八条”, 要求遏制投机性炒房, 控制投资性购房, 但其着眼点依然在于促进住房价格的基本稳定和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

尽管此后取消了一些配套的税收政策, 取消了一些政策优惠, 房价涨势却完全未能遏制住。2005 年, 全国房价继续上涨 19%。2006 年年初, 深圳、北京、广州等城市房价再次大幅度上涨, 新旧“国八条”抑制房价的作用宣告失败。

2006 年 5 月国务院又出台“国六条”, 要求政府切实负起责任, 控制住房价格过快上涨。相关的税收、金融政策也出现收紧态势, 但此时的地方政府财政已经被房地产所“绑架”, 很多地方财政收入均来自土地出让, 想让地方政府自断财路的房地产调控, 自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 调控声成了房价上涨的伴奏。

房价持续大幅上涨, 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2005 年中国十大新闻的第一条就是“房地产宏观调控出台一系列措施”, 2006 年年初, 北京 16 家新闻机构对 10 个热点进行“猜猜看”游戏预测, 排名第一的谜语是“房价是涨还是跌?” 大众持续关注, 不仅是因为房价高涨, 更是因为大众在这场房地产活

① 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全国商品房价计算而得。

② 参见《联合早报》2005 年 3 月 25 日的报道。

动中逐渐从投资变成了投机。自 2006 年开始, 全国房价逐渐失控, 2007 年, 很多地区甚至出现了通宵排队购房的现象, 一些开发商也开始囤积居奇。

持续的调控, 逐渐改变了人们的心理预期。进入 2008 年, 有些城市房价开始下降。但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 我们在 2009 年推出了大规模的救市计划, 信贷大幅扩张, 新增贷款当年达到 10 万亿元, 过量的资金进入了房地产市场, 房价再次出现疯狂上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的房价一年时间里就上涨了一倍, 通宵排队购房现象又出现了。

海南省再次出现购房热潮, 海口、三亚, 甚至是一些临海的县城, 半年时间内有的房价就上涨了一两倍。根据统计局及国土资源部的统计, 2000 年我国商品房平均销价同比上涨 25%, 创出历史新高。进入 2010 年, 涨势依然持续, 杭州房价涨幅达 35%, 深圳房价涨幅 31.7%, 厦门和北京房价涨幅则皆为 29.7%。^① 1989—2010 年全国商品房房价走势, 如图 2-7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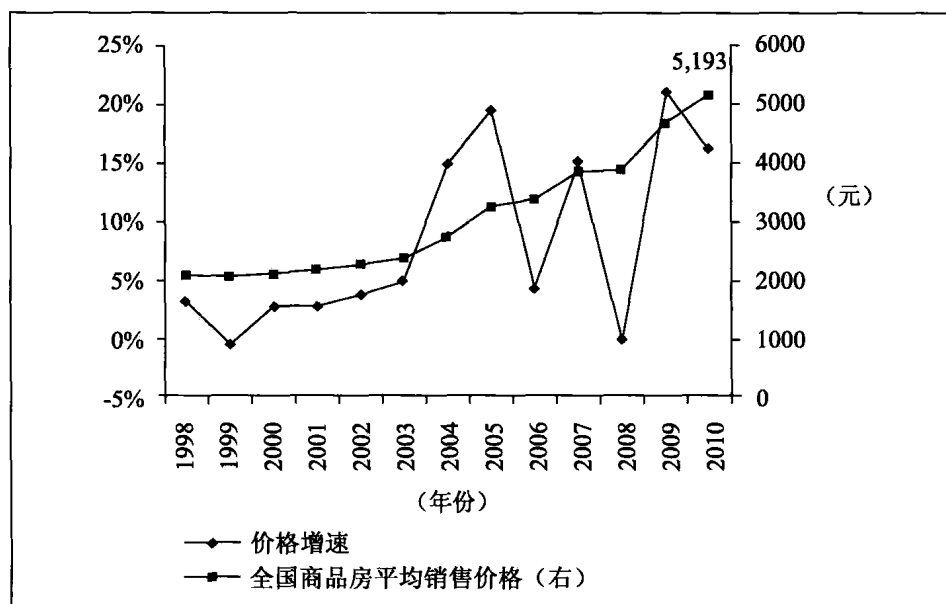


图 2-7 1989—2010 年全国商品房房价走势

① 多城房价仍纠结 [N]. 理财周报, 2011 年 3 月 28 日。

经济如此 ，你要早作打算

房价大幅上涨的同时，成交金额也成倍放大。1989—2010 年商品房销售增长情况，如图 2-8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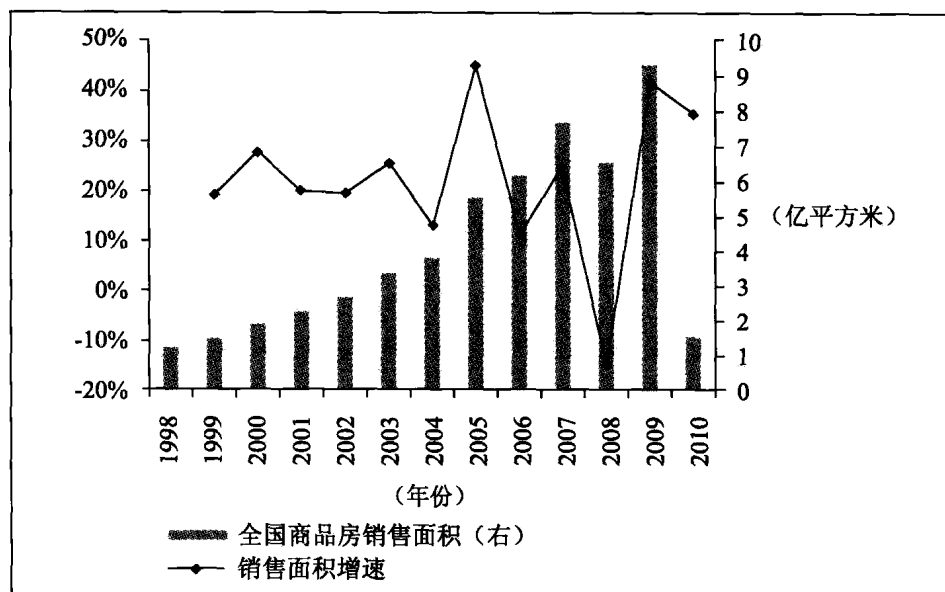


图 2-8 1989—2010 年商品房销售增长情况

因为房价上涨，中国涌现了大批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在大城市只要有一套不错的房屋，基本上都是千万级富翁了，中国的中产阶级被大批制造了出来，成为社会坚强的稳定器。而《福布斯》公布的 2009 年中国富豪榜上，房地产商占据了 38.5%，中国靠房地产真正地富裕了起来。

● 房地产泡沫的国际比较

由于全球流动性过剩，2007 年之前，全球许多国家的房地产价格都出现了明显上涨，但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中，中国房价涨幅无疑是较大的。如图 2-9 所示。

部分国家和地区的房地产价格，很多都在 2007 年后出现了下跌，爱尔兰泡沫破了，澳大利亚泡沫也破了，美国泡沫不消说，简直是不堪一击，只有中国的房价在 2008 年后继续大幅上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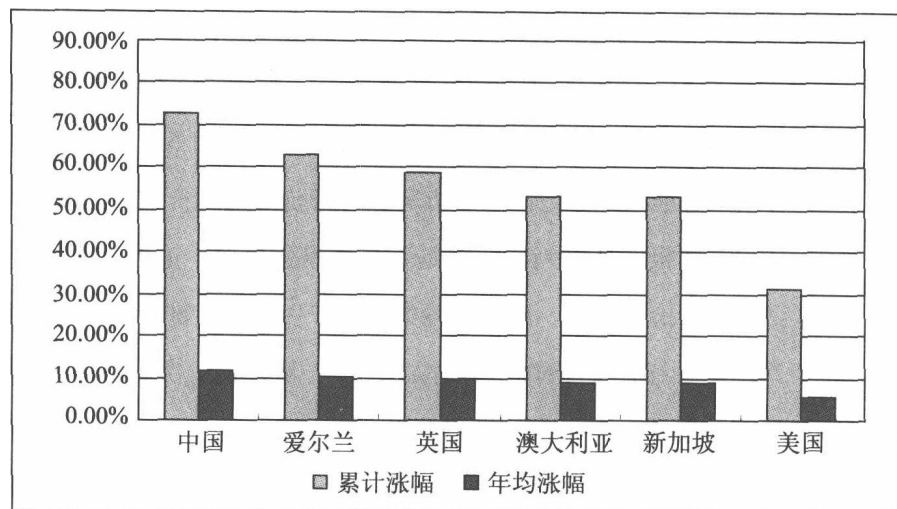


图 2-9 2003—2007 年部分国家和地区房价涨幅比较

资料来源：各国中央银行、统计局数据。

自然不能因为房价上涨就说有泡沫，有没有泡沫还得进行比较。有人说，中国有特殊国情，房价与国外没法比较，而世界上也不存在一个普遍公认的合理的房产价格。还有人说，住房自有率高低与房价存在正相关的关系，自有率低，房价低，自有率高，房价就高。中国住房自有率高达 89%，房价哪能不高？该高！西欧、北欧国家房价收入比只有 2~3 倍，因为住房自有率只有 30% 左右；东欧国家高达 25~30 倍，那是因为住房自有率高达 90%。^①

但这些说法似乎不能服众，因为我们绝大多数城市居民确实感到房价高了。高低与否，本身是一个比较的概念，因为收入低，所以觉得高。如果有人说房价不高，那大约也是和自己的收入比。如果“比尔·盖茨”们来中国，就是房价再涨个几十倍，大约也还是觉得不高。因为收入不在一个等级上，高低的问题讨论起来就如鸡同鸭讲。

衡量房价高低一般有三个标准：房价收入比、租售比和空置率。房价

^① 林文倩，房价收入比没有国际标准 [N]，南方日报，2011 年 7 月 3 日。

经济如此**动荡**，你要早作打算

收入比是指住房平均价格与家庭年平均收入的比值，用来衡量消费者对于房产的实际购买能力，国际上通行的标准有两个：一个是联合国人居中心的标准，不应超过 3；另一个是世界银行的标准，不应超过 5。一般达到了 6 倍以上就可以说有泡沫了。租售比是指房地产售价与房地产月租赁价格之间的比值，从租金回报的角度判断住房是否具有投资价值，正常值在 100 ~ 250 之间。空置率是指待出售、出租的各类房地产占市场全部存量房地产的比率，用于判断是否存在过度膨胀的虚拟需求。一般来讲，房屋空置率 5% 为适度，10% 则为警戒空置率，超过 20% 为严重空置。

按照房价收入比，中国主要城市的房价已经居于全球领先水平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是高的。如图 2-10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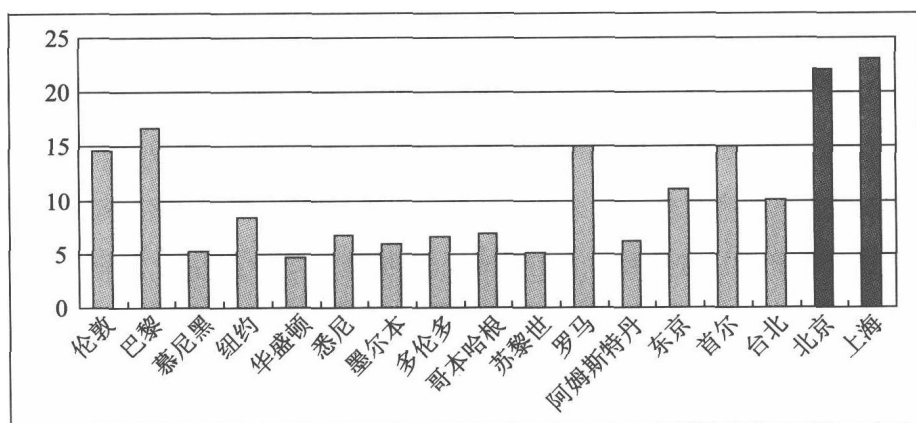


图 2-10 发达国家各大城市与北京、上海房价的对比

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也位居前列。如图 2-11 所示。

房价收入比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一个贫富悬殊的社会里，有时说明不了问题，因为有的人就是有钱，穷人无可奈何。比如，印度的孟买由于存在大批贫民窟，其房价收入比就很不好看，高得离谱，达到了 40；莫斯科也基本上集中了俄罗斯全部的富人，房价收入比也不比北京、上海低，但俄罗斯是经过休克疗法的，财富在休克中都集中到了极少部分人手里。

看看绝对房价，我们的主要城市和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也毫不逊色，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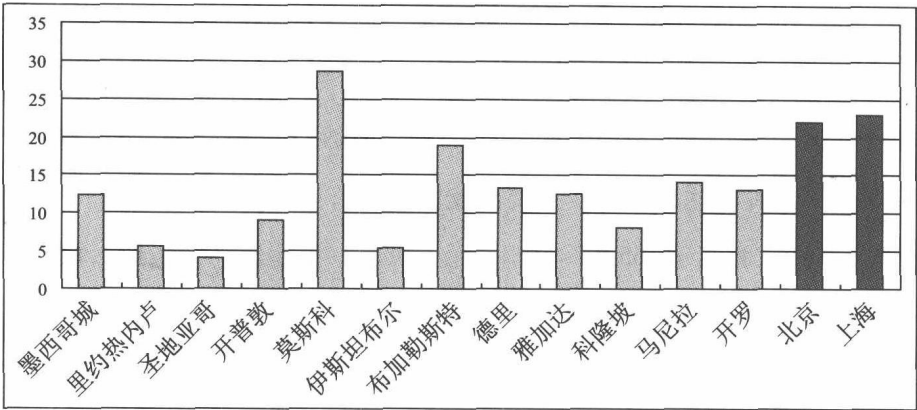


图 2-11 发展中国家各大城市与北京、上海房价的对比

管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当然，我们现在还无法和纽约、伦敦、巴黎等地做绝对值的比较，因为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只是这些国家的 1/10 左右，也因为外界一直嚷嚷人民币要升值但还没升值，所以，中国的特大城市与世界一流城市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但我们是可以和次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较高低的，在这些城市面前，北京、上海的房价已经遥遥领先了。如图 2-1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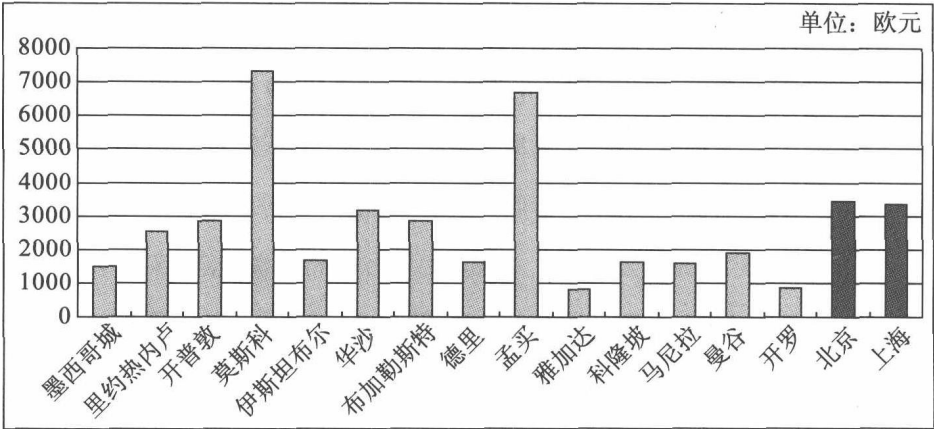


图 2-12 绝对房价的国际比较

据估算，北京、上海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目前只能买到 1.5 平方米的住宅，而世界各主要大都市则都在 3 平方米到 10 平方米之间。以日本东京

经济如此 , 你要早作打算

为例, 目前东京典型的 3 室 2 厅、不算大阳台使用面积 76 平方米、实木地板、精装修带免费车库、24 小时热水供应, 相当于我们国内标准约 105 ~ 110 平方米建筑面积的高档公寓房, 步行到轻轨站 5 ~ 10 分钟, 坐轻轨地铁在 30 分钟内可抵达市中心各主要商业区和政府办公区, 价格为 2300 万 ~ 2600 万日元, 相当于 165 万 ~ 185 万元人民币, 每建筑平方米约 1.65 万元人民币。^①

在我国的省会一级城市里, 据宜居城市网研究资料显示, 2010 年, 全国有 13 个城市房价收入比在 10 以上, 其余的大多数也都在 8 以上。

单说大城市, 不说全国, 似乎眼里只有有钱人, 那是不好的。那我们看看全国的情况。2009 年全国的房价收入比达到了 8.03, 2010 年继续维持在高位 的 7.76。对于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的权威数字, 我们不应该像西方人似的随便怀疑, 如果连权威也怀疑, 那就走向了虚无主义。虚无主义是不好的。只是这个数字, 确实与我们自身的感觉不相符, 这大约和我们总是在大中城市有关吧。

事实上, 在我国二元结构体制下, 绝大多数中小城市在一定意义上是与现代化绝缘的, 或者说处于现代化的边缘, 他们的出路就是向大城市输送廉价劳动力, 这是二元结构下的宿命。但进入 2010 年下半年以来, 房价涨势已经向二、三线甚至是四线城市蔓延了, 但尚不知可以推高多少房价收入比。2001—2010 年全国房价收入比, 如图 2-13 所示。

美国在次贷危机爆发之前, 房价收入比最高也就达到 5 左右, 根据《福布斯》杂志 2007 年 7 月综合官方数据对美国房价收入比最高地区的排名, 当时美国房价收入比最高的 3 个城市分别是加利福尼亚的洛杉矶、旧金山和圣地亚哥, 房价收入比分别为 10.1、9.4 和 8.3, 而加利福尼亚正是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房价下跌最严重的区域, 也是银行贷款坏账率最高的

① 中国房价的国际比较 [N]. 中国证券报, 2010 年 7 月 1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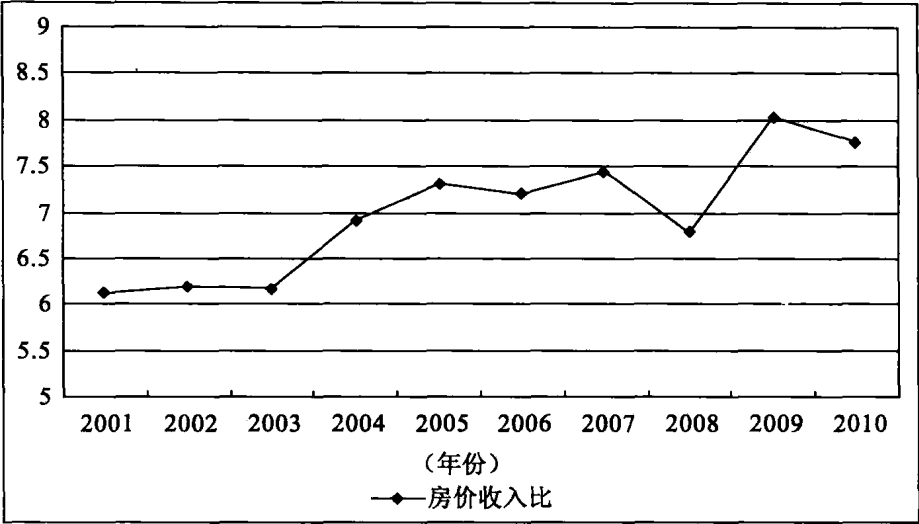


图 2-13 2001—2010 年全国房价收入对比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资料整理。

区域。2006 年次级贷款发放规模最大的 10 家美国企业有 7 家在加利福尼亚注册。^①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后房价收入比的变化，如图 2-14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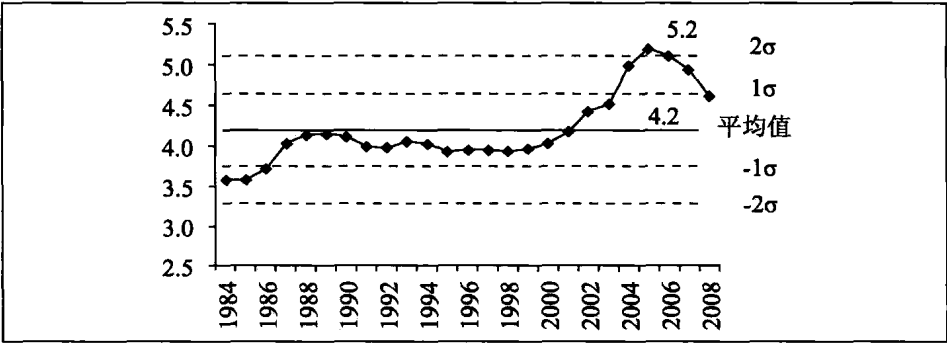


图 2-14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后房价收入比发生的变化

资料来源：美国房地产价格来自 FHFA，居民可支配收入来自 US Census Bureau。

从房子的租售比看，我国一线城市一般到了 400 倍以上，已经明显偏

① 专家称我国房价收入比远高于合理水平 [N]. 第一财经日报，2009 年 2 月 4 日。

经济如此 , 你要早作打算

离国际认可的 200 倍左右的租售比水平。如此高的租售比, 实际是购房者在对租房者进行补贴, 从投资角度看, 已经失去价值, 唯一吸引购房者购房然后出租的因素只能是预期房价会进一步上涨。

我国的房屋空置率一直缺乏较权威的数字, 但这并不能否认我国房屋空置率明显偏高的事实。2010 年, 国家电网公司在全国 660 个城市的调查显示, 有高达 6540 万套住宅电表连续 6 个月读数为零, 这些空置房足以供 2 亿人居住。^① 事实上, 各地新兴的所谓“鬼城”, 就已经是很好的证明了。

人民网 2011 年 3 月 18 日报道称: “三亚不少高档住宅小区空置情况严重, 明明应该是万家灯火之时, 小区内却灯火阑珊, 犹如鬼城。”有的甚至说“三亚高档住宅房空置率为 95%”。^② 内蒙古鄂尔多斯的鬼城经美国《时代周刊》报道后更是中外皆知, 后有好事的记者发现, 该地房价 6 年涨了 6 倍, 原来设计容纳 100 万人的康巴什新城, 目前实际只有 2 万人居住, 他们大部分是当地的回迁农民。^③

2010 年年底, 美国一家名为“商业内幕”的网站公布了若干幅郑州郑东新区的卫星图片, 并从图片上判断, 这只是“一片空屋的堆积”, 可能是中国最大的“鬼城”, 后有媒体报道郑州郑东新区建设 8 年住房空置率被指超 55%。^④ 2011 年, 深圳大学的一群学生, 历时半年, 调查了 121 个楼盘, 4.1 万套住宅, 通过查看用水量推算出结果: 深圳一手楼空置率达到 43%。^⑤ 据调查, 北京的房屋空置率在 2007 年就已经达到了 27%^⑥。而东亚危机之前, 泰国房屋空置率也仅为 21%^⑦。

据宜居城市网的调查研究, 我国一线城市的房价高估了一倍多, 很多

① 中国房产泡沫空前巨大 空置房可供 2 亿人居住 [J]. 环球企业家, 2010 年第 7 期。

② 央视聚焦经济半年报: 三亚高档住宅房空置率 95%. 新华网, 2011 年 7 月 14 日。

③ 鄂尔多斯“鬼城”空了 98 万人的城 [N]. 南方周末, 2011 年 7 月 7 日。

④ 参见 <http://news.sina.com.cn/c/2011-01-22/231321859221.shtml>。

⑤ 参见 2011 年 9 月 13 日的深圳新闻网。

⑥ 北京 27.16% 住房空置率数据由来 [N]. 中国经营报, 2010 年 9 月 18 日。

⑦ 徐滇庆. 房价与泡沫经济 [M].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6: 243.



二线城市房价泡沫也日益明显。近两年来，房价高涨的势头已向三线、四线城市转移，房地产泡沫几乎无处不在了。

❁ 房地产泡沫刚性的制度成因

1998 年与房改同时推出的还有“教改”和“医改”，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现在，官方已正式承认“医改”失败；“教改”后高校的大规模扩招，确实拉动了居民在教育方面的投入，大学校园占地面积和在校学生数量也成倍增加，但真正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却只有房地产。

社科院 2010 年《国家竞争力蓝皮书——中国国家竞争力报告》指出，近二十年来，中国 GDP 的增长主要靠资源消耗和扩大投资，尤其是房地产膨胀的拉动，可见，这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培育得确实不赖。

中国房地产泡沫刚性的制度成因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联手共谋。

表面上看，房地产泡沫是游资炒作而起，背后其实是房地产开发商与地方政府利用“国民经济支柱地位”联手共谋的结果。在发展经济大局的遮掩下，同时兼属“经济人”和“政治人”双重性质的地方政府完全可以忽视民间的呼声，唯 GDP 是从，这是中国特殊的政治制度 and 经济制度下再正常不过的结果。

之所以会在房地产上形成共谋，是由房地产本身的属性和我国特有的管理制度决定的，政府不仅垄断了土地供应，而且在房产开发的规划、建设项目审批、工程施工许可，一直到销售证的办理方面，都全程参与。房地产投资的背后基本上都有官商合办的影子。在住房市场化的大旗下，通过非市场化的运作，不仅可以拉动地方 GDP，更可以顺利地将权力和利益有机结合起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第二，政府过度介入，扭曲了房地产市场机制。

经济如此动荡，你要早作打算

房地产市场最基础的制度应是土地制度，但恰恰是在土地制度上面，我们无法完成市场化运作。我们现行的土地出让制度基本上是跟香港地区学的，香港地区曾经作为大清王朝“赏借”给英国的一块肥地，虽然长达99年，但也是有期限的，港英当局自不会以香港本土居民利益为重，而要在短期内争取宗主国利益的最大化。

因为是借别人的，法律上港英政府自是没有所有权，只好将使用权与所有权分离，让使用权所有人能同时具有使用权的出租、抵押、转让等“处分权利”，这也构成了香港土地制度的核心。事实上，民法法系的《法学总论》（罗马法）、《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都明文禁止对“使用权”进行出租、抵押和转让。

普通法法系的英国本土法律虽允许不动产承租人对不动产的转租转让，但大多数不动产所有者却通过立契约的形式禁止承租人转租转让，即不让出租权、抵押权、转让权来削弱自己的所有权，然而这却是香港土地制度的核心。内地跟香港地区学，其实是找错了老师。

在2004年之前，我国城市的土地出让，虽然国务院明确规定有三种方式：协议出让、招标出让、挂牌出让。但绝大部分土地都是采取协议出让的方式，这就决定了房地产市场很长时间以内不可能真正地市场化，也注定了官商勾结、腐败高发、暴利成为我国房地产业最基本的特征。

2004年以后，政府不允许协议出让土地了，全部改成“招拍挂”，土地出让市场化运作算是真正开始，但地方政府又普遍实行了土地收购储备制度，完全垄断了土地供应。水龙头在别人手上，下游要喝点水，没有过硬的关系就只好出高价，有时高价也不好使，弄不好就搞乱了“潜规则”。破坏规则的人要么是真正的革命者，可以建立一套新规则；要么就是“搅局者”，最终的结局就是自己出局。在房地产市场上，革命者似乎尚未看见，因此，我国房地产业依然维持着最初的基本特征。

而在房产开发的全过程中，市场化建设严重落后。其实政府压根也没



想过房地产要真正市场化，很多的制度建设都流于操作层面，这也是共谋的一个自然结果。

第三，住房制度存有缺陷。

住房制度改革重在改变过去那种福利性住房制度，实现住房商品化和社会化，这无疑是正确的。但这种改革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1998 年之后的房改几乎将所有的人都推向了市场，忽视了低收入者和住房困难家庭的住房保障问题。事实上，全世界其他国家的住房都是“两条腿走路”，一部分人通过市场化手段解决，一部分人通过非市场化手段解决。

日本实行的是“保低放高”政策，政府为中低收入者提供廉价住房或优惠住房贷款，高收入者住房由市场解决；新加坡 84% 的人安居于政府投资修建的组屋，商品房的购买者主要是收入较高的二次置业者、投资者或者外国公民；中国香港也有约一半的人居住在香港房屋委员会提供的公屋里面。

住房是生活必需品，住房问题是重要的民生问题，让“人人享有适当住房”是政府的职责所在，政府应该承担起保障房、廉租房的建设管理任务，但房改之后的很多年里，政府在这方面是失职的。

近两年，因为担心房地产投资遭打压后出现投资萎缩，政府才开始加大了保障房、廉租房的建设，但保障房、廉租房的管理也存在很大缺失。以前保障房一般也只有收入不低、有权有势的人才能申请上，该保障的保障不了；廉租房基本就是空谈，2006 年之前，累计投入资金只有 70.8 亿元，杯水车薪。

第四，地方财政过于依赖土地收益。

在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采取“招拍挂”方式前，我国的协议出让土地收取的出让金唯恐其多，“招拍挂”之后，猫腻不好玩了，土地出让金一时大增，成为地方政府的“摇钱树”。在现行体制下，由土地产生的资产性收入和大部分税费主要归地方所有，从而造成地方政府高度依赖土地收益的

经济如此 , 你要早作打算

局面。土地收益在一些地区已成为典型的“第二财政”。

也正因此，政府对房价的调控才显得三心二意，一直在抑制房价过快上涨与促进房地产业平稳健康发展之间摇摆，既怕打压了房价，又怕房价涨得太快。房价涨多了，就调控，强调从严查税减贷；别人出危机了，我们经济要冷了，又大肆增贷减税缓税。而地方政府在利益驱使下，就尽可能多圈地多卖地，“吃掉了子孙饭”，就算在严格的调控令下，也敢于忽视中央政府和民间降低房价的呼声，或明或暗地支持甚至助推房价上涨。

在目前的分税制下，不让地方政府搞土地财政也难，水利建设要抽10%的土地出让费，保障性住房要建，医疗改革、教育改革需要投入，政府还要主导城市化，大搞基本建设，这些都需要钱，而很多城市的土地也已经抵押了出去。要不搞土地财政，很多地方政府马上就会破产。

第五，流动性过剩。

流动性过剩推动了房地产泡沫的形成，尽管在很多人看来这只是表面现象，但如果没有流动性泛滥，房价泡沫自然是吹不大的，即使房价泡沫吹大了，其他地方也会瘪下去。据估计，房地产吸收了我国绝大多数流动性。据中央银行的公报，从2009年到2010年第一季度，商业银行新增购房信贷猛增了约2.4万亿元人民币，几乎较房改以来10年的购房贷款总额翻了一倍。

第三章

激荡 30 年的喜与忧

30 年的发展，我们消灭了绝对贫困，消灭了文盲，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并跻身于世界经济强国之列，我们取得的成绩是辉煌而又瞩目的。但回过头来看，我们过去更多关注发展，而忽略了社会的公平与公正，我们依然不够“富裕”和“强大”，我们要追求的是“民富国强”。幸运的是，我们现在正在向这个目标迈进。



在这个世界上，平等地待人和试图使他们平等这两者之间的差别总是存在。前者是一个自由社会的前提条件，而后者则像 D·托克维尔描述的那样，意味着“一种新的奴役方式”。

——弗·冯·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

中国经济已经走过 30 多年的增长神话，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使中国焕发了新的生机，而西方则被认为已走入迟暮。在世界经济史上，尚未有任何一个大国的经济像中国一样能持续高速增长 30 年以上，中国不仅做到了，似乎未来也将按照既定轨道高速前行，新的东方传奇将不断续写，持续冲击世界的想象空间。

面对中国神话，世界有些瞠目结舌，心情也有点乱，以至于认为上帝已经不再眷顾“傻瓜、酒鬼和美国人”，转而青睐中国人了。

中国已经成为永无休止的高增长的代名词。面对神话的出现，世界对其认知唯恐落后。2010 年年底，美国“纽约经济谘商理事会”（Conference Board）发布报告，称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两年后就将超越美国；渣打银行也称，按照名义价格计算，10 年内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将成为世界第一。

这样的认为是对的，因为中国人也是这样认为的。中国很多精英乐观地相信，只要凭借过去 30 年的成功经验，并在未来的不确定性中小心翼翼地应

经济如此 ，你要早作打算

对，中国就能像过去 30 年一样，将经济增长的神话再延续 30 年，乃至更久。

然而，历史并不一定只有一个方向。

第一节 高歌猛进的 30 年

● 30 年发展神话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单论 GDP 数字，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1978 年，我国 GDP 仅有 3645 亿元人民币，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居第 10 位，人均国民总收入仅 190 美元，居全世界最不发达的低收入国家之列。

斗转星移之间，2010 年，我国 GDP 就达到 397983 亿元，仅次于美国，较 1978 年增长了 108 倍；人均国民收入也达到 3800 美元，步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数字不可谓不炫目，变化不可谓不大。我们不由得赞叹“伟哉，GDP!”

1978—2010 年我国 GDP 的增长情况，如图 3-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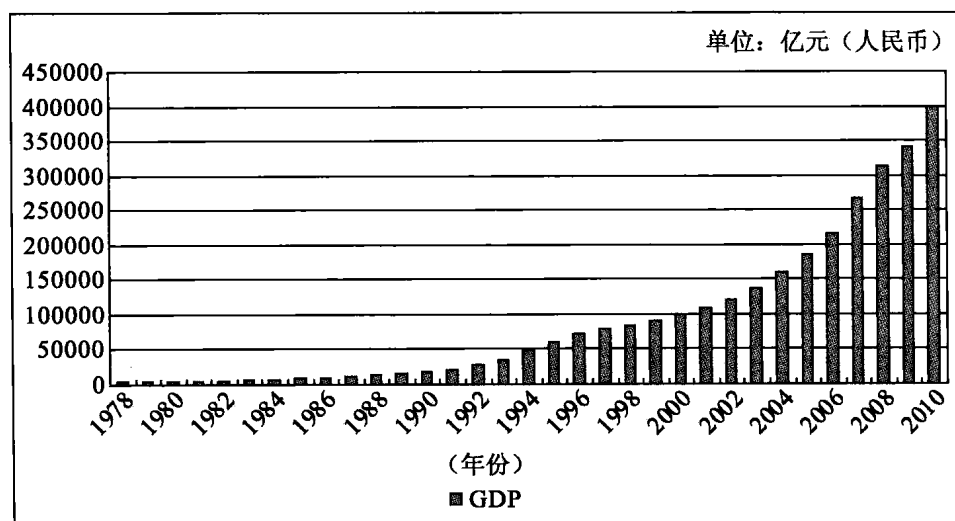


图 3-1 1978—2010 年我国 GDP 的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资料整理。



30 多年来，我国 GDP 年均增长率超过 9%，这在大国经济体中是史无前例的，被视为增长的神话。在此期间，GDP 出现了 3 个高增长期：1982—1988 年，1991—1997 年，年均增长率都是 11.5%；2002—2008 年，年均增长率为 10.4%。

当然，我们也有过低潮，1989 年、1990 年两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GDP 年增长率仅有 4.1% 和 3.8%，是 30 多年里增长速度最慢的两年。但也正因为低潮的出现，才有了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我们才有了进行改革开放的勇气；有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心。低潮的缓冲也为后来的两次高速增长奠定了基础，也正因此，中国的增长神话才能持续至今。

到 2010 年，我国内地 GDP 超万亿元人民币的省份迅速增加，达到了 17 个，位居前四的广东、山东、江苏、浙江可谓“富可敌国”，即便与 G20 国家相比也毫不逊色，广东已经超越沙特、阿根廷和南非。

单说 GDP，似乎骨感，不够丰润，那我们也看看其他东西。

2010 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 54641 万吨，猪牛羊禽肉产量 7780 万吨，其中，猪肉贡献了 5070 万吨。根据 2010 年 11 月 1 日零时为标准时点进行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31 个省市自治区总人口按照 13.397 亿计算，不考虑牲畜等其他用粮，我们每人每月理论上可以吃到粮食 33 公斤，肉 3.15 公斤。

三年自然灾害时，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自报的粮食定量也只有每月 13 公斤，并宣布：“我们要实行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

只是很可惜，那时很多人想吃稀而不可得。现在可好，你应该已经过上了比毛泽东同志都好的生活，自然也尽可以不听他老人家的话，闲时也多吃，也吃干。只是你可得记住，我国 2010 年已经是世界上第一大糖尿病人大国，拥有至少 9240 万患者，还有 1.48 亿人属于后备军，你可别

经济如此 , 你要早作打算

“被糖尿”。

增长了，富裕了，自然该有钱。

看看中央银行里存的外国“花纸”，1978年只有1.67亿美元，折合成人民币人均不到1块钱；而2006年我国外国“花纸”储备就超过日本，达到10663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位；到2010年，数字更是增大至28473亿美元，稳坐全球第一把交椅。增长何止万千叠，成山了，要数的话，数得你心慌。

我国经济也深度融入世界之中，2009年就已成为全世界第一出口大国，2010年进出口总额达到29727.6亿美元，比2009年同期增长34.7%，其中出口额为15779.3亿美元，进口额为13948.3亿美元；而1978年进出口总额仅为206亿美元，其中出口额为97亿美元，进口额为109亿美元。

国家财力自然因此大幅增长，2010年财政收入83080亿元人民币，而1978年却只有区区1132亿元人民币。

人民收入水平也提高不少，2010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919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109元；而1978年城镇居民的收入仅为343元，农村居民自然更惨，仅有134元。居民拥有的财富也快速增长，1978年居民存款仅为211亿元，2010年则达到307166亿元。

● 令人称赞的五大成就

30年来，我们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第一，消灭绝对贫困。

在消灭绝对贫困方面，我国政府作出了巨大努力。1978年，全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约有2.5亿人，约占全部人口的1/4（我很奇怪了，难道城市里就没有绝对贫困人口吗？想想似乎应该有，但好像又不该有，只是我们翻来覆去地找资料，终未找到有关城市绝对贫困人口的资料，看来城市里真是没有的）。



自 1986 年开始,我国实施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扶贫开发,使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到 2007 年年末,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减少为 1479 万人,贫困发生率降至 1.6%。近 25 年来,全人类取得的扶贫事业成就中,2/3 的成就应归功于中国。我国在这方面是发展中国家的典范,居功至伟。

当然,贫困是绝对的,也是相对的。1985 年,我国的贫困线标准是人均年纯收入 200 元,2009 年提高到 1196 元,虽增长了 5 倍,但远落后于同期 GDP 增长 42 倍,和国际贫困线标准相比,我国的贫困线标准也仍然较低,只是一条保障“吃饭权”的贫困线,有过亿人“被脱贫”。

有人因此说贫穷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对此,我无话可说。选择的权利对于我们的贫穷来说是一种奢侈,正是因为没有选择才沦为贫穷,如果有了选择而依然愿意像古希腊的犬儒们一样乞讨生活,“只要你别挡住我的太阳光”就好,那是一种有文化的高雅,与我们的贫困远不相同。

2009 年,我国贫困线标准提高到 1196 元,贫困人口因此从 2008 年的 1479 万人增至 4300 多万人,增加了 2800 多万人,这是政府在新环境下正视的结果,是可以因此证明我们的党伟大而光荣的另一面镜子。

希望通过努力,我国不仅可以消灭绝对贫穷,也要解决因因而贫的相对贫穷,这是我们共同富裕的理想所在。

第二,消灭文盲,科教大发展。

2000 年,我国宣布实现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战略目标。2010 年,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就已达 2232 万人,比 1978 年增加了 2146 万人。目前,我国科研人员总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我们不仅建成了正负电子对撞机,核电站并网发电,还建成世界上最大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神舟”飞船也载人上天。

第三,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

按照国际标准工业分类,在 22 个大类中,我国制造业占世界制造业的

经济如此 , 你要早作打算

比重在烟草、纺织品、衣服皮毛、皮革制品及鞋类、碱性金属、电力装备、其他交通工具等 7 个大类中名列全球第一。其中，烟草占比又列第一，几乎占了世界的一半，这虽是我国悠久的“抽”的历史使然，也和英帝国主义两次战争“教诲”腐败的清政府有点关系。本不是什么好事，但因为 GDP 和高税收的需要，被我们发扬光大，成为全球占比第一的产业，也算是有面子了，并顺带狠狠地抽了英国佬一记耳光——你怎么没做成全球第一呢？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我们中华，文明所系，始终牢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不学“洋鬼子”靠战争输出剩余产品，培养别人成为“瘾君子”。烟草这个“第一”主要是内部消化的结果，因此附带使我国成为全球烟民最多的国家（真有幸，又是一个第一）。

国际禁烟公约那是国与国之间的事，我们虽然已经加入，但因为早已不是国际主义者，关起门来哥几个抽抽又不碍着谁，反倒可以给国家缴纳税金，并创造若干专卖的就业岗位，其乐融融。只是，烟民多了，医疗卫生系统会有点乱，但也不用担心。

第四，文、卫、体飞速发展。

2009 年年末全国共有卫生机构 92 万个，而 1978 年只有 17 万个，增加了 4 倍之多；卫生技术人员 553 万人，比 1978 年的 246 万人多了一倍多。和 GDP 增长相比，这些数字都不炫目，但你如果真将这个和 GDP 增长相比，那就是不懂统计学了，犯了选择对象不妥的错误，卫生机构和卫生人员的增长应该与人口增长相比才行。

因为计划生育，我国总人口数量 30 多年来增长已经很缓慢了，同期只从 9.6 亿人增加到 13.3 亿人，增长不到 40%。相比之下，我们的卫生机构和技术人员则增长了少则 1 倍，多则 4 倍，你应该完全可以满足了。也就是说，1978 年你到医院看病，如果只有一个医生围着你转的话，现在至少可以保证两个医生来伺候你；如果你看了一家医院还意犹未尽，你尽可以



再跑完其余的三家。

当然，我这样说你肯定会有意见，因为“看病难”已成为一种社会公害，但这似乎怎么也不该怨卫生机构和技术人员的增加，我们应该做的是好生反思并自责：是不是生活好了身子骨变得娇气起来，动不动就要生点病？抑或是因为富裕了就对卫生机构太过挑剔，非三甲医院不进，非名医号脉不诊？

第五，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实现巨大飞跃。

单说公路交通吧，通车里程由 1978 年的 89 万公里增加到 2009 年的 386 万公里，增长了 3 倍多。这还不含村道，村道就是走骡马和行人，偶尔可以通通拖拉机的道路，如果加上，增长肯定不止 3 倍。公路等级也不断提高，高速公路从无到有，2010 年年底总长度达到 7.3 万公里，位居世界第二。

虽说高速里程屈居老二，你也不要不高兴，我们的收费公路里程可是世界第一，全世界收费公路据统计有 14 万公里，其中 10 万公里在中国，他国望尘莫及。为什么要收这么多的费？想必你也明白，“要想富，先修路”这可不是一句空喊的口号，别人都还指望着呢。

因为有了路，你也真的富了，小汽车说不定都换好几茬了，你不应该在乎收的那点过路费。2009 年，我国汽车产销分别为 1379 万辆和 1364 万辆，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汽车生产和消费国。每百户城镇家庭拥有的汽车数量也从 2000 年的 0.5 部增加到 2009 年的 10.89 部，这自然是富裕起来的功劳。尽管我们的汽车价格比国外的高不少，有的甚至贵一倍，但这正说明我们真的是富裕起来了。

富裕了，就得从乡下搬到城里做城里人，城市化水平因此稳步提高，城乡二元化结构正在打破。有钱的农民可以变成城里人，回乡下那是度假，没钱的也从农民变成了工人，只是你别忘了本分，得身兼农民和工人两种身份，“回乡务农，进城务工”，一年须得在城市和乡下像候鸟一样往返若

经济如此动荡，你要早作打算

千次。1978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17.9%，远低于当时的世界平均水平，甚至落后于非洲的平均水平；到2010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接近50%，成为30年来城市化增速最快的国家之一。

还有，我们不能忘记的是，2008年，北京举办了史上最昂贵的奥运会，神话般的开幕式盛大而辉煌，“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2009年上海举办了史上最昂贵的世界博览会，与来访的7000万人“探讨新世纪人类城市生活”，创下了不朽的纪录；2010年广州举办了史上最昂贵的亚运会，同样盛大而辉煌，展示了“广州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建设的伟大成就”。

以上说的都是成就，是好的方面，代表主流，但不好的我们也得老实说，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比如，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就相对滞后。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农村地区已经建立起相对完善的农田水利设施体系，并借此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现之后的农业大增产打下了坚实基础。

由于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分散生产的模式，从中央到地方，从内陆到边陲，政府对农田水利设施的投入很长时间都严重不足，农村水利设施因此严重超期运行，陈旧落后、老化失修现象严重，相当一部分水库带病运行，安全性和技术性都很差。2006年，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曾预言，“以目前的农村水利设施情况，早则三五年，迟则七八年，可能会出现崩溃的局面”^①。

很可惜，这个预言不幸被言中。尽管每年党中央都是“一号文件”屡次强调要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国家财政也大力向“三农”倾斜，但问题却一直未能得到有效的解决。全国18亿多亩耕地，其中有55%完全靠天吃饭，大型灌区骨干建筑物的损坏率接近40%，中小型灌区干支渠完好率只有50%左右；而中国农业灌溉用水的利用系数平均只有0.45左右，是世

^① 参见2011年1月30日的《经济观察报》。

界先进水平的一半，每年水旱灾害造成中国粮食减产大约 1000 亿斤。但好在目前我们都还有饭吃，因此可以等到没饭吃的时候再急。

第二节 30 年神话的背后

中国在 30 多年里取得的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是世界始料未及的。我们走向市场经济的经济体严格来说还很年轻，也没经历过大的挫折，正如年轻人一样，有点牛劲，敢想敢干，难免会对未来抱有美好的奢望，也不大看得上有点暮气的成熟个体，对于外界不满的吆喝声一般也只听进顺耳的，逆耳之言那一般就是阴谋。这是一种有点危险的倾向。

● 寻找坐标

1978 年，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西方国家完全没料到一个以无产阶级专政为使命的政党会成功地将一个濒临破产的大国经济变得如此生机勃勃。老外们隔山看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都和已知追求增长的认识格格不入，走在一条莫名其妙的路上，中国经济还能发展得这么好，增长得这么快，那只能是增长数字含有水分，被“注水”了。

但很遗憾，中国经济却在看空中一路高歌，狠狠教训了一把看空中国的老外们。总被教训的感觉自然不好，于是不少老外转而变为热捧中国，将之视为一个奇迹。因为是奇迹，所以就不需要解释了，就是转着圈解释了自己和别人都不理解，那就随它去吧，谁让它是奇迹呢！

因为老外视为奇迹，我们国人自然也理所当然地视为奇迹和骄傲，不然就会有民族虚无主义的嫌疑。但，恕我直言，视为奇迹可以，只是万不可骄傲，骄傲使人落后，这是至理名言。温家宝同志曾反复提到，多么小的问题乘以 13 亿，都可以变成很大的问题；多么大的经济总量，除以 13 亿，都会变得很小。

经济如此 , 你要早作打算

中国作为人口大国, 总量名列前茅相对容易。我们常说一人一口痰也会把某人淹死, 那不是说我们中国人多痰, 是在说平均概念。现在讲卫生, 不敢随意吐痰了, 但如果我们就因此忽略“一人一口”这一指标, 而热衷于放大总量, 热衷于广东超越沙特、阿根廷和南非, 而不知道广东常住人口已达 1.04 亿, 分别是沙特、阿根廷和南非的 5.7 倍、2.6 倍和 2.1 倍, 那就有些不知高低了。

有的东西不能只考虑总量, 比如高速公路吧, 就算某些小国将国土都修成公路, 整个国家变成一个大晒场, 可能依然赶不上我们目前的公路里程。

我国 GDP 增长固然可喜, 持续的发展也值得期待。但若换算为“一人一口”的标准, 我们还很落后。世界银行数据显示, 在全球 213 个国家和地区中, 中国人均 GDP 2009 年才首次进入前 100 名, 位列第 96 位, 落后于同期中国足球在世界的排名 (2009 年中国足球可是位列世界第 93 位的)。

2009 年, 我国与部分国家人均 GDP 的对比情况, 如图 3-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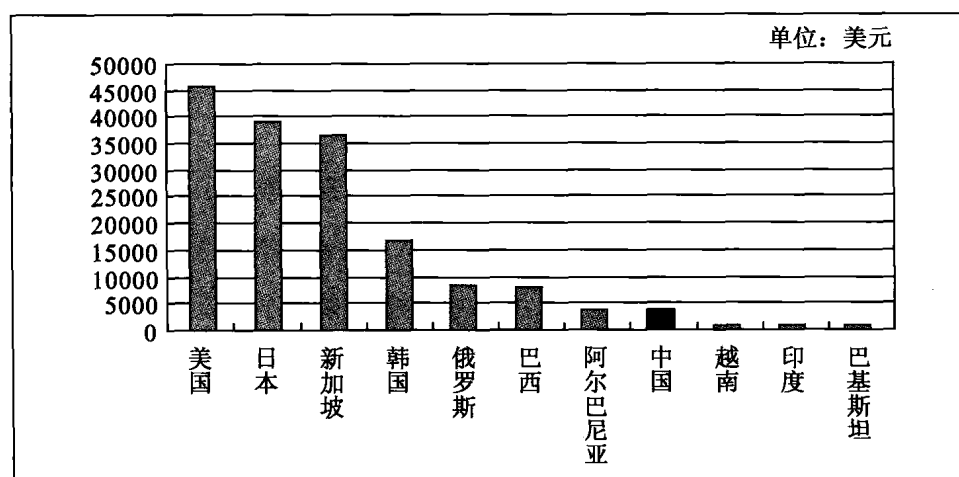


图 3-2 2009 年我国与部分国家人均 GDP 的对比

资料来源: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相关资料。

和别人比，我们不先进，和祖先比，我们依然落后。

古代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和文化大国在全球经济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两千年前，中国的经济总产值占世界经济的 1/4。一千年前，中国的经济总产值仍然接近世界经济总产值的 1/4。直到 19 世纪 70 年代，中国的经济总量一直是天字第一号。

大约由于处于万国中心太久，只知道“威服四方”，看不上“蛮夷”的“奇巧淫技”，中国因此错失工业革命的机会，就算是被“奇巧淫技”教训后，依然要保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近两百年里远远落在了“蛮夷”的后面。1950 年，中国的经济总产值只占世界经济的 5%；1973 年，仍然只占不到 5%。改革开放后，情况大有好转，2003 年，中国的经济总产值占到了世界 GDP 总量的 15.1%，但依然远落后于鼎盛时期。

1820—2003 年，中国在世界地缘政治中地位的变化，如表 3-1 所示。

表 3-1 中国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地位变化

年份 项目	1820	1890	1913	1952	1978	2008
占世界 GDP 比重 (%)	32.9	13.2	8.8	4.6	4.9	7.23
占世界人口比重 (%)	36.6	26.2	24.4	22.5	22.3	20.5
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的 人均 GDP (世界=100)	90.0	50.3	41.7	23.8	22.1	35.3

● 历史的选择

追求经济增长和国强民富，这是任何一个现代政府的当务之急。

18 世纪末以来，我国从“天朝”一步步被打下凡尘，沦为半殖民地。在此之前，因我国自限于农本社会的怪圈不能自拔，未能兴起工业革命，到了国门被洋枪洋炮敲开，割地赔款不断时，部分有志之士就开始不断尝

经济如此 , 你要早作打算

试要振兴，只是“洋务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都以失败而告终，从而再次痛失追上西方先进国家的机会。

洋务运动历时约三十余年，始于19世纪60年代，其时正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也就是说，我国近代工业起步并不比日本晚，可惜的是结果却大相径庭。

20世纪初，蕞尔小国的日本成为工业和军事强国，而泱泱大国的中华却依然积弱积贫，只有被动挨打的份儿。因何如此？一般认为根源出在制度上。明治维新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而洋务运动只是封建制度下的经济振兴，其主流意识的本质封闭而保守，所以要“洋务”，“师夷之长”，仅是为了在不变革制度的前提下维持“天朝”永享，其最终结果却是以失败告终，“天祚”也没延续成。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倒是短暂成功了，也在南京建立了“伪政权”，但因为旧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自从一九一四年爆发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以来，起了一个变化。在这以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之内的，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①，最终以逃到台湾告终，并在台湾得以苟延至今。

而共产党领导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却改变为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在革命的阵线上说来，则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②，在取得国家政权后顺理成章地和平演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也自然宣告终结，转而开始以苏联为蓝本的计划经济体制，尝试另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可惜，尝试的结果极为不理想，到1976年，整个国民经济濒于破产的边缘。

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②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1978 年，我们的国门刚刚打开一条缝，就看见了蓬勃生长的“资本主义的苗”，我们的很多“小邻居”在西方帝国主义的阵营中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工农、城乡、脑力体力之间的三大差别也大大消除。

看到“小邻居”家里有了我们曾不懈奋斗但尚未看见奋斗目的长什么样子的“马克思所描述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些萌芽”，我们心中真是五味杂陈。好在他们不仅是邻居，历史上还深受华夏儒家文化的滋润，血缘上算是近亲，他们发展得好，只能是催人上进，“就像后边有鞭子赶着似的”、“我们现在很需要跑”^① 这样的心情，当时不仅广泛存在于中央高层，更是刚经历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全国人民的呼声。

我们想跑，但往哪里跑呢？往苏联是不行了，别人要不要倒是其次，首先是我们自己就不愿意再跟在“老大哥”屁股后面转了。于是转而向几个“小邻居”学习，学习东亚那些成功获得市场导向发展的国家，开始“补资本主义课”，将发展放到第一位，追求经济的快速发展。

❁ 异化的 GDP

1978 年后，发展成为我国压倒一切的任务，目标很明确，那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至于怎么实现，依据的就是两句话：“摸着石头过河”和“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摸”解决了经济发展的路径问题，“猫”解决了绩效评价标准的问题。

有了方法，有了考核标准，事情就好办多了。我们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一路“摸”到“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 1992 年十四大明确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摸”论指导经济发展方算告一段落。

^① 1978 年邓小平访问日本期间的谈话。

经济如此 ，你要早作打算

因为是“摸”，有时难免“摸”错，部分人也掉到河里去了，但因为目的和考核标准明确，每次“摸”错后，我们总能及时纠偏，再次走上正确的轨道。总体看，“摸”的效果很不错，1978—1992年，中国GDP总量从3645亿元增长到26923亿元，人均GDP从381元增加到2311元，增长了5.1倍。^①

“摸”本质上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我们向一切发达国家请教，向第三世界穷朋友中的好经验请教”^②。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向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韩国——“亚洲四小龙”学习，这不仅因为近，更主要的都是所谓的儒家文化圈子，这一点很是契合我们。

其实，我们也在暗地里向日本学习，日本那时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在日本人看来，“亚洲四小龙”只是跟在日本这只大雁飞行的雁行阵势里面的四只小雁而已。

至于GDP这个概念，改革开放后很长时间里，我们都很少提及。

GDP，英文全称是Gross Domestic Product，翻译为中文就是国内生产总值，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所生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GDP是1953年联合国发布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的核心指标，经过1968年与1993年两次修订后，SNA成为国际最主流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GDP因此也备受西方国家的推崇。

萨缪尔森就曾说过，GDP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如同人造卫星探测地球上的气候，描绘出了一幅经济运行状态的全景。到了1985年，GDP这个概念才开始在中国的官方话语体系中出现，1993年，GDP方正式成为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并迅速被社会所熟知。

但很遗憾，刚进入中国的GDP就如橘到淮北变成枳一样，被“中国特色”化了，“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

① 国家统计局有关资料。

② 1978年邓小平访问日本期间的谈话。



发展经济学认为，制度创新、技术进步、效率提升以及人力资本投入等要素才是 GDP 增长的原因，工业革命早期的投资驱动支撑经济发展的理论在 20 世纪 50 年代就已遭到了否定，但由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差不多 30 年时间里我们实行的都是“重投资轻消费”的“统制经济模式”，一直存在“投资饥渴”，大家对如何通过投资拉动经济的方法心里多少有点底，毕竟是我们手把手弄了几十年的玩意儿，虽然也弄得不好，国民经济差点破产，但那是跟错了老师，经验还是有的。

改革开放后，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发展循着这条已有的道路走，有着制度性基础，这大概也算是经济学上所谓的“路径依赖”，只是这个名词当时大家都还不太知道，后来西风东渐多了，我们才明白“摸”到了“路径依赖”上面。

GDP 不错，代表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经济实力。追求 GDP 增长本无可厚非，不幸的是，一段时间以来，GDP 增长被我们当成了最重要的政治目标，并提出似是而非的“用发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口号，以为我国一切麻烦的根源就在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只有不惜一切代价实现经济高速增长，问题才可以解决。

这样的制度安排，在“威权主义经济发展模式”下极大调动了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整个中国演变为 GDP 增长的大竞技场，经济发展转而异化为“唯 GDP 主义”，并由此形成一整套唯 GDP 增长导向的经济、政治的政策组合。

吴敬琏先生在《经济增长模式和技术进步》一文中就曾指出，政府对重要资源的垄断与配置权力，自上而下地以 GDP 增长作为干部业绩的主要考核标准，中央地方分税制的推行，以及政府可以通过行政办法干预生产要素价格，决定了各级地方官员有一个自发的倾向，用大量的投资和资源来支持那些价格高、产值大、税收多的生产。

唯 GDP 是从，带来了政府行为的扭曲，只要于 GDP 增长有益的，无论

经济如此 , 你要早作打算

是资源的浪费也好，生态环境的破坏也好，通通可以忽略。高增长变成数字追逐游戏，往数字里注水也屡见不鲜，GDP 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水货”。有的地方，经济增长甚至异化为公然的浪费，完全无助于民生的改善。

作为经济发展的综合衡量标准，GDP 自有一些缺陷，“并没有考虑到我们孩子的健康、他们的教育质量，或者他们游戏的快乐。它也没有包括我们的诗歌之美或者婚姻的稳定，没有包括我们关于公共问题争论的智慧或者我们公务员的廉正……”^①，但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未能找到一个可以代替 GDP 的指标，全世界也仅有一个山地小国——不丹放弃了 GDP 指标。

经济发展追求 GDP 增长没错，但如果转而异化为“唯 GDP 主义”，那就有了问题。正如我们评价美女，三围的大小固然重要，但如果片面追求数字的大小，而不追求比例，追求协调，那就失之谬也。王小波曾讲了一个有关玛丽莲·梦露三围的故事，梦小姐的三围尺寸是 34、24、34（英寸），有个美国老妇人看了有点不爽，就照这个数字弄了个内衣寄给她，只是将顺序变为 24、34、34。三围还是三围，数字也还是那些个数字，但如果有人以为此三围就是彼三围，也是我们追求的审美情趣，那就很让人倒胃口了。

我们 GDP 的异化，差可比乎？当然，为了变成 34、24、34，注射点硅胶而不是水我们不反对，因为那是技术活，技术推动经济发展嘛。

● 倾斜的天平

事实上，威权模式下的“唯 GDP”增长路径，注定了经济发展的必然失衡，失衡到一定程度，发展也将不可持续。失衡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所以说失衡，那是因为目前支撑 GDP 的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部分出现了比例失调，投资挤占了太多消费的领地，而出口所占比例这些年也越来越大。

^① 罗伯特·肯尼迪在 1968 年竞选总统时批判 GDP 的言论。

如果说，GDP 增长的目的就是为了再投资，而不是消费，那目前的比例大约还算合适，可是，我们 GDP 增长的目的就是这个吗？当然不是。

投资作为各级政府拉动 GDP 增长的法宝，在 GDP 总量中的比例一直稳步提高，1980 年该比例仅为 35%，到 2008 年就提高到了 43%，2009 年为应付世界性的金融危机，我国更是推出了 4 万亿元的投资计划，将这一比例进一步提高到了 47.7%。

1978—2009 年投资与消费占 GDP 的比率变化情况，如图 3-3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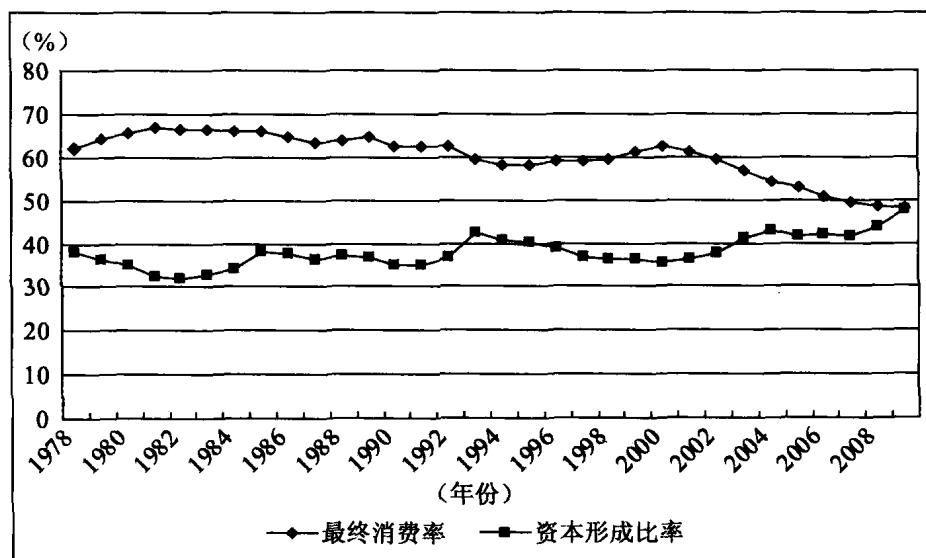


图 3-3 1978—2009 年投资与消费占 GDP 的比率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资料整理。

大量的投资追逐 GDP，带来了投资回报的递减。国家发改委原主任马凯在 2006 年就曾提到，近几年我们的增量资本产出率，也就是投资效率大幅下降，西方发达国家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投资效率大概是 1~2，就是说，GDP 增长 1，需要投资 2。而我们的 GDP 增长 1，需要的投资则是 5。

马克思对于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早就有了精辟的分析，他认为这种增

经济如此 ，你要早作打算

长模式一定会带来严重恶果：一个是平均利润率降低；另一个就是会引起工人阶级贫困化，工人大量失业，工资在 GDP 中的比重越来越小。所幸，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用实际行动验证了他老人家的不朽论断。

从 1978 年到 2009 年，我国家庭私人消费占 GDP 的比重就不断下降，由 49% 下降到 37%。

如果这个数字看起来还不使人吃惊，那是因为缺乏比较。在亚洲的主要经济体中，我国家庭私人消费占 GDP 的比例从 1999 年起就一直是垫底的，不但低于日本的 56%，甚至也大幅低于印度的 59%。而美国家庭私人消费占比一直稳定在 70% 左右。

出口拉动经济发展，一定程度上是我们向东亚模式学习的结果，但也是投资驱动支撑经济发展的必然。投资上去了，国内又消费不了，多余的生产能力往哪里转移呢？出口成了重要途径。之所以说是重要而不是唯一途径，是因为投资可以自我强化，也就是为投资而进行投资——为消化已有投资，进行新的投资，而新的投资又为已有的投资创造条件，如此循环往复。

为投资而投资是投资驱动经济发展模式的最高境界，很少有国家敢走到这一步。当然，严肃的经济学家不是这样看问题的，在他们看来，已有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被新投资消耗的部分，应该算做国内消费。

近年来，中国的出口遇到了越来越大的阻力，贸易环境全面恶化。从 1995 年开始，中国就已成为遭遇反倾销的“世界冠军”，目前全球 35% 的反倾销和超过 70% 的反补贴调查针对的都是中国出口产品。

什么反倾销反补贴，那都是老外们找的托词，说来令人生气。我们的产品，不远万里，来到贵国，低价出卖，自己在国内，反要提高价格，你们还不乐意，还要向国际贸易组织控告我们，说我们损害你们行业的发展，真是岂有此理！如果你们来到中国，看到我们为了抢点促销产品，三更半夜爬起来数星星，还将商场都挤塌，你们就应该明白中国人民的精神，你



们应该感激才对。

可是老外们不。

为此，我们也得理解。

金融危机以后，他们的国家和个人大多陷于公共和私人债务困境，一时半会儿拔不出来，没多少钱，需求不振，就算我们再借钱让他们来买我们的低价产品，他们似乎也有点不好意思了，更何况我们还很担心以前借给他们的钱会不会出问题，温家宝同志曾说：“我们把巨额资金借给美国，当然关心我们资产的安全，因而我想通过你再次重申要求美国保持信用，信守承诺，保证中国资产的安全。”^①

投资、消费、出口三者的失衡，导致了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如资源错配，大量流向无效率的垄断企业，民企生存维艰；信贷过快增长，资产泡沫严重；环境污染加剧，生态恶化；外贸依存度过高，国家经济安全遭到威胁；公共服务异化，教育医疗沦为对民生的褻渎；社会保障体系弱化，个体被动进行昂贵的自我保障；城市化异化为房地产开发，进而成为掠夺居民财富的工具；寻租盛行，腐败严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蜕化为“权贵资本主义”^②。

因为中国经济的失衡，中国变成“世界工厂”。中国生产，国外消费，中国赚到外汇，变戏法般又成为西方国债，为的是这个循环可以走下去。如果说，贫穷是一种生活方式，那劳动本身又何尝不是呢？

我们可真是觉悟高，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在践行共产主义阶段的“劳动成为生活的第一需求”，整日奔波于吱嘎作响的“世界工厂”里，不论价格多高都埋头买进国外的石油、矿产，满头大汗加工后又埋头赶紧倒腾出去，为的就是赚取菲薄的加工费以便它可以变成美国国债、日本国债、欧洲国债。我们虽然有点累，但每当擦汗时想到日渐堆高的外汇储备，心

① 2009年3月13日温家宝总理答中外记者问。

② 吴敬琏，警惕“权贵资本主义”[J]，党政干部文摘，2001年第4期。

经济如此 , 你要早作打算

里都会偷着乐，很有成就感。

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成为世界上第一富裕的美国的最大债主，不知道这应该算是一种骄傲，抑或是一种悲哀！难道我们赚点钱除了借给别人，就不能做点别的？

第三节 “国富民强”的玄机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国内的一些宣传机构就开始嚷嚷“国富民强”，弄得国外的观察家们都有些紧张，猜测中国是不是要结束“韬光养晦”，不然大张旗鼓宣传“民强”干什么，是要显示肌肉、抡起胳膊干仗吗？没办法，我们只好出来解释，中国追求的是“和平崛起”，最多也就是从以前的“群居游处，未尝有言”变为“群居游处，我要发言”。

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以前和大家在一起，我是不大说话的，在联合国里也经常投弃权票，现在不了，我要说话，有时不高兴了还要说“不”^①，你们呢，也得耐心听听。这样一解释，老外们那边就算是蒙过去了。

蒙过老外容易，但国内一段时间就对“国富民强”着了迷，甚嚣尘上地宣扬国家富裕了人民就会变强。笔者不得不承认，自己在这一点上很笨，很长时间未能想通这两者之间的必然联系。如果是说国家富裕了人民有肉吃身体就会变强变壮，这我们倒部分同意——当然也可能变虚变胖，但“吃肉长肉”这么一个肤浅的生物常识问题，如此大张旗鼓地宣传，在当时的我们看来没必要。

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宣传“吃肉长肉”有着深刻的背景和长远的考虑，是很高明的一招棋——国家要富裕你能不让？如果你胆敢跳出来公然反对，

^① 1996年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中国可以说不》，2009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升级版《中国不高兴》，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情绪。



那就脱不了卖国贼嫌疑，最起码也已经自证不再爱这个国家了。一个不爱国、有卖国嫌疑的人是没有话语权的。“国富民强”的提法为后来的“国进民退”，为每年国家财政收入增长比例远超居民收入增长水平和 GDP 增长速度打下了不错的理论基础。

只是，恕笔者直言，这个理论有点蹩脚。虽然有学者考证出“国富民强”典自东汉赵晔所著《吴越春秋·勾践归国外传》中“民富国强，众安道泰”，想以此证明“国富民强”这个概念源自祖宗，是古董，但我们要说，这是怪物，连赝品都谈不上。

❶ 国富与民强

不可否认，中国已变得富裕了，并正在变得越来越富，不仅 GDP 大幅增长，财政收入更是连续超常规增加。从 1991 年到 2010 年，中国财政收入从 2937 亿元增加到 83080 亿元，增长了 27 倍；但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却仅从 1510 元增长到 19109 元，增长了 11 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686 元增长到 5919 元，增长不到 8 倍。

从 1996 年开始，我国居民收入增长明显落后于财政收入增长，多数时候也落后于 GDP 增速，居民并未从经济增长中得到相应的实惠。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后，在国富民强的嚷嚷声中，经济金融政策进一步向国有企业大幅倾斜，向投资倾斜，居民收入占 GDP 的比重呈现出快速下降的趋势。收入下降，消费自然无力支撑。在过去的 30 多年里，消费在 GDP 中的比例逐渐下降，尤其自 2000 年开始，下降的趋势非常明显。如图 3-4 所示。

在消费中，政府消费又逐渐挤占居民消费。从 1989 年开始，政府消费在总消费中的比例逐渐上升，从 20% 左右快速上升到 2007 年的近 28%，此后一直在 30% 左右盘旋。此涨彼消，居民消费只好被委屈了，从 1996 年的接近 46% 下降到 2008 年的 35% 左右。如图 3-5 和图 3-6 所示。

经济如此  , 你要早作打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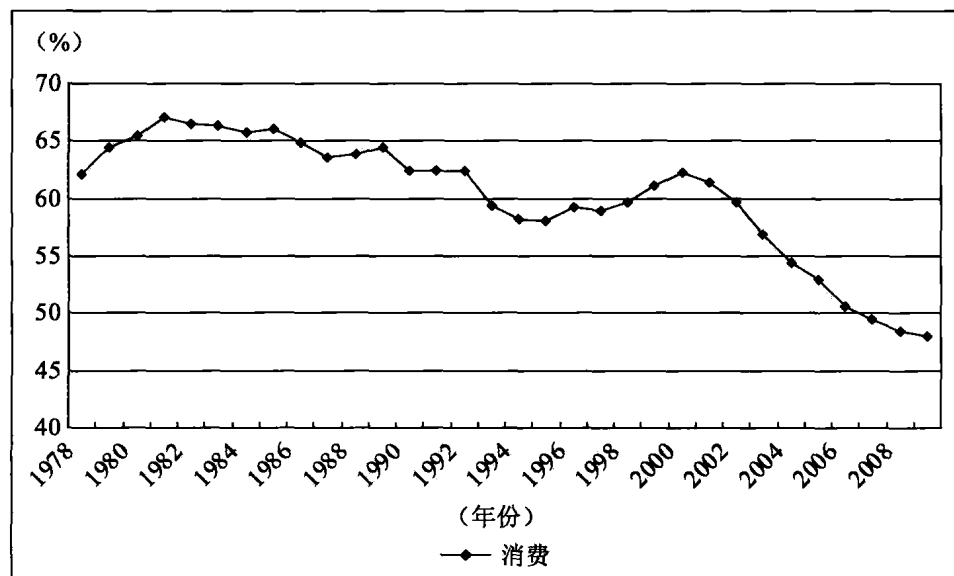


图 3-4 1978—2009 年我国消费占 GDP 比例的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资料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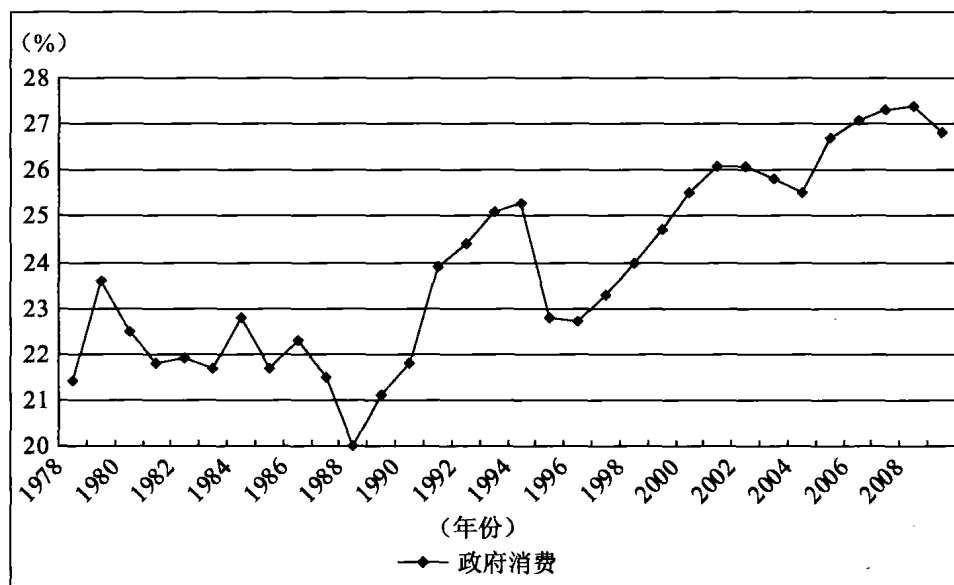


图 3-5 1978—2009 年政府消费占总消费的比例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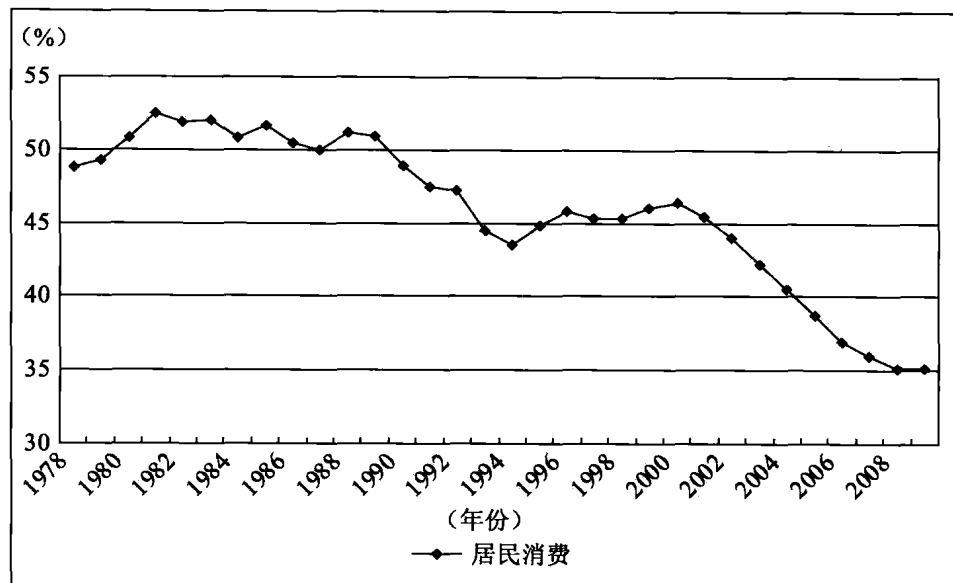


图 3-6 1978—2009 年我国居民消费占 GDP 的比例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资料整理。

根据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的研究，中国家庭私人消费始终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政府从国内生产总值中取走的那一块始终大于世界平均水平。从相对比例来讲，中国的“国富”即使在世界的强势政权格局里（原社会主义国家）也属于最强势的一档，而“民穷”即使在强势政权格局里也属于最弱的一档。

从“国富”这部电梯里走出来的不是“民强”这个美人，而是居民相对贫穷这个蔫皮皱脸的老太太。这不奇怪，怪只怪那个进城的农民兄弟见识太少，他其实不知道，“电梯”里也会走出“贪官”和款爷，只是这些人都从“贵宾通道”跑了。

● 分配功能的异化

现代财政政策的核心本应是政府通过税收以及用于消费和投资的公共开支促进公共福利。很不幸的是，我国财政分配一度演变成“威权主义”

经济如此动荡，你要早作打算

下的资源逆市场化权力配置。在这种局面下，财政政策就变得有些羞答答，说的话就像格林斯潘说的，是“神话”，得去猜。

当说要紧缩时，其实很可能是实施中性政策；当说要宽松时，那指不定又要加税；当说要采取中性政策时，这你也别信，那极可能就是左右摇摆。目的就一个，把人搞晕，以便于税收的快速增加，为财政投资和行政支出的膨胀打下基础，至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问题由“发展”自己去解决。

税收多了，国家富裕，我们自己倒没什么，只是外国人先“痛苦”起来了。美国《福布斯》杂志发布的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中国近几年连续居于世界前五名，2009年、2010年连续蝉联全球第二，仅次于排名第一的法国。而享受的福利仅占税收的8%。对于美国人的“痛苦”，有关部门是不以为然的，并宣称目前中国政府的税收收入无法满足公共支出需求，还有必要提高宏观税负。^①

之所以不以为然，是因为没有“痛苦”，有的是钱。

1978—2009年政府消费支出的情况，如图3-7所示。

我国财政开支中，行政管理费用从1978年的4.71%一路猛增到2006年的18.7%，增长幅度远超同期GDP涨幅。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多在5%左右，如日本只有不到3%，英国4%，韩国5%，印度6%左右，最高的美国也不到10%。相比之下，他们是落伍了。

1978—2006年我国行政管理占预算内财政支出的比例变化情况，如图3-8所示。

行政开支上升，我们理解。房地产开发商要拆我们的房子、要征用我们的土地，我们一时又领悟不了地方发展经济的苦心，不乐意配合。还有一些事儿，比如“奶粉里加三聚氰胺”^②、土地重金属超标等，我们偶尔也

① 赵鹏：国税总局驳斥税负痛苦指数排名[N]，京华时报，2010年10月3日。

② 2008年9月，河北三鹿奶粉加三聚氰胺的事件被曝光，中国乳业经历了一次严重的信任危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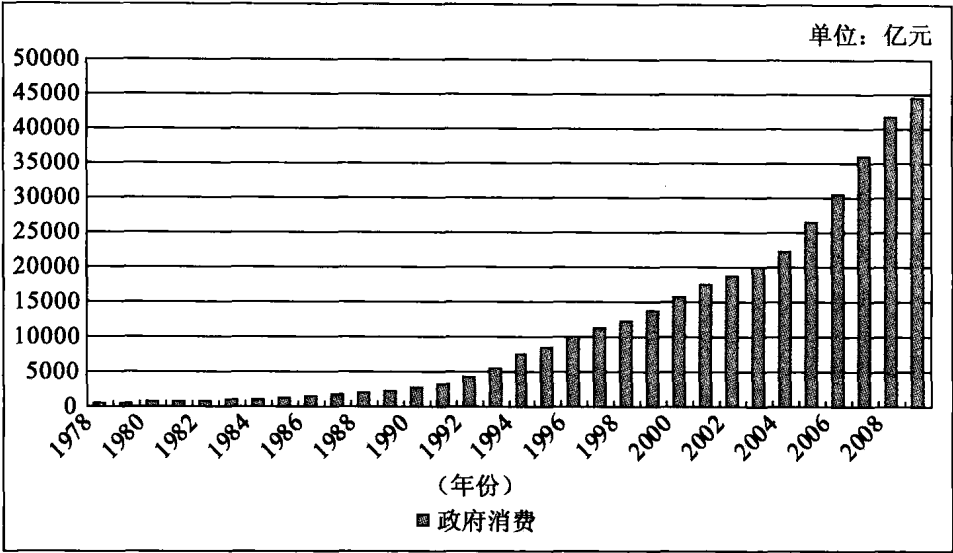


图 3-7 1978—2009 年政府消费支出的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资料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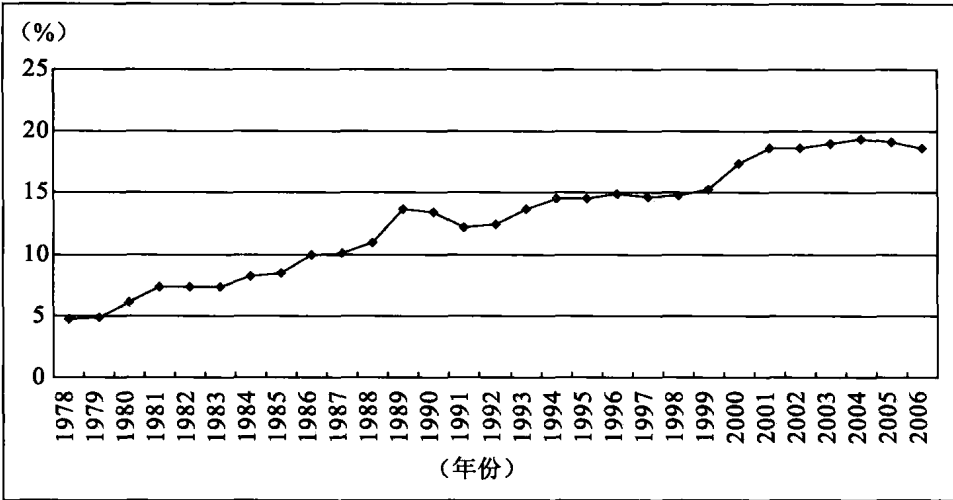


图 3-8 1978—2006 年我国行政管理占预算内财政支出的比例变化

资料来源：国家财政年鉴 2007。

会生气，可能因此还会去上级领导那里坐坐，成为“不稳定因素”，而“稳定是压倒一切的”，这就给地方政府添了麻烦，政府得增加人手来“稳

经济如此 ，你要早作打算

住”我们，有时还得给我们提供免费吃住，“维稳”费用因此提高。此外，为了“养廉”，政府工作人员的工资、福利这些也都该上去，再加上吃财政饭的多了，不增加开支也实在不行。

有好事者为此做了一些考据工作，发现我们现在“官民比”达到1:26，比西汉时高出306倍，比清末高出35倍，比改革初期1:67的比例也冒出不少。^①对于这一点，很多人觉得是一种效率缺失，但我想是否可以从另一方面理解呢？

古人云“学而优则仕”，做官吃皇粮那是需要知识的，古代生产力水平低，教育未普及，“学”者少，“优”者更少，出“仕”者自然尤其少。改革开放后，教育大发展，消灭文盲不说，单是2009年科取的“举人”、“进士”^②数量就分别为449042人和61911人^③，而明清两朝534年时间，才录取进士51744人，其中明代24898人，清代26846人。

也就是说，两朝500多年科取的“进士”比我们现在一年还少1万多。古代是进士可以吃皇粮的，我们现在吃皇粮的多点也算正常。但，如果读书唯一的结果就是增加行政开支，这样的书其实不读也罢。

以上说了这么多行政开支，也尝试进行了解释，但好像都是表象，缺点经济学的高雅理论。没有理论的东西是苍白的。上帝看我们人类，表面上大家都是行尸走肉，但有些人在“行”或“走”时其实在思考为何要“行”，为何要“走”，怎么“行”，怎么“走”，如果不“行”不“走”会怎么样等问题。看见这些人在思考，上帝就会发出笑声以示嘉奖，而对于那些什么都不考虑只管匆匆“行”和“走”的人，上帝是弃掷不管的。行政开支大增，我们需要理论支持。

① 我国官民比攀升之快史无前例 [N]. 新快报, 2005年3月6日.

② 典出鄙人某老师。记得当年考上某校硕士研究生，面试后，某老师就对我说：“恭喜你中举了。”我考上硕士算是“中举”的话，那博士应该就是点了“进士”，至于博士后，当然就是“翰林老爷”了。

③ 数字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相关信息。



德国阿道夫·瓦格纳先生提出了一个“瓦格纳法则”，讲的就是当国民收入增长时，财政支出会以更大比例增长，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政府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将会提高。看来我国这些年行政开支快速增长真是很有道理，连 19 世纪的外国人都这么认为。

只是所谓的“瓦格纳法则”是瓦先生基于 19 世纪欧美国家历史数据作出的一个考察，而非严格意义上的逻辑推理和统计，后来的事实证明它并不具有“普世价值”，它也不能解释为何我国目前的支出比均高于欧美国家，不能不说是一个小小的遗憾。

但，我们似乎应该也有可以感到“痛苦”的理由。1978—2006 年，我国人均负担的行政支出费用增长了 23.1 倍，而同期全国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长了 5.7 倍，如果考虑到大量的预算外行政费用的存在，悬殊将更为可观。^① 财政除了吃饭，还得投资，其他方面的支出自然就不多了。

2009 年，用于医疗、教育、社保、就业的支出能占到财政支出的 14.9%，也还算不错。到 2010 年，我们更提高到 17.9%^②，应该感到越来越幸福。但我们千万别和别人比，美国在这些项目上的开支相当于联邦政府总开支的 60% 以上，而德国、挪威则更高。

合理分配功能的缺失，导致贫富悬殊日益扩大，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数自 20 世纪 90 年代后就不断扩大，到 2010 年，城市人口中每人每年平均只有约 7500 ~ 8500 元收入的贫困人口已超过 5000 万人^③，农村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按照联合国标准更是高达 1.5 亿人。

我们的生活虽然好了，但负担也重了：小孩上学得交择校费；读大学得交不菲的学费；生病了走到医院里腿都打战，生怕医生邀请住院；开车出门吧，只要稍远一点，就有执法大队什么的上来帮你数屁股兜里的钞票；

① 胡联合，何胜红，我国行政成本演变态势的实证研究（1978—2006）[J]. 公共行政评论，2009 年第 5 期。

② 根据国家统计局有关资料计算而得。

③ 引用 2011 年 8 月中国社科院《中国城市发展报告 No. 4》中的数据。

经济如此 , 你要早作打算

还得买房,你看现在房子多贵呀,哪里买得起,但没办法呀,全家老少几代人一起就是清空积蓄借钱也得买呀,不然儿子只好裸婚,裸多不好看呀,弄得老子现在都不敢失业了。

❁ 隐性收入与灰色收入

灰色收入是民间用语,主要指在“制度外”实现的收入。本来这个词也很可能成为官话,但最终没有。灰色收入不入官方法眼,不是因为不重要,而是因为这个概念不好界定。

法治国家,按理只存在合法收入、非法收入,走中间道路是不行的,就像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某些民主人士所幻想的国共合作这条中间道路注定不行一样。所以我们最后将政府工作报告里原来的“坚决打击取缔非法收入,规范灰色收入”,修定为“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这是正确的。

因为没成为官方语言,所以国内对于灰色收入的研究甚少,目前影响比较大的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王小鲁的相关研究。在他看来,隐性收入是指居民收入统计没有反映出来的收入,灰色收入则是“无法明确界定、不能清楚地判断其合法或非法的收入”。^① 2005年,全国居民收入中有4.8万亿元隐性收入,而这其中大部分属于灰色收入。^② 到2008年,隐性收入9.3万亿元,灰色收入5.4万亿元。^③

2008年,我国财政收入6.1万亿元,而全国居民隐性收入达到9.3万亿元,相当于新增1.5个财政部。平均到每个人头上,全国人民人均年隐性收入6600多元。

看到自己被新增了这么多收入,你可能会又高兴又忧愁,高兴的是可

① 王小鲁. 灰色收入与居民收入差距 [J]. 中信出版社比较杂志, 第54辑.

② 王小鲁. 灰色收入与居民收入差距 [J]. 中信出版社比较杂志, 第48辑.

③ 同①.



以再出去多喝二两，忧愁的是这么多钱该藏到哪里好。你且别高兴得太早，王先生还有一个结论：隐性收入和灰色收入的 80% 以上都集中在占城镇家庭 20% 的高收入居民上，也就是说，你得衡量一下你有没有资格“灰色”，能不能“隐性”。

灰色收入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公共资金的漏失。

财政资金通过各个环节下发到地方，大部分不纳入地方预算，存在漏失和滥用；公共工程投资领域的“豆腐渣工程”，贪污腐败，不用说你也理解；地方政府和公共服务部门的预算外收费、罚款，那是某些行政部门自己创收的结果，自己弄的，哥几个分点、拿点已是正常；管理社保的，得负点责，搞搞委托贷款，腾挪几下。

第二，金融腐败。

从银行里搞钱，一直以来都是我们的梦想。为此，送点礼，给个回扣什么的那都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第三，行政权力与腐败。

有权了，有些人自然得寻点租子，搞搞腐败。

第四，土地收益流失。

中国历来是重视农业的社会，土地就是命根子，征用和出让土地寻租有着悠久的传统。

第五，垄断性行业收入。

“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 2~3 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 5~10 倍之间。”^①

^①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步正发在 2006 年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J]. 中国经济周刊, 2006 年第 5 期.

经济如此 ，你要早作打算

● 高发的腐败

隐性收入也好，灰色收入也好，具体数字，有争论，官方自是不同意，民间也有意见认为不对，但正是由于隐性的缘故，目前谁也说不清这些收入究竟有多少，但都不否认它的存在。作为个体，我们能看见的就是官员前赴后继地腐败，且腐败金额越来越大。

在世界银行公布的全球廉洁指数中，1996—2008 年，中国始终处于负数水平，低于世界平均廉洁水平，和周边几个国家和地区相比，我们的廉洁指数最低，腐败程度最高。如表 3-2 所示。

表 3-2 各个国家和地区廉洁程度的比较

年份	中国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新加坡		韩国		日本	
	Rank	Score	Rank	Score	Rank	Score	Rank	Score	Rank	Score	Rank	Score
1996	54	-0.08	90	1.484	79	0.711	98	2.231	71	0.434	85	1.139
1998	45	-0.31	86	1.162	80	0.857	98	2.189	64	0.212	86	1.306
2000	48	-0.22	85	1.12	82	0.903	98	2.184	63	0.272	87	1.306
2002	43	-0.41	90	1.385	77	0.78	100	2.372	70	0.465	83	0.992
2004	34	-0.58	92	1.574	80	0.844	98	2.31	66	0.379	85	1.161
2006	37	-0.53	93	1.766	73	0.667	98	2.19	68	0.393	90	1.339
2008	41	-0.44	94	1.875	73	0.55	100	2.345	70	0.448	86	1.246

Rank 值越高，腐败越低；Score 值从 -2.5 ~ 2.5，值越低，腐败越高。

另一个国际性研究机构国际透明组织对于我国同时段的研究也表明，我国始终处于全球最不廉洁的三分之一国家行列，和周边国家和地区相比，廉洁指数也是最低的，比如，2008 年，中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廉洁指数排世界第 72 名，而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日本分别居第 4、12、39、40、18 位。



近二十年来，虽然我们的党和政府对腐败已经高度重视，甚至将腐败提到要亡党亡国的高度，但遗憾的是，腐败分子不怕虚声恫吓，中国腐败的广度、深度、高度不仅未得到抑制，反而有了不小的发展。

腐败无孔不入，已成为全社会的普遍现象，号称“象牙之塔”的高校也已成为历史，象牙变“腐”、教授变“黄”已属旧闻。腐败案件的多发早已侵蚀掉观众的好奇心，人们现在关心的不是谁又腐败了，因为人们已经知道“就是我坐上去也得腐败”，而关心的是腐败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快乐，腐败的同时又腐坏了多少美女或帅哥，并会对几千上亿的数字发出赞美的叹息。

至于腐败分子是地市级还是省部级，小民一般不大关心，近来查处的腐败分子级别越来越高，那只能说明中央反腐的决心很大，但同时也说明我们腐败的档次提高了。

腐败发展速度如此之快，不是我党反腐不积极，也不是我们天生都要做腐败分子，而是因为我国存在腐败的体制基础。正如温家宝总理多次指出，“腐败现象在一些领域易发多发，重要原因在于制度不完善、体制机制有漏洞”。

一个政党，一个政府，如果拥有几乎无限的权力，不受外部限制、不受外部监督，走向腐败那几乎是一种必然。而腐败大量发生后，如果反腐体制不透明，反腐成为内部制约而不是外部强加的力量，那腐败的屡禁不止也完全可以预见。

腐败在任何社会、任何国家、任何制度下都会产生，关键在于腐败大量出现后现行体制多大程度上可以自我纠偏，现存的权力架构、职位安排多大程度可以被否定。

对照我们周边同文同种地区或国家的反腐手段、工具、渠道、机制，我们就应该很清楚地知道，一个政党、一届政府内部自我制约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外部对权力的制约和有效的监督，以及民间广泛的参与。腐

经济如此动荡，你要早作打算

败可能不是一个政党、一届政府的事情，但反腐绝对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大事。

● 贫富悬殊如云泥

公权的垄断与腐败、城乡的割裂、良好财富分配体制的缺失，使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

近十年来，我国地区、城乡、行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明显加大，当前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 3.3:1，行业之间工资差距高达 15 倍左右；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拉大，国有企业高管与普通职员平均工资相差 128 倍。

美国 5% 的人口占有全国 60% 的财富，中国则是 1% 的家庭占有了全国财富的 41%^①，甚至有人更恶毒，宣称中国 0.4% 的人口掌握了 70% 的财富^②，一时引起轩然大波。

根据世界银行 2010 年发表的报告，中国财富集中度远远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欧洲和日本的基尼系数在 0.24 ~ 0.36 之间，而我国则从改革之初的 0.28，上升到 2009 年骇人的 0.47，而且上升势头还在持续。0.47 还不是高点，因为有不同看法，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课题组在 2006 年所做的调查显示，2005 年全国收入基尼系数已经非常接近 0.5 的水平，经过几年发展，超过 0.5 已不是悬念，而全球基尼系数在 0.5 以上的国家只有 20 多个。

1980—2008 年亚洲国家基尼系数对比情况如表 3-3 所示。

① 夏业良：中国财富集中度超美国 [J]. 财经周刊，2010 年第 8 期。

② 数据来源于 2009 年 6 月 19 日的《人民政协报》。

表 3-3 基尼系数比较表①

年份 \ 国家	中国	日本	韩国	新加坡
1980	0.295	0.276	0.376	0.412
1985	0.285	0.32	0.345	0.46
1990	0.348	0.35		0.448
1995	0.371	0.316	0.332	0.443
2000	0.39			0.467
2004	0.469		0.316	
2008	0.469	0.249	0.316	0.425

注：0 表示绝对平均，1 表示绝对不平等。

按照国际通常标准，基尼系数在 0.3 以下为最佳状态，在 0.3~0.4 之间为正常状态，超过 0.4 为警戒状态，达到 0.5 则处于贫富极其悬殊的危险状态。对于我国超高的基尼系数，一些人“自慰”说，我国居民生活于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中，很难体会到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因此基尼系数仍处于合理区间。

对此，我们只好引用《红楼梦》中尤三姐骂贾珍贾琏哥俩无耻的话：“你不用和我花马吊嘴的，清水下杂面你吃我看见，提着影戏人子上场——好歹别戳破这层纸儿。你别油蒙了心，打量我们不知道你府上的事，这会子花了几个臭钱，你们哥儿俩拿着我们姐儿两个权当粉头来取乐儿，你们就打错算盘了！”

● 夹板中的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这个概念是舶来品。1951 年，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在《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一书中首次提出中产阶级的概念。在他

① 丁学良．辩论“中国模式”[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179．

经济如此 , 你要早作打算

看来，要成为一个中产阶级，不仅需要有知识有技术，不从事直接生产性工作，收入稳定而丰厚，思想还得保守，生活也要单调，情趣要高雅。

改革开放后，这个概念引入了中国，引起不小的争论，有的甚至认为中国只有“中产”，没有“阶级”，一时莫衷一是。不过还是有人认为成为中国的中产阶级需要十大条件：

- (1) 年收入 20 万元以上；
- (2) 持有已经上市的股票或期权，至少是有希望近期内上市；
- (3) 有度假小屋或别墅以及一辆看上去不错的车，跟人合买的也算；
- (4) 有丰富的夜生活，但打麻将或去夜总会的不算，得是去商务谈判或听音乐会；
- (5) 有外国身份或至少在外国待过三年以上；
- (6) 对一些时髦的东西，如 iPhone 或彩信没有兴趣，但对于古老文化非常感兴趣，对各个国家的古文明有一定了解，还要有古玩方面的知识；
- (7) 知道各种礼仪，风格是美式的，但心里崇拜欧洲；
- (8) 知道最新上演的歌剧和芭蕾舞剧；
- (9) 谈话中经常夹杂外语单词，听众不懂再用中文解释；
- (10) 着装随便，但不是普通的随便，而是一种非常刻意的随便。

这样的条件太苛刻了，这是要消灭我国才刚要兴起的中产阶级，居心有点叵测。

争来争去，大家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最后达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情趣可以不要，得有点产业，有点收入，看得懂赵本山的小品，懂得调情但不要成天想着调情。这样说，有人还嫌麻烦，于是干脆变为按照收入来区分，只要收入达到社会中等水平且没进过将来也不会进“局子”的就算中产。

这样一来，事情就简单化了。



2008 年，中国社科院发布报告称，中国中等收入阶层呈现加速成长的态势，1999 年中等收入阶层比重为 15%，2003 年达到 19%，预计到 2020 年，有望达到 40% 左右。

简单是简单了，但如果仅仅是按照这个精简的标准，中国严格地说那就是只有“中产”，而没有“阶级”，要成为社会的“稳定器”，还远没有这个资格和力量。作为一个“阶级”，最基本的是必须具有大致相同的价值观。

要成为社会的“稳定器”，最基本的是要认同社会的主流价值，思想温和，不会成天幻想要去“革”某人的“命”。至于收入，一定意义上不再重要，但你的收入中至少可以留出 1/3 自由支配，而不是全部交给老婆或房地产商，这样你才会有闲暇读点书、听听演唱会，偶尔还可以出去旅游。

收入不上不下，重视家庭和传统，生活安逸且还有希望更安逸，不喜欢革命而喜欢改良，这种人放到哪里都应该是广受欢迎的。但近来这些人在中国的日子却似乎有点烦，而且可能会越来越烦。

收入增加跟不上物价腾涨的速度，房价飞一般上扬似乎永无尽头，北京、上海、广州等地一套公寓售价已是中产阶级年收入的几十倍，中产阶级已是“技术性破产”。

小孩读书，半个家庭的收入化为泡影；生大病一次，一个家庭破产；失业半年，一个家庭基本破碎；大学生本应成为中产阶级的预备军，却毕业即失业，而被列为可能沦为新底层的首选；平等机会缺失，底层向上流动日益困难，中产阶级至此成为无本之源。

● 走向民富国强

“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论语》

经济如此 , 你要早作打算

“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

——管仲

“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藏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余。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礼节用之，余若丘山，不时焚烧，无所藏之。夫君子奚患乎无余？”

——《荀子·富国篇》

“田野荒而仓廩实，百姓虚而府库满，夫是之国蹶。”

——荀子

上面引用了一些名人名言，不是要给读者补课，而是希望以此说明，民富才能国强的理念很早就是我们治国的理想。我们之所以会走到“国强民强”的状态，那是“误入藕花深处”。

我们不反对“先国强，再民富”。在近代的一百年时间里，因为积弱积贫，我们被别人欺负得够呛，只是因为中华民族固有的韧性，我们才终于在1949年缓过气来，并自豪地向世界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倾所有国力短时间之内建立了较为完整的重工业体系，打下了“国强”的基础，有了原子弹、氢弹，也有了运载火箭，还把人造卫星送上了天。自此，就没人再敢主动上门来欺负我们了。为了这些发展，我们先生产后生活，就是忙时也吃稀，大家心里还是高兴的。

改革开放后，为更快地发展经济，追上先进国家的发展步伐，我们一段时间里采取效率优先的策略，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公平公正，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发展经济的终极目的是使老百姓生活得更从容、更幸福、更有尊严，我们因此需要回归本源，将“国强民富”的顺序换一下，改为“民富国强”。这是我们党执政为民理念的具体体现，是践行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幸运的是，“十二五”规划已将“民富”置于“国强”之前。

第四节 脆弱而孤独的大国

借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中国仿佛一夜之间就崛起了，中外报刊一时大腕云集，热捧中国。

西班牙人说“中国模式是发展中国家的新样板”；澳大利亚人说“中国崛起取得了如此辉煌的胜利，以至于现在受到考验的不是北京的体制，而是我们的体制”；俄专家盛赞“中国模式是人类成就创造性集大成者”。^①

最搞笑的是美国，看见中国一夜之间崛起于东方，第二天醒来有点恍惚，觉得自己可能站在了“历史的错误一面”，吃完早餐后就开始反思，以为可能还是古希腊人说得对——历史是循环的，而不是他们一直以为的朝着美国这一个方向发展的，现在方向变了，朝着中国了，进而有些害怕。中国经济规模未来 10 年就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这还不算，如果“中国模式”出口，大家都这样子搞，那印度、巴西、俄罗斯说不定什么时候也一夜之间崛起，那时美国人将何以自处？如果真那样，那就跟英国学，将相对的衰落当做人生的一种冷幽默。

但我们要说，美国人，你多虑了，我们远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强大，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我们再诚实点，就应该说，我们之所以看起来还有点强大，那都是被你们的金融危机吓的，我们当时不明就里，生怕殃及池鱼，只好靠加大投资、疯狂放贷来稳住经济，而地方上和地产商这时也趁火打劫，忙着往自己碗里捞，弄得中央只好往锅里不断加水，其实我们就是换了件花马甲，你该还认得我们的。

● 踌躇于身份的认同

现任布鲁塞尔当代中国问题研究所所长的古斯塔夫·格拉茨在《中国

^① 盘点外媒关于“中国模式”的报道，新华网，2010 年 11 月 27 日。

经济如此 , 你要早作打算

刚刚萌芽的身份窘境》一文中指出，中国一方面认为自己是一个曾经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发展中国家，因此有权得到更多的体谅和支持；另一方面认为自己是一个新兴的大国，正在逐步重建古代王朝的荣耀，希望受到平等的对待和尊重。

然而，这是一种窘境。

作为发展中国家，当然有条件要求国际社会体谅和支持，但体谅和支持的前提是你不要再提什么平等和尊重，别人听着烦。作为一个大国，你有了平等和尊重，那你就该体谅别人，支持别人。平等和尊重从来都是实力的象征，也是义务和责任所在。

在我国 GDP 总量超越日本时，有人站出来警告日本别因此幻想削减对中国的援助，你对中国的援助那是对历史的补偿。言下之意，钱我还是要的，但有点不好意思了。因为眼里盯着钱，说话就有些不讲理，远赶不上以前我们虽然穷，但还可以硬气地对日本人说，“为了中日世代友好，我们放弃对你们的战争索赔”来得痛快。

放弃索赔，对不对，那是单说，但既然已经放弃，作为后来者就该认这个账，那才是做人的本分。至于日本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国家，怎样的一个民族，你睁大眼睛看清楚就行了。超过别人还向别人要援助，这其实就是自陷于困窘。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去争什么援助，而是要埋头做，以便今后日本向我们要援助时，懂得怎样礼貌地拒绝，实在拒绝不了，就从小人道主义的角度多少提供点。

作为新兴大国，别人因此期待我们承担更多的责任，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但说实话，我们对这方面的认知还有点茫然，准备得也不充分，两者之间有些不搭调。这一点在 2009 年的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大会上展现得淋漓尽致。

中国站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约定的发展中国家实行自愿减排，不受“三



可”（可报告、可检测、可核实）原则约束，但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却认为现在情况不同了，中国已是全球第一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应该可以接受可报告、可检测、可核实的原则，应该多做点事情。

虽然最后哥本哈根会议在我们看来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外国媒体却普遍对中国在会议上的表现有些微词，英国气候大臣甚至在《卫报》发表公开文章，指责中国“劫持”哥本哈根会议谈判。对此指责，我们的外交官当然予以了义正词严的反驳，毫不留情。

不可否认，中国已是一个大国。在哥本哈根会议上，甚至美国总统也为了避免会议僵局，不得不两次离开会议中心，到中国总理下榻的酒店登门拜访，第二次甚至还在门外等了半个小时，理由是中国总理正在和别人谈话。

这倒不是中国有意要怠慢美国总统，而是大概没想到他会两次不请自来，没想到在美国人看来中国就这么重要，而中国却认为自己还没重要到美国总统两次登门拜访的程度，两者之间的认知差距导致了中国外交上的“失礼”。

在我们自己看来，中国还不强大，人均国内总产值只有 4000 多美元，距离发达国家的标准还很远，国内还有 1.5 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按照联合国标准），脱贫的任务还非常艰巨，够忙乎好长一阵子的，在国际上只能承担相应的责任。

两者认知的差距导致了我们对自身身份的不确定性。“妾身未分明”，说话就会有些闪烁，行为上就会有些矛盾。虽然我们想做“一个负责任的全球性大国”，也正在朝这方面努力，但现实却有着很多的阻碍使我们进退两难。

国际上游戏规则制定权都掌握在西方人手中，有的我们不太认同，虽然目前还不得不尽量合着西方的音乐节拍跳舞，但内心总希望有一天舞场里会响起京韵大鼓，因此就难免跟错节奏，踩着西方美女的脚。

经济如此 ，你要早作打算

更麻烦的是，我们踩了西方美女的脚后，有时还不会道歉，因为我们知道用中文说了对方也听不懂，就只好笑笑，笑得多了，对方就以为我们是在“揩油”。

说我们想“揩油”，甚至说我们“傲慢”，那是误解，根本原因是我们还不会用别人的语言，按照别人的思维方式向其解释为什么会走神、会跟错节奏、会踩着她的脚。我们可以说不，但得以别人可以理解的方式，而不能一味地生硬。如果以为生硬就是强大的标志，以为国内的思维和价值取向就是所谓的“普世价值”，那就又落入了天朝帝国的窠臼。

有学者曾指出，日本很早就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按理说是一个大国了，但由于日本人成天板着脸，不会说话，要讨好别人时就只知道一个劲地鞠躬，所以外交上很被动，没办法，只好在1985年纽约的“广场”里签订“日元投降协定”，由此进入“失去的年代”。

这种研究，是严肃的也好，不严肃的也好，但结论还是有一定的启发性，那就是要让别人知道我们现在是怎么想的，今后会怎么样，按照国际上通行的说法就是要“透明”。

我们需要外界听见中国真实的声音，而不是手机里可以自由切换的假声。输出中国文化，不是单靠政府支持几个“孔子学院”就可以完成的，也不是几个歌唱家到国外大剧院吼几嗓子“主流”歌曲就可以的。我们需要民间广泛的参与，甚至也会需要某些“敌对势力”的噪声，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外界知道我们真实的情况。

● 脆弱的社会结构

经过30多年的经济发展，我国的社会结构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按照社会财富和权力资源进行的分层早已出现并正在不断强化。

社会主要群体，包括农民，工人，城乡无业、失业和半失业等群体，他们收入低，生活窘迫，抵御风险的能力十分脆弱，政治上几乎没有话语



权，对社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小。而作为现代社会“减振器”的社会保障体制远没有完善，无法从制度上给予这些人有尊严的生存权，很大部分弱势群体因此成为或自认即将沦为社会底层，成为“被社会排斥的人”。

根据社科院的调查显示，自 1997 年以来，我国城乡差距、城市低收入家庭的比例日益扩大，低收入、失业半失业、无业等社会弱小群体弱势化趋势越来越明显。

位居社会上层的精英分子，出于各自利益的考虑走向了联合，在大众诉求面前结盟。“学而优则仕”、“商而优则仕”、“官员博士化”、钱权相连的利益依存是他们结盟的具体表现。

精英结盟导致了垄断利益和以权谋私的大量出现，并形成了对社会资源和机会的垄断。为强化这种结盟，精英群体趋向于精英的自我再生产，上下流动渠道被堵塞。而精英因利益而结成的联盟在各自的利益面前缺乏足够的稳定性，他们对未来感到不确定，在大肆获取利益的同时，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大量移居国外，部分官员自己一时半会儿走不了，或者觉得待在国内还可以多捞一点的，就将妻子儿女连同财富先行转移出去，自己在国内“裸着”，一有风吹草动，马上可以溜之大吉。

据 2011 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报告显示，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党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以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人员高达 18000 多人，携带款项达 8000 亿元人民币。

近年来，中国个人境外资产增长迅速，2008—2010 年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 100%。与此同时，近年来中国向境外投资移民的人数出现快速增加的趋势，以美国为例，中国累计投资移民的人数最近 5 年的复合增长率达 73%。某些移民目的国甚至迫于移民人数不断增长的压力提高了投资门槛。

招商银行和贝恩管理顾问公司推出的《2011 年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指出，新富阶层中近 60% 的人士已经完成投资移民或有相关考虑；可投资资产规模在 1 亿元以上的企业主 27% 已完成投资移民，47% 正在考虑移民。

经济如此 , 你要早作打算

一个社会中，甚至连既得利益集团都事实上分崩离析，其脆弱性是显而易见的。

作为社会“稳定器”的中产阶级，在中国所占比例还很小，且面临被消灭的风险。在西方发达国家，中产阶级占总人口的比例一般在 80% 左右，新加坡更是高达 90%，就是印度也自认为中产阶级比例达到了 50% 以上。

而在中国，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发布的研究结果表明，2008 年中国中产阶层的规模占总人口的 22% ~ 23%，并以每年 1% 的速度增加，也就是说到 2013 年，乐观估计该比例也仅有 28%。而对于中国社科院的这个结论，由于缺乏较为一致的标准，很多人不以为然，以为自己“被中产”的可能性很大。

一个公正的社会结构至少应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平等进入，社会各阶层之间的互惠互利。而在目前的中国，这两个条件却难以实现。精英的自我再生产导致向上流动渠道堵塞，而让所有人都受益的“增量”改革时代已经结束，改革深入已需要某一部分人让渡既得利益，但由于权力垄断导致机会不公，这种让渡很可能变成对大众财富的再掠夺。

30 多年来，中国经济一直处于高增长状态，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受益者，只是多少不同，这也是在目前贫富极为悬殊的情况下社会能保持相对稳定的主要原因，但如果以为这种状况可以持续下去，那就是对现状的误读。

● 曾经的主流日益边缘

在一个明显分层、价值取向多元、贫富悬殊的社会里，要谈“主流”是一件颇有危险的事情。这种危险不仅是你走在路上就可能有莫名其妙的板砖砸过来，更可怕的是当你头破血流时，可能还不会赢得任何人的同情。

什么是主流？大家都搞不清楚。官方是主流？底层大众是主流？抑或是知识精英？似乎都对，但又都不对。你能说中央电视台宣传的不是主流？当然不能，但这个主流似乎又没能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可。2010 年隶属于



《人民日报》的《人民论坛》杂志“未来 10 年 10 大挑战”课题组调查后得出的结论有一个就是“主流价值观边缘化危机”。

既然自己都承认“边缘化”了，那就很难再说自己是主流。底层公众人数多，似乎该成为主流，但社会上却很难听见他们的声音。知识分子按理说应该是“社会的良心”，但社会明显分层却使他们很为难，不知道该站在哪一边，站在官方立场吧，似乎被“御用”了，缺乏独立之人格，站在底层吧，似乎又和自己的利益过不去，于是很多时候都“不知所云”。

一般以为搅乱我们思想的是外来文化，大门打开，外资来了，但“苍蝇”也“嗡嗡”地飞了进来，污染了环境。西方价值观异化了我们原来的理想，使我们从“高尚的人”、“纯粹的人”变成了“拜金主义者”，从一天到晚喝稀饭，像驴一样忙活的人变成了“物欲横流”的“享受主义者”，我们成为了物质的奴隶。如此的不堪，自然该受到“主流”的批判，但那些“主流”、“精英”似乎都高高在上，完全不知道我们怎么想的，只是一味地鼓噪，像留声机一样，我们怎么听都很别扭。

正是因为没有彼此认同的东西，大家就难免互相嚷嚷，嚷嚷久了，都觉得乱，都以为现在社会思想五花八门，物欲泛滥，缺乏理想，都不知道人怎么活着。“礼崩乐坏，狂狷有作，自己制则，而事不稽古”，世风日下。因此，人们觉得就更需要主流价值观了，以便社会出现困惑的时候，“主流”可以站出来处理分歧。

我们处在一个思想混乱的年代，但又是一个激情的年代，社会的种种情绪由于互联网的放大效应，发出了巨大的和声，身处这个环境，有时已很难分清主流与非主流，谁对谁错。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社会大众和精英阶层有了直接交锋的可能，在这种交锋中，虽然多数时候壁垒森严，彼此之间常常鸡同鸭讲，你宣传的我不信，我说的你又以为那只是社会的阴暗面，都代表不了主流。

互联网的出现，使底层有了表达自己对社会真实看法、发泄不满的阵

经济如此 , 你要早作打算

地，而由于技术进步，封锁或压制互联网消息成为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正是有了互联网的放大效应，底层真实的声音才可以上闻，社会的不公平才一定程度上得到重视并纠正。这是曾经“沉默的声音”^①。

在这种时候，壁垒森严的两大阵营有时候会变得扑朔迷离，昨天的敌人可能今天就转为盟友，而今天的盟友一夜之间又可能成为敌人。正是在这种相互的碰撞、排斥与融合中，我们的社会主流意识才可能渐渐成形。

精英集团和社会大众利用不同的舆论阵地，相互之间争夺舆论的主导权，期望自己的看法可以形成社会的主流价值，这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乱，是因为彼此之间一时找不到契合点，未能达成共识，社会大众的多元的价值观还只是一些“碎片”，无法得到官方的认可，而官方认可的，事实上又已经“边缘化”。

要成为主流，首先需要有代表性，其次要有导向性。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价值观深植于国家的传统文化之中，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外来文化的到来会使其受到一定冲击，并在相互的碰撞中吐故纳新。网络时代，全球化的文化流动极为频繁，顽固地坚守原有传统而拒绝变化的文化，不是消亡，便是被其他文化所替代。

文化的多元是好事，也应该是常态，不同文化间的借鉴可以促使文化的共生共荣。在主流价值观的形成过程中，如果我们一味坚持一种既定的标准，凡与这个尺度不合的，均被排斥，那么，“主流”的形成很可能遥遥无期，而“主流”的继续混乱也是不言自明的。

中国真正领先的创造性思想集中于先秦时代，秦汉“大一统”后“独尊儒术”，思想被阉割，人性被压制，中国历史成为一部以王侯将相为主角、“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改朝换代史。近代五四运动方重启民智，但时日很短，不久就陷入“主义之争”和闭关锁国之中了。

^① 党报呼吁倾听“沉默的声音”。人民网，2011年6月3日。

直到改革开放，我们才有机会渐渐融入世界潮流，重新接纳自由平等、公平正义、宪政民主、有限政府等价值观念。然而，所谓的“普世价值”在被我们知晓和接纳时，与曾经的“主流价值观”发生了很大的，甚至是不可调和的冲突。

符合基本人性与社会经济内在逻辑的价值理念具有普遍性和开放性。主流价值观，不是靠纸面上写出来的，也不是宣传机器唱出来的，它是社会大多数人根深蒂固的、发自内心的东西。只有社会的历史和实践，才是决定一种价值观命运的力量，在这点上，我们应该牢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

● 受制于人的外向型经济

中国走到外向型经济，有着自身的历史必然性。改革开放之前，长期的闭关锁国和国内动乱，导致中国民穷财尽，严重缺少经济发展所需资金。为摆脱困境，同时不给国内尚不稳定的局面带来大的干扰，中国开始在广东、福建利用地理位置的优势试办经济特区，实行特殊政策，没想到“开放”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于是推而广之。

事实上，由于内部环境的制约，1978 年以后，我国很长时间里实行的都是“开放优先”，希望通过与国际的接轨促进“对内改革”。接轨的努力使中国内部体制的改革和变迁获得了巨大的动力，但同时也使中国经济对外依赖性越来越强。1980—2008 年，我国外贸依存度由 12.6% 上升到 59.2%，最高年份甚至超过 70%^①。2008 年之后，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这个比例有所下降，但依然维持在 50% 以上。

在所有大国中，中国的外贸依存度是最高的，是以贸易立国的日本的一倍多。而一般以为，一国外贸依存度的高低与其国民经济规模是呈负相

^① 根据国家统计局有关资料计算而得。

经济如此 , 你要早作打算

关的。中国事实上已成为世界上唯一具有小国外贸依存度特征的经济大国。作为一个大陆型经济体，中国自身的优势并没有体现出来，每次外部发生危机，中国都要受到强烈的冲击，亚洲金融危机不例外，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危机也不例外。

作为一个大国经济体，如果贸易密度过高，必然带来一系列问题。

首先就是深刻制约国内的经济政策，对于外界的经济波动缺乏有效的抵抗手段。这一点在 2007 年的金融危机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当金融危机波及实体经济时，我国出口出现大幅下降，沿海工厂大批倒闭，并进而深刻影响到内陆的经济发展。为此，我们不得不再次祭出曾经屡试不爽的法宝——“加大投资”来对抗。而在此之前，中央政府已经认识到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局限性，因此提出要“加快转型”。

金融危机的到来“挟持”了我国的经济政策，4 万亿元的投资以及随之而来的 10 万亿元的信贷，彻底扭转了我国的转型轨道，使我们不得不走回老路。更麻烦的是，我们高估了金融危机对我们的影响，采取的措施过犹不及，不仅导致以房地产为首的资产泡沫越吹越大，也加大了国内经济滞胀的风险。

无法走向大陆型经济体的大国经济是脆弱的。如果经济发展结构或者模式不改变，政府无论怎样侧重于二次分配，都很难奏效，中国的贫富悬殊、社会矛盾也很难缓解。

我们用廉价劳动力生产的廉价商品，帮助西方有效遏制了通胀压力；我们承接发达国家低技术、有害于环境的产业，污染我们的水源和空气，而西方因此可以顺利实现技术升级，改善环境污染。对于这些，发达国家在获得巨大利益的同时，却并不领情，常常在很多问题上对中国施加压力，包括环境保护问题、劳工和人权问题等。他们忘掉了中国的这些问题都和西方有关。

其次是战略性资源面临发展瓶颈。自 1993 年中国首次成为石油净进口



国后，2010 年石油净进口 2.55 亿吨，对外依存度突破 55%。当前，石油等重要能源已经被少数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所垄断，国际自由贸易量不足总产量的 50%，进口需求不可能无限制得到满足。

中国进口的原油中，近一半来自中东，30% 左右来自非洲，这种来源结构存在相当大的风险。中东是美国固有的地盘，中国目前的一些合作伙伴，如伊朗、苏丹、尼日利亚等都存在较强的不稳定因素，一旦有关国家政权更替、政局动荡，我国将深受其害。而美国原油进口中，约 70% 来自加拿大、墨西哥、委内瑞拉等西半球，约 30% 来自中东、非洲等地。在石油运输方面，我国还主要依靠油轮运输，其脆弱性是显而易见的。

我国矿产资源总体储量不足，而且资源需求与供给结构性脱节。矿产资源天然的劣势，无法满足中国目前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早已是国际铁矿石的最大买主，2010 年共进口铁矿石 6.2 亿吨，占全球海运铁矿石的比重超过 50%。但很遗憾的是，我们是进口大国，却在价格上毫无发言权，面对趋向垄断的价格联盟，我们付出了过高的代价。

再次是人民币面临过多的升值压力。过高的外汇储备，必然导致外界强大的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舆论压力。人民币曾经是单一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2005 年以来，中国开始汇率改革，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不断上升，由当时的 8.11:1，到 2011 年已突破 6.4:1，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强。但单边的升值换来的是更大的压力，国际收支经常项目与资本和金融项目持续的“双顺差”给了外界足够的理由。

面对人民币的升值压力，我们只能采取渐进的办法，以免给国内制造业造成严重的影响。但外界并不满意，一会儿美国要将中国列为所谓的“汇率操纵国”；一会儿又是议员联合上书要求人民币一次性升值 30%，否则将科以惩罚性关税；一会儿又是反倾销反补贴。国内对此也是议论纷纷，莫衷一是。

人民币在外界看来“持续被低估”。金融危机后，由于我们的政策使我

经济如此 , 你要早作打算

们一夜之间“抖”起来了，2009 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达到 50%，人民也富起来了，到处都在传言中国人要来抢购奢侈品、房产和资源。既然这么富裕，那就得再拉全球兄弟们一把，“升点值吧”、“负点责吧”，环太平洋的国家一起说^①，你看我们多虚弱，经济数据疲弱不堪，失业人员超过 9%，而你们即便在金融危机发生后的 2008 年和 2009 年，登记失业率也始终保持在 5% 以下，保持了充分的就业率。

但老外们哪里知道我们的苦衷，我们所以有钱，那都是银行放出来的，社会保障部的失业率是“被就业”出来的，我们的失业率也不低，甚至超过了你们。但他们不信，逼得社科院站出来说，中国城镇失业率约为 9.4%^②。老外们依然有些不依不饶，弄得温家宝总理只好在 2010 年 3 月 22 日会见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外方主要代表时，透露“中国的失业人口多达 2 亿人”。

但热钱还是在涌入，因为外面的情况确实太差了，看来人民币暂时还是相对安全的，至于何时可能遭到强台风的袭击，能否有效抵御，那是暂可不管的。

● 孤独的行者

中国是孤独的，因为其他大多数大国均与超级大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而中国却逐渐被推向与美国对抗的轨道；中国是孤独的，因为中国的政治制度与全球大多数国家都不同，而在我们看来，所谓的“普世价值”并不一定适合中国；中国是孤独的，因为在我们不需要的时候到处都是朋友，但当我们真正需要帮助时，朋友却都跑去度假了，电话也打不通。

我们在经济上融入了全球体系，受到的却是“非市场主义国家”待遇；我们想理直气壮地发言，却发现我们说的对方都不太爱听，反而被认为是

① 环太平洋国家施压中国升值人民币。中国商务部网站，2009 年 11 月 12 日。

② 数据引自 2008 年 12 月 16 日中国社科院公布的《社会蓝皮书》。



“傲慢”^①。

现在我们慢慢崛起了，但别人似乎并不待见。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一些周边国家宁愿选择寄人篱下以获得地区外大国的空口安全承诺，也不愿相信中国“睦邻友好”的政策。我们很吃惊。在我们看来，几乎所有亚洲国家都受益于或试图受益于中国的经济成就，但却都在战略上通过不断亲美来防备中国的崛起，甚至连新加坡前总理李显龙也敦促美国继续留在亚洲以制衡中国。

我们周边的地缘战略环境恶劣。印度自不消说，很早就和中国较劲，军事上也以中国为假想敌；日本虽然和中国一衣带水，但却是美国在亚洲的战略伙伴和代言人；因为中国支持而逐渐强大的东盟，强大后却拉来美、俄制衡中国；北方邻国虽然有些衰落，但依然是世界第二大军事强国。这些都使人放心不下。

我们曾经是“被第三世界的朋友抬进了联合国”，但放眼全球，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中国，在全世界近 200 个国家里，似乎找不到多少真正的盟友。如果硬要找的话，缅甸、朝鲜和巴基斯坦可以算，但他们在世界上的地位都很边缘，前两个与世隔绝，中国对他们来说几乎是唯一的依靠，后一个由于地缘政治的缘故，希望借中国之力以取得制衡。各有各的小算盘。

在美苏角逐的时代，我们是重要的“第三支力量”；在全球反恐时代，我们是亚太地区稳定的主要力量；现在，本·拉登已死，美国反恐也基本结束了，我们会被插上什么标签呢？

美国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Huntington, Samuel. P）认为，由于美国国内存在着多样性和多文化的推动力量，存在民族、种族的分裂，美国

^① 2011 年 3 月 1 日《环球时报》报道：法国埃里克·伊斯哈勒维奇出版《中国的傲慢》一书，作者试图证明中国取得经济成功后，开始变得“傲慢”，不再听西方的教训了，而是开始教训西方。

经济如此 ，你要早作打算

比大多数国家更需要一个对立面来推动团结。“9·11”恐怖袭击之前，亨廷顿认为，萨达姆作为一个对手是不够格的，中国问题太多且在今后可能造成的威胁还为时尚早。

亨廷顿认为“美国现在的实际敌人和潜在敌人是宗教驱动的伊斯兰好斗分子和完全非意识形态的中国民族主义”。现在，本·拉登已死，中国也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由于政治体制、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中国很可能成为美国的假想敌。成为一个强大对手的敌人是不幸的，因为如果你也认为他是敌人的话，你将会耗费宝贵的资源以求与其对敌；但这也是幸运的，因为你已经有了与强大对手为敌的资格，有了这种资格，也因此赢得了尊重。

我们现在与周边国家存在的中国南海争端也好，东海争端也好，事实上早就存在。而美国重返亚洲也不过是对过去事实的一个再认定，用不着大惊小怪。我们之所以发出惊叫，也许是因为我们自认为强大了，以至于有能力向美国挑战；或者是认为我们已经不知不觉间削减了美国在亚洲的势力和影响；抑或是认为亚洲就是我们的地盘，容不得别人染指。

其实，这三点我们都远未达到，所以用不着惊叫。我们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不管被别人插上什么样的标签，假想敌也好，战略合作伙伴也好，我们都应该处之泰然，不要被别人的政策所绑架，也不要被某些利益集团所绑架。

在西方人看来，“孤独是可耻的”，但一个人有时不得不面对孤独。面对孤独不走向自闭，而是从孤独中走向与大众的融合，那是成熟的标志。中国现在之所以有些孤独，是因为我们处在不断崛起和转型的过程中，自身的定位和别人对我们的定位都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其中分寸不好拿捏，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孤独和不确定性，我们难免有些焦虑，而这种焦虑事实上是任何一个大国在迅速崛起的转型年代都会有的。

新加坡《联合早报》2010年11月23日发表题为《中国需重视崛起焦



虑症》的文章，颇为值得一看，现摘录如下：

事实上，任何一个大国在迅速崛起的转型年代都会面临心理焦虑症。当年美国在 20 世纪初迅速崛起的时候，也曾经陷入了崛起焦虑症，主要表现为在对外事务上，面对英国希望美国履行世界领导责任的要求表现出十分不情愿的态度，在对外行为上明哲保身，长期奉行孤立主义的外交路线；在对内事务上，利益集团风起云涌，社会价值观陷入了精神错乱，几乎每一个社会问题都会引发激烈的争论，每一个群体都在强烈地表达自己的特殊诉求。显然，在经济高度增长和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人们的心理未必能够像物质转型那样轻易得到解决，急剧的心理变化不可避免地会将整个社会拉入一种无所适从的集体焦虑状态。

针对社会心理世界看不见的焦虑症，唯一的办法就是进行心理调试，在政治思潮、制度调整和生活方式上，进行价值重建。在 20 世纪，美国人用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对美国上下进行心理调试。在政治思潮上，进步主义运动如火如荼，一举扭转了引发社会倾轧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引导美国进入了一个自由与和谐有机统一的轨道。

在制度调整上，从老罗斯福的改革到小罗斯福的新政，进而到“伟大社会”计划，美国在应对社会矛盾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挑战。在生活方式上，从社会反叛到保守主义的价值重建，美国人的生活渐渐步入了经济自由与社会保守并行不悖的轨道。虽然中国与美国的国情不同，但美国在现代化和国家快速崛起过程中克服崛起焦虑的经验仍可为中国所借鉴。

第四章

繁荣背后的动荡隐忧

经济繁荣的背后，我们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不断强化着尴尬的城乡二元结构。严重的环境破坏、凋敝的乡村、日益悬殊的贫富差距，使我们不得不回过头来审视自身的经济发展模式。

未来的路，我们怎么走？



满街飘的都是大盖帽，那是纯粹的计划经济；满街飘的都是草帽，那是纯粹的市场经济；街头既有草帽，也有大盖帽，那就是混合经济模式。

现在，纯粹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都已经没有了，区别只在于草帽和大盖帽的多少，也就是市场和政府的边界问题。有的地方大盖帽只在晚上和经济危机时才出现，平时都是草帽的天下；有的地方则是大盖帽一天到晚忙于指挥草帽干这干那，很忙很累很有智慧的样子；有的地方是草帽管理草帽；有的则是若干大盖帽，管不住一个草帽。

当然，所有的地方都会有礼帽，也会有八个草帽抬着一个礼帽在街头哼哈飘过的风景，但负责巡街和保驾护航的帽子有的依然是草帽，有的则是大盖帽或者化装成草帽的大盖帽。

在我们看来，这两者之间有着天然的分别。

中国经济的成功，引发了外界对“中国模式”的热烈探讨，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进行解读，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但到目前为止，尚没有一个“中国模式”得到多数人的认同。有人戏言，如果有人能解开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秘密，那他可以获得中国政府颁发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可是到目前，还没人获奖。

外界看来，“中国模式”是“国家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威权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党国资本主义”，或者是“新威权主义”，对于这些带有歧视性的名词，我们当然是不认同的。

经济如此 , 你要早作打算

我们的性质首先是社会主义，很早以前就“跳过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虽说偶尔回头补补课，但那也只是补课，难道你能说一个大学经济学教授不慎忘记了《国富论》的作者，回头问问他的学生，他就变得不如学生了不成，当然不能，教授还是教授。还有一些人以为是“市场列宁主义”、“儒家资本主义”，这些还靠点边，但也肯定得不到中国颁发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

在我们看来，不争论比争论重要，“共识”比“模式”重要，尤其是西方人对中国的“共识”。2004年，美国《时代周刊》高级记者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在英国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那就是“北京共识”。

在雷默看来，建立在“北京共识”基础上的中国经验具有普世价值，不少经验可供其他发展中国家参考，可以成为一些落后国家寻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模式。人家记者嗅觉多灵敏，不仅回避了“主义之争”，而且因为不想获奖，没有功利主义，所以才能提出如此高妙的构想，“北京共识”一时成为我国主流媒体的高频用语。

“模式”也好，“共识”也好，指向的都是经济发展的路径，而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是社会福利的改善。但我们知道，经济增长并不一定能改善社会福利，因此，如果我们单纯地看经济增长，而不看增长背后的代价，是不全面的，得出的结论也只能是片面的。

不可否认，30年来，我国经济获得了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但与此同时，我们为追求单纯的经济增长，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引发了日益深重的社会经济问题。

让我们先转过身，看看我们增长的背后又留下了多少隐忧。这倒不是我们有什么“偷窥癖”，希望以此来窥见什么隐私，只是想换一个角度来审视我们的过去罢了。



第一节 增长与破坏共生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要解决的是吃饭问题，今后的路怎么走大家心里都没底儿，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只有两句话：“摸着石头过河”和“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但怎么摸，需要理论的指导，因此，“比较优势理论”成为中国主流的发展理论之一。

之所以该理论胜出，当然是多方面因素所致，其一是系出名门，源起于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由最有影响力的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首先提出，后经赫克歇尔和俄林推进到了资源禀赋理论。什么是资源禀赋呢？就是说你有什么本钱，你得用你拥有的本钱去做没本钱的买卖。

如果你自认为天资聪颖，好，那就去读书，大学毕业后直接失业；如果你自认为有一膀子力气，那就跑到山西去挖煤或者直接到河北的砖窑里打黑工；如果你自认为长得美丽无比，那你就什么都不用做，今后等机会直接坐到宝马车里哭就是；如果你自认为既没聪明到能读好书，力气又没大到可以下黑窑，但是很小就学会骗父母的钱了，那我劝你赶紧到华尔街去；如果你很小就会偷拿父母的钱，事后还能一本正经地和父母一起找并让父母以为是他们自己丢的，那我得恭喜你，你很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

其二是该理论虽是用于解决国家贸易之间竞争优势的问题，但经林毅夫教授引入后，似乎不仅解释清楚了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也很符合我们当时以“开放”促“改革”的国情。

其三是该理论名字取得好，我们睁眼看见的都是资本主义的“绝对优势”，那当然不好，对于自尊心也有点打击，我们要看到我们的“优势”，虽然只是“比较的优势”，但总是有“优势”了，大张旗鼓宣传起

经济如此 , 你要早作打算

来心情毕竟也好些。我们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根本差别不是别的,在教授看来只是“要素禀赋结构的差别”^①。这样的解释多好,很振奋人心。如此看来,我们什么都不缺,就缺钱,“唯一可以有巨大的增长差别的资源是资本”^②。

林毅夫等在批判“赶超战略”基础上也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不能不说他具有高度的历史眼光和极强的现实敏感度。林教授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实行“赶超战略”的国家最终并没有带动国家经济的持久快速增长,且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作为一种替代性选择,遵循比较优势才是更有效的发展战略。林教授的“药”下对了,因为中国也是“赶超战略”的失败者,也正缺资本得很。

但奇怪的是,“比较优势理论”被中国无情的现实所绑架,演变成GDP“赶超战略”下的“比较优势”。对于这一点,已经逝去的杨小凯教授似乎有所预料。在杨小凯看来,如果缺乏相应的制度配合,“比较优势理论”指导下的经济发展难以持久,并最终被国家机会主义所挟持。

为了追求成本的“比较优势”,我们曲解了自己的“资源禀赋”,以致走上了一条高污染、高投入、高消耗的发展道路,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消极后果。

环境污染

小时候,我们所知道的中国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长大后,我们所知道的中国是人均土地面积和资源拥有量都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小时候,我们看见的天空是蔚蓝色的,河水是清澈见底的,晚上星星还会眨眼睛;长大后,我们看见的天空是灰色的,河水混浊,晚上没有星星甚至也没有月亮。

① 林毅夫,孙希芳.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J].国际经济评论,2003年11—12期.

② 同上。



小时候，我们看见的人都在劳动，虽然辛苦，很少吃肉，但只要有肉吃就很快乐；现在，我们看见的人也在劳动，也很辛苦，虽然经常吃肉，但都很忧愁，很怀念以前的肉，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肉已经快成为慢性毒品了。小时候，哥哥姐姐们不断地出生，父母虽然忧愁不知怎样才能养活他们，但也很高兴，因为他们都是健康的；长大了，我们轻易不敢要小孩，不是担心养不活，而是害怕他们天生畸形，我们不知道怎样才能给他们一个健康的未来。

我们已经透支未来。

我国七大水系近一半河段严重污染，75%的湖泊出现重度污染，不适合人类使用，甚至不能用来灌溉农田。城市河段90%以上严重污染；近岸海域水质恶化，赤潮频繁发生，渤海已成“死海”。

地表水不够了，只好抽采地下水，地下漏斗增多，地面沉降大幅出现。仅以河北为例，全省地下水累计超采量已逾1千亿立方米，使该省出现了近4万平方公里的地下水超采漏斗群和近5万平方公里的地面沉降区，浅层地下水水位平均下降11米，深层地下水水位平均下降40米左右。

地下水也不可避免地遭到污染，因其更隐蔽和不可逆性，危害将会更大。中国地质调查局初步调查结果显示，全国有90%的地下水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其中60%污染严重。华北平原有50.71%的地下水资源不能直接利用。我国118个大中城市近年来的地下水监测统计结果指出，较重污染的城市占64%，轻度污染的城市占33%。地下水污染呈现由点到面、由浅到深、由城市到农村的扩展趋势，污染程度日益严重。^①

空气不再透明，雨水不再干净。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达到国家一级标准的仅占3.7%，52.9%的城市出现酸雨，其中酸雨发生率在25%以上的城市占33.6%，酸雨发生率75%以上的城市占10.9%。^②一些

① 北京大学郑春苗教授2011年6月20日接受《水工业市场》的采访。

② 数据引自2009年环境保护部《中国环境状况公报》。

经济如此动荡，你要早作打算

大城市的颗粒物和二氧化硫浓度已经超过世界卫生组织及国家标准的2~5倍，酸雨面积已占国土面积的1/3。在《世界发展指标2006》列举的世界空气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中国占了13个。我国有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水，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

2010年，由加拿大科学家根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卫星数据绘制而成的全球2001—2006年污染颗粒PM_{2.5}浓度地图首次发布，中国的空气污染已经到了异常严重的程度。PM_{2.5}是指大气中直径小于或等于2.5微米的颗粒物，也称为可入肺颗粒物。与较粗的大气颗粒物相比，PM_{2.5}粒径小，富含大量的有毒、有害物质且在大气中停留的时间长、扩散距离远，因而对人体健康和大气环境质量的影响更大。

在中国的版图上，除了中国东北部和西南部尚有一片蔚蓝色之外，其余均被异样的颜色填满了，而华北和华东地区则成为重灾区。

中国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水土流失面积约占国土总面积的40%，荒漠化面积约占国土面积的1/3，草地耕地退化状况也相当严重。据国家环保总局有关数据显示，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每年沙化土地扩大面积从560平方公里增加到2460平方公里，我国18个省的471个县，近4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正受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威胁。

土地数量的减少促成了土地利用强度的不断提高，从而使得土地肥力衰退。我国的中低产田比例由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2/3增加到20世纪90年代的4/5。而这些问题中最严重的部分又往往集中在中国最贫困、最脆弱的人群所生活的地区，从而使问题变得更为严重。随着城市与工业化地区的扩展以及公路网与铁路网的建设，中国正在失去很大部分肥沃的耕地。

土地的污染不断加剧，受到污染的耕地已达上亿亩，其中包括重金属污染、污水灌溉引起的耕地污染和因堆存固体废弃物所导致的耕地占用与

毁坏。城市土壤尤其是工业企业及其周边土壤的污染更为严重。矿区土壤污染面积已达数百万公顷。^① 重金属对土地的污染已经成为新的课题，形势异常严峻。

有调查报告甚至称，中国耕地约有 10% 遭到重金属污染。国土资源部曾公开表示，中国每年有 1200 万吨粮食遭到重金属污染，直接经济损失超过 200 亿元。^② 一项由原国家环保总局进行的土壤调查结果显示，广东省珠江三角洲近 40% 的农田土壤遭重金属污染，且其中 10% 属严重超标。^③

中科院地理所环境修复研究中心的公开论文资料显示，截至 2008 年，我国至少有 116.7 万吨的砷被遗留在自然环境中，这就相当于百万吨的砒霜被散落在旷野中，任雨水冲刷，注入河流，渗进土壤^④。更可怕的是，我们现在还不敢正视这个问题。

几年前，一位科学家受邀到某地检测土地重金属的污染情况，实验结果出来后，科学家大为震惊，因为这块全国著名的粮食主产区的污染情况已经严重到令人咂舌的地步！科学家亲自将监测报告递交给当地的一位高级官员，这位官员沉思良久后说道：“这个情况确实非常严重，我们也一直很重视，但是，我们目前无力治理，所以请不要告诉任何人我看过这份报告。”^⑤ 无语，真是让人无语！

我国森林覆盖率只有 20% 左右，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的天然林已经持续减少了 50 年，而且，迄今为止，尚未有迹象表明中国已经开始实施天然林的可持续管理。生物多样性也面临极大的挑战，中国的许多物种正濒临灭绝，《国际濒危物种贸易公约》所列出的物种中，中国占有将近 1/4。

我们的环境已不堪重负，我们正在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世界银行

① 北京大学郑春苗教授 2011 年 6 月 20 日接受《水工业市场》的采访。

② 中国土地重金属污染之患。人民网，2011 年 2 月 22 日。

③ 中国土地重金属污染危局 [N]. 国际先驱导报，2011 年 3 月 4 日。

④ 同②。

⑤ 同②。

经济如此 , 你要早作打算

2007 年发表的报告说, 中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每年高达 1000 亿美元, 每年有 67 万人死于空气污染和水污染。

根据中国出生缺陷监测中心资料显示, 从 1996 年到 2007 年, 我国出生缺陷发生率从 8.77‰ 上升到 14.79‰, 每年新增出生缺陷儿总数约为 80 万~120 万人, 平均每 30 秒就有一名缺陷儿出生。其中, 除 20%~30% 患儿经早期诊断和治疗可以获得较好的生活质量外, 30%~40% 患儿在出生后即死亡, 约 40% 将终生残疾。这意味着每年将有 40 万家庭被卷入终生痛苦的旋涡。

2005 年, 瑞士达沃斯论坛公布的世界各国“环境可持续指数”, 在全球 144 个国家和地区中, 中国位列第 133 位, 倒数第 11 名。2008 年 1 月底, 德国环境部部长嘉布瑞尔出访中国前接受“德国之声”采访称, 由于环境问题, 中国的经济发展等于零。

北京大学教授夏业良也认为, 如果我们按照绿色 GDP 或者可持续发展的指标来测算经济总量, 就会发现中国的 GDP 有可能是负增长。这些声音我们当然可以斥之为污蔑, 或者是西方政客和异化知识分子的管孔之见, 置之不理, 但政客可以被污蔑, 知识分子可以被异化, 只是事实不好被随意更改。

2007 年 7 月,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也曾忧心忡忡地说: “中国生态环境已经逼近临界点, 距离环境灾难并不遥远, 如果不大力治理改善, 环境危机势所难免, 20 年改革开放成就将被吞噬。”他甚至不顾身份地表示: “中国如今的水污染问题, 不是技术问题, 不是资金问题, 而是体制问题。”^①

资源消耗

中国是以占世界陆地面积将近 1/15 的土地、世界 9% 的耕地、6% 的水

^① 参见 2007 年 9 月 14 日人民网的报道。



资源、4%的森林资源、不足9%的铁矿石、不足5%的铜矿、不足2%的铝土矿、1.8%的石油储量和0.7%的天然气储备，养活了22%的世界人口，并且将GDP总量增长到全球第二位。

这是一个奇迹，但同时也意味着我们经济的脆弱，意味着我们要更加珍惜资源。但遗憾的是，我们一直采用的是高投入、高消耗的发展模式。

当我们为了不可持续的发展而耗尽了自身宝贵的资源时，未来，我们将何以自处？

水已经被我们污染得差不多了，资源也快被我们消耗完了，现在我们不得不到非洲、南美洲这些地方寻求新的资源，世界因此担心“谁来养活中国”，而我们更应该担心拿什么来养活后代子孙？

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资金、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的粗放投入实现的。樊纲博士的研究也表明，1979—2005年，我国经济增长绝大部分是靠要素的投入实现的，占到了60%以上；而制度推进的效果却出现了明显递减，由1989—1998年的0.93递减到1999—2005年的0.32。^①

我国资本形成额占GDP的比重自2003年以来，已经连续6年维持在40%以上，2008年高达43.5%，接近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②，高于美、德、法、印度等国家的水平。

中国的增量资本产出比每况愈下，“六五”、“七五”、“八五”、“九五”期间，每增加亿元GDP需要的固定资产分别是1.8亿元、2.15亿元、1.6亿元、4.49亿元，2004—2008年则增加到了5.61亿元，其中2008年更是高达7.58亿元^③。也就是说，我们要增加1元GDP产出，就要投入接近8元，而世界上其他国家一般在2倍左右，这是多么惊人的对比！

① 樊纲. 中国经济增长的要素因素分析与展望 [J]. 资本市场, 2008年第4期.

② 资本形成额占GDP比重已近两倍于世界平均水平 [N]. 第一财经日报, 2009年11月6日.

③ 同②.

经济如此 , 你要早作打算

高速增长的同时，我们消耗了大量的物质资源，且资源利用效率不高。我国 GDP 每增长 1 倍，矿产资源消耗则增长 4 倍多。我国单位能源的产值只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1/4。我国单位 GDP 的能源消耗，2003 年分别是日本的 5.68 倍，德国的 5 倍，美国的 3.32 倍。如表 4-1 所示。

表 4-1 2003 年中国与其他国家每亿美元 GDP 消耗能源对比表

印度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韩国	美国	法国	德国	英国	意大利	日本
1.26	1.32	1.53	2.08	3.32	4.64	5.00	5.42	5.46	5.68

资料来源：根据美国能源署提供的数据和 IMF 提供的 GDP 数据计算。

在水的利用效率方面，中国农业灌溉用水利用系数只有 0.43，而许多国家已经达到 0.7~0.8；中国工业万元产值用水量平均为 222 立方米，是发达国家的 5~10 倍，工业用水的重复利用率平均为 40% 左右，而发达国家平均为 75%~85%。

2000—2007 年，中国单位国民生产总值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3 倍，水资源消耗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3.9 倍。

2007 年，我国消耗了全世界 41% 的煤炭、9.2% 的石油、47.8% 的水泥、31.1% 的包括铜铝锌铅锡镍在内的常用有色金属、16% 的淡水^①，在此基础上我们创造出了仅占全世界 7% 左右的 GDP。

2010 年，中国又有幸超过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耗国了。

我国目前已经是全球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最大的铜进口国、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原油进口国，甚至在 2007 年变成煤炭净进口国。国内廉价的资源已经被我们消耗殆尽了。

当中国巨大产能所需要的基础原材料及能源还可以在国内得到满足的时候，我们可以低价出让资源、不要资源税、任意压低劳动力工资、牺牲

^① 数据引自中国科学院《2009 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



环境甚至是以生命为代价，达到价格上的“比较优势”，从而维持商品的低价输出。为此，国外虽有不满，但也无可奈何，只好羡慕地说：“你们连工人的工资都可以不发，我们怎么竞争得过你们呀？我们国家的工人待遇、福利稍微差一点就要罢工，一罢工，资方就要让步，而你们工资特别低又不许罢工，多好啊！”

正因为这些天然的“优势”，我们达到了“中国卖什么，什么就跌”的境界。全世界因此才能享受很长时间的所谓“低通胀高增长”的好日子，而这种好日子后来变成了“中国向全世界输出通缩”，这是我们始料未及的。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爽了一把，得到了增长幻境和堆在中央银行里的一大堆美国“花纸”。而当国内的基础原材料及能源消耗得差不多时，疯狂运转起来的机器就开始要求国外提供资源供应，从而不可避免地引发大宗商品的价格暴涨。

不是它们要暴涨，只是因为以前被压低了，现在需要回归合理的价格。国外的人力价格、资源价格、环保标准远远超过中国，其成本自然也远远高于中国，“中国买什么，什么就涨”，原因大概在此。

❁ 沉重的“地耗”

截至2010年年底，我国耕地总数不足18.26亿亩，已接近18亿亩的红线。人均耕地不足0.1公顷，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2、发达国家的1/4，只有美国的1/6、加拿大的1/14。然而，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正在被不断蚕食。

现在，无论你走到哪一个城市，首先映入眼帘的总是宽阔的入城大道、气派非凡的新城市广场、鳞次栉比的工业园区，此外还会有规模恢弘的大学城以及美丽招摇的高尔夫球场。但在这背后却是新城区日渐沦为“鬼城”，白天少有人行，入夜灯火凄凉；很多大学的占地规模早已超过世界一

经济如此 , 你要早作打算

流高校，而里面的学生却渐渐稀少，因为稀少，所以就难免成为动物们野合的好去处；只是工业园渐渐变得美丽起来，芳草萋萋，污水淙淙，近可闻鸟语，远可观野狗。

有人估计，我国省级以下开发区征地后的土地闲置率高达 40% 以上，省级以下的自不必说，当然是越来越美丽。而高雅的高尔夫球场旁边自是房地产开发的好去处，别墅、洋房充分展示出我们野蛮的富裕。由于高雅还不太被官方认同，早在 2004 年，国务院就要求暂停新建高尔夫球场，但高雅的东西是挡不住的，2008 年国土资源部通过卫星照片依然发现全国 172 个城市中仍然存在相当数量的在建高尔夫球场。

美中不足的是，你也许会在入城大道上看见道路两边低矮而整齐划一的民房，当你还以为如此整齐划一大约是在列队欢迎你的到来时，它们就会偶尔地露出些许斑驳来刺痛你的眼睛，这你得理解，曾经的沧桑与无奈不是一点整齐划一可以掩盖的，而这正是城市化的奢侈与寒酸的农村之间真实的对照。

我国人多地少的矛盾十分突出，但土地的低效率利用问题十分突出。“目前，我国大中城市人均综合用地已超过 120 平方米，对照国际大都市，东京人均综合用地仅 78 平方米，中国香港才 37 平方米。”“从 1980 年到 2005 年，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急剧扩张时期，经济每增长 1%，会占用农地 30 万亩左右。与日本的快速发展时期相比较，我国 GDP 每增长 1%，对土地的占用量差不多是日本的 8 倍。”^①

“2008 年全国城镇工矿建设用地达 1.231 亿亩，人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大大高于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水平。工业用地开发强度明显偏低，容积率一般只有 0.3 ~ 0.6。”^②

一边是中央一再地重申，要守住 18 亿亩耕地的底线，一边却是地方无

① 中国地耗怪象 [J]. 半月谈, 2011 年第 3 期.

② 徐绍史. 落实节约优先战略 加强资源节约和管理. 国土资源部网站, 2010 年 12 月 7 日.



度地挥霍。近几年全国每年建设用地需求量在 1200 万亩以上，但每年土地利用计划下达的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只有 600 万亩左右，缺口达 50%。怎么办？自然还是老办法：未批先占、少批多占、以租代征。

为什么我们的地方政府就这么没有创意，难道想不出一一点新办法吗？不是，那是因为老办法依然管用，新办法麻烦，费脑筋不说，还不一定管用，就别累着自己了。

但，我们能永远这样子下去吗？

第二节 断裂的城乡关系

早期人类渔猎而食，随遇而栖，其后群聚定居，渐成村落。因物质日有丰盈，因之而互“市”。市者，交换也，“若朝聚井汲，便将货物于井边货卖，曰市井”。有了多余的物质，难免就有人不怀好意，始而筑城。城者，墙也，可以自守。于是乎，城市渐兴。

什么是城市？目前全世界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和标准，不同国家对城市构成的标准也不同。在丹麦，任何 250 人以上的居民集中地都被视为城市，而加拿大则需要 1000 人，德国需要 2000 人，美国呢，稍多一点，要有 2500 人才算。中国因为人口多，得要 3000 人或者是行政级别达到镇或以上的，因此我们又合称为城镇。城镇之外的，那就是乡村。

乡村变成城市，就是城市化。

城市化有什么好处？经济学解释说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因为可以降低交易成本、进行资源合理配置、提升产业结构。如此解释有些不好理解，举个例子吧，你在农村要卖一只鸡，如果不到集市去的话，就只好提溜着鸡满山坡吆喝，很累，还不见得有人买；如果你到城里去卖，可能刚进城就被鸡贩子给收走了。

两者比较，你不仅节约了时间，而且还赚了钱。回头想想鸡贩子腆胸

经济如此 , 你要早作打算

凸肚的模样，你开始羡慕了，于是也跟着一起去贩鸡，这样你从事的产业立马从第一产业跳升到第三行业，你从一个每天劳作还吃不饱的“农二哥”升级为每天可以吃鸡下水的商人。当然，你也可能不跟着鸡贩子走，或者你想跟而鸡贩子不要，但你又很羡慕城市里的花花绿绿，于是进城打工。

这样，你还是升级了。当鸡贩子也好，进城打工也好，说不定你就发了财，这样你还可以将老婆孩子一起接到城里做城里人，老婆尽可以打扮得光溜水滑坐在门口看风景，你一家子就城市化了。而你留在农村的那点土地自然有人惦记，就是没人惦记，你年迈的父母也不会让地荒着，因为家乡本来就人多地少。

而你当年看见的鸡贩子，因为你也来贩鸡，竞争激烈了，又拼不过你，只好在城市周边圈点地准备做养鸡场，本来快破产的人，只因为房地产火爆，碰巧有个远房老表在市政府当处长，于是合伙将养鸡场变成了开发小区，眨眼之间跻身上流社会，奔驰、宝马开得呼呼转。城市就在这样不断的轮回中快速膨胀起来，资源得到优化，产业得到升级。

虽然最早的城市起源于大约一万年前的中东两河流域，也就是现在的伊拉克一代，但古代城市风头最健者当属我国。唐朝的长安、北宋的汴京都惊得世界一愣一愣的，以至于上海世博会都要用高科技将“清明上河图”展示给外国人看。

因马可·波罗而传至欧洲的东方神话，欧洲始而震撼，继之以怀疑，当马可·波罗垂死时，神父甚至要他忏悔《马可·波罗游记》里说的都是谎话，马可·波罗含泪答道：“上帝知道！我所说的连我看到的一半还不到！”

可惜那时的上帝常驻欧洲，不知道东方的繁华。其实，当西方还处于中世纪蒙昧黑暗之中时，唐朝长安常住人口就已超百万，西域、天竺、吐蕃、高丽、日本，以至于波斯、安息，一时四海来朝，煊赫辉煌。“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只是到了近代，我们落后了，以至于中国很长时间都是“乡土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长时间实行城乡二元分割，有一段时期甚至实行“逆城市化”运动，使得城市化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也进入城市化的快速轨道，但城市化很大程度上不是市场化的结果，而是在二元分割制度下政府强有力的“有形之手”推动下形成的。

坚不可摧的城乡二元分割制度事实上将中国演变成了两个断裂的社会，我们的城市越来越像纽约，乡村越来越像非洲。中国目前已是世界上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达到3.3:1^①，如果加上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对农村居民来说不可得的各种补贴、社会保障等，实际差别还将更大。

❁ 扭曲的城市化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80年，中国城市化进程相当缓慢，城市人口比重仅由11.2%上升到19.4%，而同期全世界的比例则由28.4%上升到41.3%，其中发展中国家由16.2%上升到30.5%。^②

这段时间，我国对城市和市民实行从生到死的“统包”，对农村和农民则实行什么都不包，但严加管制的“统制”，城乡之间不同的户籍制度、粮食供给制度、住宅制度、教育医疗制度、失业保障制度等造成城乡之间差异巨大，成功阻止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自由流动，整个社会形成了相互隔离的二元社会结构。

隔离到什么程度？彼此之间几乎都不通婚，除非城市姑娘一时吃错了药，不然农村小伙就没有希望。那时的你真要是娶了一个城市姑娘，十乡八县都会传开，比现在娶一个毛里求斯的媳妇还稀罕。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农民因土地承包似乎慢慢“抖”了起来，乡镇企业的发展更使部分农民敢于穿西装打领带，装扮得和城里人差不多，说话也可以嗯嗯啊啊地吐半截了；而城市则因为大量“知青”返城、国有企

① 袁杨．探索实现民富的中国路径 [N]．半月谈，2010年10月．

② 范恒山．中国城市化进程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经济如此 , 你要早作打算

业效率低下等问题闹得有些自顾不暇，城乡之间的壁垒因此渐有松动，至少在外面吃饭不要粮票，买衣服不要布票了。

这样，胆大一点的农民就可以到城里去，而不用担心会成为盲流，城市化因此被提上政府的议事日程。但农民要离乡背井远走高飞还是不行，不是政府不让，而是传统文化要求你“安土重迁”，所谓“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因此政府就实行人道主义的“离土不离乡”的小城镇发展策略，你可以迁入小城镇，县级以上稍远稍大一点的城市那就别去了，去了也不予迁入。政府担心你走远了，话都听不懂，受外乡人欺负。

随着开放的深入，珠江三角洲开始出现大量的民工荒，本地人完全不能满足用工需求了，于是河南、四川、湖南等人口大省的农民开始大量涌入。既然那么遥远的地方都可以去，别的地方自然也尽可以去得，神州大地一时人潮如流，春节期间更是闹得各地政府都有些不安生，组织好民工的返乡和春节后的返城一时成为地方工作的重头戏。

这一时期，我国城市化得到了快速发展，2009 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 46.6%，2010 年年底，我国的城市化率已达到近 50%^①，但是在统计的城镇人口中，“包括 1.5 亿农民工在内，至少有 2 亿人并没有享受市民的权利”。公安部 2008 年提供的户籍统计数字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之间的差距也显示，2008 年至少有 1.61 亿人^②是“被城市化的”，在统计部门看来，只要你在一个城市中居住半年以上就“被城市化”了，至于你是不是城市居民，那是你的事。

此外，还有相当部分人虽然是城镇居民，也算城市化了的人，但却离开本土到外地谋生活。比如谋到上海、北京若干年，也喜欢上那里了，不愿意再回到最初的小旮旯，但是因为“人户分离”，整个人就不完整了，因

^① 2010 年 11 月全国人口普查结果。

^② 中国遭遇“半城市化”困扰 [N]. 光明日报, 2011 年 2 月 17 日。



此依然不敢说“阿拉上海人”，也不敢自认是北京人，最多称为“北漂”，还漂着呢，不知什么时候沉下去。这也是一个异象，晚上睡觉你想起来心里会有些隐隐作痛。

城市化的核心本应是将农民变成市民，但是我们的政策却人为地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建立起一道难以逾越的藩篱，那些为城市建设和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进城务工人员和在城市定居的农民被排斥在城市主流社会之外，无法完成身份的转换。

农民在城市里居住 10 年甚至 20 年，如果没有完成户口迁移，那也依然只能算在城市暂住，最后还得回老家，变不成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居民。这些人虽然进了城，在城市里面工作生活，但身份依然是农民，无法享受城市居民的教育、医疗、劳动保障和失业救济等社会公共福利，只能游走于城乡之间。

庞大的游离于城市之外的进城务工人员成为中国城市化独有的现象：孤岛般耸立于日渐凋敝乡村上的繁华都市，庞大而混乱的城乡结合部，简陋且面临随时被强拆的农民工子弟学校，新的两地分居，候鸟一般的季节性迁徙，无助留守的儿童群落……城乡差距因之日益拉大，社会因之日益呈现断裂状态。

城乡二元制度结构使城市既可达到凭借户籍制度和人口流迁政策的有限开放获得它所需要的廉价劳动力，又不必为他们提供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大大节省了政府的财政支出。这样的城市化是扭曲的，是对农村制度性的掠夺与伤害。新的城市化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乡村的凋敝和对农民的剥夺之上的，只要造成二元分割的制度存在，掠夺就必然存在。

我们的城市化，一定意义上只是物质的城市化，层出不穷的高楼、雄伟瑰丽的广场、宽广美丽的道路背后隐藏着的是对人性的漠视。

改革开放之前，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由国家全包，农村则基本上由农民自筹资金解决，农村生产与生活急缺的中小型基础设施，实际上主要依靠农民

经济如此 , 你要早作打算

自己集资或者是无偿建设，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极不相称。改革开放之后，农业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每况愈下，1978 年为 13.4%，1990 年下降为 9.98%，2000 年仅为 7.75%。

农村生产能力低下，但我们在很长时间内还在征收农业税费，直至 2006 年方全面取消。而西方国家很长时间实行的则是高额的农业补贴，2002—2007 年，美国每年的农业商品补贴就达 190 亿 ~ 210 亿美元^①；欧盟每年用于农业补贴的开支高达 440 亿欧元。^②

改革开放之前，农村中小学的相当一部分开支由人民公社或生产大队负担，民办教师报酬由农民承担，这也可以理解，旧社会私塾也是这样子的。改革开放后的很长时间内，国家每年财政支出的教育经费几乎全部用在城市。1985 年以前，农村教育多少还可以享受点财政的羹汤，每年每个中学生有 31.5 元、小学生有 22.5 元的教育拨款，但到了 1985 年突然就没了，改由农民自筹经费办教育。

后来国家强大了，GDP 超德赶日地不断前进，农村教育也有了一些财政投入，好些，有点甜头了，但城乡教育分化却远未能止住。

就业方面，城市居民的工作国家也不安排了，这点和农村差不多。但目前国家每年为城镇居民提供各类社会保障，虽然这点保障也快变得越来越没有保障了，但总比没有好。2009 年全国财政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7606 亿元，农村社会保障就业支出为零，因为没必要，农民有土地就是保障，政府已经又给你延长 30 年不变的承包权了。

2009 年我国的医疗卫生支出 3994 亿元，城市居民的医疗支出自然是占大头，农村沾点药气就可以了。说到医疗，城市居民多数似乎也别妄想，2000 年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医疗卫生筹资和分配公平性排序显示，中国医药卫生总体水平排在第 144 位，卫生公平性排倒数第 4 位。这样看来，城

① 美国就该取消农业补贴 [N]. 环球时报, 2004 年 6 月 9 日。

② 难以为继的欧洲农业补贴政策 [N]. 世界新闻报, 2003 年 9 月 1 日。

市居民最好也别生病。中国社科院一份有关医疗卫生的调查指出，中国投入的医疗经费，80%是为850万以党政军干部为主体的特权阶层服务的。

还好，城市有保障房。不过农民就不要想了，想也没用。2009年我们财政部安排了726亿元保障房支出，2011年达到1300亿元左右^①，因为我们要开工建设1000万套各类保障性住房！

很早很早以前，农民盼望着被城市化，因为那意味着鲤鱼跳龙门，或者“农转非”，一下子就可以吃上公粮，或者被安排到城市企事业单位就业。这种安排，体现出来的经济关系，是失地农民能在一定程度上分享到土地转变用途后产生的增值收益，城市化带来了失地农民命运的转变。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农转非”没意义了，安排就业也不现实了，但土地还是国家和集体的，要征用那不过是一个“物归原主”的过程，规定补偿多少就是多少，由不得嫌多嫌少。补偿费用的构成大致包括以下几块：土地补偿费、青苗补偿费、地上地下构筑物补偿费和人员安置补助费。

随着征地范围的扩大，失地农民越来越多，社会矛盾日益突出。近几年，我国大规模城市化才开始，失地农民造成的负面影响似乎还不大，等到几年以后，矛盾也许才会真正爆发。

城乡之所以分割，以前是为了控制，但更重要的是需要通过工农业之间的“剪刀差”掠夺农村，尽快完成资本积累，以便尽快建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据估算，改革开放之前，国家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从农村隐蔽地吸走了8000亿元资金^②。

我们现在的“剪刀差”依然存在，但这一块已经不多了，说实话，政府也没有怎么看在眼里，现在看中的是土地。2006年政府卖地的收入为

^① 中国建千万套保障房。中新网，2011年2月23日。

^② 项继权，城镇化的“中国问题”及其解决之道[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4月。

经济如此 , 你要早作打算

7000 亿元, 2007 年突破“万亿”, 达到 1.3 万亿元, 2008 年少点, 但也有 9600 多亿元, 2009 年 1.59 万亿元, 2010 年 2.7 万亿元。^① 5 年累计达到 7.25 万亿元, 这其中有多少可以归于对农村的掠夺呢?

进入 21 世纪以来, 党和政府调整了城乡发展战略, 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但很遗憾, 重城轻乡的公共财政投入结构并没有多大变化, 农村的资金和资源仍源源不断地流入城市。2008 年, 中央明确提出, 要“严格界定公益性和经营性建设用地, 逐步缩小征地范围, 完善征地补偿机制”, 要“按照同地同价原则及时足额给农村集体组织和农民合理补偿, 解决好被征地农民就业、住房、社会保障”。

同时提出, “在土地利用规划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外, 经批准占用农村集体土地建设非公益性项目, 允许农民依法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开发经营并保障农民合法权益。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对依法取得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与国有土地享有平等权益”。这些构想都是很好的, 但在执行的过程中却出现了较大的偏差。

但是还好, 我们开始慢慢转变。

● 房地产绑架城市化

西方国家的城市化本质上是依靠市场和社会的力量完成人口和资源的重新配置, 并依靠市场调节完成产业及城镇的布局。我国的城镇化则是在政府这只“有形之手”强有力的主导下进行的, 这为城市化后来演变为政府与房地产商之间的合谋创造了天然的条件。

我国大规模城市化严格地说是在 2000 年以后才开始的。2000 年 10 月, 中共中央在关于“十五”规划的建议中提出, “随着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 我国推进城市化条件已渐成熟, 要不失时机实施

^① 2010 年全国土地转让成交总价款达到 2.7 万亿元 [N]. 新京报, 2011 年 1 月 9 日。



城镇化战略”。在此之前，政府的精力还主要放在农村小城镇建设上。

房地产这个行业在中国倒是出现得更早一些，20 世纪 80 年代末海南房地产泡沫可以说是我国房地产行业的滥觞，只是很快被打压下去了，弄得海南省政府以后很长时间都疲于消化烂尾楼。

1998 年，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为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中央政府决定进行房改、医改、教改，从此医疗产业化、教育产业化、房地产产业化正式拉开序幕。现在，官方已宣告医改正式失败，教育产业化诟病也很多，只有房地产脱颖而出，不仅早已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更弄得全国上下为之癫狂。

“要不失时机实施城镇化战略”，那是自然的。我国的城市化当时不管相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还是相对于经济发展都已经落后了，所以得追。追的最直接表现就是政府开始利用“有形之手”强力推进城市化。为此，政府首先需要筹措资金，怎么筹措，当然是先将土地从农民手中廉价征用，然后转手倒卖出去，获得高额利润，然后循环不已就可以。

这个过程，大家开始都还有点不适应，政府的精力主要放在通过招商引资、增加基础建设来增大 GDP，城市化和房地产的发展都相对平缓，购房者绝大多数以自住型为主。到 2003 年，经过几年磨合，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尝到了甜头，政府职能在城市化推进中不断强化，政府发现自己正在变得“无所不能”，于是热烈地爱上了这个行业，并提出了著名的“经营城市”的理念。

要经营城市，只靠政府“有形之手”单要自然不行，那样政府收购的土地会砸在自己手上，这当然不是政府的初衷。代表“无形之手”的房地产商一个个特精明，看见政府提出经营城市的理念，就知道政府准备变成大商人了，你要做买卖，那我得傍上。有了“捧哏”，有了“逗哏”，晚会就可以隆重上演了，房地产头戴着“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高帽，一时间大兴特兴。

经济如此 , 你要早作打算

地方政府财政迅速变成“土地财政”，有的城市出让土地的收入甚至占到地方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巨额的卖地收入勾起了地方政府不断膨胀的欲望，很多城市于是不顾条件地通过规划将城市范围扩大，城镇面积从1990年约1.28万平方公里到2008年的3.63万平方公里，增加了180%。

目前，我国有655个城市正计划“走向世界”，200多个地级市中有183个正规划要建成“国际大都市”。^①真是气势恢弘。

土地既然被规划进来了，那就是政府的了，什么时候征，什么时候用，就看地方和房地产商两刷子什么时候扫到。

“城市化大跃进”中，有条件没条件都要上，至少口号得喊得响亮，一是显示领导水平与魄力，二是得勾引住那些近几年越来越财大气粗的房地产老板。

“咱俩抬抬价，把地价哄上去？”

“好！”

于是地价一夜之间轰然上涨，升斗小民一时看不明白。哇！新地王出来了，那房价还得涨，于是哄而抢之，于是地产商赚大钱了，于是地方GDP上去了，于是新的地产商又冒出来了，于是新的土地又可以卖高价了……皆大欢喜。

现在，房地产确实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甚至提升为关键产业也不为过。中国社科院2010年《国家竞争力蓝皮书》就曾指出，中国近20年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房地产业膨胀发展取得。

一个行业，几乎不从事任何价值创造，主要功能就在于左手买进、右手卖出，而能变成中国的支柱产业，支撑中国近20年的大发展，这是何等伟大的创举！

我们在城市化过程中呕心沥血，成天盘算着怎样偷工减料才能不成为

① 城市化不能“大跃进”[N]. 人民日报, 2011年2月14日.

“楼脆脆”、“楼歪歪”，怎样将世界上所有的动听名字搬到中国让中国人足不出城便可以享尽世界绝妙风光，怎样用诚实的房托吸引住准备买房的人……目的不就是为了房价飞一般上涨，今后可以高价再买政府手中的土地吗？

我们为地方 GDP 和土地财政作了莫大的贡献，房子建到哪里，城市才能“化”到哪里，房地产的支柱地位不可动摇。否则，房地产商都不再买地了，土地财政就玩完，要想用卖地的钱建什么辉煌的广场，再造几个城市，就更没指望，地方经济也得掉一半下去。如果实在要逼着房地产商降价，那银行得先准备倒闭。

这不，狠话放出来了，地方政府被逼得也是实在没办法。不是要限购吗？那就只限中央城区的，反正中央城区已经基本开发完了，限不限问题不大。要开发就到远一点的地方去吧，你们去了，就说地铁很快要修过来，这样房子会卖得快些，如果实在不灵的话，我们就开个讨论会，讨论讨论行政中心是否可以搬到你们那里去。

不是国土资源部不给地吗？那咱还是打农民的主意，请“农民上楼”，腾出宅基地换取城镇建设用地指标。于是一场让农民上楼的行动在全国 20 多个省市悄然展开，山东诸城宣布取消域内所有行政村建制，生生造出 208 个“万人村”^①。山东诸城已经达到了 100% 的城镇化，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房地产商和地方政府的相互利用裹挟了城市化进程，造成城区面积的快速扩大，城市密度日渐降低，城市空宅率日渐提高。从 2000 年到 2008 年，中国城市建成区的面积以 6.7% 的年平均速度在增长，而中国的城市人口增长速度只有 2.5% 左右，^② 城市化的密度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城市每平

① 不能把农民“逼上楼”“打上楼”[N]. 新京报, 2011 年 5 月 2 日.

② 张曙光. 世界经验已证明城市化是必然趋势. 凤凰财经, 2011 年 4 月 14 日.

经济如此 , 你要早作打算

方公里接近 2 万人,到现在只有 9000 人左右^①。这本身和城市化是背道而驰的。何为如此?圈地运动需要也!

“经营城市”本身的逐利性与房地产商贪婪天性的紧密结合,成为推动中国城市化的巨大动力,间接引发了房价从 2003 年起的一路高歌猛进,而这也正是地方政府不愿意深刻打压房地产的根本原因。

● 凋敝的乡村

乡村相对落后的生产力,在 GDP 至上的竞争下注定不可能受到重视,乡村不可避免地走向凋敝。

两亿多进城农民背后留下的是静寂的小村庄,荒芜的田野上只有飞鸟飞过,远处有几个人影在灰白的天空下浮动,渐渐地越来越小,消失在天际的那头。曾经清澈的小溪已变得遥不可及,曾经的欢笑只能在春节大返乡时才可以听到,但这欢笑短暂而仓促,不久乡村又陷入了长时间的沉寂。几声爆竹轰然炸响在寂寥的天廊下,牛们因此昂头呼应,那是天地间不绝的回响,也是乡村凋敝的哀音。

在城市化的大潮中,乡村在沦陷。

几千万家庭长期处于撕裂状态,幼无所养,少无所学,老无所依,这究竟是城市化过程中乡村可以避免的代价,还是乡村本身的宿命?

年轻人外出打工了,早期还一年回来一次,如今已是多年难回。部分老人也随着子女搬到城镇居住,村庄里平常只有老人、儿童和狗。留下的一片片住房空空荡荡,日渐破败。农业生产设施早已不复曾经的模样,田野一片荒芜,杂草与庄稼齐生,河湖与腥臭同在。曾经的美丽乡村已然让位于污水和垃圾。入夜以后,间有零星的灯光在昏夜中明灭,显示人迹的存在,而偶然的狗吠,也显得孤单和无精打采。

^① 杨伟民:盲目开发是城市化进程扭曲的主因。中国经济网,2011 年 3 月 29 日。

乡村的留守者是 5800 万儿童^①和他们年老的祖辈们，中国广袤的乡村如今是他们在努力支撑。根据 2009 年全国妇联的统计，14 岁以下的留守儿童有 4000 万人以上，其中，57.2% 的留守儿童是父母一方外出，42.8% 的留守儿童是父母同时外出。留守儿童中的 79.7% 由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抚养，13% 的孩子被托付给亲戚朋友，7.3% 的孩子不确定或者无人监护。许多家庭里，孩子才一岁左右，父母就外出打工。农村家庭夫妻分居、母子分离已是常态。

曾经的乡村，学校就是一个村庄的中心。近十年来各地大力推行“撤点并校”，村一级学校几乎全部并到乡镇，从 1998 年到 2007 年，中国的学校数目减少了 47.5%。乡村的中心消失了，乡村渐渐地也将归于消亡。但同时，适龄儿童人数却只减少了 24.3%，很多孩子要读书只能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去。而农村大量学校的教室和师资明显不足，常常一间教室挤七八十个学生，很多学校又实行 24 小时全封闭式管理，学校食堂被承包，学生伙食常常很难令人满意。

没有温馨的家庭环境，加上教育环境的不到位，许多留守儿童表现得封闭、冷漠、自卑、孤僻。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越来越消极，很多儿童被社会不良风气熏染，变成整日游手好闲的游民。在农村，少年犯罪率、自杀率近几年都在不断上升。

在我们夸耀已经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背景下，却有 1.8 亿人所居住的农村在“基本”之外，即使是“基本”之内的很多地方，每年上学依然得缴纳不少的费用，很多偏僻地方的失学率甚至达到 50% 以上。令人痛心的是，越是教育凋敝的地方，农民越把希望寄托在教育上，他们希望穷其一生可以培养出一个大学生，但现实是无情的，教育成本日渐高昂，并不是农民肩挑背扛承担得起的，农民孩子的大学梦越来越远了。

^① 全国妇联 2009 年的统计数字，中国有 5800 万留守儿童。

经济如此 , 你要早作打算

当世纪翻开新的一页时，我们惊讶地发现，农村孩子在大学生源中的比例在明显下降，与1980年相比，几乎下降了一半。这是一个新的世纪！新世纪里，一个贫困家庭倾其所有培养出一个大学生，却发现孩子根本找不到工作，那是怎样的一个困窘呀！整个家庭的希望轰然倒塌。

家乡已然远隔，身边的城市陌生而冷漠，几无容身之地，这对于初涉社会的农村大学生来说是怎样一种心境和压力。“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游民”成为他们之中很大一部分人的真实写照。

农村公共设施几近于无，道路泥泞不堪，水利设施长久失修，更谈不上什么公共图书馆了。不远处的镇上倒是有几家花花绿绿的歌舞厅，那是为乡镇干部和煤老板们准备的，老乡们过门只有侧目，能和里面进出的人打个招呼，在乡亲们看来也是一种荣耀。

乡村中人们的亲情在逐渐淡漠。据湖南省对留守儿童的一个调查表明，留守儿童中，38.4%的人认为父母不了解自己，20%的人认为与父母在一起的感觉很平常，7.4%的人甚至不愿意和父母在一起。和父母都“形同陌路”的孩子们，将来会是什么样？我们真不敢想象。

我们曾经视为儒教传统根基的孝道已然冰消瓦解，传统的乡间伦理早已解体，剩下的就只是金钱与利益，钱成了衡量自我价值的唯一标准，抢劫、卖淫已不再是“见不得人的勾当”。

这是《南方周末》一个记者与打工者的一段对话^①。

（记者）问：“你生活中最大的压力是什么？”

（打工者）答：“钱。”

（记者）问：“为什么？”

（打工者）答：“如果没有钱，回到村里就会被人鄙视。而如果有了钱，

^① 城市里的陌生人——黑道乡村 [N]. 南方周末, 2011年7月12日.



所有的人都看得起你。”

（记者）问：“那如果你告诉村里人，这钱不是靠打工而靠抢劫得来的，他们还会尊重你吗？”

（打工者）答：“当然尊重。因为我们那里的人会说，这是他用命去换来的钱！”

在这样的乡村里，法律已经无法进入村民的日常生活了，很多乡村因此越来越走向“丛林社会”，弱肉强食。

今天的中国已经断裂为严重失衡的乡土中国和城市中国两部分。在乡村，人们四散离去，留下的已不再有生命力。在城市，进城的农民因为体制的缘故，无法融入城市，他们行走于城市与乡村之间，被城市排斥的同时却又已经不愿再回到熟悉的乡村，不是他们愿意在城市里忍受寂寞、歧视与无端的屈辱，而是回到乡村结果只会变得更坏，因为故乡确实太过凋敝了。

如果有一天，当他们在城市里无法生存时，“被排斥者”对于他曾经心向往之而不能至的城市会是什么样的感情，我们能够想象吗？当金融危机刚刚影响到我国时，社会上屡次出现的恶性事件应该已经给了我们足够警示：慌不择路的施于弱小群体的恶性报复，是社会的悲剧，更是人性彻底的沦丧。

我们记忆中的社会不是这样子的，它应该有起码的廉耻和侧隐之心，对于弱小我们至少不能欺凌，对于父母我们至少懂得孝敬，对于儿女我们至少知道抚养。如果一个社会堕落到公然以欺凌弱小为乐，公然用刀子刺杀生养自己的父母，坦然地出卖自己的亲生骨肉以换取金钱，那这个社会最终只能是万劫不复。

我们记忆中的故乡不是这样子的。静寂的夜晚，当我们躺在遥远的城市里时，故乡曾经是我们苦难的慰藉，是我们心灵的归宿，是我们灵魂深处最柔弱的那根琴弦。现在故乡已经变得越来越陌生，越来越不易亲近了。

经济如此 , 你要早作打算

曾经的故乡已随风而逝，而我们的灵魂又将何处安放？

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传统都深植于乡土之中，城乡本为一体，乡村本是城市之源。但近几十年来，城市和乡村日益成为对立的双方，水乳不能相融。我们的乡村正在凋敝，我们的故乡正在沦陷。

如果我们失去了广袤的乡村，城市又将何以为附？我们的社会又将何以为附？

第三节 经济发展模式背后的隐忧

2007 年源自美国的金融危机重创了发达国家的经济，当西方依然处于惊恐之中时，中国经济却在 2008 年实现了 9% 的高速增长，外界自是有些莫名其妙。因为诧异，不免就认为中国当有独特法门，不然何以能在危机中独善其身？于是“中国模式”一词成为中外解读中国经济的热门词语。

“中国模式”流行时间很近，但其源起却已湮灭不可考，仿佛是西方人首先提出，但也可能是海外华人，说不清楚，后来俄罗斯人开始使用。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时，国内媒体和某些主流经济学家似乎还准备拿“中国模式”来为庆典放一个礼花，一时中外呼应，煞是热闹。

但很遗憾，对于什么是“中国模式”，大家越讨论越混乱，有的甚至开始将“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中国道路”混用，至今也没有一个可以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意见领袖出来。

有的以为“中国模式”很了不起，具有世界意义，不仅是中国人之福，甚至可以输出到其他发展中国家^①；有的说“中国模式”已经在挑战西方主流经济学了^②；有的以为就是有也不独特^③；有的认为模式可能是有的，

① 姚洋，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② “中国模式”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挑战，人民网，2011 年 7 月 27 日。

③ 黄亚生，“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 [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

但别欢呼得太早，这个模式说不定是个陷阱^①；更有甚者，认为根本就没有什么“中国模式”，凡是赞美“中国模式”的，都有点可疑，可能要害我们^②。

搞什么搞，搞了这么久，模式有没有都成了问题。事情有点玄了，但“玄之又玄”，正是“众妙之门”。

● 效法“东亚模式”

“中国模式”首先应该是一种经济发展路径，然后才是一种制度模式。因此，我们首先需要搞清楚这些年来中国经济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改革开放后很长时间，指导我们经济建设的理论只有两句话，“摸着石头过河”和“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对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我们很多时候采取的都是应急式解决办法。时间稍长，大家都觉得总这样零敲碎打似乎不行，于是理论界尝试要建立一套能够有效运转的经济体制。

怎么建立？闭关锁国几十年造成我国和外界几乎完全隔绝，内外理论界根本不在同一个语境中，学习就成为建立自己理论的捷径。

由于意识形态的局限，我们学习的对象首先在社会主义阵营中选择。斯大林那一套是不行了，赫鲁晓夫的经济改革也不成功，但柯西金的“改良的计划经济”好像还可以，于是试试，但结果依然令人失望。

老大哥的不灵，那就在东欧“友邦”那里找找支持，于是学习东欧的“内含有人市场经济的计划经济模式”，但麻烦的是很多东欧经济学家自己都承认这套模式运行不成功。完全的计划经济体制看来有点问题，于是将目光转移到了我们的“小邻居”身上，那就是所谓的“东亚模式”，但这就得要求放弃严格的计划经济，转而实行至少是部分的市场经济。

① 吴敬琏：中国模式祸福未定 我们不要忘记所以 [J]，中国改革，2010 年 10 月。

② 陈志武：没有中国模式这回事 [M]，台湾：台湾八旗文化出版公司，2010。

经济如此 , 你要早作打算

因此，指导我们经济建设的理论思想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1982年）、“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4年），一直转变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2年）方告一段落。算是中学结业了。

“东亚模式”，简单地说就是指包括日本、“亚洲四小龙”在内的国家和地区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展形成的经济发展制度，其核心是集权或者威权政体下的市场经济，经济上实行国家有限干预的外向型市场经济，政治上实行集权主义和精英治国。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创造的经济持续增长奇迹，对我们有着非常大的吸引力，而“亚洲四小龙”中的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新加坡与我们同文同种，都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是与我们有着血缘关系的亲属；韩国很早以前就是中华帝国的藩属，也算是远亲。它们的迅速崛起证明西方人可以的，我们同样也可以。更重要的是“东亚模式”下的政治集权主义与我们政治上“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原则恰好契合，于是“东亚模式”就成为我们模仿学习的主要对象。

吴敬琏教授曾经提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左右，占主导地位的是另外两个模式，一个是东亚模式，就是以日本为首的所谓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另一个是欧美模式，我们把它叫做自由市场经济。大体上说，领导干部偏爱东亚模式，比如小平同志最推崇新加坡，国家经委偏爱日本通产省，国家计委偏爱韩国企划院。而受过现代经济学训练的经济学家，都偏爱欧美模式。但他们对大的方向没有分歧，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共同面对计划经济，他们都反对这个东西；另一方面是因为，即使主张欧美模式的经济学家，也承认在市场没有发育起来之前，政府要承担一些调节作用，这样就结成了一个联盟，大家都赞成要搞市场经济，至于政府作用的大小问题，可以存而不论。但这一点就变成了我们目标模式上的一个模糊之处。从理论的完整性来说往往表现为第四种模式即自由市场经济，但具体到政

策上，往往表现为第三种模式即政府主导。”^①

目标已经明确，“小老师”又正在前方慢慢踱步，我们于是加快了步伐。1992年之后的几年时间里，我们先后在财税、金融、外汇管理、企业制度、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改革在宏观经济体系建立和所有制结构调整两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进展，原来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发生了改变，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的比重有了较大下降；人民币汇率也在1994年年初一次性贬值50%，标志着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也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

尽管如此，由于旧体制中既得利益者的影响和阻挠，虽然国有经济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已经不到一半，但政府和国有企业仍然是稀缺经济资源的主要支配者。

针对这个问题，十五大（1997年）明确提出要根据“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原则，调整和完善国民经济的所有制结构，缩小国有经济范围，国有资本要从不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退出，明确宣布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鼓励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此后几年，我国经济的所有制结构明显优化，除少数垄断行业外，民营经济一般居于主要地位，国有企业绝大多数也从国有独资变为股份多元化的公司制企业，市场化体制框架在我国基本成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得到加强。

这些举措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我国GDP增长多数年份都在10%左右，经济增长的质量也不错，居民人均消费增速都快于GDP增速，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图4-1为1979—

^① 吴敬琏：《经济转型破除思想禁锢超越“东亚模式”》，南方网，2008年7月8日。

经济如此  , 你要早作打算

1996 年我国 GDP 与居民人均消费增速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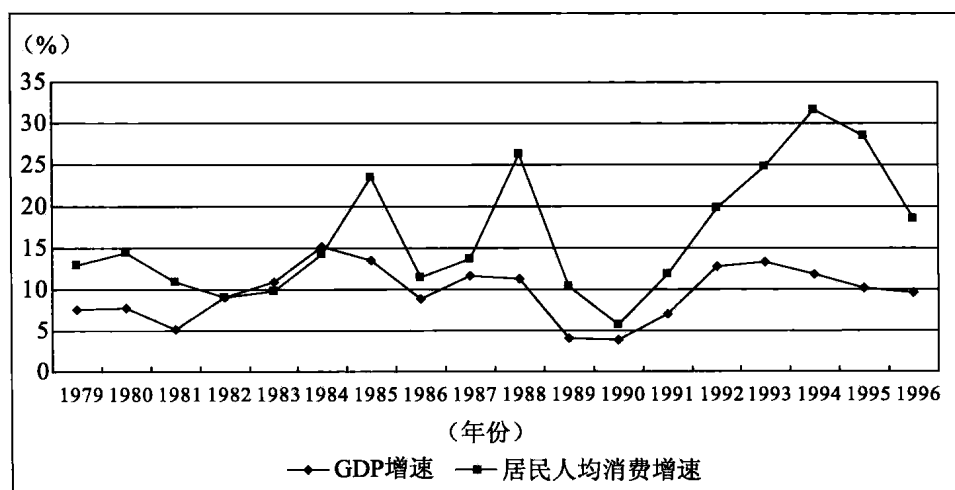


图 4 - 1 1979—1996 年我国 GDP 与居民人均消费增速比较

同时，外贸进出口总额也出现快速增长，进出口总额占 GDP 的比例从 1985 年的 22% 上升到 1994 年的 40% 以上，到 1996 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 24133.8 万亿元人民币，外向型经济基本成型。1985—1996 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增长趋势及其占 GDP 比例的变化，如图 4 - 2 和图 4 - 3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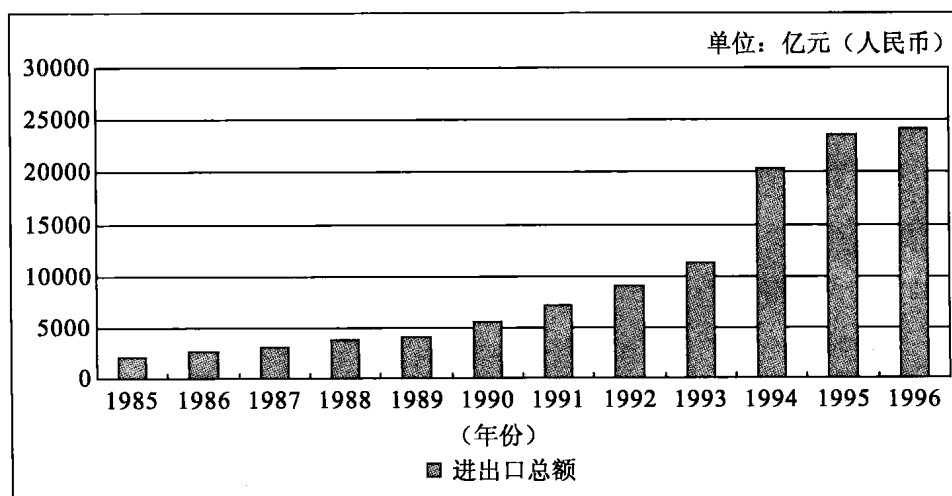


图 4 - 2 1985—1996 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增长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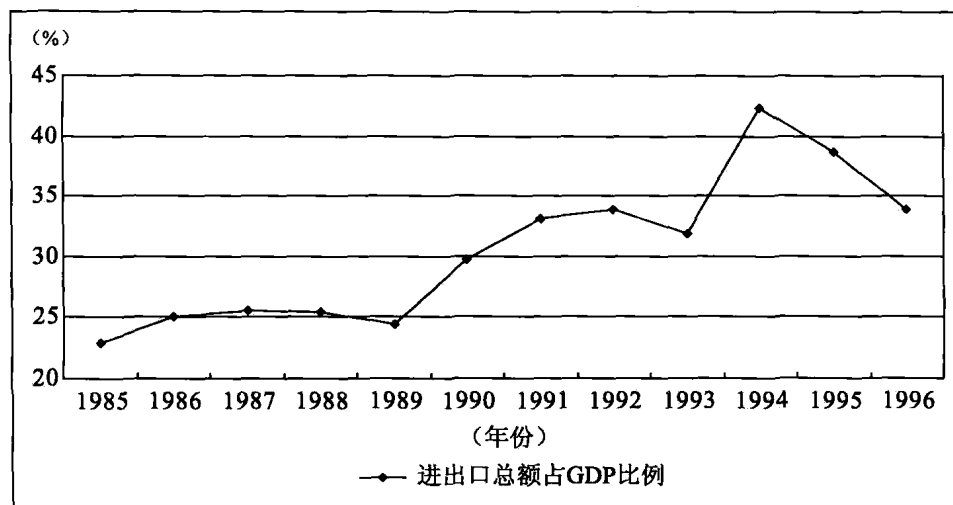


图 4-3 1985—1996 年我国进出口总额占 GDP 的比例变化

以上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资料整理。

“东亚模式”拐了一个弯

对于“东亚模式”本身，事实上也存在诸多争论。有的认为东亚的成功探索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经济发展道路，“这是一种将东、西方价值观完美结合的模式，一种包容自由、有序、社会关注和个人主义等信念的模式，东方崛起的最大意义是孕育了世界现代化的新模式。”^①

有的认为，东亚国家的发展很大程度依赖大规模的劳动力和资金投入，而非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FP）实现，所谓东亚奇迹是虚构的神话，是“纸老虎”^②。不幸的是，亚洲金融危机给了“东亚模式”当头棒喝，彻底暴露出外向型经济的弱点和裙带资本主义的体制弊端。美国《外交》杂志曾因此庄严宣告“亚洲金融危机证明美国经济模式正确”。^③

正是因为外向型经济的固有弱点，早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以贸易立

① [美] 约翰·奈斯比特. 亚洲大趋势 [M]. 北京：外文出版社，1996：275.

② Paul Krugman. 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 Foreign Affairs, 1994: 10—11.

③ [美] 唐纳德·埃默森. 亚洲美国化了吗 [N]. 外交双月刊，1998 年 6、7 期.

经济如此 , 你要早作打算

国的日本在 20 世纪 70 年代对美贸易就出现了巨额顺差，导致两国贸易摩擦不断，日本逐渐认识到要调整经济结构，将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变为内需主导型经济，走协调发展的道路。

到 1985 年日本自信地认为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打败他们了，于是与美国、联邦德国、法国以及英国共同达成了“广场协议”，通过五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诱导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有秩序地贬值。“广场协议”签订后，日本加快了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增长的动力转到了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被转移到了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这样，东亚就形成了日本学者所谓的“雁行阵势”，日本是头鸟，后面跟着东亚“四小雁”和其他经济体。

这些国家都以出口为导向，随着经济的发展，对外依存度也逐渐提高，尤其是对美国市场存在很强的依赖性。此后全球经济出现了严重失衡，主要表现就是美国巨大的贸易赤字和东亚过剩产能之间的失衡，失衡的结果最终导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亚洲四小龙”效仿日本的做法，在经济上顺应自由化与国际化趋势，开始调整经济结构，政治上则顺应民主化潮流，实现政治民主化转型。伴随东亚地区的经济转型与产业转移，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不断下降，贸易摩擦减少。与此同时，中国则成为东亚国家和地区经济结构调整的受益者，不仅成为其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接国，对美出口总额也从 8.6% 飙升至 26.4%，东亚国家退出美国市场的份额很大部分被中国占据了。

中国及东亚各经济体对美出口额占各国（地区）总出口额的比重变化，如表 4-2 所示。

表 4-2 中国及东亚各经济体对美出口额占各国（地区）总出口额比重

年份 国家（地区）	1985 年	1995 年	2004 年	2007 年
中国	8.6%	16.6%	21.1%	26.4%
中国香港	30.8%	21.8%	16.5%	13.5%
中国台湾	48.1%	23.6%	16.2%	13%
日本	37.6%	27.5%	22.7%	20.3%
韩国	25.6%	19.5%	16.9%	12.8%
新加坡	21.2%	18.3%	13.0%	6.1%
泰国	19.7%	17.9%	16.1%	14.8%

资料来源：2007 年之前的数据来源于 IMF，2007 年数据来源于 UN COMTRADE DATABASE。

这种产业转移使整个东亚形成了一个全球性的产业链条：美国（基础研究）—日、韩、新、中国台湾（应用开发）—中国和东盟（制造生产）—出口到美国和欧洲。但全球经济的不平衡却并未改善，只是中国被绑在了失衡的中心位置，自此之后，中国出现了东亚不断增长的贸易逆差和对美国、欧盟不断增长的巨额贸易顺差。如表 4-3 所示。

表 4-3 2003—2008 年中国对外贸易平衡表（单位：亿美元）

年份 国家（地区）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韩国	-230.3	-344.3	-417.1	-452.5	-476.2	-382.1
日本	-125.1	-208.6	-164.6	-240.8	-318.8	-345.2
中国台湾	-403.6	-512.3	-581.3	-663.7	-775.6	-774.6
东盟	-135	-200.8	-196.3	-182.1	-139.8	-28.3
美国	473.6	802.7	1141.7	1442.6	1633.3	1708.6
欧盟	135.3	370.4	701.2	916.6	1342.3	1601.8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商务部公布的资料整理而成。

经济如此 , 你要早作打算

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国经济发展的车轮正是被亚洲金融危机给绊了一下，因此方向上出现了一些偏差，这种偏差开始似乎微不足道，但到后来已大相径庭。历史可能真是一连串偶然事件的集合。

几乎正是在中国 1997 年决定大步迈向市场经济的时候，亚洲爆发了金融危机，中国一时内外交困，经济发展在 1998 年出现了较为明显的降速，GDP 增长率只有 7.8%，且出现了通货紧缩。

为应对金融危机，在朱镕基总理的领导下，中国一方面加强市场化改革，继续执行国退民进的策略，对关键领域的国有企业强化自身约束，努力建立良好的企业治理机制；同时实行西部大开发，希望建立一个相对有效的国内大市场；此外，政府采取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大幅增加基础建设投资，进行房改、医改和教改，推行房地产产业化、医疗产业化、教育产业化。另一方面加强政府机构改革，精简机构，将国务院所属的 41 个部委一下子减少了 12 个，被撤掉的部委集中在经济领域，国务院系统一级公务员减少一半，政府对经济过多的介入一时得到很好的抑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空前强化。

但遗憾的是，国内市场不是一个晚上可以建成的，正如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改革开放之前，为应对设想中的大规模战争，中央以下各级行政区域均建立了基本相似的产业结构，造成了资源的极大分散和浪费，也削弱了中央计划当局的权力；但也有一个好处，地方自足的经济结构使得各地自然形成了市场分割。

而我们进行的经济改革，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放权让利给地方，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在各地竞相追逐 GDP 和自上而下的政绩考核制度的背景下，各地政府不约而同地加强了对本地资源的控制和保护，造成大量新的毫无必要的浪费，地区之间产业趋向雷同，全国市场因此变得更加零碎，对内部市场的整合形成了难以克服的障碍。至此，统一的国内大市场体系宣告暂时失败。

国内市场的分割,使我们在危机中也只好继续沿着外向型经济前进,依靠大幅提高出口退税率,加紧拓展拉美、中东和非洲等新兴市场来稳住出口。出口受抑,内需又不动,加大基础建设投资自然也就成为吸收过多产能的重要手段。

1998 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 28406 亿元^①,较 1997 年增加了 14%,固定资本形成占当年 GDP 的 36% 以上,自此之后,投资占 GDP 的比重逐年增加,到 2009 年已达到近 50%。

1997—2010 年我国全社会投资增速与 GDP 增速的对比,如图 4-4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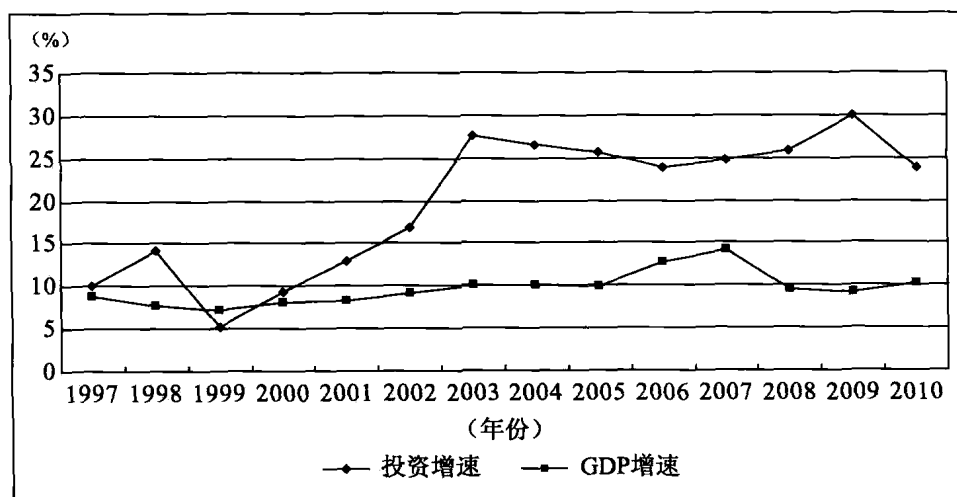


图 4-4 1997—2010 年我国全社会投资增速与 GDP 增速的比较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资料整理。

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由于选择渡过危机的方法不同,中国在经济发展的路径上表现出了明显有别于“东亚模式”的地方。东亚国家在危机应对中选择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以及制度性改进,尤其是政体的转变,最终走向了民主政体下的市场经济。

^① 引自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

经济如此动荡，你要早作打算

而中国则逐渐走上了一条离“东亚模式”越来越远的发展道路，政府在危机中对经济的强势介入，通过加大政府投资以消化过剩产能的临时举措，在危机后被当成政府参与经济的常态，于是新一轮投资大潮开始全国性上演，投资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大，消费所占比重越来越小。

政府通过投资拉动经济的常态化本质上与政府转型和精简政府机构是矛盾的，正是这个矛盾，导致我们一度向“小政府”转变的格局慢慢出现了逆转，对国有企业的认识也逐渐从“退”转变到“进”。

肇始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是我国政府首次“试水”强力干预渡过危机，尝试的成功客观上加强了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自信。从2001年开始，中国因为大规模的投资拉动，经济走出了新一轮快速增长，到2003年出现了较为明显的过热迹象，对于“经济发烧”，政府“退烧”是很有经验的，那就是进行宏观调控。

在很多政府官员以及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看来，由于我国市场机制不健全，间接的宏观调控手段存在较为严重的市场失灵，需要用行政手段进行强行控制，由于政治上的集权，行政手段调控经济被看做中国特有的政治优势，调控得多了，似乎也就越来越得心应手。

经过几年国企改革攻关，国有企业的效益从2003年开始好了起来，因为效益转好，国有企业产权不明的缺点似乎已不再是经济效益提高的障碍。既然如此，国有企业“退”的步伐就明显慢了下来，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自然也得到了提高，甚至被提升到共产党执政基础的高度看待，于是“国进民退”在未来的经济格局中也就成为必然。

国有企业效益的提高、事实上的“国进民退”以及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又进一步刺激了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行为，并使之从一个原本已计划要缩小的“有限政府”又回到了实际上的“无限政府”，政府开始以为自己无所不能了。但这不是政府的过错，GDP数字的持续增长本身提供了证明。

亚洲金融危机过后，很多原东亚国家政治上顺利完成了从威权到民主

政体的转变，原教旨的威权体制下的“东亚模式”事实上已经不复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东亚模式”兼容似乎变得遥远了，在此之后，中国官方也甚少提及“东亚模式”。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继 1981—1984 年、1989—1992 年之后，爆发了历时两年的第三次改革大辩论（2004—2006 年），争论的焦点最终又回到改革开放是否正确，我们是否还需要坚持改革开放^①。

这个命题本身是一个伪命题，坚持改革开放肯定是不容否定的，暗藏在背后的忧虑其实是“东亚国家转型了，我们应该怎么办？”这场争论由于中共十七大的正式回应而告一段落，会议明确指出：“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但这种忧虑并未因官方的正式回应而得到消解。

● 被误读的“中国模式”

2007 年，新一轮金融危机来袭时，我国政府依然是老办法新用，依靠 2008 年 4 万亿元的投资和 10 万亿元的新增信贷，政府对经济持续的行政干预，以及国有企业的不退反进，我国依然实现了 GDP 的高增长。当别国还在苦海挣扎时，我们早已爬到岸上了。

利用政府对经济的强力干预，中国渡过了两次世界性经济危机，这给了我们政府足够的强力干预经济的理由。渡过一次危机，可以说是偶然，渡过两次就变成了一种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中国继承的“东亚模式”于是摇身变为“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赢得了世界关注的目光。在不少人看来，这也可以成为其他国家学习的榜样，甚至可以挑战一下高高在上的“华盛顿共识”。真是“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

美国和西方该感到有危机了。

^① 吴敬琏：《中国经济六十年》[J]，财经，2009 年第 20 期。

经济如此 , 你要早作打算

但他们不。在他们看来，“中国模式”虽然赢得新的光芒，但中国依然“不断崛起却又脆弱”^①，而其主流社会对于“中国模式”要么视而不见，要么以为没有任何值得学习的东西，既没有道德上的诱惑力，也没有人权上的优势。

他们的国务卿希拉里甚至高调宣称：“有些人注意到了中国，说‘天啊，他们的年均增速有9%、10%，盖过了别人’。如果你有独裁主义心态，或者历史上存在独裁主义心态，觉得这种状态更加舒服，那么‘中国模式’就可能有吸引力。”

她还告诫受到“中国模式”引诱的国家，“如果你真的关心国家的发展，如果你希望你的人民获得长远的福祉，那么就必须让政治自由和尊重人权与经济发展匹配”。^②

你看，这个女人说话多气人，但我们是大国，一般不与人计较，自然更不会与一个女人计较，尽管她曾经是美国的“第一夫人”。

在美国看来，除了它的盟友之外，其余都是需要它关照的对象，要么你来给我打工赚点美钞养家糊口，要么你来学学我的“普世价值”，如果这两样你都不愿意，自己要关起门来瞎搞，那对不起了，我得做好世界警察的本分，要来修理你。

世界经济秩序的更替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近代以来，世界经济发展理论的主流是起源于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遵循“小政府大市场”的基本原则。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苏俄开始了社会主义尝试，也就是计划经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基本分成壁垒森严的两大阵营，各自按照内在的逻辑进行经济比拼，但很遗憾，随着苏联和东欧的解体，计划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尝试宣告失败，市场经济一统江湖。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也是顺着市场经济这条路一步步前行，从计划体

① 盘点外媒关于“中国模式”的报道。新华国际，2010年11月27日。

② 新兴的中国模式对其他国家来说优劣并存 [N]. 悉尼先驱晨报，2010年11月16日。

制内徒劳无功的改良，到发展商品经济，再到市场经济，层次分明，目标清晰，极大地释放出国民经济的活力，支撑了中国经济三十多年来的高速增长，并迅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在美国金融危机之前，对于“中国模式”的讨论更多集中在经济发展路径上，不管是“东亚模式”也好，“中性政府”的良治也好，还是“渐进制度观”、“低人权模式”也好，大家比较趋同的是中国改革还在半途，“中国模式”尚未定型。但在金融危机之后，这场争论从经济方面延伸到了政治体制，变成了第三次改革大辩论的延续，只是这次争论的核心从改革是“进”还是“退”变成了“进”或“停”的问题。

由于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西方经济呈现出了相对衰落趋势，我国则用老办法快速跳出了危机，外界因此欢呼“中国模式”的胜利。我们一些人也就认为既然我们两次战胜了金融危机，那足以证明这个模式具有良好的生存和适应能力，是中国最好的发展道路，以为我们完全可以按照这种模式继续走下去，也就是继续采取集权政治下的有限市场经济模式。

如果说，我们因为渡过了两次世界性经济危机，就证明中国政府干预经济这种模式具有无与伦比的优越性，是今后我们继续遵从的标准，那么“中国模式”就此不动无疑是应该的。但如果说，虽然我们扛住了经济危机的冲击，但过度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已经不可持续，而国有企业由于固有的制度性缺陷，容易造成效率低下，政府过度干预经济容易造成寻租和腐败，这些方面我们还需要改。那么，我们的改革方向在哪里？

一路往“西”去，难度似乎很大；折回头回到传统的计划经济时代肯定又不现实，目前的既得利益集团也不会允许。那么，停在原地不动呢？事实上不可能，因为我们早就已经认识到经济需要转型这一现实。

在很多西方人看来，中国经济持续繁荣是一个大的悖论，有些不可理解。经济上建立起了初步的市场经济体制，但保留了政府对经济的强大干

经济如此 , 你要早作打算

预权力，国有经济成分占比很大且垄断着一些重要行业。

而在我们某些人看来，这正是“中国模式”的精髓所在，并武断地认为在当今中国社会，起决定性作用的不再是任何单一的力量或价值，而是多种力量、价值的综合，因此中国也有了不错的相互制衡。在这种模式下，中国可以按照自己的特征和需要，走“半市场、半指令”的道路，因为政府具有高超的平抑市场周期波动的强大干预力。

因为有了超凡的“自适”能力，我们当然可以搞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混合模式。渐变式改革决定了混合经济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至少是一个必须经历的过程；落后国家在赶超发达国家的过程中，良好的集权政府治理对经济也有着很好的促进作用，这些都不可否认。而经济发展成功的关键，甚至可能是唯一的关键，是“找到正确的制度”。

中国的改革开放作为一项伟大的实践，目前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否定西方现代化以来所积累的知识对我们的引领作用。市场经济、民主、自由、尊重个体生命的价值，这些东西是具有普世价值的，这一点也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一致认同。

为“找到正确的制度”，我们已经“摸”了很多年，也许我们还将继续“摸”下去，因为别人以为的“正确制度”并不一定适合我们，适合我们的“正确制度”还在远方。

● “中国模式”背后的陷阱

早在几年以前，吴敬琏先生就提出改革需要“过大关”，我们需要通过“惊险一跃”来完成，也需要运用大智慧对改革进行“顶层设计”。但很遗憾，这个大关我们还没过，似乎现在也不太准备要过，而“顶层设计”究竟要设计成什么样子，吴老先生似乎也不好明说。之所以要“过大关”，要“顶层设计”，是因为我们现在面临很多荆棘和陷阱。

第一，政党垄断国家权力暗含的前提是社会大众多数的授权，也就是

说要有合法性。封建社会自然是天命所归，现在不同了，得通过经济的不断发展带给大众更好的福利，这是一个政党执政能力的真正体现。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过程中，执政党要具有超凡的前瞻性、快速的适应能力和及时纠错的能力。但一般以为，如果没有良好的约束机制，即使一个具有很强专业知识和良好意图的政府，要在一个迅速变化和复杂的全球经济环境中作出好的决策，也会很难，甚至还会作出不理智的决策，从而造成资源的浪费和经济负增长，造成大灾难。

第二，2007 年美国的金融危机是因为失衡而产生，但到目前为止，世界经济失衡的格局并未发生任何改变。与欧美国家经济去泡沫化不同，中国几乎没有从西方的危机中吸取教训，救市政策反而刺激了投机、加剧了资产泡沫、制造了大量的地方债务，从而加重了中国国内本身就已存在的失衡状态。

站在中国的角度看，世界存在着四重失衡：东亚国家，包括中国在内，与欧美国家之间的失衡；中国与东亚国家之间的失衡；中国内部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失衡；中国国内的资产泡沫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这些失衡如果不能达到再平衡，世界经济要想恢复到危机之前的全球增长状态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们虽然暂时渡过了这场金融危机，但经济发展似有不可持续之虞。我们当初之所以在危机波及我国时，放胆采用 4 万亿元投资和紧随其后的 10 万亿元信贷投放，是希望以此暂时渡过难关，平滑一下经济周期，以便于外部经济好转时继续在老路上放马狂奔，但这个打算现在看来有点玄了。外部经济一时难以复原，我们过剩的产能出口遇到了越来越大的阻力。

国内消费市场，虽然我们提出了收入倍增计划，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加强了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但居民消费占 GDP 的比例也仅从 2008 年的 35.2% 上升到 2009 年的 35.6%。2010 年国家大力促进消费，包括降低汽车购置税、汽车家电下乡补贴等，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居民消费占 GDP 的

经济如此 , 你要早作打算

比例也仅达到 38.8%^①, 2011 年该比例极可能折而向下。而资产泡沫也早已从房地产延伸到了古董、艺术品、红木家具甚至是农产品等领域。

经济失衡的难题需要破解之道, 这不仅需要智慧, 更需要勇气。

第三, 当一个社会利益集团明显多元化的时候, 需要有效平衡社会利益。北京大学的姚洋教授在解释中国经济发展之所以成功时, 提到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存在一个“中性政府”, 它不会为任何利益集团所俘获, 而是为了国家和人民大众。这在改革开放之后一段时间内是非常正确的看法, 因为中国的社会阶层明显地扁平化, 大家共同的诉求就是搞经济建设。

改革开放到今天, 我国出现了明显的按照所掌握的财富和资源进行的社会分层, 贫富已经极为悬殊, 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且很难调和。在这种利益取向大相径庭的情况下, 党和政府还能保持“中性”吗? 又如何才能保持“中性”?

第四, 政府对经济的介入如何法制化的问题。“宏观调控”正在演变成通过行政手段对经济进行的微观干预, 也正在变成政府介入经济的常态。

政府介入经济在没有解决权力监督和约束的情况下, 有着很大的风险。首先就是腐败问题, 因为有钱又有权, 寻租当然就免不了, 腐败也会屡禁难止。“根据 1988 年以来若干学者的独立研究, 中国租金总数占 GDP 的比率高达 20% ~ 30%, 年绝对额高达 4 万亿至 5 万亿元。”^② 其次是市场自由交换秩序得不到保证。最后是资源错配, 在所有制成分多样的经济形态中, 政府需要公平公正地对待一切所有制形式, 防止金融等稀缺资源被浪费在导向错误的、关系紧密的国有企业中, 而那些有希望的新型小企业渴求融资支持, 却得不到国家的庇护。因此我们需要从制度上明确政府怎样调控宏观经济, 并营造规则透明、执法公正的调控环境。

① 国家统计局有关资料。

② 吴敬琏, 中国经济六十年 [J]. 财经, 2009 年第 20 期。

第五，如何让民众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福利。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在于改善大多数民众的福利。我们需要从深层次改变利益分配格局不公正、不公平的局面，让大多数民众切实享受到改革开放带来的好处。

● “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

1989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的经济专家以及拉美国家代表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研讨会，旨在为拉美国家经济改革提供方案 and 对策，由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执笔写成了“华盛顿共识”。

“华盛顿共识”共有十项内容，包括：加强财政纪律；把政府支出的重点转向经济回报高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改革税收，降低边际税率和扩大税基；利率自由化；采用具有竞争性的汇率制度；贸易自由化；资本准入，特别是外国直接投资进入自由化；私有化；放松政府管制，消除市场准入和退出的障碍；保护产权。

“华盛顿共识”与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一脉相承，后来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宣言”，其核心就在于“最大化的市场”和“最小化的政府”，要求政府对经济的干涉越少越好。

20世纪80年代，由于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在美英两国采取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成功，加上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科尔奈等人提出社会主义的试验已经结束，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水火不相容，向资本主义过渡是市场化改革的必然结果。“华盛顿共识”一时打遍天下无敌手，成为包医经济百病的“普世药方”，自然也就成为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极力向发展中国家输出的模式。

政府企图纠正市场失灵，而政府本身也有失灵。但是，“华盛顿共识”对政府的失灵矫枉过正，它假定所有政府都只能是“守夜人”角色：白天没你什么事，你的任务就只是单纯地保障契约实施和保护产权，其他的你

经济如此 ，你要早作打算

要做那也会是一无是处，不如不做。

这样的看法，自然很不合一些政府的胃口，也与东亚国家曾经信奉的发展战略形成鲜明的对比。在东亚，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甚至是主导的作用，于是就有人拿“阴暗面”来说事，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和拉丁美洲照你们的药方抓药怎么不灵呢？

还好西方人比较诚实，有人提出了“后华盛顿共识”，认为发展不仅是经济增长，而且是社会的全面改造；不仅要关注增长，还要关注贫困、收入分配、环境可持续性问题；同时指出市场力量不能自动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承认政府在促进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既然“华盛顿共识”都承认政府对经济发展有着促进作用，那依然保持政治集权的国家心里就多少有点底气了。随着中国经济持续不断的增长，基于中国以及越南这样的转型国家的成功经验与政策措施，这种转型的实践在国际上也就获得了不少的肯定与支持，并被认为是中国等亚洲国家转型的成绩及经验，可以对“华盛顿共识”提出挑战。但这样的声音，在很长时间里还比较微弱。到了2009年，中国似乎一夜之间崛起，中国渐变式转型赢得了世界性目光，似乎可以有资格与“华盛顿共识”比个高低了。

既然要比高低，那就得对等，别人是“共识”，你也得弄个“共识”出来。还好，“共识”其实早都有了，只是很长时间躺在角落里无人注意。

雷默的“北京共识”包括：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循序渐进，积聚能量；既务实，又理想，解决问题灵活，因事而异；不仅关注经济发展，也同样注重社会变化，体现了一种寻求公正与高质量增长的发展思路。

在雷默看来，“北京共识”将取代已广受人们怀疑的“华盛顿共识”，这是平等、和平与高质量的发展愿望。

雷默的“北京共识”一提出，就受到国内的广泛关注，但在国际上却影响不大。西方不喜欢，那是自然的，因为雷默想为“华盛顿共识”树立

一个对立面（很奇怪，雷默这个美国人事事实上的卖国贼勾当，在美国却并未引起公愤，甚至于批评他的同胞也没指出这一点，可见美国人觉悟之低下，真是不可思议）；一些经济学家更是认为雷默“对中国国内严肃的经验研究成果似乎看也不看，他大概只是把宣传品中最不实事求是的大话言辞当做了实际情况，填充进他的概念之中。”^①

后来雷默自己也觉得“北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相比没有什么确定内容，只是有足够的灵活性。有灵活性就足够了，于是他不断往里面注水。可惜他孤身一人，对经济又是一知半解，怎斗得过编写“华盛顿共识”的那一帮世界顶尖的经济学家，出来的结果依然不很理想，有的甚至成为笑谈。

比如，雷默认为，中国拒绝把人均 GDP 的增长作为进步的唯一标志，不搞自由国际贸易等。这不是往中国脸上抹黑吗？哪有这等事？！我们可是 GDP 的第一崇拜者，也是国际自由贸易的坚定支持者，不然我们一个劲地要求加入 WTO 干什么！

但是，说实话，“北京共识”这名字不错，在这个世界上还真难找到一个，且由纯种美国人提出的并自认为可以和西方普遍认同的“华盛顿共识”相提并论的概念。正因为其核心天然具有灵活性，因此“北京共识”经国内学者不断往里装填东西，内容越来越丰盈，像极了十八岁的大姑娘，有了十八变的功能。

“北京共识”的新颖之处在于体现了“渐变式改革”，一个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一个同时又在转型的经济体，如果要采取“华盛顿共识”的建议，只好经历“大爆炸”和“振荡疗法”，饱受痛苦不说，还可能“休克”；如果按照中国经历的渐变式改革，就会步步得益。

后来，有胆大的国内学者认为“北京共识”单说经济不过瘾，于是将

^① 丁学良，辩论“中国模式”[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经济如此 , 你要早作打算

政治引了进来，认为同“华盛顿共识”截然相反，“北京共识”就是把市场自由化改革放在民主化改革之前，甚至认为这是“北京共识”最重要的一个特点。

但很遗憾的是，“北京共识”的内容依然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因此很难说它本身在国内达成了一个什么共识，在国外甚至依然不断受到强烈的质疑。

这是大家共同的认识吗？

好像不是的。

对此，有的学者干脆提出，“如果这一共识在中国得到了普遍的接受，那么‘北京共识’是错误的，是对美国和全球经济共同体过度的敌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战略依赖‘华盛顿共识’的基本要素，例如自由价格、竞争、有限的通货膨胀以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因此，‘北京共识’只是在‘华盛顿共识’的基础上，对它的补充，而非挑战和替代。”^① 有的认为，过去 30 年中国经济准确无误地朝着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市场信条迈进，即强调谨慎的财政政策、经济开放、私有化、自由市场和保护私有产权，这种策略是成功的，并嚷嚷要终结“北京共识”。^②

说中国经济过往的发展道路遵从了“华盛顿共识”的很多条款，这自然是对的。其实我们也知道，要靠雷默的这个东西来挑战“华盛顿共识”，现在还是不行的，所以我们的基层一直没正面回应“北京共识”这个提法。但这并不妨碍某些人将“北京共识”看成是对“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以及东欧和苏联休克疗法的批判。

① [美] 斯科特·肯尼迪。“北京共识”的神话 [J]. 国外理论动态, 2010 年第 4 期。

② 姚洋。终结“北京共识”。财经网, 2010 年 2 月 23 日。

第五章

动荡中的生存之道

——我们将走向何方

泡沫破灭，我们无可奈何；经济动荡，我们无法躲避。我们唯有擦亮双眼，做好准备，让自己不要陷入泡沫的迷幻之中。

不要以为有什么低谷，高手一般是死在抄底里；金银早已不是货币，不要盲目迷信它们；股市是靠不住的，尤其是所谓的科技股；回归实业是王道，运用科技是正途。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经济战争之惨尤甚于兵战，为政者可不慎乎？

1929 年爆发的股市泡沫崩溃直接引发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间接导致了欧战的爆发。据 1932 年 9 月的美国《财富》杂志估计，美国当年有 3400 万成年男女和儿童没有任何收入，占总人口的 28%，这还不包括 1100 万户农村人口。街头流行的歌曲是《兄弟，能给我一毛钱吗？》（Brother, Can You Spare a Dime?）一个阿肯色州人甚至为找一份工作步行了 900 英里。

持续的大萧条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才宣告结束。大萧条期间，世界的经济损失高达 2500 亿美元。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战场造成的经济损失也仅为 2600 亿美元。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损失的国家财产为 653 亿日元，换算到泡沫经济时期，约为 885 万亿日元。而日本泡沫经济崩溃产生的经济损失，12 年间大约是 1400 万亿日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经济损失的 1.6 倍。^①

按照苏联官方的数字，1989 年苏联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美国的 61%，居世界第二位，到了 1991 年年底，苏联财政和货币崩溃。继承了前苏联 70% 的国土、70% 的经济基础、60% 的人口以及约 70% 国家资源的俄罗斯，一直到 2001 年，国内生产总值大约为 3000 亿美元，仅为 1989 年苏联的 1/10。

① [日] 松田久一，下一个十年，消费崩盘的年代 [M]，盛凯译，海口：南方出版社，2011：48。

经济如此**动荡**，你要早作打算

中国经济在长达 30 多年的快速发展中，也面临着泡沫经济破灭的危险。这是一场泡沫的大决战，决战的对象不仅是现在的泡沫，还有曾经的自己，犹如左右手互搏。左右手互搏是残酷的，但我们似乎根本没有准备好。在大众一片泡沫危机的嚷嚷声中，很多地方政府却依然沉迷在舔舐泡沫的那点甜味之中，他们没想到这种泡沫很快就会变成毒药，或者他们已经想到，但以为最后去品尝毒药的将不会是他们。

第一节 房地产泡沫破灭的路径猜想

“什么叫泡沫？所谓的泡沫就是拿针戳一下就破，那才是泡沫。中国的楼市说有泡沫，但用什么都扎不破。中国的楼市泡沫是钢做的，而且还得继续涨。”^① 这话出自大家，因此颇为热闹了一阵。

但如果有人坚持说中国房地产泡沫不会破，那我想一定会有新的“牛刀”们出来打赌。中国楼市本来就是用钢筋和水泥堆出来的泡沫，尽管有的保障房混凝土用手可以揉碎，楼面用脚一踩就能感觉到整个楼层明显的抖动^②，但那也是钢筋和水泥，你拿一根针去戳，又不戳关键部位，自然是在演戏。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中国特色的泡沫究竟会怎样破。加尔布雷思曾说，“价格的下跌总是比上涨更加迅猛，一只充足气的球一旦被戳破，就不会有条不紊地漏气”。但事实上，泡沫的破灭并不总会发出“砰”的一声，慢撒气也是可能的。

纯粹的市场经济下，泡沫常常是急速破灭，但在大萧条之后，政府加强了对经济的干预，“有形之手”减缓了经济波动的幅度。政府既可能加速泡沫的形成，也可能使泡沫破裂的过程不至于过于激烈。

① 2011 年 6 月 10 日，张五常在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商业领袖高峰论坛上的发言。

② 四川泸州 402 套保障房楼板现大面积裂缝 [N]. 华西都市报，2011 年 8 月 26 日。



警讯与预期的变化

合理预期理论假定人们是理性的，他们会最大限度地利用所得到的信息来采取行动而不会犯系统性的错误，预期需要随事件发展而调整。在预期形成过程中，政府的作用相当重要，但一旦投机进入狂热阶段，政府的告诫事实上已经失去作用，并不能阻止危机的发生，很多时候反而是将危机推向更广更深的阶段。因为如果政府发出的警讯起作用了，危机被阻止了，那么以前的投机被证明是正确的，这反而会激发此后更加激烈的投机。

理性的政府一般趋于谨慎和保守，在泡沫刚刚泛起时，一个掌握了比投机者更多信息的政府就希望泡沫可以得到抑制，但这个时候正是泡沫价格上涨快、投机者获利迅速、市场趋于狂热的阶段，投机者如饮甘饴。政府的警讯可能会使市场暂时停顿或者稍微下降，但随后的报复性反弹将证明政府的警讯只是空口白话，政府的行为会被市场认为是在和“幻想的泡沫幽灵”作战，甚至会被喜欢阴谋论的人视为政府被新一轮投机者绑架进行的“合谋”。

这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何我们的房价会在一片调控声中不断上涨。事实上，2003 年中央银行发出收紧房地产信贷警讯时正是大好投机的开始，而此后的政策调控，不管“国八条”也好，“国六条”也好，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房价上涨的助推器。

如果政府发出的警讯不能协调一致，那事情就会变得更坏，我国房地产泡沫正是如此。2003 年中央银行首先发出警讯，但随后国务院宣布房地产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要大力支持；到了 2006 年房地产泡沫已经成型，政府想打压又怕经济受损，投鼠忌器；2008 年后眼看房价回落有望，2009 年政策又转为极度宽松。

至此，市场成为所谓的“刚性泡沫”，大多数人经过长时间泡沫考验，

经济如此 , 你要早作打算

以为泡沫不过尔尔，实属正常，以前买房投机的心态已转为“就是投资也还不错”。

1929年10月华尔街大崩溃之前，美联储在1928年就开始收紧银根，缓慢提高再贴现率，到1929年1月，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再贴现率已达到5%，2月，美联储主席就公开发布警告，认为股价已经过高，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提议马上将再贴现率提高到6%，以抑制投机。

美联储的行为被认为是“为阻碍繁荣这架机器的运转而竭其所能”，“激起了一个正直、聪明、具有爱国心的群体（指华尔街）的敌对情绪”。而即将离任的总统柯立芝此时发表了令投机者欣慰的关于股价偏低、国家经济健康的言论，市场在年初小挫后随即创下新高。此后接任的胡佛总统要接着创下“胡佛繁荣”，对股市也是爱护有加，尽管贴现率在1933年8月已经提高到了6%，但市场依然持续上涨，直至最后大崩溃。

1996年，科技网络股推动美国进入“新经济”时代，股市大牛。10月14日，道琼斯指数跃过6000点，《今日美国》头版宣称这是为“有史以来最稳定牛市”树起了一个里程碑，《纽约时报》注意到“人们普遍认为仅有股市是长期投资之所”。12月，格林斯潘因此发出“非理性繁荣”的警告，《纽约时报》报道说“一声沉响，振聋发聩”，《华尔街日报》则问道：“市场过高了吗？”格主席的这番讲话却只维持了不到两天，股市不但没减速，反而加剧了，到1997年的2月，道琼斯指数已经突破7000点了。

此时的格林斯潘再次警告市场：“在过去两年里，人们总被警告要特别担心股票猛涨这一情况，这显然产生了行情能持续多久的问题。”1997年3月，美联储把短期利率提高到5.25%，市场猛跌了7%左右。然而，没过几周，市场就飞快回涨，到6月中旬，道琼斯指数逼近7800点，9月，突破了8000点关口。在格林斯潘看来，他和美联储都被投资者“教训”了一把，不得不承认自己无法知道市场何时被高估，而且无法和市场对着干。

1997年10月，亚洲金融危机波及美国市场，10月27日，道琼斯指数



狂跌 554 点，尽管一个月之后，美国股市就将失地收复，但 1998 年 9 月 29 日，美联储却开始了连续三次快速降息，降息政策与其说是为应付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不如说是格老在政治上屈服于股票市场的结果。到 2000 年 1 月，道琼斯指数创下 11722 点的纪录，其后市场暴跌，科网股泡沫破灭。

如果用我们前面提到的识别投机狂潮的几个标准看，中国房地产市场早在 2007 年就已经进入过度投机阶段了，2009 年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又将泡沫更推进了一步，一些西方人因此嚷嚷说“中国的房地产泡沫比迪拜严重 1000 倍”，准备要“卖空中国”。

看来，老外手上的中国存货不少，不然焉能“卖空”？但事实上，中国房地产泡沫基本都是自己人搞起来的，前几年每当楼市相对低迷时，就有传言说什么境外资金要抄底，准备大肆进入国内房地产市场，那其实是为了忽悠国人上当而已，当不得真。

老外要“卖空中国”了，中国政府不得不重视起来，2010 年又是提高房贷首付，又是实行密集的限购，还要求财政加紧催收土地欠款、税务部门加紧查征房地产商税收，但房地产商已经不怕了。

经过 2009 年这一轮新的泡沫，房地产商和银行、地方政府的关系更加“亲密”了起来，土地财政、银行信贷、房地产开发贷款将三者绑在了一起，他们相信中央政府不敢玩得太大，不然很可能玉石俱焚。

但中央政府是不能被绑架的，银监会站出来说：“银行能够承受房价下跌 50%。”并表示，“从长远来讲，房地产市场的科学调控对银行业是个福音。”^① 中央银行是不方便说话的，自从 2003 年发布收紧房地产信贷的通知被国务院“否决”后，至今头都有点晕，加息也变得小心翼翼了。

泡沫终将破灭，似乎已是共识，但关键是泡沫究竟会在何时、以什么方式破灭。

^① 银监会主席刘明康：银行能够承受房价下跌 50%。财经网，2011 年 7 月 29 日。

经济如此 , 你要早作打算

中国房地产泡沫破裂的导火索将始于资金链最薄弱的开发商。如果政府的紧缩政策持续甚至加强，一些资金缺乏的开发商迟早要面临资金链的问题，进而不得不降价卖房，从而引起房地产市场的动荡和市场对房价预期的转变。

虽然中国存在严重的金融压抑，房地产市场似乎并不是由过度信贷推动的，绝大部分购房者所用杠杆并不大，首次购房首付最低都在 20% 左右，目前第二套房贷的首付更是达到了 60%，银行也没有表现出对风险的非理性追逐。但由于投资性购房比例已经远超 20%，有的地区甚至达到了 50%，投资性购房的唯一目的就是为房产升值后转手。

按照明斯基的概念，投资性购房首付在 40% 以下者都应该属于庞氏投资者，因为房租收入远不够支付贷款利息。当投资者资金耗尽，或者其预期房产价格下降时，他们将被迫抛出房产。卖盘大量涌出之时，由于信贷限制，市场根本没有足够数量的低收入边际买房者接盘，房价将出现急剧下跌。

❁ 慢撒气还是“砰”的一声

泡沫“砰”的一声破灭，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快速破灭必将引发一系列不可控的连锁反应，不仅经济将“硬着陆”，社会也将大范围动荡，甚至会引发政治上的危机。苏联因为体制刚性的缘故，经济失去了自我纠错能力，经济增长泡沫快速破灭，导致了一个阵营的大崩溃；近期发生在埃及等中东地区的动乱本质上也是因为政治结构的刚性与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自适能力之间出现了冲突，导致民怨爆发。

中国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路上已经走过了 30 年的时间，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在不断摩擦中寻找着双方的结合点，内生的经济活力和政治体制的适度变化使我们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都有了不少的弹性，可以免于苏联的刚性失败。



但正因为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之间存在不少摩擦，我们的社会也积累了不少矛盾与问题，尽管这些问题绝大多数都是可以靠人民币解决的“人民内部矛盾”，但我们目前依然承受不了泡沫极速破灭后的灾难性后果。

泡沫的急速破灭只有在中央对经济和地方政府彻底失控的情况下，才可能发生。诱发泡沫快速破灭的基本条件是中央银行不顾一切地在短时间内大幅提升利率，收紧货币供应。而中央银行这样做的唯一理由就是中国出现持续恶性通货膨胀。

事实上，中国近期要出现持续恶性通胀的可能性很小，一是中国的粮食价格基本与国际脱钩，且国内基本可以实现自足；二是中国政府对于通胀有较强的控制能力。这不单是统计局控制数字的游戏问题，核心在于国有企业基本上掌控了我国的基础资源和重要行业，政府因此拥有较强的定价能力，就算是输入型通胀，政府短期内也可以通过财政补贴或其他方式阻断其在国内的传递。

当然，长期来看，政府控制通胀的能力是值得怀疑的，将导致经济的持续扭曲，从而损害经济发展，造成新的社会不公。

因此，房地产泡沫破灭的方式只应该是慢撒气，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软着陆”。在这点上，我们其实是可以和日本进行比较的，日本大藏省当初选择的泡沫破灭路径也是“软着陆”，希望在维持原有机制的前提下，尽量避免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破产对社会的冲击，等待景气回升逐渐消化已形成的泡沫。

虽然选择的是“软着陆”，但能否真正实现“软着陆”，关键要看政府调控经济的水平和能力如何，那才是真正考验执政能力的时候。

日本泡沫是“软着陆”了，但“软着陆”的后果却比“硬着陆”更可怕。日本股市泡沫从1990年1月开始破灭，到2003年才探底成功；房地产泡沫则是1991年年底出现慢撒气，到2005年方算触底，漫长的跌势带给日本的是长达十几年的经济萧条。

经济如此 , 你要早作打算

在房地产调控方面,我们其实已经在做“软着陆”的准备了,但我们不能踏着日本的足迹,重复悲剧。

● 日本步入“失去年代”的启示

现在很多研究者都将我们现在的泡沫和日本当年的泡沫进行比较,认为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和当年的日本有很多共同之处。比如,都是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策略,面临增长方式的转变;都处于美元贬值周期,经常项目赤字逐渐收窄;都有较高的储蓄率,货币政策都很宽松,本币也面临升值压力等。

而中国在很多方面甚至比日本还糟糕,比如,投资比例过大,企业创新能力不足,产业结构低级等,因此有人预言中国泡沫破灭的后果会比日本更可怕。对于这种简单类比,我们是不同意的。日本之所以在泡沫破灭后沦入“失去的十年”,主要是因为自误。

第一,政局动荡。

日本泡沫破灭的过程,也是政商之间、银企之间丑闻曝光之时,丑闻的暴露重创了日本政府的威信,社会出现了严重的信任危机。1993年,日本“1955年政治体制”宣告终结,自民党不得不结束长达38年的一党执政,多党联合执政不仅没有提高政党的执政能力,反而导致政局动荡。

自民党一党执政时期,党、政之间相对稳定的合作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政治僵局不断出现,政府处理经济问题多方掣肘,进退失据,行政效率大受影响,一再错失扭转颓势的良机。

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相继涌现出吉田茂、佐藤荣作、田中角荣、中曾根康弘等一系列出色的政治家。而自1991年以来,日本政府11年间换了9位首相,最长不到满届,而最短的只有64天,日益零碎混乱的政坛当然不能保持政策的连续性。

很多内阁人气低迷,有的支持率甚至降到个位数,为了赢得支持,经



济理性不得不让位于短期的政治利益，尽管历届内阁不断尝试新的政策，修正甚至抛弃上届政府的基本政策，但由于政策不稳定、不连续，严重影响了日本经济的恢复。

第二，政策一误再误。

从1989年5月到1990年8月底，日本中央银行短时间里5次上调利率，将利率提高到6%；1990年9月，大藏省通过所谓“窗口指导”，要求所有城市银行把1990年第四季度的新增贷款数额减少30%（与上年同期相比）。1990年日本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从1985—1989年平均10%的增长率跌到7.4%，1991年跌到2.3%，1992年甚至创下了-0.2%的历史最低纪录。极度的信贷紧缩，导致日本股价和地价急剧下挫。

日本政府面对泡沫崩溃，在之前长达40年的经济增长背景下，以为日本依然无所不能，对经济景气抱有侥幸的期待，总想蒙混过关，缺乏结构性改革的准备，没能果断实行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举措。尽管从1992年3月开始，日本政府先后10次提出和实施了刺激经济景气的“经济对策”，但由于政策左右摇摆，终究收效甚微。

日本首任财务副大臣村上诚一郎曾说：“如今回过头来看，在那种危机时刻，为了让市场能够安心和理解，果断实施一些政策是必要的。在此之前，日本政府总是小打小闹，推出一些不痛不痒的政策，结果没有能够阻止事态的恶化。”

1993年2月，日本中央银行将利率调回到泡沫经济时期2.5%的水平，9月又降到1.75%。与此同时，从1992年3月到1995年9月，日本政府先后7次提出和实施了刺激经济景气的“经济对策”，为此投入的资金总额超过65兆日元，相当于日本GDP的10%以上^①。货币和财政的“双松”政策，确实起到了刺激经济的作用，1995年日本经济逐渐回升。

① [美] 高柏. 日本经济的悖论 [M]. 刘耳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301.

经济如此 , 你要早作打算

但1996年,桥本内阁实施紧缩性财政政策,同时对金融业进行急剧改革。紧缩财政政策迫使日本政府将直到2003年的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政赤字总额控制在GDP的3%之内;此外,政府还将国债降低了4.3兆日元,将消费税从3%升至4%,取消了1994—1996年执行的对个人收入与财产税减免的政策。

金融业改革要求当银行自有资本率低于8%但高于4%时,银行必须执行改进商业经营的计划;当低于4%时,银行要么扩充自有资本,要么降低资产规模,并不得开设新的分支机构和从事高利息存款业务;如果银行没有了自有资本,则必须停业。

“双紧”政策造成日本在1997—1998年出现了资产流动性陷阱,银行拒绝向企业提供贷款,企业破产数目迅速增加,与此同时,企业负债金额也于1997年升至14.2兆日元,1998年达到14.3兆日元,连续打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上企业负债的最高纪录。^①日本经济再次出现紧缩,1997年出现了23年以来的第一次经济负增长。

1998年,日本政府不得不再次实施扩张型财政政策。然而,企业和消费者已经失去信心,过度扩张的财政政策使财政赤字猛涨,到1999年3月底,政府负债已达到9兆日元,比当年的税收高出约18倍。^②

1995年年底,日本政府决定直接投入公共资金6850亿日元解决住宅专门金融机构问题,特别是救济受到拖累的大债权人——农会协同组织(简称农协)。但由于农协是自民党的重要支持力量,大藏省与农林水产省就农协系统金融机构的救济达成特别协定在程序上存在瑕疵,引起其他利益团体的不满,造成全国舆论一边倒的局面。人们都对以国税处理银行不良资产和呆账的做法持严厉批评的态度,认为这是政府保护企业政策的延续。

① [美]高柏.日本经济的悖论[M].刘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304.

② [美]高柏.日本经济的悖论[M].刘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305.



由于政府威信已经受到质疑和破坏，政府关于投入公共资金救济私有企业理由的阐述又非常笨拙，缺乏说服力，致使以公共资金来处理不良资产的设想无法推行，大型金融机构、生命保险机构、一揽子承包商的亏损都只好放任自流。

当日本政府意识到问题的根源存在于曾经创造日本经济辉煌的日本模式中时，防止经济长时间萧条的最好时机其实已经错过。尽管日本政府开始对各种制度乃至整个体制进行反思和改革，在金融方面采取“大爆炸”，允许金融机构批量破产，但政府当局在前几年已经耗尽了财力和威望，无力采取有效措施解决金融系统的严重问题了。

只是在大规模投入公共资金（共计 30 兆日元，其中 13 兆日元用于补贴未破产银行，另外 17 兆日元用于在银行破产处理过程中保证存款人利益）救济金融机构，并对日本长期信用银行和日本债券信用银行实行国有化之后，才使银行部门恢复了暂时的、表面上的平静。

但随之而来的是财政更加恶化。财政方面制定了财政结构改革法，在经济管理方面推行大幅度松绑的自由化路线，却又遇上了亚洲金融危机，财政重建不得不让位于经济增长。2001 年，日本小泉内阁提出“改革无禁区”口号，要求日本人民忍一时之痛，试图通过强制性的结构变革，达到“硬着陆”，无奈遭到强烈反弹，最终不了了之。

民主政体之下，威权政府也已不再，政治上软弱的政府不愿也不能采取非常强硬的政策，否则只能在泥潭中越陷越深，而日本政府也被泡沫破灭的恶果折腾得不堪重负。2002 年，日本政府债务超过 GDP 的 130%，到 2011 年，债务已经达到 GDP 的 210% 了^①，成为发达国家中财政危机最为深重的国家。

第三，失去创新优势。

^① 穆迪可能下调日本主权债信用评级。网易财经，2011 年 8 月 2 日。

经济如此 , 你要早作打算

日本在泡沫破灭时, 不能从制度上寻找原因, 不愿意放弃父爱主义的行政指导方式, 在制度上不能按照市场要求推动大幅度的行政机构改革。从1998年开始, 日本才不得不彻底压缩省厅数字, 加强首相的决断力, 引进独立行政法人制度, 改“事先限制—协调”的管理方式为“事后监视—救济”的管理方式, 加强司法机关的功能和审判民主化, 力图实现从行政国家到司法国家的“第三次法律革命”。

日本企业曾经依靠产业转型和技术创新成功崛起。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 日本企业开始大批量地生产基于本国开发技术的新产品, 在汽车和家用电子产品这两个领域, 日本企业获得了极大成功。小型节能汽车、录像机、摄像机、激光唱片、大屏幕电视、计算机游戏、文字处理器与传真机、电子表、数码表、电脑等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很强的竞争力。

但在泡沫经济破灭过程中, 日本没能确定新的战略性产业并进行重大结构调整, 日本主要的制造产业投资绝大部分是用于生产规模的扩大, 而不是用于研发新的、革命性的产品。1985—1993年, 美国企业在信息技术方面的投资占其总资本投资的比例从20%增加到35%, 而同期日本仅从13%增加到18%。截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 日本只有9.9%的办公室配备了PC机, 而美国则有41.7%。1997年1月, 互联网上注册的服务器网址, 日本只有美国的7.3%。^①

在信息化技术革命中, 日本彻底落后了。尽管同期日本也不断冒出新产品, 但这些新产品后来被认为只是“泡沫技术”而不是技术创新, 它们只是给产品增加某种讨人喜欢的特征, 但并没有增加实际的新功能。

第四, 总想搭上美国经济的“便车”。

日本出口导向策略的成功, 是基于美国强大的需求, 利用了美国的高收入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发展潜力。即使美国陷入萧条, 日本需要做

① [美] 高柏. 日本经济的悖论 [M]. 刘耳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235.



的也就是等待几个月，因为他们知道美国的复苏会是强劲和迅速的。然而，美国的“便车”也不好搭，时间久了，要么买票，要么就下去，如果美国情况不好，可能还会要求你将以前吃进去的给吐出来。

但很遗憾，日本繁荣时期浪费了多少年的出口利润在国内的资产泡沫、“大而无用”的工程和定价过高的美国资产。在某些专家看来，这也是“搭便车”政策的失败。冷战期间，美国奉行不对称合作政策，让日本和其他盟国的产品很容易地进入美国市场，而不必在本国市场给美国产品同样的待遇。

但当美国出现巨额逆差时，日本对美国施加的压力没能有正确的反应，美国便终止了与日本的不对称合作。日本期待美国经济好转带动日本发展的想法落空了。

第五，全体就业策略。

终身就业曾被认为是日本经济成功的一个奥秘，它使日本政府可以集中国家资源用于发展经济，但与此同时，政府不得不通过其他方式让效率低下的部门与夕阳产业得到生存的机会。

在泡沫经济破灭过程中，维持社会稳定与经济结构升级换代这两个目标之间的矛盾彻底显现了出来。在整个 20 世纪 90 年代，日本政府用推迟经济结构升级换代来维持全体就业和社会稳定，大大削弱了日本经济在竞争性更强的国际新环境中作出调整的能力，日本经济逐渐丧失了活力。

尽管日本作了很大努力，全体就业策略的基础依然逐渐失去了。首先，越来越多的大制造商加入了将生产向海外转移的潮流；其次，在泡沫破灭冲击下，企业破产数量迅速增加，尤其是受政府保护的低效率产业，情况尤为糟糕。

日本雇佣制的变化大大降低了消费者对自己工作稳定的信心，当消费者对未来产生强烈的不确定性时，指望他们增加开支是不现实的。因此，日本出现了所谓的“厌消费群体”，他们拒绝轿车、高级家电、国外旅游，

经济如此 , 你要早作打算

最大的乐趣在于“为自己的存款不断增加而高兴”，追求的是“无论如何 30 岁之前要存够 1000 万日元”。

❶ 中国会崩溃于房地产泡沫破灭吗

被英国《金融时报》形容为当代经济界的“先知”，被《纽约时报》封为“新末日博士”的尊敬的努里埃尔·鲁比尼（Nouriel Roubini）先生 2011 年预测中国经济将在 2013—2014 年实现“硬着陆”，着陆的方式有三种：第一种是泡沫“砰”的一声脆响后，经济完全“崩溃”；第二种是像一个小骗子似的“蒙混过关”，中央政府为此不得不全力救助地方债务和银行，而这将和日本一样，导致失落的十年；第三种是“空间换时间”，地方政府、中央、国有企业和银行分摊泡沫破灭后形成的坏账，其结果是经济增长显著下降，但可以防止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

在鲁比尼看来，中国经济增长在 5% 或以下就算是“硬着陆”了，因为中国需要 8% 左右的增长速度，不然社会和政治的稳定就不能保持。换句话说，中国经济“硬着陆”的同时，社会和政治的动荡也将发生。博士对中国的发展是持悲观态度的，在博士眼里，中国继续推进改革要么会遇到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无果而终，要么就为时已晚。总之一句话，中国不“硬着陆”是不可能的了。

“先知”的话，我们自然可以视为无理取闹，但那是不严肃的。对于泡沫，理性既然告诉我们已经存在，就应该正视其破灭可能引起的后果，并将之视为新一轮经济增长的起点，从制度上为新一轮增长奠定基础。泡沫的破灭并不可怕，它本质上只是经济的一个自我修复过程，可怕的是我们不敢正视。在泡沫破灭的方式上，我们需要做的是选择一条对经济和社会冲击最小的路径。

但我们的地方政府似乎根本没想过房价会下跌，在他们看来，2011 年房价上涨幅度不超过 GDP 增幅就已经不错了。近年来，地方政府对房地产



市场的依赖程度大大增强，地方政府不希望房价下跌，这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事情，因为他们还需要依靠土地财政所取得的收入，需要将房地产投资最大化以保持 GDP 的高增长，更需要维持目前的利益格局。

可以预计，在 2013 年之前，地方政府仍会有较强的投资冲动，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政府官员出于自身升迁的考虑，需要在换届前后保持 GDP 的高增长率，过去两届政府换届如此，2012 年的换届前后也应当出现投资大幅增长的趋势；二是 2009 年出现了全国性的投资大跃进，频现的融资平台公司加剧了投资冲动，地方政府已经制订出未来几年依靠投资拉动经济繁荣的计划。

但在 2013 年之后，一旦房价下跌，必然导致土地价格下跌，随着土地收入的下降，政府前期投资的大量项目可能会因为资金不到位而被迫中止，并且由于前期的过度投资使政府面临沉重的债务负担，地方债务危机随时可能爆发，依靠投资所制造的经济繁荣也终将破灭。

由于人为压低利率，中国存在世界上最大的存贷差，银行的赢利能力因此也显得不错，但中国的金融机构本质上是脆弱的，风险识别、风险控制 and 风险定价的能力都很差，银行治理结构也存在明显缺失，间接融资的主导地位和国有银行的垄断，不仅造成资金利用效率低下，更加剧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

与泡沫中的日本和亚洲金融危机之前的经济体的银行相比，我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有过之而无不及。高校贷款、政府平台贷款、国有企业贷款、基础建设贷款、内部人控制贷款等表面上看起来都很安全，但底下却是流沙，这些贷款中的某些部分已经可以列入次级和可疑类了，有的甚至已经成为不折不扣的坏账。我们可以相信国家不会让金融机构破产，但这改变不了金融系统脆弱性的特征，更改变不了潜在金融危机诱发的可能性。

无论理性还是感性，我们自然不希望中国因房地产泡沫破灭而出现经济崩溃，我们也自然希望中国可以免于“失去的年代”，我们更希望的是我

经济如此 ，你要早作打算

们因此可以奠定新的成长基础。

寄希望于房地产泡沫破灭不对我国的经济和社会造成负面影响，不形成金融危机，那是不现实的。现在我们的政府手中依然持有对土地的垄断和强力干预经济的权力，政府的威信也还存在，如果利用得当，我们也许不仅可以免于泡沫破灭的长时间苦痛，更可以推动中国经济再次起飞。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选择权在我们政府手中。

房地产泡沫破灭本身并不可怕，因为中国信贷体系不完善，按揭杠杆不大，几乎没有什么金融创新，金融自由化也没有实行，泡沫破灭的冲击程度应该相对较小。但麻烦的是，我们不仅仅是房地产泡沫这么简单，我们其实还存在所谓的经济增长泡沫，我们已有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走到尽头，贫富悬殊已越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腐败，不公平、不公正的社会矛盾已经深度积累，这些问题如果叠加在一起，后果将不堪设想。

中国房价已经在慢撒气了，但中国经济是否会因此出现崩溃则完全取决于我们的政策。丘吉尔曾经说过：“当他们比较完所有的可能性之后，他们就会作出正确的选择。”现在，我们应该还有时间对房地产泡沫破灭的后果进行正确的比较与分析，对于房地产泡沫的破灭，我们不应该抱有侥幸心理，重犯日本当年的错误。

如果我们将泡沫的破灭归于别人的阴谋，而不从自身寻找原因，不采取应对的措施，那我们极可能败得比日本还惨，我们面对的也许不会只是“失去的十年”，更可能的是从此引发大规模的政治动荡和社会动荡。

我们与泡沫的决战才刚刚开始，决战可能使我们陷入“失去的年代”，也可能使中国经济从此涅槃重生。失去还是重生，就看为政者如何选择。我们是有条件也有可能避免落入日本泡沫破灭后的陷阱的，但能否避免，这不仅考验政府的智慧，更考验政府的决心和勇气。



第二节 未来经济的路径选择

既然是泡沫，破灭就不可避免。

美国大萧条时，美联储和财政部其实放任了萧条的进一步发展，他们认为，泡沫破灭是经济体的自我强制清算，对经济长期发展来说是好事。凯恩斯爵士的横空出世，导致政府对经济的积极干预，此后的泡沫破灭过程都可以见到政府和中央银行忙碌的身影。

政府的介入稳定了就业和收入，及时修复了遭到破坏的“资产负债表”，稳住了资产价格，中央银行作为最终贷款人为市场提供了流动性，防止了萧条的自我加强。

由于政府对经济介入的程度不一样，政府在泡沫破灭过程中采取的措施也不尽相同。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参与程度相对较浅，一般不会直接干预微观经济体的运作。2008年年底，美国要通过公共资金直接救助金融机构的提议就曾引起社会的强烈不安。

政府主导的经济模式下，政府不仅通过“行政指导”直接参与经济，而且政商之间关系“亲密”，泡沫破灭过程不仅直接影响经济，也冲击到了政治体制。政府参与经济的程度越深，受到的冲击也就越大。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对泡沫破灭的方式和路径存在较大的选择余地。当然，选择不同，结果也不同。

❶ 危机是转型经济的成人礼

一个经济体的发展，不会永远一帆风顺，挫折、失败和成功应是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只有经历挫折，并在挫折后重新崛起，方可达到辉煌。不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周期性决定了危机的必然存在，经济危机是经济自我修正的必然过程，是经济体成熟的“成人礼”。

经济如此 , 你要早作打算

世界很多地方，年满 18 岁时都需要举行象征迈向成人阶段的仪式。成熟意味着责任，“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传统的成人礼仪式早已演练完毕，因为有先例可循；但经济体的“成人礼”却缺乏统一标准，有的应对得当，有的则陷入了泥潭。

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依然处于不列颠“日不落帝国”的阴影之下，并未意识到自己已是全球经济老大，需要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当华尔街大崩溃时，美国外交上孤立主义盛行，经济决策失误多多，导致全球步入长达十多年的经济大萧条。

美国在 1930 年 6 月为保护国内工业，通过了灾难性的《霍利－斯穆特关税法》，以邻为壑，从而引发了世界性的贸易保护，世界国际贸易总额从 1929 年的 686 亿美元急剧萎缩到 1933 年的 242 亿美元，下降幅度高达 65%。

与此同时，美联储“无为而治”，听任危机对经济“强制清算”，导致美国资金大规模从国外回撤。受此影响，1931 年 5 月，维也纳最大的银行——奥地利信贷银行宣布无清偿能力，引起欧洲大陆的恐慌和连锁反应。7 月，德国丹纳特银行破产，随后德国所有银行都被迫放假，柏林证券交易所也关闭了两个月之久。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终于意识到自己全球老大的责任，为重建欧洲实行了“马歇尔计划”，投入了大量资金，“马歇尔计划”的实行，不仅使西欧经济得到了快速恢复，有力地促进了欧洲一体化进程，而且也为全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长时期和平奠定了基础。

日本在泡沫经济破灭之前，已是世界公认的第二大经济体，但由于长期在美国的军事保护下生存，经济上也存在“搭便车”的想法，不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未能处理好本国面临的挑战。

20 世纪 60 年代末期，尽管日本经济学家一致公认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固定汇率是二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但日本却不愿进行任何努力以维持这个体系的存在，并坚决拒绝日元升值。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日本依然不愿意开放国内市场和大幅升值日元。因为日本相信，国家之间政策协调的根本目的就是让对方做自己希望他们做的事情，而自己不用做对方想要自己做的事情。

为应付美国施加的压力，日本代之以金融自由化，日本不仅要做大产业大国，还要做金融大国，因此将银行业也发展成为日本的支柱产业。对此，美国当然也是欢迎的，因为在美国政府看来，日元的低估与日本金融市场的封闭有关，日本开放金融市场，美国的金融机构将可以占领相当的日本市场。

金融自由化使日本落入了“蒙代尔三角悖论”的陷阱，保持汇率稳定的目标与国内政策的目标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为压低日元汇率，日本不得不超发货币，不仅引发了泡沫，也造成了通货膨胀。当货币供应量以两倍于 GNP（国民生产总值）增速增长时，日本中央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就不能只考虑稳定汇率了。

泡沫破灭后，日本很长时间内依然不愿意就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结构进行全面检讨。日本经济之所以会走向长达十多年的萧条，不能不说与日本狭隘的自利经济行为有关。日本没有意识到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世界出现了完全不同的金融和经济秩序，美国早就靠不住了，日本需要谋求自身稳定的金融环境 and 经济环境。

但日本明治维新后一直想的是“脱亚入欧”，在亚洲除提出过所谓的“雁行经济模式”外，基本上没有其他。20 世纪 70 年代，日本曾被邀请加入亚洲区域性国际清算协议，但日本没有参与；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东亚各国提议建立亚洲货币基金，日本依然持观望态度；只是在 2000 年中国积极支持东盟，形成 10 + 1 体制后，客观上为抑制中国的影响力，日本才积极参与了亚洲经济事务。

日本有法定的“成人礼”，隆重得很，但日本经济的“成人礼”仪式却办得有些糟糕，以至于有“失落的一代”醉酒跑到成人仪式上耍酒疯，逼得正在致辞的佐世保市市长应景而感叹：“社会冷酷啊！守点规矩吧！”

中国改革开放历经几十年，我们经历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也经历了恶

经济如此 , 你要早作打算

性通胀，举办了史上最盛大辉煌的奥运会，也见证了周边国家经历泡沫破灭的痛苦。三十多年来，依靠低资源价格、低劳动力成本、低附加值出口驱动、高投入、高污染，中国实现了神话般的增长，但这种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甚至被认为“恶性经济增长”。

三十多年来，我们依靠良好的外部环境，积极融入全球一体化的大潮中，享受到了全球化的好处，积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但经济发展优先的策略，导致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社会公平与正义，忽视了共同富裕的目的。经济发展了，社会矛盾却不断激化，和谐社会的建设之路修远而漫长。我们的社会矛盾需要解决，公平与正义需要得到宣扬，高发且屡禁不止的腐败需要得到抑制和清理。

三十多年来，我们初步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制还很不完善，低效率的国有经济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并不占优势，但却控制着国民经济的命脉，在资源配置中起着主导作用；国有企业在能源、电信、交通、金融等重要行业中长期处于垄断地位。

现在，中国经济需要面对泡沫破灭的“成人礼”了。作为转型中的经济体，如果说，我们是独一无二的“中国模式”，那是妄自尊大。“中国模式”是什么？严格地说就是在中国的“东亚模式”。“东亚模式”曾经是成功的，在其广受推崇之时，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颂扬“裙带关系”的优越性，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要挑战联合国的《普遍人权宣言》，他们都坚持认为亚洲的价值观优于西方的价值观。

但就在这时，“东亚模式”被认为是“纸老虎”，研究者发现，除日本之外，亚洲金融危机之前的东亚各国，并没有因为科技发展而提升效率。克鲁格曼因此断言：“如果亚洲的经济成长有什么秘密的话，那只不过是它们能够延宕欲望的满足，愿意为了未来的收获而牺牲现在的享受。”^①

① 五年一觉——亚洲金融危机 [J]. 三联生活周刊, 2002 年第 7 期.



很不幸，亚洲金融危机使“东亚模式”失败了，东亚国家和地区面对“成人礼”采取了不同的应对策略，导致各国的经济复苏程度大相径庭。

韩国在危机中受到羞辱，不得不接受 IMF 开出的“药方”，进行彻底的政治民主和经济自由改革，斩断资本主义“裙带”，加强透明度。通过一系列措施，韩国很快实现经济复苏，2006 年韩国 GDP 已经排名世界第 11 位，高于俄罗斯和澳大利亚。

中国台湾也通过政治改革顺利实现了经济结构转型。

在印度尼西亚，尽管苏哈托倒台了，公民也拥有了更大的政治自由，但始终没能解决好不良贷款、贪污腐败和经济结构性等问题，经济依然在昏睡中挣扎。

马来西亚因为强势政府的存在，可以拒绝 IMF 的援助和建议，并宣布资本管制，严格控制外资流出，实行固定汇率（林吉特兑美元比率下调为 3.80:1，较危机爆发前贬值 33.7%），西方世界一片哗然，直接导致 1998 年马来西亚股指降至历史低谷。资本管制虽然套住了外资，但直接结果就是导致外商投资从 1998 年的 27 亿美元直线下降到 2001 年的 2.9 亿美元，因此马来西亚政府不得不在 2001 年 5 月完全取消资本管制。危机期间马来西亚政府也大规模整顿金融体系，实行持续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2000 年后连续 4 年财政预算赤字均超过 GDP 总量的 5%，但经济复苏并不理想，经济结构的基本格局未能改变，对外依赖性持续增强，极易受到外来因素的冲击。

危机作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自我矫正机制，是我们不能回避的，正视危机的存在并采取应对措施，是我国经济与社会从成长到成熟过程中必经的“成人礼”。面对“成人礼”的到来，我们会上演什么样的仪式呢？

❁ 误入渐进式改革陷阱

中国经济改革的目的不仅是需要从落后的自然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

经济如此 , 你要早作打算

更重要的是要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因此，中国经济改革既是改良性质的，又是一场制度性革命。

当初为了改革的顺利推进，我们选择了务实的渐进式改革，不纠缠于姓“资”姓“社”，而是在体制外培育推动体制内改革的力量。但也正因如此，社会思想并未得到清理与统一，激进与保守在改革的终极目的以及具体路径上始终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

所谓“增量改革”本质上是机会主义式的。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是猫界的机会主义；不解决意识形态问题，而采取典型的“拿来主义”，也是机会主义。但客观而论，我国刚改革开放时，这是唯一正确、可行的选择，因为我们首先要解决的是温饱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选定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但意外地却走岔了道。究其原因，不能不说与我们当初的选择有关。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中国特色”的旗号之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在我们看来，这种奇异的结合是全球首创，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因此，我们改革的终极目的是模糊的，没有参照系，每前进一步都可能被视为创造，但也可能被视为倒退。

当改革处于改良阶段，对既得利益者不仅没有坏处只有好处时，改革得以顺利进行；而当改革需要既得利益者让渡部分既得利益之时，“中国特色”就成为挡箭牌，他们要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特色与市场，或者说，我们坚持的传统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发生了巨大的冲突。

一段时间里，这种冲突因为中央高层坚定不移地支持改革开放，在社会上并未引起大的波澜，也未根本性妨碍改革的深入推进。但这种脆弱的平衡被一个偶然的事件打破了，我们的改革路径自此开始偏离。

2004年8月，郎咸平教授从香港回到内地准备一展身手，没想到，刚一伸腿就掀开了国企改制的潘多拉盒子。在郎教授看来，20多年来的国企



改革无非是一场瓜分国有资产的盛宴，呼吁停止国企改革，“郎旋风”掀起了第三次改革大争论的序幕，引发公众对国企改革、腐败和贫富分化等严重社会问题的强烈共鸣，一些人甚至呼吁，宁愿全面停止改革，也不要扭曲的、不公正的改革。争论持续发酵，2005年，社会上又刮起了“刘国光旋风”。

刘国光是对我国早期改革有重大影响和贡献的学者之一，一直坚持中国改革的市场经济取向。2005年7月，他却提出现代西方经济学整体上不适用于社会主义中国，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指导的理论。同时，他要求“检查一下高校领导干部，包括校长、书记、校长助理、院长、系主任、研究室主任、研究所所长等，是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不是就换”，“领导岗位一定要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刘国光的言论立即在社会上，特别是在经济学界、教育界引起了强烈反响。

改革推进自此遇上了强大阻力。2005年2月，国务院发布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份以中央政府名义发布的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性文件，被寄望开启“中国民营经济春天”的“非公经济36条”^①，遇到了强烈反弹，一份广为流传的万言书指责“非公经济36条”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将从根本上动摇乃至改变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建议立即撤销。“非公经济36条”走了多年也一直未走到春天，几乎是无疾而终，反倒是国有企业、与权力结合的权贵企业欣然逢春了。

2005年，中央原定为“改革年”，“要用更大力量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并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突破”，但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2005年不得不成为“反思改革年”。尽管其后中央高层站出来明确支持改革，但社会的改革共识已基本破裂，意识形态再次笼罩在改革上空，中国经济体

^① 全称为《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

经济如此 , 你要早作打算

制改革自此之后基本处于停滞阶段，更遑论政治体制改革了。

现在，中国改良部分的潜力已经耗尽，而深入的改革依然云遮雾绕，中国经济体制已进入“半计划半市场的混合经济状态”，往前就将跨入市场经济，退后就将回到计划时代。前进，阻力很大；退后，更是不可能。目前，双方僵持不下，于是很多人转而认为目前的模式就是最好的了，并开始欢呼中国诞生了第三条路，可供全世界模仿。

中国以加入 WTO 为契机，主动融入到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为中国经济带来了十多年的好光景，但也正因为此，内部改革的紧迫性逐渐消失了，中国经济和政治改革的目标日益遥远了起来。在“混合经济”状态里，政府如鱼得水，不仅掌握了大量的稀缺经济资源，还可以假“宏观调控”之名，行审批制度之实，大批寻租。

我们的经济正走向权贵资本主义，“政府有很大的配置资源的权力、干预企业的权力，就会产生寻租空间，导致腐败和贫富悬殊的趋势愈演愈烈。如果政府主导经济资源配置，那就不叫市场经济，而叫权贵资本主义了”^①。

渐进式的经济转轨也逐渐被机会主义所挟持，造成了制度性腐败和社会不公。“渐进改革所形成的双轨制长期看将产生非常高的代价，也许大大超过赎买既得利益平滑转型的短期好处。”^②

改革开放，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这点大家已经达成了共识。但共识之中又有完全对立的分歧，针锋相对，不可调和。

一种观点认为，这是“中国模式”的功效，独有的“中国模式”不但创造了长达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奇迹，而且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屹立不倒，为世界所艳羡，已成为“北京共识”，目前正考虑出口专供发展中国家模仿，并挑战“华盛顿共识”。

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的奇迹来源于市场化改革对创业精神的解

① 吴敬琏．再论“权贵资本主义”[N]．南方周末，2010年10月20日．

② 杨小凯等．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J]．经济学，2003年第2卷第4期．



放，而靠政府强化行政管制和大量投入要素资源实现的增长不可持续，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经济社会后果：资源枯竭、环境破坏、腐败蔓延、贫富悬殊、阶层对立、社会矛盾激化。如果不尽快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使中国回归市场化、法制化和民主化的正途，这些后果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和社会面临更大的灾难。

然而，后者带有“威胁性”的看法，前者根本不以为然，在前者的拥趸们眼里，这些矛盾之所以出现，并不是因为政府权力太大，恰恰是因为权力还太小，政府管得不够多，不能全天候监控每一个人，才让他们有机会去上访、去闹事，因此需要大力“维稳”。

既得利益者不愿意出让利益，行政权力不肯退出市场，这应属正常。渐进式改革的路径依赖，除非有强大的外部因素介入，否则路径是不会改变的。

事实上，如何从“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向更加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转变，几乎是所有高速赶超发达国家的、采取“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与“威权发展模式”的国家和地区都曾经遇到过的问题。日本如此，韩国如此，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等依然如此。中国自有不同之处，那就是中国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起步更低，市场环境更加不成熟，面临的挑战更加突出。

日本通过泡沫经济的破灭走向了“失去的年代”，并在失去之后进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结构性改革，所以才只是“失去”而没有“倒退”。东亚其他经济体通过亚洲金融危机的洗礼，有的通过制度性变革已经涅槃重生，如韩国、中国台湾；有的却依然梦游在“裙带资本主义”的阴影里，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危机也改变了日本及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经济或政治发展的进程。

中国这样的经济转型大国，市场经济才只是近二十多年的事情，市场机制薄弱，政府权力巨大，转型较我们的邻居会更加困难。恩格斯曾

经济如此 ，你要早作打算

说：“一个伟大的民族要使自己成熟起来，最好的办法就是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

我们的党是善于反思的，也是勇于改革的。党和政府已经提出“可持续发展”的口号，要建立民主，要“以人为本”，真正做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

所有的泡沫破灭过程都是痛苦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受政府主导下的泡沫化之苦，比发达国家尤甚。按照美元计算，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一年时间内，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韩国国民生产总值下跌幅度都在 40% 左右，而印度尼西亚甚至达到不可思议的 80% 以上，如表 5-1 所示。

表 5-1 东亚国家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一览表^①

国家	国民生产总值（亿美元）		下涨跌幅
	1997 年 6 月	1998 年 7 月	
泰国	1700	1020	40.0%
印度尼西亚	2050	340	83.4%
菲律宾	750	470	37.3%
马来西亚	900	550	38.9%
韩国	4300	2830	34.2%

我国的泡沫经济已经存在，需要澄清，那是逃避不掉的，但如果我们将泡沫的破灭视为改革新的推动力，并以此凝聚人心，形成新的共识，我们是可以从制度上奠定未来经济发展的基础的。关键是我们怎么选择。

● “软着陆”是大势所趋

2009 年，中国通过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世界性的极寒经济中靓丽

^① Cheetham, R. 1998. Asia Crisis. Paper presented at conference, U. S. - ASEAN - Japan policy Dialogue.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June 7 - 9, Washington, D. C.



了一把，国外看得目瞪口呆，继而发出颂扬之声，他们没想到金融机构竟然可以不顾后果地如此大规模放贷给没有还款能力的机构。

美国人在危机中深感自己在上帝那里失宠了，上帝已经创造了“中美”（Chimerica）的概念，目前正眷顾东方。

中国人民是有智慧的，但对上帝似乎过于奢求了，上帝如果与我们同在，那我们什么都不怕，泡沫也好，危机也好，都不应该光顾我们。但上帝的心思不好猜，我们只好祈祷，泡沫可以有，也可以破，但千万别让泡沫破灭的痛苦无尽期，我们应该有选择的可能和余地。

泡沫顺利“软着陆”，没有阵痛，没有经济萧条，这是我们的梦想。未来几年之内，如果可以通过适度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将泡沫逐渐稀释掉，而不出现价格的急跌，以及由此引发的经济萧条，那么中国就将再次打败西方主流经济学，并给他们制造一个“泡沫不破”的“神话”和研究课题。

中国要想顺利实现“软着陆”，需要足够的时间进行缓冲，并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此外，我们可能还不得不借助外部经济环境，西方经济既不能好到美元加息，也不能坏到影响中国出口，如果外国不能做到这一点，要加息、要强制人民币升值或者是制造贸易壁垒，那就肯定是阴谋，是有意要搞垮我们。

很遗憾，中国顺利“软着陆”而不出现痛苦的外部条件已经不再。国门之外是此起彼伏的人民币升值的嚷嚷声和不断的贸易打压，间或伴有远期做空的“不法”行为。国内则是一众“好事之徒”不断诱导民众对房价下跌的预期，有的甚至敢说房价要跌50%，真是可恨！

而民间高利贷时刻面临引爆的风险，还有所谓的影子银行也很不像话，经常拆东墙补西墙，做剜肉补疮的烂事。存量房、投机房也很不像样，都在虎视眈眈，随时准备争夺市场的流动性。更不好打理的是人们的预期，如果是机器人就好了，大家都可以耐心等待房地产回暖的日子。

经济如此动荡，你要早作打算

我们的现实选择，其实不多。

第一，泡沫“软着陆”同时进行制度转型，奠定经济长远发展的基础。

概率：20%。

这是泡沫最好的结局，但因为是最好的，所以很难奢望。

想要出现这样的结局，首先需要强有力的党和政府，确保整个社会能够在政治上保持战略性的改革共识以及社会的相对稳定；其次是改革的主导者不仅要勇于改革自己，更要能进行理性的政策选择，甚至不惜牺牲短期经济利益。

我们的改革已陷入两难困境——改革需要政府来推动，而改革的根本则在于触动政府和一大帮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中国历史上改革者主动革到自己头上的例子十分稀罕，几曾未见。对于既得利益者而言，在确保自身利益不受损的前提下进行改良似乎可以接受，但事实上即使是改良也会遇到极大的阻力，改良者的命运少有善终。

商鞅车裂，晁错腰斩；王安石在当朝之时亦被很多士大夫视为奸臣，苏洵甚至以他为模板写成《辨奸论》，“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王安石不得不忧愤而死，至今江南一带依然以称猪为“拗相公”来纪念他；张居正生前勇于革新，虽是芝兰，但因当路，也不得不锄，死后却几乎被掘棺鞭尸，长子也不堪拷虐而自缢；清末几乎亡国之下，维新变法也以失败告终，六君子身首异处，康梁亡命海外。

中国渐进式改革自“改良”始，目前“改良”的潜力已经耗尽，需要触及改革者自身的利益，触及制度性根本，我们能否借泡沫破灭之机的强大冲击从“改良”一跃进入改革的深水区域，未可知也！

泡沫破灭带来的危机可能加速，但也可能延缓改革。激进的改革与经济的尽快复苏往往是相互矛盾的，泡沫破灭给社会带来的痛苦极可能使政府为了经济复苏推迟制度性调整。

我们祈祷，我们可以忍受房地产泡沫破灭引发的苦痛，完成经济结构



的转型，从此走向成熟的市场经济，走向不再依靠无效率的政府投资拉动的消费型经济。但我们有理由担心，经济转型，叠加上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可能会引发短期内加倍的经济萧条，使我们的转型不能成功。

目前，有能力有资格带领中国“再改革”的只有中国共产党，我们期盼着！

第二，泡沫“软着陆”，但从此进入“失去的年代”。

概率：60%。

这种结局是次好的，也是我们很可能预见的结果。

政府将想尽一切办法使泡沫实现“软着陆”，因此很可能相继进行一些制度性改进，以求得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避免引发社会动荡和政治动荡。泡沫慢撒气引发的经济萎缩、社会和政治动荡自然也不符合既得利益集团的长远利益，既得利益集团不得不逐渐让渡部分既得利益，以换取社会对其利益的承认和保护。

泡沫即使“软着陆”，其过程依然是痛苦的，党和政府的威信在泡沫破灭过程中将不可避免地因为官商勾结、制度性腐败而受到一定影响；但如果党和政府能从制度上坚定推进反腐运动，会增强民众对党和政府的向心力，凝聚改革共识，为渐进的制度性改革提供群众基础。

日本泡沫破灭的过程，并未伴随着大规模的经济衰退，究其根源，有两个原因：一是财政资金的大规模投入代替了私人投资，二是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进行了一系列的渐变型制度改革。

泡沫破灭之后，日本政府不断推出“经济对策”挽救经济，与此同时也进行了政治体制变革，其基本方向是简政放权，转换政府职能，放松政府管制，削减政府权限，推进地方分权，发挥民间、地方和私人部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避免日本经济进入衰退期。

经济如此 , 你要早作打算

1993年9月至1994年7月,日本政府相继制定了《关于今后行政改革的推进方策》和《推进放松规制纲要》,改革放松了1100多项政府规制。^①

1995年3月,制定了《推进放松政府规制》的五年规制改革计划;1997年3月,五年规划再次修订,并新增放松规制项目890项,总计达到2823项;1998年政府成立“放松规制委员会”,监督放松规制计划的顺利实施,并提出和审议新的放松规制改革计划。^②

1999年7月,日本国会通过《地方分权一揽子法案》,改革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发挥地方公共团体的自主性和自立性,明确中央政府监控地方政府处理法定委托行政事务的程序,建立和健全了中央与地方关系处理的法制和机制。^③

加快“从官僚主导向政治主导”的转变,提高以首相为中心的政治家集体政策制定与执行能力,形成了所谓的“2001年体制”,政治派系的重要性大为降低,自民党派系领袖的实力不再成为左右首相权力的条件,行政机构在改革后也焕然一新。

制度性改革防止了日本经济的继续衰退,但因为错失良机,制度性改革本质上是“蒙混过关式”的,只有在面对很强压力、别无选择时才相继选择,改变得太少太慢,时间拖滞过长过久,没有在危机时刻毫不犹豫地实施一系列具有前瞻性的政策。这样的改革自然导致日本很长时间里无法建立新的经济增长机制,而旧的经济增长机制在改革中却已经被破坏殆尽了。日本经济在新旧机制不断的摩擦和冲突中渐渐失去了活力。

① 包霞琴,臧志军主编.变革中的日本政治与外交[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4:111—113.

② 王新生.政治体制与经济现代化:“日本模式”再探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268.

③ 包霞琴,臧志军主编.变革中的日本政治与外交[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4:106—108.



中国渐变式改革事实上已经形成路径依赖症，改革活力正逐渐消失。未来一旦我国的房地产泡沫破灭，地方政府很可能被动应对，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的政策需要照顾地方政府的感受，激进的改革措施很难及时推出，如此的话，我们将很可能重走日本泡沫后的道路。只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我们在这条路上也许会走得更艰难一些。

事实上，我们已经在朝这方面努力了。约占地方总债务 43%，总额在 4.6 万亿元的债务在 2011 年、2012 年两年集中到期，很明显，要还款是有问题的。于是管理层决定将占全部地方平台贷款三成的约 2.8 万亿元贷款转为一般公司贷款，这样就降低了地方政府债务违约风险，从而使地方财政脱离了“无限连带”责任，公司贷款就只是公司与银行之间的事情了，只用承担有限责任。

事实上，这两年中国的银行都赚大发了，给政府背点烂账那是应该的，何况银行都是国有或国有控股的，最终的买单者是全国人民。

第三，“软着陆”变成“硬着陆”。

概率：20%。

这种结局可能是最坏的，但祸福相依，因为最坏，我们也可能为脱离最坏而进行惊险的一跃，说不定就跳到最好的去处了。不过，这种转换很难，通常伴随着暴力与剥夺，更何况大衰退导致的混乱局面是谁都不愿意看见的。

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有着深厚的制度基础，如果我们不能尽快从制度上寻求解决办法，而是为推迟泡沫的破灭继续像“末日博士”鲁比尼说的那样“豪赌恶性经济增长”，那我们可能很难寄望有好的结果。2009 年我们开动机器大撒了一把人民币，造成了经济持续繁荣，现在虽然全球流动性更甚，但我们似乎不敢再来一次撒钱式的繁荣。

其实，不再撒钱是不可能的。中央银行说 2010 年年底“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1 万余家”，“平台贷款占当地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的比例基本不超过

经济如此 , 你要早作打算

30%”，也就是不超过 14.376 亿元；银监会统计则是 9 万多亿元，两者之间有差距，但据说口径不一样；国家审计署的结果却是 10.7 万亿元。总之，数目都不小，一个子儿一个子儿地数的话，够忙乎几辈子的。

现在地方政府不仅还在想法找钱，而且已经把心思放在如何赖账上面了，如果我们继续在老路上走下去，未来两三年之内持续撒钱加大政府投资，放大政府债务危机，那么不仅经济转型会越来越困难，而且通货膨胀也将失控，一旦地方债务还款危机的潘多拉盒子打开，经济泡沫也将失控并“砰”的一声脆响后急速破灭。

世界性金融危机已经彻底改变了我国面临的经济环境。出口空间越来越小，中国出口欧美已经遇到大麻烦，寄望于欧美经济快速复苏后再在老路上走的想法事实上已经破产；投资的边际效率越来越低，人口红利也基本消耗殆尽，刘易斯这个“拐点”已经出现在中国土地上，居民消费的提升也始终只见打雷不见下雨。

而我们的资源分配更加向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倾斜了，企业的技术创新始终停留在简单的模仿上，经济结构调整喊了若干年，却依然停留在全球价值链的最低端。看看我们各大电视台的广告，黄金时段铺天盖地的都是酒，似乎喝了它们我们就走向了海洋，就有了几千年的文化，就吸收了五谷的精髓。

看来，我们都有些晕。在酒的熏染下，我们似乎还没觉察到我国面临的国际政治环境也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曾经给我们提供了有利经济发展环境的“9·11”已经过去，西方将不再按照是否支持反恐进行政治划界，意识形态、政治体制将成为其最重要的考量。

在世界大国里，中国是孤独的，如何再次融入世界应该成为我们现在思考的大问题。一个国家只靠酒是不行的，麻醉一下神经可以，但真要走出去比拼，还得靠科学技术或资源。

在上述三种选择中，最好的结果是可以期待的，但我们能否走上这条



路，有没有勇气走完这条路，目前看来条件还不成熟，因为如果没有强烈到使我们不得不进行选择的外部冲击，我们很难主动走上这条路。

韩国、中国台湾之所以转型顺利：一是因为经济体相对较小；二是不得不接受外界的耳提面命；三是自身有深刻的危机感。泰国和印度尼西亚虽然也接受了IMF援助附加的改革条件，但因为没有如韩国和中国台湾一样的危机感，所以改革相对不彻底，经济的恢复速度自然也就难以相提并论。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期待上帝与我们同在。中华民族好不容易站起来了，千万不要再次趴下。与日本泡沫破灭时相比，我们有劣势，但更有优势，那就是制度改进的余地远比日本大，技术创新、消费提升的空间也是国土逼仄的日本不可比的，我们完全有条件形成依靠国内消费支撑的大陆经济体。

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城乡差距巨大，社会保障体系相对脆弱，这是坏事，但在中国泡沫破灭之时也可能会变得不那么坏，甚至为中国经济“软着陆”提供良好的缓冲平台。

城乡分割使政府可以花比城市里更少的资金暂时缓解大规模失业带来的巨大冲击；而矫正扭曲的城市化所带来的发展潜力可以再次激活广大乡村的活力，长期来看可以在城乡之间形成良好的互动；地区不平衡为产业的转移和递进提供了充分的余地，中国的制造业完全不用像日本一样转移海外，造成产业空洞，但国内的这种产业转移应该是更少污染、更高层次的转移，而不是高污染、高消耗的简单移位；而中国企业较低层次的技术创新改进的余地也非常之大。

当然，在一个快速变化的经济环境中，好与坏的转换常常是可以瞬间完成，如果处理不当，好的也会变坏，而坏的会更坏。

● 制度创新奠定未来

未来的中国经济能否续写辉煌，将完全取决于我们能否从制度上正确

经济如此 , 你要早作打算

应对新的挑战。

美国经济学家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认为，路径依赖对制度变迁具有极强的制约作用，如果路径选择正确，制度变迁就会沿着预定的方向快速推进，并能极大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来从事收益最大化的活动，促进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这反过来又成为推动制度进一步变迁的重要力量。双方呈现出互为因果、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局面。

如果路径选择不正确，制度变迁不能给人们带来普遍的收益递增，反而有利于少数特权阶层，那么这种制度变迁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而且加剧了不公平竞争，导致市场秩序混乱和经济衰退。这种“锁定”局面一旦出现，就很难扭转，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深有体会。因此，制度变迁的国家必须不断解决“路径依赖”的问题。

我们曾经走在正确的路径上面，偶然事件的发生改变了我们的路径，但我们现在还远没被“锁定”在无效率状态，还可以重新回到改革的快车道上。

不可讳言，我们为追求片面的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社会的公平正义。改革后期，绝大多数居民的福利并没有跟上经济发展速度，经济发展的成果越来越集中于政府、国有企业以及权贵阶层。相比之下，普通大众啧有怨言，但又深感无力改变现实，于是有的开始愤世嫉俗，更多的则变成完全的机会主义者。

如果说，我们的改革共识已经分裂，我们就再没有了改革的凝聚力，那是片面的。我们完全可以通过重新凝聚力量，通过制度性反腐重新赢得民心，通过公平正义与机会平等重新树立党和政府的威信，通过科技进步和国企再改革使中国经济再次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

科技进步和创新是经济增长的首要推动力。创新包括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而在这三方面，我们的潜力都还很大。创新是时髦的，因为中央一直在提，提了若干年了，似乎依然不见多大的成效。之所以不



见成效，一是中国高消耗、高污染、高投入、低廉劳动力、低福利的经济发展模式尚未走到尽头，企业犯不着冒不可知的风险；二是真正的创新确实有些难度，伪科学唬唬人还可以，真要市场化就会变成骗子。

真正的创新没有良好的机制和较大的投入通常很难做到。中国很早就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但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是明显的。2010年中国的研发投入占GDP的总量达到1.7%，略微超出世界1.6%的平均水平；而创新型国家的研发投入已经占到GDP总量的2%，韩国则高达3.1%。

中国科技成果的转化率平均只有25%，距离发达国家60%甚至80%的水平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创新型国家科技创新对GDP的贡献率高达70%以上，美国和德国甚至高达80%，而中国现在科技创新对GDP的贡献率只有40%左右。^①

国企改革是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转型的主要议题之一，也是提高中国经济的公平性和效率性的必由之路。

“现在的国有企业是地道的‘国家强盗’，它们享有政策、资源、垄断地位和权力价格的巨大优势，是经济不公平、腐败、挥霍、低效的主要来源之一。”^②

国企是低效的，这是经济学的常识，也为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在内的事实所证明。近年来，中国出现了明显的“民退国进”，国有企业占有的稀缺资源越来越多，获得的垄断优势越来越明显。但如果将其光鲜的外衣脱掉，我们就知道这些利润来自于垄断与变相的补贴，其真实的资产回报率远低于社会平均水平。

就是这些利润，事实上也只是被国企本身占有，并未惠及民众。1994—2007年，国有企业没有上缴一分钱的利润；2009年，国有企业利润

① 数据引自2011年4月26日的《法制日报》。

② 于中宁，于梦：将国企改革进行到底[J]，财经杂志，2011年第9期。

经济如此 ，你要早作打算

上缴比例仅约 6%，其余利润都在企业内部分配；2010 年，该比例降至 2.2%。^①

当泡沫的潮水退去，也许我们会发现国企正在裸泳，国企将很可能因为腐败和低效成为国民抛弃的对象，那时，中国也许会进入第二轮的国企改革快车道。

国企的深入改革将把中国经济再次带入发展的快车道，但如果国企的再改革不能吸取第一次改革的经验和教训，不能做到公平与正义，再次成为“瓜分的盛宴”，则很可能成为社会矛盾总爆发的导火线，不仅导致中国经济的“硬着陆”，也将导致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的“硬着陆”。

国有企业的近期改革，应立足于公平正义，确保不同经济主体充分、公平竞争，打破国有企业的行政垄断，规范并有效制约国企行为，提高经济效益。终极改革目标应该是退出竞争性领域，不与民争利，转而以实现社会公益为目标。国企的再改革，似乎已提上了日程，但也许我们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按部就班地进行了。只是，不论国企改革的过程如何，我们都必须做到公平与正义。

第三节 自求多福——危机中如何生存

根据产生的原因，危机大致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由于市场之外的某种未预见到的冲击打破市场均衡导致的危机，通常情况下，这类危机都不严重。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和晚期的油价跳涨，以及 2001 年“9·11”恐怖主义袭击，就属于这类危机。

第二类可称为诱导性经济危机，如我国 1993 年反通胀和抑制局部房地产泡沫而出现的经济衰退。这是政府针对市场已经出现的破坏因素主动采

^① 数字引自 2011 年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做的《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与改革》报告。



取的经济行为，虽导致了短暂的衰退，但对于经济的长期健康运行却大有益处。

第三类是由投资泡沫破灭引发的经济萧条，它内生于经济体制中，对经济的破坏程度大，持续时间长。大萧条、日本泡沫以及发端于美国的次贷危机都属于此类危机。

中国经济是一个大泡沫，泡沫破灭之时，不论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措施，阵痛都是难以避免的，持续的时间也会较长。对此，我们不能抱以侥幸的心态，遮遮掩掩，蒙混过关，那将会使我们步入日本一样的“失去年代”，陷入长时间的经济衰条而不能自拔。

从制度上解决问题，自是正道，但对经济体制的重大改革将推迟短期经济复苏。因为这意味着游戏规则的改变，经济体必须重组新规则和旧规则的剩余部分，这种重组需要时间，需要磨合，在重组未完成之前，经济主体面对环境中很大的不确定性，投资也面临更多的风险，经济主体因此倾向于保守，政府刺激经济的计划也无法指望达到旧体制下同样的效果。

泡沫破灭将对我们每个人的经济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作为个人来说，我们不能控制危机的发生，也逃避不了危机的影响。面对泡沫破灭的冲击，我们希望能寻求到有限的求生之道，确保自己不会变得更加贫穷。

当然，并非所有人在危机中都会产生经济损失，如果采取了正确的措施，有的人甚至还可以使自己变得更加富有。未来是不确定的，不可预知的，但过去通常可以借鉴。历史也许不会重复，但至少是押韵的，不会跑调，我们通过对泡沫史和目前经济形势的了解，也许可以为预测未来奠定一个不错的基础。

● 泡沫破灭终将到来

因为灿烂但不确定的未来而产生幻想，最终合成为泡沫的谬误。历史

经济如此 , 你要早作打算

上任何一次泡沫经济的破灭，都将引发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中国房地产泡沫也不会例外。一旦泡沫破灭，市场信心将很快发生逆转，争夺流动性的战争将不可避免，几乎所有人都竞相出逃。价格下跌，流动性迅速消失，而恐慌的自我强化又将加剧市场的跌势，除非价格下降到足以激发购买行为的程度，或中央银行作为最终贷款人向市场提供满足正常现金流的流动性，形势才会恢复正常。

资产价格的快速下跌不仅导致企业账面财富消失，更糟糕的是这些资产很多都是抵押物，价格的快速下跌将使银行不得不要求追加抵押物或者是将抵押物扣押后设法出清，而这又将加速资产价格下跌的恶性循环。企业或个人大量失去资产，不仅吞灭房地产业本身，也将使相关行业大受影响，并将金融业拖入陷阱。债务违约大量出现，随之而来的是信贷危机，最终影响到几乎所有行业。

财富的快速消失，使泡沫支撑下的虚假经济繁荣很快衰败下去，大量企业陷入困境，不得不裁撤机构人员、降低工资，投资将不再出现，消费将大幅萎缩，经济将陷入全面下滑状态。

随着经济下滑程度的加深，银行偿付能力不断遭到打击，许多借款者相继陷入财务困境，由房地产之外的其他资产保障的银行贷款债务违约率出现大幅上升。无法解脱的经济困境将严重助长悲观主义情绪，而这又将引发更深层次的经济衰退。

目前格局下，中国当然不会陷入所谓的流动性陷阱。流动性陷阱是凯恩斯最先提出来的，就是说即使利率低得接近于零，也不能够使银行贷款、商业投资、消费真正运作起来，从而导致扩张性货币政策失去作用。

由于中国有着特殊的经济体制和金融体系，软约束使政府投资和国企扩张根本不会在乎投资回报率的高低，他们在乎的是投资行为本身，利率更低只会刺激起更多的投资冲动，并会在一定时期内带动经济发展。

2009 年的天量信贷和投资可证明，投资占了我国 GDP 比重的一半，这



是全世界未曾发生过的奇迹。也许，我们还可以走得更远，只要人民不反抗，社会不动荡，天量货币投放完全可以再支撑 GDP 数字未来几年的高速增长。那时整个社会居民只要维持简单的温饱即可，剩下的都是政府消费、投资带动，再次创造一个中国特色的新经济增长模式。自然，如果可以创造出居民一点消费都不需要的经济增长模式，那就更好，但就不知这样的增长模式下还需要居民吗？我想，应该是不需要的。如果真可以出现这种情况，那又另当别论。

只是负责任的中国政府不会继续在这条单纯依靠投资和出口带动的经济发展道路上前进了，因为大家都意识到这样走下去很快就会撞上南墙。中国政府已经在为房地产泡沫“软着陆”准备充气床垫，用保障房投资填补商品房地产投资的下滑，为此需要确保政府平台公司和央企有充足的贷款可以继续大肆投资和扩张。

这在理论上是十分正确的，但麻烦的是政府和央企都意识到自己的投资是无效率的，今后还款大有问题，因此希望通过高明的“财技”，如资产剥离、企业重组等老办法赖账。当政府都开始想办法赖账的时候，银行坏账、信贷危机只好加速爆发，社会信心将快速崩溃。

❁ 高手死在抄底里

中国房地产泡沫这个黑洞，下跌时很可能遇上更黑的黑洞，那就是交易市场上的流动性黑洞。当市场信心崩溃时，流动性突然消失，此时整个市场只有卖方没有买方，被抛售资产的价格下跌与卖盘持续增加并存，又会进一步恶化流动性状况。

此时，除非确实有人需要解决住房问题，比如，不买房子老婆就进了别人的门，或者不买房子就会天天失眠，那为了家庭和健康着想，可以去买，不然，就还是等等再买。如果是投机的话，最好的结果就是收手，千万不要以为现在的房价比高点已经下降了 20%，就欢天喜地地杀进去。这

经济如此 , 你要早作打算

把“下跌的刀”，你接不住的。泡沫的上升与下降一样，都会有一个矫枉过正的过程，最后的下跌阶段可能会更加猛烈。

据说香港有个股神，后来又变为了股评，他就是曹仁超。1972年在香港恒生指数1200点时，他就开始看空，差点被公司解雇；1973年恒生指数从1773点后大幅下跌，到1974年跌至400点时，老曹开始心动了，以为很快就将见底，但人家股神就是股神，此时只是心动但手未动，等到7月份，恒生指数跌至290点后方大胆买入，他拿出50万港币抄底蓝筹股和记洋行，该股已从1973年顶点的43元一直跌到5.8元；可惜，5个月后，恒生指数再度跌至150点，和记洋行也跌至1.1元，曹先生不得不斩仓出局，亏损高达80%以上。

当然，如果你自认为有沃伦·巴菲特那样的大智慧，尽可以去抄底，也完全可以在别人恐慌时大肆贪婪。事实上，巴老爷从未说过抄底的话，在他看来，只要内在价值到了值得投资的区域，就可以买入。

巴老爷自认为终其一生都在追求永恒持股，但真正能找到的对象却凤毛麟角，因此从不轻易说自己在最低价位买到了好东西。他知道抄底只会越抄越低，他尊敬的老师格雷厄姆在1929年大崩溃后，1931年抄底就抄到了破产。

如果能在价格下跌前把价值高估的商品卖出，那自然是最好的投资选择。但如果迷信市场是永远正确的，相信市场说明一切信息，那自然可以等到跌势确立时再行卖出。在下跌初期，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确保流动性。

● 金银靠谱吗

在这一轮世界性经济衰退中，金银成为最耀眼的明星。人们相信当经济稳定增长、各种金融资产普遍流行之时，黄金白银虽然默默无闻，但它们总会在经济遇上困难时挺身而出，不仅可以保值，还可以升值，能够带着它的信仰者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对黄金的这种信任，自有历史给出良



好的证明。

大萧条时期，黄金采掘企业的股票在 1929—1932 年平均上涨了 650%。

20 世纪 70 年代，黄金在西方世界滞胀的背景下，从 35 美元一盎司起步，到 1975 年上涨到 200 美元一盎司，1980 年 1 月上涨到 850 美元一盎司，短短几年，增长了 23 倍之多。黄金开采公司的股票自然也水涨船高，1970—1980 年，标准普尔黄金股指数上涨了 18 倍多，如果将大量的分红计算在内，黄金股在 10 年时间里创造了高达 37.5% 的年收益率，比巴菲特年均 20% 左右的投资回报率几乎高了一倍。

1999 年之后，黄金再次从 250 美元一盎司起步，持续上涨了 11 年，到 2010 年年底达到 1400 美元一盎司，即使在 2008 年情况最糟糕时也取得小幅增长。进入 2011 年，因为欧洲国家债务危机升级，黄金再次大涨，从年初的 1300 多美元一盎司一直上冲至 1900 美元，而同期全球股指却是大幅下滑。

推动本轮黄金牛市的主要因素应该说还是流动性泛滥，2001 年以来，由于发达国家和新型经济体都采取了宽松货币政策，整个大宗商品市场价格在 2001—2006 年都出现了持续上涨的趋势。

2007 年美国出现的次贷危机以及随之发生的金融危机，使大宗商品价格出现快速回落，而黄金则由于避险功能的存在，反而出现了一定幅度的上涨。2009 年，美联储开始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中国也放出天量信贷，从而刺激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反弹，黄金和白银再度成为领涨的品种。2011 年，由于欧元出现危机，金银更是独上高楼。

1975—2011 年，以美元计价的一盎司黄金现货价格走势，如图 5 - 1 所示。

白银走势基本与黄金同步，进入 2011 年，白银更是疯狂，不到一年时间，曾一度上涨了 170%，从 2011 年 1 月 28 日的每盎司 26.35 美元上涨到 4 月 25 日的每盎司 49.83 美元。

经济如此动荡，你要早作打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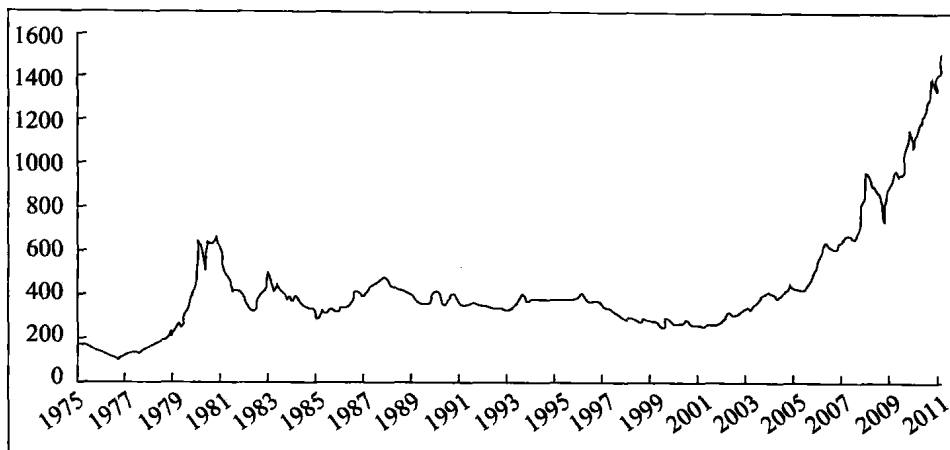


图 5-1 以美元计价的黄金现货价格走势

1975—2011 年，以美元计价的一盎司白银现货价格走势，如图 5-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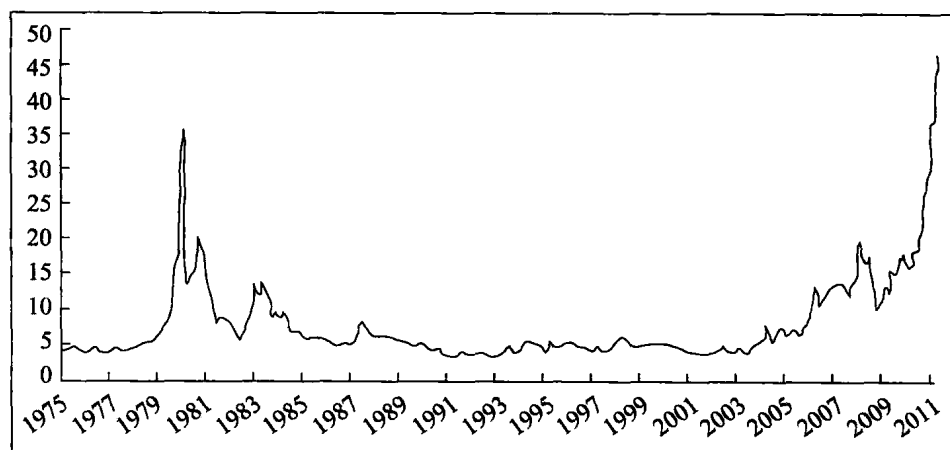


图 5-2 以美元计价的白银现货价格走势

2002 年，我国逐步开放黄金投资领域，2005 年下半年，国内陆续开放个人黄金投资业务，黄金开始成为中国有钱人的主要投资对象之一。2010 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黄金消费国。

尤其是现在房地产投资似乎将很快出现问题、通货膨胀不断攀升的背景下，黄金大受青睐。在很多人看来，黄金的价格肯定会突破 2000 美元每



盎司，甚至很有可能达到 3000 美元。

黄金之所以受到青睐，是因为黄金在历史上曾长期作为货币。当美元走弱时，黄金作为避险工具受到重视，并被认为是真正的货币。现在，人们对信用货币的信心不大，尤其是欧元危机爆发后，人们潜意识里相信这个世界上唯有黄金有资格整理信用货币的分歧，并一统货币纷乱的格局。

但在一部分人看来，黄金早已存在泡沫了，索罗斯在 2010 年年初就认为黄金是最后的资产泡沫，并在 2011 年全部抛空了持有的黄金。当然，他错过了 2011 年下半年的大好机会，正如巴菲特在 2007 年以 10 元多的价格抛空中石油，而中石油当年年底却冲到 19 元高位一样。

未来的黄金，如果欧元解体，完全可能再次出现大牛格局，3000 美元一盎司可能都是低点。但不论欧元是否解体，黄金再次成为货币是不可能的，因为黄金本身的工业价值不高，黄金的珠宝需求是有效需求中最重要的部分，大概占据黄金总需求的 43%。

未来，随着美欧经济复苏，货币走势的转强，黄金很可能再次重复过去的历史。上一次牛市行情是 1980 年结束的，在随后的 20 年里，一盎司黄金的价格从 850 美元跌至 250 美元，暴跌 60%。

金本位早已死去，且将不再会有机会出现，认清这一点，也许将可以使那些黄金的崇拜者明了未来的黄金走势。

2011 年 7 月，美国众议院货币政策委员会主席罗恩·保罗与伯南克在一次听证会上就黄金进行了一次有趣的辩论。

保罗：“你认为黄金是货币吗？”

伯南克：“不是。”

保罗：“它不是货币？”

伯南克：“它是贵重金属。”

经济如此 ，你要早作打算

保罗：“黄金作为货币有六千年的历史，莫非是某人突然将其逆转，废除了这一经济法则？”

伯南克：“好吧，它是一项资产。你能说国债是货币吗？我也不认为国债是货币，但它是一种金融资产。”

保罗：“那么各国中央银行为何持有黄金？”

伯南克：“呃，这是一种储备形式。”

保罗：“那它们为何不储备钻石？”

伯南克：“好吧，这是一种传统——长期以来的传统。”

保罗：“但是，有些人依然认为它是货币。”

伯南克的回应再清楚不过了，仅仅因为某种东西有价值，哪怕是巨大价值，也并不意味着它就是货币。黄金曾经是广泛接受的交换中介，但现在不是了，它只是投资品。

在黄金的牛市中，很多投资者研究出各种理论来证明黄金不再是边缘的投资品，它可以预防弱势的美元、动荡的全球经济、失灵的中央银行以及严重的通货膨胀。在他们看来，如果市场开始动荡，黄金的价格自然就会上涨。但黄金终归只是投资品。

尽管中国在国际市场上是黄金的大买家，但却依然没有定价权，黄金市场的牛市早晚会结束。我们在享受狂欢的时候，需要保持高度的警惕。2005年年底中国为缓解国内泛滥的流动性而开启的个人黄金投资门可能是旋转的，但并不一定会通向金光灿烂的大道。

外币与本币的纠结选择

事实上，现在持有现金（包括储蓄、国债等）并不是一个好的投资策略，通胀将使之快速贬值。如果非要持有现金，以确保每天晚上可以关上门沾着唾沫点算自己的财产，满足那点葛朗台的心理需要，那么适度持有



一些外币是应该的。

在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下，这样说似乎很弱智。但真正的弱智是不会傻到讨论这个问题的，他们只会说，在人民币升值的时刻，坚决不要关注外币。于是乎，人民币似乎真的升值了。

是的，自2005年7月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兑美元从8.07升值到2011年10月的6.37，升值了21%；而同期国家统计局公布的CPI指数，却累计上涨了34%。更可怕的是，我们自身对物价上涨幅度的感受远不止如此。房价从2005年到2011年，全国平均大约涨了两倍；粮油也涨得被发改委约谈，而约谈的结果却是方便面分量越来越少，饮料包装瓶越来越小；白酒三番五次地涨价，汽油上去后就不想下来，而“豆你玩”、“蒜你狠”、“糖高宗”不断跳出来刺激大众的神经，弄得官方CPI数字更显羞怯了。

人民币升值在国内是一个伪命题。自启动人民币兑美元升值机制以后，人民币实际购买力正走向升值的反面，越来越不值钱，“毛”得厉害。我们其实根本就不想让人民币升值，因此升值策略变成了“对美元名义升值，对内通过通胀事实上贬值”，以弱化人民币升值压力。这种策略的必然走向就是通过国内居民财富的隐性掠夺补贴银行、贷款企业、出口企业，最终助长资产泡沫。

人民币对外假升值，对内真贬值。说假升值，主要是指相对于美元，人民币是升值的；但由于美元在危机后狂贬不已，人民币兑欧元、英镑、澳元、瑞士法郎、日元等却是贬值的。

人民币的国际购买力并未提高，反而是降低了，这就有了所谓的输入型通胀的说法。于是我们对于通胀和资产泡沫就更可以放任不管，在某些人看来，这就更证明了西方世界要搞垮我们的阴谋。

如果未来中国经济有什么闪失，千万记住，那是外部世界结盟对付中国的结果。中国人是喜欢阴谋论的，我们老祖宗玩出三十六计和若干兵法

经济如此 ，你要早作打算

的时候，西方大多数地方还处于蒙昧时代，美洲除了少数几个印第安人在游荡之外，几乎就是一片荒芜。而老外竟然敢在几千年的文明面前玩弄阴谋，那应该是如同找死一样，只是，老外不管，而中国的很多人却日益担心自己沦为其阴谋的牺牲品。

就算人民币真的升值，我们的小日子也未必好过，最基本的问题就是物价是否会降下来。如果说真升值了，进口的原油、矿石、奢侈品什么的便宜了，但这些降价的好处真能落到小老百姓手中吗？可能未必，君不见国内汽车比国外至少贵 50%，奢侈品至少贵 20%，汽油也是只涨不跌，而央企这些年账面上赚了大钱，但就是不分，也不上缴国库。真升值的话，可能的结果就是外汇占款大幅增加，国内流动性因此更加过剩，资产泡沫更大。

尽管外界，主要是美国对人民币升值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但人民币目前是否真有升值空间在一部分人看来是值得怀疑的。中国与欧美间巨额的贸易逆差是经济表象，背后却是日本及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大肆通过向中国转移产能，将她们与欧美之间的贸易逆差向中国这个世界组装工厂转移的结果，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代人受过。

亚洲金融危机之前，日本及东亚其他经济体和欧美间存在贸易逆差，因此直接承受欧美的贸易压力。危机过后，日本及东亚其他经济体加速了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将大量产能转移到中国，到次贷危机爆发前，事实上已经形成欧美、中国、日本及东亚其他经济体之间贸易的三角关系。

当然，中国本身也有一点贸易顺差，但中国本身的贸易顺差是通过贱卖资源、高污染、低工资、低福利政策好不容易换来的，如果不考虑这些，中国本身甚至还会给日本等国倒贴成本。正如德国一位政治家所说，如果考虑上环境污染等因素，中国近几年的 GDP 增长可能会是负数，GDP 如此，贸易顺差焉能不如此。

在外部看来，人民币贬值的可能性正在加强。早在 2011 年年初，一些反向投资者就认为，中国经济是一个等待破裂的泡沫，有着巨额债务，随

着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必然会导致金融危机及经济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也将贬值。

一些对冲基金已经开始大胆押注人民币贬值，尽管“就算人民币崩溃的可能性很小，然而崩溃可能带来的获利非常高，令人难以忽视”，人民币“做空交易的潜力非常巨大，在目前形势下有着廉价保证时，不相信就太傻了”。^①

做空中国已经开始，2011 年在美国证券市场猎杀中国造假的上市公司只是前奏，只是嗜血者大战前的一次演习，而标准普尔、穆迪等评级公司也相继下调了中国房企信用评级。华尔街资本大佬已在摩拳擦掌了，索罗斯裹挟重资已重返香港地区，对内地虎视眈眈；高盛已向其全球会员正式发出“解除人民币升值头寸，改为做空”的建议。

如果您希望保障自己的财产安全，那么在泡沫破灭之时请远离人民币现金投资。如果您需要足够的流动性，那么可以选择相对坚挺的外币，如前期的澳元、英镑、瑞士法郎等，美元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欧美国家的货币政策本质上都是坚定的反通胀支持者，他们不会因为追求盲目的高经济增长而有意滥发货币。

❁ 大宗商品还会持续看涨吗

毫无疑问，过去 10 年是大宗商品的牛市，10 年里只有两年下跌，分别是 2001 年下跌 18.8% 和 2008 年下跌 41.3%，而同期的中国股市却是 10 年 6 跌，最高年跌幅达到 65.04%。

支撑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因素主要有三个：一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对大宗商品有着大量的需求；二是全球流动性泛滥；三是投机的需求。未来可预见的时间内，只要这三个因素依然存在，稀缺的大宗商品价格就

① 谁在押注人民币贬值？[N]. 华尔街日报，2011 年 6 月 22 日。

经济如此 ，你要早作打算

将持续上涨。

据世界银行预测，世界人口将从目前的 67 亿人增加到 2050 年的 91 亿人，而世界经济发展的模式中长期内都无法脱离目前的模式，对大宗商品的需求将会有增无减，而投机资金的大肆进入很可能将价格推离基本面。

事实上，大宗商品已经逐渐成为全球机构及个人投资者资产组合中的重要部分，投资于大宗商品相关基金的资产规模，已从 5 年前的基本为零，迅速增长到 2010 年年底的近 1500 亿元，并还在高速扩张中。据日本野村控股公司的研究，人均国民总收入低于 1000 美元的国家，其收入每增加 10%，金属消耗量就会随之增加 10%，粮食消耗量增加 6%，能源使用量增加 4.25%。^①

据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发布的数据，到 2020 年，新兴市场的能源需求预计将增长 27%，而发达国家的增幅仅为 8%。与此同时，能源供应依然紧张，世界原油储备中的很大一部分要么深藏海底，要么储藏在难以开采的加拿大油砂之中，或是位于政治形势不稳定的国家。因此，在很多人看来，押注石油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很多机构都看好铜、铁矿石、铅、煤炭等大宗商品的投资前景。

过去中国对大宗商品的牛市提供了需求支撑，因为中国的高速发展似乎永无尽头，外资投行自然也一路高歌。高盛集团表示，2011 年直至 2012 年，大宗商品投资回报进一步增加；瑞银看好大宗商品，理由是供应有限但新兴市场的需求增长，投资者的兴趣浓厚加上市场规模偏小，而这一切将会推高价格；摩根大通也看好大宗商品，因为中国将依然决定大宗商品的市场需求。

如此之多的看好，却并未阻止 2011 年的大宗商品大跌。从 2 月份开始，国际市场上，有色金属、棉花、橡胶等就开始触顶回落，呈现一波持

① 稀缺性决定大宗商品的投資价值 [N]. 华尔街日报，2011 年 5 月 5 日。

续调整行情；5月份，原油、黄金、白银等纷纷暴跌。一些机构表示，大宗商品的暴跌，可能是市场泡沫开始破灭的表现。

另一些人则坚持认为这只是上涨过程中对不坚定者的有效清理。著名的“做空者”约翰·鲍尔森表示，未来3~5年，随着美国 and 英国大幅增加货币供应量，金价最高可能会涨至每盎司4000美元；吉姆·罗杰斯也表示，油价可能继续攀升，因为全球石油储量正在减少。

目前，世界经济的复苏还处在未定之途，欧美债务危机和赤字问题还未找到解决的办法，欧美经济正在陷入第二次衰退，市场信心明显受抑。中国本身也面临诸多问题，经济发展模式需要转型，经济结构需要调整，贫富悬殊需要改变，而以房地产为首的资产泡沫也需要得到清理。要解决这些问题，中国要保障经济发展不会出现大的问题，且外部拥有良好的经济环境，这样才能确保中国经济的平稳转型。

如果中国不管外部世界经济，执意通过加大投资继续拉动国内经济增长，继续担当全球成长的发动机，那么中国将暂时为稀缺的大宗商品提供底部支撑，大宗商品也可能因此再次进入新的牛市。但当世界经济复苏之时，几乎就是中国经济不可避免地衰落之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千万不要对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大宗商品投资波动幅度很大，风险很高，未来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一旦中国出口受阻，国内经济因泡沫破灭出现大幅回落，中国很可能不得不大幅减少甚至停止购买原油、煤炭、铜和其他大宗商品，而外部世界又不能及时填补中国形成的空缺，那么大宗商品的价格很可能面临雪崩的局面。

当然，如果“中国模式”顺利出口到俄罗斯、印度等新兴大国，全世界再次出现对资源的抢夺，那么以石油、铁矿石为代表的大宗商品持续的牛市自然是理所当然的。

经济如此 , 你要早作打算

紧抓住农产品与土地

农产品的价格近年来一直处于上涨趋势，有人说，目前已进入世界性的农产品牛市。糟糕的天气和各国不断增加的需求将持续推高农产品价格，此外，投资者扩大了对农产品的购买，有的甚至开始收购农田和水资源。在中国，由于国情的限制，收购农用土地是不现实的，面临很多法律障碍，水资源的交易也没有市场，但农产品投资还是可行的。

新兴市场正经历人口的巨大增长，世界人口到 2050 年将增加 30% 左右，但人类的耕地资源已不可能增长这么多。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所长、粮食经济学家布劳恩指出，“农业生产增长率大致维持在每年 1.2% 左右，但是这一增长率却无法赶上人口增长和由此而来的对粮食需求的增加”。

中国因素再次凸显了出来，一些投行因此认为农产品“上涨不再需要其他理由”。根据美国农业部公布的数据，2010 年中国首次成为全球进口美国农产品最多的国家。分析人士指出，这意味着中国对国际粮食市场的依存度增强，对世界粮食市场来说具有“战略意义”。

但中国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却不愿意支持这个说法，在中国的统计数字里，中国粮食自给率依然在 99% 以上。事实上，中国统计的进口粮食只包括玉米、水稻、小麦等作物，不包括大豆等经济作物。中国在 2010 年进口大豆 5480 万吨，占全球大豆交易总量的 60%；此外，还进口了 260 万吨的棉花，157 万吨玉米，120 万吨小麦。如果加上经济作物，中国的粮食自给率已经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 90% 以上降到了现在的 70%。

我们的官方数据之所以能保证几乎 100% 的粮食自给率，是因为我们将有限的资源都用于保证水稻、小麦、玉米等主要农产品的种植，而大豆等经济作物的供给则通过国际市场来解决。中国对外依存度高的农产品种类包括大豆、棉花、植物油和食用糖等品种。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的推进，我们将失去大量优质的农田，中国

的粮食自给率很可能将进一步下降。据估计，如果中国的城市化率达到80%，那么粮食自给率可能会下降到50%。一旦中国粮食自给率下降，必然会推高国际市场农产品价格。

2000—2006年，中国农产品进口额年均增长18%，在世界前15个农产品进口大国中增速最快，而这一势头目前仍在发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预测，中国粮食净进口量到2020年将达到2224万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进口国。

中国的粮食生产形势是严峻的。近年来耕地数量大幅减少，耕地质量也在下降，农作物种植开始失去对有害病菌的抵抗力，农作物品质、产量每况愈下。更要命的是，受污染耕地大幅增多，环保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早在2006年全国受污染的耕地就已达1.5亿亩，污水灌溉污染耕地3250万亩，固体废弃物堆存占地和毁田200万亩，合计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10以上。

最新的非官方统计数据显示，我国被污染土壤已经占到了全部耕地总面积的1/5。^①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从2009年起，我国全面实施粮食增产1000亿斤的战略规划，这在一些专家看来，无异于涸泽而渔，所付出的生态代价太大。农业污染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污染源，但我们对此却熟视无睹，因为我们要保证粮食生产，又不愿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和补贴，没有从根本上转变农业生产方式。

这是短视的，是盲目追求GDP增长的必然结果。而在广大农村，农民已经不愿意进行更多的粮食生产，大量年轻劳动力外出打工，老人已经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在四川、湖南等很多省市，80%以上的农业生产劳动力都是本该颐养天年的老人。

对我们来说，国际上几乎全是坏消息：俄罗斯、乌克兰等停止了粮食

^① 中国粮食安全面临新抉择 [N]. 中国产经新闻报, 2011年2月28日。

经济如此 ，你要早作打算

出口，美国玉米产量下降，同时加大了生物燃料开发。全球脆弱的生态系统和日益增强的环保压力，事实上已经无法再为农业领域的超常发展提供土地支持，未来全球也许将很快告别供求平衡时代，中国对外依赖严重的经济作物也许存在历史性的重估机会，这对于国家来说是不幸的，但对于投资者而言，可能是不错的机会。

警惕中国股市

房地产泡沫崩溃并不能给股市带来上涨动力。中国证券市场自诞生开始就是一个泡沫，也许，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将同时使股市泡沫得到彻底的清理。

如果要投资股市，可以将眼光放到外部市场，比如美国的金融股就是不错的选择。至于香港市场，由于支撑恒生指数的多半企业都是红筹股或者 H 股，未来内地经济的不振必将对香港市场造成很大的影响。自 2000 年以来，香港市场逐渐脱离美欧市场，转而与内地市场同步了。

科技股，历来都是高风险、高收益的代表。中国一直在抓高科技，尽管航天、国防等领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市场化的渠道却一直未打通，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明显不足。如果寄希望于在深圳创业板上发现真正的高科技，那还是早点洗洗睡吧，别费神了。

对中国股市的投资一直以来都是散户们对有关机构和内幕人士的慈善赞助，经济萧条时期还是少行点善吧。

回归实业和高科技

实业救国，曾经是晚清和民国很多知识分子的理想与追求，但很遗憾，那时的实业救不了国，甚至这些知识分子连自身的命运也挽救不了。在高尚以至于脱离了物欲的主义面前，实业是卑贱的、庸俗的，注定将成为一种罪孽。



但主义因为过于高尚，现世中难免显得苍白，空喊了一阵口号之后，事实上只有实业方是正道，其余的都是胡乱折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的其实就是新形势下的实业救国道路，不然，中国焉能成为所谓的“世界工厂”。只是，近年来，我们开始跑偏了，泡沫化挤占了实业发展所需要的资源，产业结构始终得不到提升，制度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小。

我们需要回归实业的正道。

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在题为《为了21世纪的科学》的研究报告中强调，“科学技术对国防和经济从未像今天这样不可缺少”。工业革命已降，技术进步已然成为经济发展的首要推动力。19世纪的“机器时代”，20世纪初的电气化、半导体，现在的互联网，先后推动了经济的大发展，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未来，我们在海洋工程、生物、环保、新能源、新材料、网络与信息等方面的技术创新优势将有力推动人类经济的再次发展。

基础研究耗资巨大、耗时漫长，非一般企业可以承受。我国的很多基础研究居世界前列，但我们缺乏将这些研究顺利转化为经济利益的制度机制。我们需要搭建有效的制度转化平台，鼓励中小企业进行应用性研究，从而形成企业核心竞争力。在经济萧条之时，中小企业的创新将是我国经济尽早复苏的重要一环。

未来是不确定的，泡沫破灭过程也面临很多变数，对投资者个人而言，要么遭受损失，要么大获其利，没有所谓的中间道路。因势利导，分散风险，是逐利的根本。在泡沫破灭之时，寻求有效的投资组合，而不是豪赌单一品种，将有助于规避风险。

从长期来看，泡沫只是经济过程中的短暂瞬间，是破坏，但也是重建的开始，是财富可能的损失，也是新财富诞生的机会。

技术革命在带给人类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在快速消耗地球上的资源。

经济如此 , 你要早作打算

未来人类的发展，短期之内还脱离不了目前的发展模式，资源的占有和消耗将决定经济的发展程度，因此寻找新的能源、新的资源将成为很长时间内人类面临的主要问题。对资源的争夺和占有注定将成为国与国之间竞争的核心，而纯粹信用下的金融体系，在这种竞争面前将会面临失去信用的风险，美元如此，欧元也将会如此。

而全球共同认定的通行的共同货币短时期以内将不可能出现，特别提款权是不错的构想，但远不能形成共同的货币基础，回归金银当前看来也不现实。因此，贸易体系与金融体系之间的恩怨情仇，泡沫与财富间的纠缠，大国之间的博弈，等等，都将屡屡上演。

在这种格局下，金融动荡之时，金银作为长时间的曾经货币，会不时站出来整理货币之间的分歧，但如果寄望于金银再次成为货币是不可能的了，因为人类在信用货币下已走得足够远，再回头时伊人已杳然。寄望于附生在别国掌控的国际金融秩序为国家财富升值保值，无异于缘木求鱼，美国国债不是安全的，它与希腊国债没有本质区别。

构建适应自身的金融体系，对资源尤其是稀缺资源的抢占，对新能源、新技术的追逐将成为国与国之间较量的资本。这些与金银一样，不是货币，但却是财富，需要开发和坚守。衡量一个国家的实力，不仅要看政府外汇储备的多寡和本币增发的多少，还要看拥有了多少资源以及对于高新技术的开发与运用程度。

● 资产泡沫是经济动荡最突出的体现之一。遗憾的是，迄今为止人们尚未建立起解决资产泡沫的制度性安排。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兼首席风险官 汪建熙

● 中国房地产市场是全球经济主要风险源之一，泡沫不断累积的快感正在演变为痛楚，面对经济增长趋缓的形势，我们唯有进行制度性改革方可渡过难关。

——《财经》杂志原主编，《新世纪》周刊总编辑 胡舒立

● 我们可能正好处在市场波动极为疯狂的时间段，没有一个人能确定市场的正确方向，泡沫是不可避免的。

——香港证监会原主席，中国银监会首席顾问 沈联涛

上架建议：宏观经济

ISBN 978-7-5454-1216-1



9 787545 412161 >

定价：45.00元